

# 大外交家

第一卷

执掌外交部

李连庆 著

周恩来



人民出版社

# 大外交家

周恩来

## 内容简介

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党和国家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大外交家周恩来》共分 6 卷，本卷主要描写了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被委任为国家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立即出访苏联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接着投身于抗美援朝的外交斡旋，成功地与正面战场配合，逼使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低下了头，从而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 大外交家

第一卷

执掌外交部

李连庆 著

李连庆

责任编辑:王 萍  
封面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吕 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外交家周恩来:全6册/李连庆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6802-9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1956号

## 大外交家周恩来

DA WAIJIAOJIA ZHOU ENLAI

李连庆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37.75 插页:12

字数:1980千字 印数:00,001—30,000册

ISBN 978-7-01-016802-9 定价:378.00元(全6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 序

李连庆同志的新作长篇纪实文学《大外交家周恩来》出版了。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它为当代和后人研究周恩来的生平又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好材料。

举世周知，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者和奠基者，是世界公认的伟大外交家。他在外交上的成就和建树，在中国和世界外交史上是首屈一指的。他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崇高的国际地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那高超的外交战略战术思想，灵活的外交技巧，崇高的道德品质，超人的天赋才华，独有的外交风格和巨大的魅力，赢得无数朋友们、各式各样的对手乃至敌人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重。周恩来是中国的骄傲！

李连庆同志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经常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教诲，同时也对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进行过比较深刻而广泛的研究，熟悉和掌握大量的资料。李连庆又是一位作家，出版了许多文学著作。这些都是他得天独厚而别人所难有的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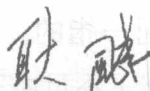
《大外交家周恩来》主要是依据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大量史料创作的。在选材方面，作者特别注意那些体现周恩来非凡性格和光照日月的材料。为了增加作品的艺术性和生动性，作者在某些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描述上、语言表达上，尽量将丰盈的生活

## 大外交家周恩来

细节糅进去，使宏观的历史框架和人物的具体活动有机交融。通过历史事件了解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又通过他的外交生涯了解他的精神风范，令人顿悟，令人起敬。以史为文，文史结合，纪实文学才有感染力。本书作者在这方面是做了努力的，而且用纪实文学形式写领袖人物也算是国内第一次才有的。作者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大外交家周恩来》共6卷，写周恩来各个历史阶段外交生涯的主要方面，分“执掌外交部”“舌战日内瓦”“万隆会议展雄才”“鹏程万里行”“行程十万八千里”“光辉映晚霞”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6卷书，将是一幅体现整整一个时代精神、感兴于领袖人民性内涵的五彩纷呈的历史画卷。

是为序。



1998年3月5日

# 目 录

序	耿 飏 1
引 言	1
一、投身革命——一生的转折	12
二、外交部点将	36
三、出访苏联缔结条约	65
四、朝鲜战争爆发运筹于中枢	86
五、再访苏联谈军援	131
六、出兵朝鲜与外交周旋	147
七、美国人发出和谈信号	188
八、开城谈判针锋相对	223
九、谈谈打打有进有退	259
十、率团访苏与中苏朝蜜月期	308
十一、上甘岭战役后谈判重开	345
十二、停战协定终于签字	380

## 引言

秋天是北京的黄金季节。天高云淡，碧空万里，气候温和，鸟语花香，水波荡漾，层林尽染，一派美丽、迷人的景象。“骏马秋风刮北”，可与“杏花春雨江南”媲美。

1949年10月1日，北京这个已有3035年的历史古都，以最好的气候，最动人的姿态，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迎接人民自己推选出的政府，迎接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令人敬仰的领导人主持国家的大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翻开了中国和世界崭新而又有深远意义的一页。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旁边一个极其简陋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处理各种急务。秘书小何走进来说：“周副主席！您不是昨天约好今天下午一时半同毛主席一道去勤政殿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吗？”

周恩来猛一抬头，习惯地看一眼手腕上的表，笑呵呵地说：“可不是到时间了嘛！小何，感谢你的提醒，开第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就迟到，那可不好啊！我们今后办公要正规化，必须严格遵守时间，改变过去的游击作风。”他边说边站起来朝外走。

周恩来一贯动作迅速敏捷，走路像一阵风。周恩来走出办公室的门口，忽然猛一回头：“小何，你看我今



天这身衣服怎样？”

周恩来从来生活简朴，但十分注重仪表。

他今天穿一身黄色卡其布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皮鞋，整整齐齐，服服帖帖，显得英气勃勃而又潇洒自如。

小何仔细端详一番，觉得周副主席本来就长得浓眉大眼，面容清秀，身材匀称，风度翩翩，一直被人们公认为美男子，今天又穿了这身九成新的刚刚熨得笔挺的衣服，显得格外英俊，很有魅力。他说：“衣服倒是挺合身的，可惜是布料子，要是毛料那就更精神了。”

“你这小鬼，有卡其布料的衣服就很不错了，还要毛料的。国家这么穷，百废待兴。我们共产党人要勤俭办事，不能奢侈浪费。”周恩来对下面的人讲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即使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从不声色俱厉，但是对领导干部却要求非常严格。

周恩来走到颐年堂门前，毛泽东差不多也同时到了。

“啊，恩来，不，总理阁下！”毛泽东操着一口湖南方言，半开玩笑地说。

“主席，你又开玩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还未通过对我的任命呢，你这样称呼是不合法的呀！”周恩来笑眯眯地看着毛泽东。

“对，我们已是执政党了，再也不能以党代政了。”毛泽东也笑眯眯地拉着周恩来的手，两人同时迈着矫健的步伐，英姿勃勃、气宇轩昂地向着勤政殿的方向走去。

“主席，今天休息得好吗？”周恩来想起今天黎明时分，毛泽东身披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今天下午要在开国大典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来到他的办公室，一起进行修改。当时周恩来正在安排开国大典各项工作，十分忙碌，但他一见毛泽东进来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弄清来意后，同

毛泽东一道逐段逐句商讨和推敲公告的内容与措辞，直到东方太阳升起的时候，毛泽东才离去。所以周恩来非常关心毛泽东的休息。在过去战争时期，周恩来也一向关心和照顾毛泽东的健康与安全。

“我从你那里一回去，就高枕无忧地呼呼睡了几个小时。”毛泽东边说边比画着。然后他两只眼睛紧盯着周恩来的眼睛说：“我从你的眼神看，你又熬了个通宵达旦！”

“我因为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比如检查今天开国大典的各项安排，布置外事组根据我们今天凌晨定下来的《公告》稿，修正外文，还有全国政协会议未了事宜。”周恩来没有掩饰，如实相告。

“这可不行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的身体怎么能担任繁重的任务呢？今后政府工作你是唱主角唱红娘呀，担子比过去更重了，也更繁忙了，千头万绪，一定得注意休息，劳逸结合嘛。”说着他用力捏了一下周恩来的手，表示对这位亲密战友的关怀和嘱咐。随后他话题一转：“我看外事组这几年工作得很不错，是你那个未来的外交部一支骨干力量。”

“是的！”周恩来应和着，“不过，过去他们办的是非官方的外交，现在要开始办正式的官方外交，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还不熟悉，没有经验，还得好好学习，在实践中锻炼。”

“我非常赞同你的意见。在外交上我们要另起炉灶，不仅是彻底、干净地抛弃和改变旧中国屈辱卖国的外交政策，而且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外交队伍。”毛泽东的语气非常坚定。

“我们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和全国政协共同纲领中都已经规定得非常清楚了。今后主要是努力贯彻执行的问题，同时，我们要创造一个独特的外交风格、外交原则，在世界上树立一个榜样。”周恩来充满信心地说。

毛泽东连连点头：“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比前人干得好，也会比外国人干得好。”

毛泽东、周恩来几十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共同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现在，他们又要共同建设新中国。

下午2时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准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场上肃穆庄严，连咳嗽的声音都没有。因为这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第一次会议，而且要任命关系新中国今后发展的政务院总理、外交部部长。政务院乃是政府的实体，主要执行机构，一切方针政策措施都要通过和依靠它去执行，去实施。总理则是主要当家人。外交部部长乃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全体委员都聚精会神，认真对待，虽说人选早已在政协会议上和各民主党派中协商过，并取得完全一致意见，但必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正式决定和通过，才有法律效力。所以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一提名，全体委员便一致通过，任命才华出众、知识渊博的51岁的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任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时势造英雄”。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永恒的真理。中国革命的形势，造就周恩来这个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部长的人才，而国内国际的发展变化，也将造就他成为古今中外罕见的“好总理”“大外交家”。

### 幼承庭训，家道中落

周恩来从小就抱有“为了中华之崛起”的理想。

周恩来于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

安市) 驸马巷周家宅院里。

山阳县是苏北平原上有 16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一直是州、府一级行政机构的驻地，因而也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的山阳郡，隋的楚州，宋的淮安军，元的淮安路，明、清的淮安府，都驻在山阳县。在辛亥革命的后三年，山阳才改名为淮安县。

淮安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的地方，在历史上不仅是漕运、交通的要津，也是我国处于南北对峙时期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历史上人才辈出的名城，如汉朝著名的军事家韩信和文学家枚乘、宋代巾帼英雄梁红玉、明代文学家《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清代民族英雄关天培和画家边维祺等都是淮安人。

淮安的古迹很多。城西北隅有文通塔，城中心有镇淮楼。驸马巷就在文通塔和镇淮楼之间，在巷的南头有一条与它成丁字形相接的曲巷。就在驸马巷与曲巷相交的地方，有一所由两个宅院相连的住宅，一宅门向驸马巷，另一宅门向曲巷，都是曲折的三进院。这处住宅，在清朝光绪后期，就是周家的，主人叫周骏龙，又名攀龙，字云门，曾更名为起魁。

周骏龙是浙江绍兴人。他到淮安是来做官的，先是给县知事当“师爷”，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师爷不算官职，是由主官聘请的幕僚，被尊为老夫子。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在幕后帮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仰仗他们。周骏龙并没有达到攀龙附凤的显赫地位，到晚年，只攀了一个七品官的职位——山阳知县。不料他的前任偏偏是个有后台的人，长期拒不交印。到他正式上任的时候，已经病体奄奄，不久便去世了。周骏龙虽说当了一任知县，却没有发家，只不过用过去一点积蓄，和他的二哥周亥祥合买了驸马巷住宅，除一块坟地外，没有一亩土地。到

## 大外交家周恩来

周恩来的父辈时，家庭的经济已相当困难。

周骏龙有四个儿子，贻庚、贻能、贻奎、贻淦。他们按照封建大家庭的规矩，叔伯兄弟间排名排行，分别为老四、老七、老八和老十一。

老七周贻能，后来改名劭纲，字懋臣，为人忠厚老实。他也学过师爷，但没有学成，只能做点小事情。他的妻子是清河知事万青选的第十二个女儿，小名冬儿，大家都叫她万十二姑。她读过五六年家塾，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结婚后生了恩来（字翔宇）、恩溥（字博宇）、恩寿（字同宇）。

当周恩来出世的第二天，他的外祖父万青选病危，老人在病榻上埋怨冬儿没去看他，因为他生前最喜欢十二姑。别人告诉他，十二姑在生孩子。他深知阴阳八卦，问了孩子生辰以后，说：“好，这个孩子有出息，叫冬儿好好抚养他。”不料万青选的话竟成了巧合的预言，周恩来果然成了闻名世界的伟人。

周恩来生下来以后，他的父母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大鸾。鸾是与凤凰齐名的一种“神鸟”，表示父母对他的宠爱。

在周恩来满1周岁的时候，他的十一叔，也就是他父亲的四弟贻淦病重了。周贻淦刚刚20岁，才结婚1年，新嫁来的十一婶陈氏，他们夫妇没有子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在人们的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恩来的父母那时尽管只有一个儿子，还是把大鸾过继给贻淦了。贻淦夫妇非常感激，并为大鸾请了一个很好的乳母蒋江氏。两个月以后，贻淦去世了。

陈氏带着大鸾住在两间亭子间里。陈氏那时才22岁，年轻守寡，从不外出。她把全部的爱和心血都倾注到大鸾身上，没有他，她就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陈氏的父亲陈源，饱读经史，很有学问，但却没有取得显著的功名和地位。他没有儿子，便把女儿当作家庭教育的对象。陈氏聪明、好学，但她不喜欢经典，却爱好诗词、戏剧、小说和绘画，因此，她广泛涉猎了各种文学读物，成为一个才学出众的女子。她的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办事细心。周恩来称她为“娘”，而称自己的生母为“干妈”。

在大鸾年幼的时候，陈氏就不断地把一些比较通俗易懂的唐诗片段代替儿歌去教牙牙学语的继子，就这样，当大鸾还远远不能理解其含义的时候，已经能背诵许多唐宋名家的诗句了。周恩来4岁时，陈氏就教他识字，5岁起，送他到私塾读书。陈氏对他要求很严，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有一次，一个调皮的兄弟玩刀子，几乎伤着他，这引起她的警惕，大鸾是她的独根独苗，唯一的爱子和亲人呀，她不能允许有任何的意外发生。于是，陈氏就更不允许他轻易出去，整天把他关在屋内念书，空暇时，就教他背诗，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西游记》，那些具有人民性的诗句和富于爱国主义思想或进步倾向的故事，在大鸾纯洁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天天陪着她。陈氏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刻的。40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万氏妈妈是周恩来的生母，尽管她已经将他承继陈氏，但她仍然跟他保持着亲子之爱。万氏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妇女。公公去世之后，这个官宦之家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局面。大伯子貽庚（字曼青）

## 大外交家周恩来

在奉天做个小职员，每月只有十几元的收入，不能养家。两个小叔子：貽奎是残废、貽淦已经夭亡。进钱的门路是没有了，但知县之家的门面要维持，亲朋好友，婚丧喜忧，逢年过节，迎来送往，这一类应酬都要力求维持在当年的水平上才不失体面，这担子都落在万十二姑的身上了。由于她从小跟着父亲万青选出入于官宦门第，经历过比较大的场面，也着实有能力充当这个败落中的周家管家。为了解决经济上入不敷出的矛盾，要典当借贷；为了维护周府的面子，要讲究一定的排场；为了缓和大家庭内部和亲戚间的不和，要多方奔走，排解纠纷。

周恩来6岁的时候，随同他的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外祖父家里居住，并在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外祖父家是个大家，有99间房子，但家里人也很多。

万青选有十多个子女，有做官的，有爱好诗词歌赋的，也有擅长书法绘画的。因此，这个坐落在清江浦西长街的万家，尽管也面临着分崩离析和衰败，仍不失为官宦人家，书香门第。比起周家，毕竟好得多了。万家有宽敞的客厅，幽美的花园，讲究的家具和陈设，丰富的藏书。万家的书房，成了周恩来童年时代猎取知识的宝库。他很聪明，性格中有着活泼的一面，外祖父家同辈的孩子比较多，常在一起玩，使他度过比较欢乐的童年时光，同时学到不少东西。万家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请他母亲万十二姑去调解。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常跟他母亲去，在旁边听着，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

十二姑在万青选生前是得宠的，但她毕竟是女子，在封建家庭中，女子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同时她同她的兄弟万立钧买彩票得奖分得5000元也已用得差不多了，周家经济景况越来越不好，在万家住久了，自然矛盾也多了。为了使周恩来受到较好的教育，

万十二姑和陈氏都主张搬家，并请一个先生教孩子念书。新居就紧靠在万家旁边的一个四合院，有14间房子，书房占了两间，学生为周恩来和他的二弟、两位姨表妹。周恩来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南开中学时规定了五个“不虚度”：读书不虚度，学业不虚度，习师不虚度，交友不虚度，光阴不虚度。据当时和周恩来同窗攻读的两位表妹回忆：当她们还在认方块字的时候，她的表哥周恩来已经捧着厚厚的线装书，在先生面前背诵如流了；当她们还在描红的时候，周恩来已经在练习悬肘，临摹各种名家的字帖了。

1907年春天，当周恩来刚刚9岁的时候，他的生母万氏由于穷、病、忧愁和劳累而去世了。这年夏天，他的嗣母陈氏带周恩来来到宝应她堂兄家住过两个月。在那里，他有一个表哥叫陈式周，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的青年学者，在私塾里教书，有许多藏书，周恩来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并在以后许多年里一直保持来往和通信，还得到他的多次资助。

以后，周恩来随嗣母又回到清江浦。第二年7月嗣母陈氏又因肺结核被夺去了生命。

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的感情特别深厚。他在日本留学读书时在日记中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吟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难受，那眼泪忍不住得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遗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道还想着有我这个儿子没有？”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对记者说：“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后悔着亲恩未报。”

两个母亲接连病逝，使周恩来的生活陡然发生变化，料理完丧事，家里已经是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在他的面前只留下一条出路：带着两个弟弟回淮安驸马巷老家。



## 大外交家周恩来

周恩来回到阔别3年的旧家，还不满10岁，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他除了八婶的温存和蒋氏奶妈的同情以外，等待他的是冷漠、讥嘲、轻蔑和艰难的生活。他为了钱，不得不向亲友借贷，在借贷无门的时候，就拿出他母亲的一点遗物到当铺去典当。

典当来的钱如果是用于自己和弟弟的生活费用，也还罢了。这些钱要用来买礼品，应付亲朋故旧的婚丧喜庆，维持周家的门面。在他的卧室里，贴着重要亲戚的生辰忌日，这些日期像是催命符一样迫使他去典当借贷。有一段时间，连他们家的一部分房产也给抵押出去了。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候伯父寄些钱回来，才缓解一点困境。

这副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几乎使童年的周恩来难以承受。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着并承担着这一切，这对周恩来当然也是一种磨炼，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遇到极其困难的情况，他也能够随时妥善处置。

有一天，周恩来在奶妈蒋氏陪伴下到东门附近龚荫荪家探亲。龚荫荪的母亲和恩来的外婆是表姐妹，恩来叫她姨外婆，叫龚荫荪表舅。在他幼年时，妈妈经常带他走亲戚，姨外婆、表舅、舅妈都很喜欢他。龚家已知道周恩来的处境，对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天资聪敏早有所闻。龚荫荪觉得不能让他把学业荒废下去，就要他到自己家塾来读书。周恩来从此就早出晚归，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龚荫荪的思想倾向维新，后来又成了孙中山的信徒，到过日本，结识一些同盟会的会员，他经常奔走于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在家里带头剪辫子，不信鬼神，不许女儿缠足，主张男女同学。他聘请的家塾老师周先生，是个愤世嫉俗的落第秀才，学问很好，为人也开明。龚家有丰富的藏书，除古书外还有一些宣传近代科学和西方文明的新书和报刊，周恩来把他称作自己政治上的启蒙

老师。1952年他对龚家一位表姐妹说过：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老师。龚家的表姐妹同他共同学习，在一起作组诗、捉“洋鬼子”的游戏。在这里，他获得一些温暖、安慰和欢乐。但只有两年时间，龚家发生变故，搬到淮阴去了。周恩来茫然若有所失，又不得不整天陷入最讨厌的家务生活中去了。

这种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造就了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和管家能力，但也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对封建家庭和习俗的强烈憎恨。

## 一、投身革命——一生的转折

1910年春天，周恩来12岁。他在奉天的伯父周贻庚，生活较前安定。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伯父商量，伯父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这个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就在这时，伯父给他写信，要他去东北，又乘三伯周贻谦路过家乡之便，接他到东北随伯父母一起生活，并上学读书。周恩来喜出望外，他怀着一颗激动的心，向往着新的生活，毅然离开故乡，踏上了征程，开始了少年时代的新生活。

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说：“12岁的那年，我离开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周恩来到了白山黑水的东北，从牢牢禁锢着人的心灵的封建家庭和私塾生活转到刚刚开办的新式学堂念书，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北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是民族危机格外深重的地方。在学校里，教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时局的危急和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一次，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他在

学校读书时，即有明确的求学目的和志向：“基础立于此日，发达俟于将来。”“作事于社会，服役于国家，以其所学，供之于世。”

他在诗作《春日偶成》中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在《敬业》创刊词中，他郑重指出：“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生于外侮日迫、自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安忍坐视而不一救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达了他对黑暗时政的忧愤之情。

他在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举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沸点。”他以国文最佳者，获得特别奖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

他为了“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中华腾飞于世界”。

他在日本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刊，约翰·里德的《震动地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之物语》，幸得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等，比国内的知识分子更早地、更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他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经过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达“笃行”的过程。1919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立即从日本回国，投身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南开大学倡办了“觉悟社”，领导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实践他的爱国志愿和追求真理的愿望，为此而被捕入狱数月。

他于1920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先到英国，刚抵那里就给他的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又说：“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旅欧期间，他在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潜心研究其他各种主义，

## 大外交家周恩来

对各种不同思潮广泛涉猎，经过冷静观察、研究、分析、比较、批判，反复思考，最后才得出结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最科学、能够救中国的。并于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即中国共产党。所以周恩来之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绝不是盲从的，更不是赶时髦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完全自觉自愿，决心为其献身的。他在1922年3月在给天津“觉悟社”战友的信中说：“我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还附了一首悼念战友黄爱的诗，表达他的心愿。

诗曰：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的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展示了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精神境界。

周恩来在伦敦、巴黎、柏林给天津《益世报》《新民意报》《觉悟》等刊物写的近百篇通信、通讯、散文，对当时的欧洲局势和中

国有关事件的发展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对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评论，分析它的内外原因特别是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这为周恩来主持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尤其是分析国际局势，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周恩来在欧洲学习和工作期间，创立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巴黎组织即“旅欧总支部”，并成为其主要负责人，这也为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创造了条件。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临行前旅欧总支部对他的评语是：为人“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说话动听，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能看书看报”。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位能干的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才，也说明他具有外交的才能。

回国以后，他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同年11月就任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不少高级军事人才，如徐向前、陈赓、林彪、左权、罗瑞卿、刘志丹、周士第、王尔琢、许继慎等等，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军衔的政治部主任，并同蒋介石两次率部东征，讨伐陈炯明，接着又升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奠定了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并为他以后在中国开展统一战线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1927年3月，他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军阀孙传芳。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悬赏二万五千元缉拿周恩来。

同年5月下旬，周恩来到了武汉。他在十多天前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军事部长，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常委会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

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

同年的8月1日，周恩来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从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己的人民军队，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1928年，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一道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底，他赴中央苏区，就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后又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身份兼任红军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朱德和他的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恢复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会后，他继续担任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同毛泽东共同指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1936年4月7日，他在李克农陪同下与张学良将军在肤施（后改名延安）举行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协议。

## 西安事变中的周恩来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周恩来应邀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一道，处理西安事变善后事宜，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周恩来到西安这个大风暴的中心，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形势，承



担着极其艰巨的任务。他要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工作；要做留在西安的共产党员的工作；要做东北军、西北军中不同派别和观点的人的工作；还要同蒋介石的代表和蒋介石本人谈判。当时，各种势力和对立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稍有不慎，则不能实现中共中央的决策，抗日救国大业将毁于一旦。

周恩来处变不惊、沉着机智、力挽狂澜。他来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同张学良谈到深夜。他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拥护蒋介石做全国抗日的领袖。他更明确地指出，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截然不同的两种前途：如果说服了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到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蒋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中国的前途更坏更糟。而历史的要求我们争取一个好的前途。

周恩来的意见，张学良极表赞同，认为周恩来比他站得更高，共产党不计前嫌，从民族利益出发，令他钦佩。这样就促使张学良下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又去做杨虎城的工作，向杨介绍了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内容，申述了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的主张。杨听了以后，十分惊奇，感到意外。因他原先估计：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有长达十年的血海深仇，一旦捉住了蒋介石，虽不致立即杀掉他，也决不会轻易放掉他。杨虎城对蒋介石将来能否抗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是否实行报复，有很大的顾虑。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而他则是蒋介石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对其处理和共产党就有所不同了。周恩来对杨虎城的这番肺腑之言，表示理解和同情。

根据他本人同蒋介石多年共事以及后来同蒋打交道的经验教

训，深知蒋介石出尔反尔，说翻脸就翻脸，杨虎城的顾虑不无道理，但是为了抗日大业，只有说服他了，并暗下决心，今后要设法保护他。于是他向杨进行耐心解释。他说，现在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蒋抗日，连国际上也在争取他抗日，美英帝国主义从他们的自身利益出发，希望蒋能制约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争取蒋走抗日的道路。对蒋介石本人来说，现在也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在这种情况下，促使蒋介石改变政策，实现抗日作战，是有可能的。至于蒋介石将来是否会进行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西北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三个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抗日力量，尽管蒋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听了周恩来的分析和意见后说，共产党置党派之间的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实在令人钦佩，自己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杨某无不听从。

周恩来不分白天黑夜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高级军官、将领们和社会各界人士中有不同意见的朋友、知名人士进行交谈，细心做工作，常常废寝忘食。就连在西安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也找他们谈话，分析形势，指出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要求他们排除“左”、右倾的干扰，全力以赴地实现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一再叮嘱大家发动群众，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以保事变和平解决。

经过多方面的紧张工作之后，周恩来亲自同宋子文会晤，在宋子文、宋美龄的陪同下与蒋介石直接会晤。这两位曾经是朋友后来成为冤家的会晤，虽然有点儿戏剧性，但却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了中共和红军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主张。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表示同意并答应实施周提出的六项主张，但他提出要让蒋介石 25 日离开西安。张学良表示愿意亲自

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沉着稳重，考虑周到，他同意宋子文提出的条件，但坚持在蒋介石离开西安之前，签订一个政治文件作保证，而且不赞成25日就离开西安，也不赞成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但是劝阻无效，张学良仍坚持亲自送蒋，并在事先未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就陪同蒋飞往南京。当周恩来得知此事赶往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这样一来，后果十分严重，使得西安处于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之中。

蒋介石到南京之后，把张学良软禁起来，调中央军向西安推进，造成大军压境的形势。东北军中的将领为了营救张学良而发生内讧，一批少壮派军官主张与蒋介石决一死战，救出张学良。他们杀害了主和的王以哲将军。周恩来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认为应以民族大局为重，避免发生内战，力争和谈协定的实施，由此引起东北少壮派青年军官的不满。有一天，几个青年少壮派军官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是一位思想极其敏捷的人，他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他想对于这些青年军官必须首先镇住他们，才能使他们冷静下来，再开导他们。他霍地站起来，猛一拍桌子，威严而又大声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几个青年军官低头不语，气焰收敛。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他们自觉惭愧，流着泪，跪下向周恩来认错请罪。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了。

这时，西安充满了火药味。有人挑拨说，少壮派杀王以哲将军，是受共产党的指使。周恩来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王以哲将军家中安慰家属，帮助料理后事。消息传出之后，东北军高层无不深受感动，一些人解除了对共产党的误会，

从而揭穿了敌人阴谋，稳定了人心，扭转了危局。

王以哲将军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核心人物，也是与中国共产党接触最早的主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他的被害，不仅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失去了维护东北军团结的希望，为蒋介石分化瓦解东北军扫清了障碍，而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地位和力量，南京方面也就乘机施加压力，改变了原办法，提出了一项更不利于东北军、西北军的“陕西军事善后办法”。同时，王以哲被害的消息传出以后，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刻调转枪口向西安开进，声称要为王以哲将军报仇，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此时非常恐慌。

面对这样严重、复杂的局势，周恩来沉着冷静，临危不乱。他一方面让叶剑英派刘澜波到渭南前方，向东北军传达中国共产党坚持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团结，继续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表示共产党反对杀害王以哲将军这一错误行为，将积极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另一方面，他考虑到少壮派军官在发动西安事变中的功绩，明白他们错误地杀害王以哲将军的动机是想救张学良，因此，他毅然决定不避袒护少壮派之嫌，把他们送到云阳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从而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保护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扭转了时局，形成了国内合作抗日的局面。周恩来在这个事变中忠实地、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成了人民的重托，为挽救中华民族立下了千古不朽的功绩，表现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少有的英雄气概，也显示出他的伟大政治家解决纷乱复杂重重矛盾的卓越才能，为他以后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处理复杂的国际问题积累了经验和资本。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主要谈判代表，赴西安、南

京、上海、杭州、庐山等地同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本人举行会谈，终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他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任中共长江两岸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方工作，随后又赴山西与阎锡山商讨八路军入晋作战问题，并帮助谋划保卫山西及首府太原。

抗日战争期间，他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武汉、重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和十分危险的环境中，依靠他的大智大勇，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联系、周旋、交涉、谈判，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各阶层广大的爱国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对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支援前线，起了极大的作用。周恩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和第一位模范执行者。

周恩来在武汉、重庆不但是共产党派驻在国民党那里的代表，而且也是共产党派驻在整个外部世界的代表。他在武汉时就在中共代表团内设立了国际宣传组，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交机构，1939年4月正式建立外事组，独立自主地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工作。当时在武汉、重庆的苏美英法印等国的大使和外交官员都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经常有联系来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西方国家到重庆访问的人士十分频繁，他们当中有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共和党领袖威尔基、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担任蒋介石顾问的拉铁摩尔、先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史迪威、魏德迈以及外交官员、自由人士、记者、教授、作家、学者、医生、军官等。周恩来与他们进行广泛的接触，努力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使他们对中国有个较正确的认识。

美国驻华使馆外交人员谢伟思在后来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说：

“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到责怪。”周恩来正是用他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工作才能，正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说服和影响了许多人，因而在国际统一战线中，团结了很多的外国朋友，这就大大有利于在抗战胜利后把美蒋反动派彻底孤立起来。

周恩来抗战时期在国内统一战线和国际战线中的工作，特别是他创立和运用的“团结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反动力量”“站稳立场、坚持原则、多做工作，扩大影响，争取多数，孤立敌人”和“又联合又斗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他的“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的风格，都为他今后的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外交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接受附近的日伪军投降，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率部向东北进发，以后又调林彪、罗荣桓、黄克诚率部进入东北，并组织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大批干部前往，开辟东北根据地，防止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同时努力争取国内实现和平，建立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反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因此，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冒着很大的危险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顽强而又巧妙的斗争，终于达成由周恩来起草的“双十会谈纪要”，推迟了内战的爆发。

以后，他又同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继续在重庆、南京、上海、北平同蒋介石

石、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努力争取和平，动员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配合解放区军民反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自1945年12月22日起，他与以调解人身份来华的美国代表马歇尔特使将近一年的谈判。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最主要的接触，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一次外交活动，也是周恩来就任外交部部长前最大的一次外交实践。在这次谈判中，周恩来以巨大的智慧、高超的艺术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这场谈判的胜利，维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他善于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随机应变、果断决策，向中国和世界表明他是一位极其罕见的外交家和革命领袖。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任命马歇尔为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是美国为数不多的五星上将。他22岁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校，身历两次世界大战，曾在菲律宾、法国等作战，1924年他充任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团长时，曾驻天津3年，能讲流利的中国话。但他从1932年起提升为少将以后又担任美军总参谋长，便在国际政治洪炉中受到锻炼，历次的罗斯福、丘吉尔会谈，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重要国际会议，他都参加了，养成政治家的风度。这位67岁的军人，在政治上说得上老马识途了。周恩来认为马歇尔来华充当国共调解人，美国“扶蒋压共”的政策不会变，但在方法上却有改变的可能。赫尔利是企图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压制共产党，使美国在中国越陷越深，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反对，也受到美国国内批评，而且违反美国当前主要战略是与苏联争雌雄。而马歇尔来华，则有可能接受我党民主的统一中国的意见。因此，他提出在与国民党进行的这场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我们对美国的政策应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对其错误的政策必须给以适当批评，对

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须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须以坚决抵抗”。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召开包括各重要党派的全国会议，扩大政府基础，协商解决内部分歧；保证美国不会使用军事干涉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欢迎杜鲁门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愿意在杜鲁门声明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求得妥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为取得斗争中的主动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周恩来在与马歇尔最初几次会谈中，明确地向马歇尔讲了两点：第一，中国不应内战。中共主张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先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成为宪政国家。中共目前所要求的这种民主与美国式的民主颇为相似，但要加以若干中国化，即在目前阶段，我们还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和国民党的大党地位。第二，共产党所说的建国道路就是要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中国。在这方面，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供我们借鉴，包括华盛顿时期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主张的四大自由，以及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工业现代化。周恩来还向马歇尔坦率表示，中国共产党接受美国的调解是以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前提的，我们希望看到盟国关心中国的内争，但要求盟国恪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诺言。周恩来说道：“如何才能做到两者兼顾，不致顾此失彼，极为困难”，但中共“愿意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考虑问题”。马歇尔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顾虑，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奥妙”而且“颇难做到”的事情，但他愿尽力而为。

周恩来遵照党中央争取实现全面停战、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



合政府、在全国开创一个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的方针，与马歇尔主要会谈停战和整军两个问题。

在停战问题的商讨中，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群、马歇尔首先就两个主要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无条件立即停战并禁止一切军事调动的原则和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所谓“三方一致协议”，是指在负责处理停火及各项有关重大事宜的三人委员会（由美方代表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组成，后称三人小组）中，每方都拥有否决权，按一致协议的原则作出决议，一切决议送交国共双方最高当局分别核准后方能生效，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随后建立的、由三人小组领导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及其属下的一切机构。这样不仅保障了中共在马歇尔的调处活动中与国民党处于平等的地位，也是防止国民党和美国双方联合起来压制共产党的保障。在关于停战令一般条款的讨论中，国共双方最关注的是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接收主权的问题和国民党要求我方交出热河、察哈尔两省的赤峰和多伦两个战略要地的问题。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和斗争，最后国共双方都做了让步，三方一致同意，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可不受停战令中关于禁止一切军事调动的条款的约束。国民党方面放弃对赤峰和多伦的要求，仍由中共部队占领。1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发布了停战令。

这就为同一天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政治协商会议是国共和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中共和各进步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31日一致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这些协议是引导中国走向和平、民主、团结的蓝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好的希望。

在整编军队方案的磋商中，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国家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要同时交给民主联

合政府。蒋介石则坚持要我党交出军队才考虑实行政治民主化的措施。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周恩来提出如果国共两党各执一端，必将造成对立，使问题无法解决。他建议两者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他形象地解释道，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好像两条腿，是平行的，互相配合前进的，协商两条腿的神经中枢就是改组政府。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的这种灵活变通的说法，既坚持了国共两党的军队要同时交给联合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我党我军的利益，又为谈判的进一步进行创造了条件。

在会谈中，马歇尔用了大量的时间介绍了西方国家军队不干预政党政治的传统的形成过程。他幻想把西方的这套制度植入中国，并以此说服我党交出军队。马歇尔提出的整军建议中，是缩短国共两党部队从分别整编到统编的过程。他甚至提出，在最先完成的统编军队中抽出3个师到日本参加联合国占领部队，其中一个师为中共部队。2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对马歇尔提出的军队整编办法有彻底破坏国民党及地方军队原来系统的一面，可以“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同时提醒说：“美蒋的目的在于政治上让步，军事上取得攻势，对这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对于整编“必须慎重处理”，“因为中国军队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央的意见只是决定第一期整编计划，对两党军队合编不能答应，一个师去日本应谢绝；第二期计划待第一期计划完毕后再行决定，因到时可取得一些经验，并可看清美国的意图，以便根据形势的发展来决定我党对于军队的政策。周恩来在谈判中认真贯彻了中央的这一指示。

2月25日，国共双方和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方，共同签署了军队整编基本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全国军队的整编分为分编和合编两个阶段，在实行全部统编前，尚须经过试点，这就具体地解决了军队统编与全国政治民主化互相配合进行的问题。统编方案规定，国共两党军队将按照双方协议的5：1的比例配置，两党军队

地位平等，统编结束之前，我军的领导权属于我党。

停战协定、政协协议和整军方案签署之后，内战在全国范围内暂时地相对地停止了一个时期，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成立联合政府的决定，被迫承认了我军的地位和数量。这是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取得的重大成果。虽然这些协议不久就遭到国民党方面的破坏而未能实行，但它们的签订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国民党撕毁协议，暴露了它们坚持独裁、内战的面目，我党坚持要求履行这些协议，则大得人心，掌握了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同时，也为我党我军准备对付国民党发动内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推翻了政协决议确定的修宪原则，也推翻了整军协定。同时，在改组政府的谈判中，国民党也蓄意设置障碍，极力避开建立联合政府这一关键步骤，企图直接召开国大，制定独裁宪法，为继续实行法西斯统治制造根据。周恩来根据他同蒋介石、国民党多年谈判的经验：他们善于搞两面派手段，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形势将发生逆转。他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国民党已退回到两面派的本来面目。从此，周恩来为挽救时局的恶化付出了极其巨大的努力。

他在维护各项协议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与国民党、美国方面就解决东北问题进行谈判。当整军谈判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就敏感地察觉到“东北问题将成为斗争的焦点”。马歇尔来华后，我党就希望和平解决东北问题。1946年2月，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中共代表团，指示：“力求用和平方法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根据指示，于2月下旬主动要求国民党与美方代表两方就东北问题举行谈判，并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

可是，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毫无和平诚意，他先是采取回避态度，否认东北存在中共军队，否认东北处于内战状态，迟迟不愿就

东北问题举行谈判，当谈判开始后，他又采取拖延战术。美国帮助国民党占领东北是它的既定政策，马歇尔从一开始在东北问题上就站在偏袒国民党的立场上。他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顾虑重重，极力帮助蒋介石确立在东北的优势地位。他不顾东北内战正在扩大，以履行美国有帮助国民党接收东北主权的条约的义务为借口，动用美军的运输工具，不断向东北运送国民党部队，后来甚至超过了整军方案所规定的5个军的限额。对于周恩来先后提出的一些合理建议，例如三人小组亲赴东北视察促成停战等都表示不能接受。在几经周折之后，于3月27日，国共双方就派遣停战执行小组进入东北问题上达成协议。但一两天后，国民党军队就在东北发动了新的进攻。蒋介石还宣称国民党在东北的行动不得受任何阻拦，在国民党完成接收之前，东北无内政可言。我军忍无可忍，只有实行自卫还击。

此时，周恩来从东北形势的发展联系整个谈判形势，分析和判断认为，真正挽救和平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要打破国民党在东北大打、全国大闹的局面，就必须在东北挫败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制止全国内战的爆发，挽救已恶化的局势。中共中央接受周恩来的看法和建议。到了1946年5月中旬，四平保卫战的紧要关头，周恩来认为，全面破裂的危险已经增加，形势真正好转绝无可能，目前半打半和的可能性较大。而到5月下旬，在四平、长春失守之后，周恩来的结论是，内战已面临全面化边缘，不可避免，但尚有缓和与推迟的可能。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周恩来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一致向党中央建议，调整我党的方针策略。由于蒋介石的内战方针已定，我方力量一时尚处于劣势，因此我党目前方针应为避免挑衅，推迟战事，积极准备。6月7日，周恩来飞返延安，直接向中央汇报情况，并进行研究。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我党目前的策略方针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的前提下，

“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

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为了欺骗群众，于6月6日宣布从第二天起东北休战15天。其实，蒋介石同意东北停战，主要是因为他关外的军事力量已达顶点，他打算在关内发动进攻，并利用在东北取得的军事胜利的时机，压迫我党在全国作出让步。他在谈判中不断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和一系列极为无理的要求，企图逼迫我党屈服或宣布谈判破裂，使他找到发动全面内战的借口。面对这样严峻、紧张的谈判斗争，周恩来采取的对策是既要避免破裂，又要不做大的让步。双方在谈判桌上不断拿出针锋相对的新提案和方案，但不解决任何问题。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爆发了全面内战。国共两党斗争的重心已由政治谈判转到军事较量。在这个时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十分注意分析研究国民党和美国两方的政策差异，以便利用矛盾，寻找对策。他有一个基本估计，在东北问题上，国、美两方的立场已日趋一致，但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美国尚有疑虑，不愿大力支持。对这个矛盾要加以利用，但不能估计过高。周恩来主张采取的策略是，对于国民党要针锋相对，以打对打，以和对和，以半打半和对半打半和；对于美国则要以争取为主，批评为辅。在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周恩来不断揭露蒋介石积极布置内战的阴谋，列举国民党违反停战令，破坏政协决议的大量事实，表示中共希望马歇尔能继续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调处。

在6月初的一次会谈上，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中共一直希望马歇尔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国民党方面从一开始就不愿其成功。现在蒋介石已准备大打，并竭力把美国拖下水。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周恩来指出，美国政府采取的是双重政策。一方面是比较好的，是罗斯福总统留下的世界各国要合作，中国各党派也要合作；另一方面，是比较暗淡的，那就是积极援助国民党，而不愿中国尚

未实现民主化。对于中国正在出现的内战局面，美国是要负责任的，应该加以制止，也能够加以制止。

随着内战的扩大和美国对国民党援助的不断增加，周恩来在谈判中加强了对美国的批评和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反对让美方握有最后决定权。美方提出改变过去三方一致原则，还有国、共两方代表意见分歧时，军调部或执行小组的美国军官握有决定权、执行权和解释权，国民党代表表示支持和给予补充。这个建议有利于国民党和美国两方联合起来压共产党。对此，周恩来坚决加以抵制，他告诉马歇尔和其他美方人员，改变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使人感到美国要控制中国，中共方面不能接受。当国民党代表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个问题时，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中共是爱国主义者，不能承认丧失国权的办法。”第二，反对美国援蒋。它包括反对美国帮助国民党运兵东北超过整军方案所规定的5个军数额，反对美国政府向国民党提供贷款、武器、作战物资，反对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军事援华法案和向国民党出售战时剩余物资等。

最后，周恩来同马歇尔的斗争中心是揭露美国的骗局。在1946年9月底，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张家口进攻。周恩来立即致函马歇尔、蒋介石，声明如果国民党军队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的进攻，中共将认为国民党政府已公然宣告谈判破裂。10月9日，周恩来在上海与马歇尔举行会谈，向其表示，中共对他的“公正”立场已丧失信任，暗示他的调处已失败，应该退出调处。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立即宣布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国共谈判到了破裂的最后关头。11月15日，伪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慷慨陈词，指出国民党一党“国大”的开幕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协商的道路。

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调回国，并发表了所谓“离华声明”，诬蔑我党“不顾国家利益与人民痛苦”，“不顾作出公允的妥协”，吹嘘蒋之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颠倒是非，把美蒋发动内战的罪责完全强加在我党头上。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了《评马歇尔离华声明》的演说，痛斥了马歇尔的无心调停。周恩来列举了美帝派军驻华，帮助蒋介石调动218个旅进攻解放区，侵占解放区1790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占领解放区165个城市，缔结侵略性的中美商约、航空协定等大量事实，明确指出破裂和谈、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美蒋反动派，指出马歇尔的伪善面目，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帝的真面目。

周恩来回到延安后，同毛泽东一起留在陕北，胜利地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情报工作。他同毛泽东相辅相成，共领统帅部指挥全面战争。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魄力大，在战略决策上往往独具匠心，高人一筹。周恩来既能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深谋远虑，又能将毛泽东的魄力和决策，化作严肃谨慎的技术措施、环环相扣的具体步骤贯彻到千军万马的行动上，落实在千里之外的决胜中。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不但指挥陕北和全国的军事斗争，获得重大的胜利，而且还一起制定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作战方案并指挥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在这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的败局已定，被迫退位。周恩来又在北京主持同国民党的和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他除继续指挥作战，消灭蒋介石残余军队以外，主要精力用于主持筹备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由于周恩来有如此的光荣历史，赫赫功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和多方面的领导能力以及高尚的品格、情操，因而被公认为杰出

的领袖，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尊敬、爱戴和拥护。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就考虑要选择一位能力强、威信高，能总揽全局的人出任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部长，主持政府工作、新中国的建设和外交事务。他在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个别交谈或中央书记处的会谈上酝酿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选时，便深思熟虑地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不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了。但是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要向他乞讨才能活下去。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好国家，管理好城市，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并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做好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我认为关键是要选好一个当家人——总理。在我们几个人当中，我看恩来最能应付国内国际大局面，解决复杂的矛盾，是个人才，他比我强，我不如他，让他做总理兼外长最合适。

朱德表示：我赞成恩来做总理，他一直是我们的总管家，军队的总管家，再让他当政府的总管家那是顺理成章。他是解决问题的能手，什么最难办的事，到他的手里便迎刃而解了。

刘少奇说，管理国家，建设国家，好比唱一台大戏，要有各式各样的角色，但是必须有一个主角，否则戏就唱不好，唱不下去了。像《西厢记》里的红娘就是个主角，台上台下、台前台后都有她的戏，有声有色。我看就请恩来来唱红娘这个主角，我们大家唱配角。

毛泽东认为，少奇这个比喻很好，很生动。恩来唱红娘，我们这些人的日子就好过了。

任弼时也非常赞成周恩来当总理。他还建议他兼外交部部长。他说，恩来长期做统一战线工作，又在我们党内主管外交工作，外



交工作实际上就是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他有丰富的经验，是行家里手。而且他既有外交方面理论也有过实践，在国际上他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最好不过的外交部部长人选。

根据党内多方面的酝酿，毛泽东在1949年3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就明确地说道：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各个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同周恩来交往，深知他的为人，对他的品格和才学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周恩来是最周到不过的人，由他当总理，那是真正的“周”总理了，所以都一致地、毫无保留地拥戴他，相信他一定能把中国对内对外的事办好。许多外国友人也认为新中国的总理和外交部部长非周恩来莫属。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前来石家庄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他在同毛泽东等书记处成员会谈后，又单独同周恩来会谈一次，这次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讨论了战后经济建设、交通运输等恢复工作，成立新政府的总体规划与设想；对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管理；发展或建立各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对他们力量的运用和发挥；在中国有多党存在，它们的作用和意义等。这些正是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日夜苦心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这次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苏，与斯大林商谈中国建国问题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很快就会取得胜利，那时你们就将成立新的共和国，组织中央政府，不过在这方面也不会遇到什么困难，因为你们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哪儿去找这样一位理想的总理呢！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往中国的大使兼驻华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

后任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说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外交谈判对手。

就连周恩来的对手蒋介石也非常佩服和赞赏他，不无感叹地认为国民党里找不到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才。蒋介石一直想拉拢他、重用他。就是在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已经暴露，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分裂的时候，蒋介石还想任命周恩来以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或战地财政委员会主任的重要职务，但被周恩来拒绝了。

## 二、外交部点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完之后，下午3时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怀着胜利的喜悦，迈着矫健的步伐，沿着西侧的古砖梯道登上天安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天安门，原为明清两代皇城的正门，位于北京市区的中心。它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也即公元1417年，当时称“承天门”，承天启运的意思。清朝顺治八年，公元1615年重新修建，改称“天安门”，受命于天，安邦治民的意思。在高大的红色城墙上开有5个拱形门，城上有九开间的城楼，红柱黄瓦，巍峨壮丽。前后各有华表一对，门前有金水河，跨河有汉白玉石桥5座，桥前为广场。天安门过去乃是皇帝发表诏书的地方。如新皇帝登基，选纳皇后等重大庆典时，在此举行“颁诏”仪式。

从天安门向北，便是举世闻名的红墙绿瓦的故宫，又称紫禁城。这个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9000多间房屋的雄伟壮丽的建筑群，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奇珍异宝、历代名人字画、珍贵的艺术品和各种文物。它代表中国和东方的古老

文明。

如今它们都已回到人民的手里，今天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乃至整个古老的北京城都披着节日的盛装。30万军民聚集天安门广场周围。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的海洋。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准时宣布开会，在刚刚定为代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声音，代表全中国人民，代表无数先烈们的夙愿。这个声音，震撼了全世界。随即，毛泽东开动有电线通往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杆的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58门礼炮齐放28响，如同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

红旗升起之后，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北京，原名北平。它是驰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其历史极其悠久，向上追溯，它是人类的祖先发祥地之一，几十万年前著名的“北京人”在这里生息、劳动，开辟草原、菜地，揭开了中国远古历史的第一章。就是往近处说，从历史有明确的记录时候算起，周武王分封召公奭于燕，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以后，北京有过众多的名称、纷繁的建置，如蓟城、广阳、燕郡、幽州……物换星移，历经变迁，而燕京、而南京、而北平、而北京，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而发展，而日益繁荣昌盛，所谓“人物殷阜，百姓富饶”。北京是古代中国北方的重镇，是汉族和北方各民族交流往来的枢纽，后来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毛泽东宣读完公告以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这位从辛亥革命开始就带兵打仗，南征北战，不知经历和指挥过多少战斗的著名军事家、统帅，身着戎装，健步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远候在桥南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即致军礼报告，受检阅的陆海空军代表部队均已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乐乐曲的连续鸣奏中，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总指挥同车陪同，检阅肃立受阅的三军部队。当朱德向指战员问好时，指战员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接着，朱德重登天安门，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命令》。然后，海军、陆军、炮兵、摩托化兵、骑兵在《八路军进行曲》《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雄赳赳地走过天安门，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一批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天安门前天上地下，浑然一体，形成雄浑的立体武装阵容，万众观望，应接不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也兴奋得乐不可支。阅兵仪式结束以后，便是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举着五颜六色的旗帜，呼着祝贺的口号，唱着胜利的歌曲，走过天安门向新中国的领导人致敬。周恩来是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上述活动，都是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进行的。他显得特别的忙，他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张罗、检查、督促，一丝不苟，保证大典顺利进行；同时，他还要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和民主人士、各界代表，分头介绍今天的盛况，共享欢乐。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人民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是，此时此刻的周恩来，他的心情既兴奋激动，又对往事有许多酸甜苦辣的回忆。他浮想联翩，想到过去，想到现在，更想到将来。周恩来从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回到中南海他办公的地方。中南海曾经蒙受许多耻辱，经历了60年左右的辛酸苦痛，可以说是一个旧中国的缩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以后，它才回到人民的怀抱，洗刷了耻辱，荡涤了污垢，中南海成为党中央和政务院

办公的地方，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周恩来的办公室先是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毛泽东住处和办公室的旁边。1949年10月7日，他搬进中南海西花厅。西花厅原是清朝最后一个执政王戴洋官邸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军阀袁世凯和段祺瑞都使用过这个地方。1949年全国解放时，这座院落已很破旧了，但周恩来认为稍加修理，还可以用作他的办公室、住房以及会客。可是他又不许讲排场，除了必要的开支外，不同意多花国家一分钱。西花厅是一个四合院，前面大约有百多平方米是他的会客室，用来会见国内外客人或在这里开会。东西厢房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以及秘书们的办公室和住房。三间北房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东西两面墙立着四个书橱，放满了书籍，三张方桌拼起来的长会议桌，占去了办公室的大部分。周恩来吃饭就在会议桌的一角。周恩来的办公桌斜放在办公室的右边，办公桌左侧茶几上三部电话机一字摆开。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极其普普通通的办公室里，日理万机，处理着党和国家对内对外的大事，直到他病重住院才离开这个办公室，在医院里办公。

周恩来一回到办公室，没有休息，马上拿起电话拨到中央外事小组的王炳南，检查他昨天下午和今天早晨交代的任务完成的情况。

昨天，9月30日上午，周恩来步履矫健，气宇轩昂地来到中央外事小组的办公室。他一进门便笑着对大家说，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任务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明天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将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后，要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公告和用我这个外交部部长名义的函件，立即发送到留驻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外国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准备，把公告和函件中英文都打印好。这将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发出的第一个照会。周恩来

又指示说：遗留在中国的外国使领馆，与它们的建交工作，要通过谈判进行，要它们表明与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我们才予承认，我们建交是有原则的。谈判建交在国际上并无先例，这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的一个创举。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抓得很紧，讲求效率，他在电话中要求中央外事组立即将发给使领馆的每封函件和公告送来给他签字。

一份份函件送到周恩来的面前：只见上面写道：

### 公 函

敬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在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此致

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1949年10月1日于北京

每一份函件袋中装有一份公告，内容是：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49年10月1日)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

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



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

周恩来仔细审阅了公告和公函的中外文，确认无误，他拿起办公桌上的毛笔，打开墨盒，蘸满墨汁，在“外交部部长”下面签上“周恩来”三个大字。他的字潇洒、挺拔、有力。他将一封封公函签完了字以后，又让外事组的人和秘书仔细检查一遍，装进信袋里，立即发送。因为这是新中国政府第一个外交文书，也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文书，牵涉到外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周恩来原本就是一个认真、仔细、谨慎的人，所以他就更加认真、仔细、谨慎了。

就在公函发出的第二天，10月2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受苏联政府委托致电周恩来外长说：“苏联政府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日，葛罗米柯副外长还向国民党广州政府驻莫斯科代办发表声明：“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苏联政府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已决定自广州召回其外交代表。”10月3日，周恩来立即复电葛罗米柯，表示“热忱欢迎立即建交并互派大使”。

接着，保加利亚于1949年10月4日、罗马尼亚于10月5日、匈牙利、朝鲜、捷克于10月6日、波兰于10月7日、蒙古于10月1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0月27日、阿尔巴尼亚于11月23日分别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时，周恩来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连续几夜不眠。他一方面按照“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

方针，忙于同外国商谈建立外交关系和处理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和司法权等特权残余，外国人在华拥有的企业、房地产，外国政府、私人团体在中国兴办的文教事业，以巩固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经济、文化关系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他积极筹组政务院和外交部的班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周恩来组成了外交部的领导班子，选定外交部的办公地址。1949年11月8日，北京已进入深秋，天气微寒，落叶纷飞。这天下午，周恩来乘坐美国别克豪华轿车，从中南海他的住处西花厅前往东单外交部街的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办公地址，位于东单迤北路东外交部街（31至33号）。这里是一个两幢西式楼房的大院子。

它最初是明朝将领石亨的赐第。由于石亨恃功骄傲，权倾一时，引起英宗的疑忌。英宗天顺四年（1460），石亨以图谋不轨罪被捕下狱，后死于狱中，宅第被没收入官。

明朝世宗嘉靖年间，世宗将石亨旧宅赐给咸宁侯仇鸾，仇鸾将右边建成一座秀丽的花园。嘉靖三十一年（1552），仇鸾被革职，忧惧而死，住宅被没收入官，后来赐给成国公朱庚。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女寿宁公主下嫁冉兴让，便将此宅改赐给冉駉马。冉駉马为这个府第起名为宜园。

明末至清初，几经演变，宜园成了工部宝源局所在地，开炉铸造钱钞。清朝宣统年间，外务部将已废的宝源局旧址改建为专门接待外国人的迎宾馆，特意聘请美国人坚利逊承包修建西洋式迎宾馆。主楼为灰色，上下二层，楼内中间有过道，楼上北侧正中有可容纳四五百人的大礼堂。礼堂东西两侧和南面为客房。楼梯宽大精美，窗户敞亮。楼顶平台，四周有女墙。楼底均为宽大的客房，地下有厨房和餐厅。大院有两个大门，东边为洋式大门，有门楼，庭

院宽绰，古树参天。西边为中式绿琉璃瓦大门，门内有隽丽的假山。这样的迎宾馆在当时堪称是第一流的了。

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以这个迎宾馆作为他的办公之处。袁世凯为了麻痹革命派，巩固他的地位，于1912年8月邀请孙中山来北京“晤商要政”。袁世凯为了拉拢孙中山，将迎宾馆让给孙中山居住，他自己搬到铁狮子胡同东门内办公。孙中山从8月24日至9月18日在这个迎宾馆住了26天。同袁世凯密谈了13次，大部分也都在这里进行。孙中山离京以后，袁世凯的外交部便从东堂子胡同迁到迎宾馆，把石大人胡同改称外交部街。不久，又在迎宾馆楼西边增建一座大楼，称西楼，迎宾馆称东楼。西楼之上有天梯相通。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这里成了旧外交部的档案保管处，后来又曾一度为国民党政府华北政务管理委员会占用。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由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接收，以后便交给外交部了，成为外交部第一个办公地址。

### 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

周恩来的车来到外交部的西门口，警卫向他立正敬礼，然后缓缓地开到东楼门前门楼下面大楼的台阶边，警卫员小何先从车的前座走下来，打开后面的车门，周恩来非常敏捷地走下车来。他今天仍然穿着那身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国大典时穿的那套黄色卡其布中山装。

这时，新任命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和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迎上前来，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随后由李克农等陪同，走上二楼，引导到周恩来在外交部的办公室。

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二楼会议大厅的南面一排房间的东头一间，

有30余平方米，由于楼层高、窗户大，显得宽敞明亮。室内是刚刚粉刷过的一层白色油漆墙，下面有两尺高的木板墙，木质地板地，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大地毯，中间有一个大吊灯，四周墙壁上有壁灯，临近南面窗户旁，安放一张雕花红木的大办公桌，四张红木太师椅，一套沙发，四个红木雕花的书橱。书橱里放满了二十四史、古典文学、诗词，都是线装的古书，以及中外有关外交学、外交史和国际问题的著作。周恩来办公室西侧外间为一大会议客室，用来接待各国使节和重要外宾，地上铺着高级地毯，摆放了两套大沙发。

周恩来看过以后，坐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说：“这个办公室虽没有我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大，却比那个阔气。我不是说过吗，一切因陋就简，为什么要搞得这样豪华呢？”

李克农笑笑说：“总理，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北洋政府外交部的，已经存放在这房子里30多年了。这次我们接管过来，稍加清洗修理就用上了。”

王炳南接着说：“总理你看这些太师椅上都刻有龙的图案。不是宣统皇帝就是袁世凯想登基做皇帝时候添置的。”

周恩来也随着王炳南手指的太师椅看去，说：“你看这张椅上真是刻的双龙戏珠，手工精致，栩栩如生。这都是劳动人民的创造，供皇帝和官僚们享用。现在又回到人民手里，旧物利用，再为人民服务这很好。”周恩来停顿一会儿，浓眉下的一对大眼睛，扫射一下办公室又扫射一下在座的人，郑重而又严肃地说，“我今天告诉你们，在我当外交部部长的时候，不得建造新的外交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这个就很好嘛！一定要勤俭办外交。”

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连连点头，同声说道：“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办。”他们三个人都是长期追随周恩来，在他的直接领导下

工作和成长起来的，深知周恩来的为人、性格和脾气，是位说一不二的人。

李克农，又名峡公、稼轩、震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出身于安徽巢县一个地主家庭，1899年9月15日生。青年时代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五四时期投入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他在芜湖创办了民生中学，团结进步人士，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开展反帝反封建活动。1926年，他在芜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先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并担任党的沪中区委宣传部部长。1929年正当蒋介石加紧对我党的破坏和对红军的“围剿”，党派他到陈赓同志担任科长的中央特工科工作，加强对共产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保卫工作。

在这期间，他干了一件十分惊人的事，就是1931年4月下旬，当时的党中央、周恩来派参与中央领导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后，在武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叛变。顾顺章原是上海的工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长期协助周恩来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许多党的重要机密，清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周恩来、陈云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叛变后向国民党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这个极其机密而重要的情报，被我党早就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胡底截获了，他们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李克农。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沉着机警，千方百计设法找到当时与中央直接联系的陈赓报告了党中央和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情况紧急，又是在国民党严密统治下，要迅速大规模地疏散机关和人员，任务自然是非常艰巨的，不知道有多少困难和危险，但是像周恩来这样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又能冷静而周密地估量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的人，没有浪费一点时间，英明而果断地采

取行动，在当天就同陈云商定好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在上海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了家。当顾顺章带领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原先的住址也都被搜查，结果却一一扑空。这是在周恩来领导下，李克农、钱壮飞立下的奇功、大功。如果不是他们的机智勇敢，不怕危险，打入敌人内部，那么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将被一网打尽，对中国革命带来的打击也将不堪设想。所以，毛泽东曾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同志包括周恩来都不存在了。周恩来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扬和称赞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是中国情报工作的“三杰”，说若是没有他们，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人世了。以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与周恩来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可惜钱壮飞在长征途中牺牲了。李克农到了苏区后，任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并参加了长征，仍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

长征到了陕北，李克农又奉中央和周恩来之命，第一个同张学良将军进行停战谈判。西安事变时，他任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的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先后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为叶剑英的得力助手，接着又任中共

中央社会部部长，军事情报部部长，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同国民党和美国代表等外国人打交道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既是外交专家又是情报专家。

从李克农的经历看，他一定是个冷漠严肃的人，哪知他却是个热情洋溢、风趣和善的人。他微胖，梳得整齐浓厚的黑发，带着微笑的圆脸盘上深邃的目光中仿佛含有一种洞察力。他因为眼疾很重人们都叫他“瞎子”，鼻梁上架一副度数较深的金边眼镜，上唇留着齐口短髭，很有气派。他还是一个喜爱文艺的人，不但同文艺界的人如夏衍、阿英等有较深的交往，而且在苏区时同钱壮飞、胡底等经常自编自导自演话剧、活报剧、双簧，曾主演过《秘书长万岁》，在剧作家李伯钊主编的《农奴》中，与李伯钊分别扮演剧中兄妹两个角色，他在表演中生动自然，惟妙惟肖，深受观众的欢迎。

章汉夫，1905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他早年留学美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参加了美国共产党。1928年中国共产党派他到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并在派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团中协助邓中夏的工作。1931年回国后，周恩来派他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后又调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33年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不久，因叛徒告密，章汉夫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始终坚贞不屈，英勇顽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从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工作和著译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章汉夫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副总编辑，1938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攻占武汉前夕，出版了最后一期报纸，随同周恩来撤出

武汉。1939年至1945年，章汉夫在重庆《新华日报》任新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等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为了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亲笔写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章汉夫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同敌人的新闻检查官进行了机智的斗争，挫败了敌人的阻挠，把周恩来的题词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出来，受到周恩来的赞许。

1945年5月，章汉夫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了旧金山制定《联合国宪章》的大会，表现了他的外交才能。

解放战争期间，章汉夫被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工委委员、副书记，并负责在上海、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被迫离开国统区，周恩来派章汉夫、乔冠华、龚澎等到香港工作，章汉夫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从事统一战线和宣传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章汉夫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后任天津市军管会委员，外事研究组组长，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外事处处长。

王炳南，陕西乾县人，生于1908年1月。早在青年时期就受到党的影响，接受进步思想。1925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乾县、淳化等地从事建党工作。1928年在杨虎城部队做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起赴日本、德国留学，在德国期间任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书记、国际反帝大同盟东方部主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主席。1936年春，奉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推动团结抗日，促进国共合作。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协助周恩来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的赏识和毛泽东的表扬。西安事变后，任西北民众运动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后，中国共产党派他到上海、武汉、重庆等地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做统一战线、国际宣传和外事工作。他历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央常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同盟的联系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候补委员。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任毛泽东的秘书。以后又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第二副书记兼发言人。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后，相继在延安、晋绥和西柏坡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是最早协助周恩来筹组外交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如找房子、购置办公用具以及调配干部等。

王炳南熟悉外交工作，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英文也能应付一般的外交活动。他同许多外国人打过交道，有很丰富的经验，他的思想敏锐，工作勤奋，富有魄力，勇于负责。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关心他人，因此颇得周恩来的赏识，成为周恩来外交上的得力助手之一。

周恩来对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说：“你们把干部花名册拿给我。”

王炳南一听，连忙打开自己的公事包，把早已准备好的干部花名册取出来，恭恭敬敬地送到周恩来的面前。他们都知道周恩来有一个习惯，到哪一个机关或开一个重要的会议，都要对在场的人逐个点名的。用周恩来自己的话说，通过点名既可认识人，又可直接交谈，了解情况，增进感情。而今天是周恩来第一次到新中国的外交部来参加成立大会的，无疑对出席会议的人要点名的，所以王炳南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外交部干部的花名册。

## 物色人才，从容点将

周恩来接过花名册，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每一个干部的姓名、籍贯、出生、年龄、学历、特长都一一看过，有的还默记在心。

周恩来看完花名册说，“人不多啊，总共才二百多一点，要面对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是很不够用的。”

李克农立即回答说：“是的，总理，我们正在物色和抽调一些干部来充实外交部，不过人很难选，懂外交会外文的人不多。”

“你这就不对了”。周恩来批评说，“几亿人口的大国，还没有人才！当然！”周恩来话锋一转，“外交干部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必须挑选那些绝对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稳阶级立场的人来做，总不能有半点儿马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是挑选本阶级中最忠诚、最可靠、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英国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外交学校，担任外交职务。日本也都是从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大学这些有钱的人才能上得起的大学生中挑选外交干部。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是从工人和水兵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中挑选人才担任外交工作。你们知道，苏维埃政府的第一位外交人民委员，也就是外交部部长契切林就不是职业外交家，而是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他忠诚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非常出色。在卫国战争期间，著名的老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担任外交部部长，协助斯大林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他的精明才干和杰出的外交手腕，尤其是他建立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赢得了胜利，也获得世人的称赞。所以我们外交队伍要‘另起炉灶’，国内国外都要用我们共产党自己优秀的干部。旧的外交人

员一律不用或基本上不用。”

“总理说得对，另起炉灶。”章汉夫摇动着胖胖的身材，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三个来源，一是从军队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全面领导工作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在敌人白色恐怖中度过来的，也是可靠的。”周恩来明确提出解决外交干部的途径。

李克农抹一抹嘴上的短髭说：“我们将遵照总理的指示，马上着手选调，现在我们已从军队中物色几位将军，准备派出去当大使，像袁仲贤、耿飏、姬鹏飞、曾涌泉、黄镇、彭明治、王幼平、谭希林、倪志亮、韩念龙等，还要调些中级军官，派出去当武官和参赞。”

周恩来的脸色显露出丝丝微笑，满意地说：“这很好，不过要训练一下，请一些专家讲点起码的外交知识，比如一般外交礼仪、见人如何打招呼、握手，如何用刀叉吃西餐，如何穿西服打领带等等。如能学点外文更好。”

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异口同声地称赞道：“总理这个指示很重要，我们立即着手筹办！”周恩来将外交部干部花名册交给秘书，然后站起来，走出他的办公室，向别的办公室走去。他要逐一视察外交部的各个司、处的办公室和外宾接待室。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及周恩来的秘书、警卫簇拥着周恩来，先视察了东楼外交部办公厅、苏联东欧司、国际司、领事处、礼宾处、外宾接待室、厨房、食堂，又视察了西楼的亚洲司、西欧司、情报司、美澳司和国际新闻局。他边看边做指示，要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等如何关心、改善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不要一进城，就高高在上，不关心干部，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周恩来精神抖擞，他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疲倦，不顾李克农等建议“休息一会儿”，便径直来到东楼大厅。

外交部全体干部已齐集大厅，个个穿得整整齐齐，尽量打扮得漂亮一点，像过年或参加庆典一样，一派喜气洋洋，说说笑笑。的确，这是个不一般的日子，它是无数志士仁人为了为之奋斗一生，要建立人民自己的外交部，一洗一百多年来屈辱外交的耻辱；要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扬眉吐气；要选择国人信得过的外交部部长，在世界上纵横捭阖，赢得胜利和荣誉。今天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杰出的领袖、具有丰富外交经验、在国内外交享有盛名的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就要来上任了，并且要发表就职演说。这样重要的时刻、难得的机会，谁的胸中都会像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无法抑制自己兴奋的心情。

当周恩来笑容可掬，健步走入会议大厅之际，人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热烈鼓掌，踮起脚尖，翘望周恩来那高雅的神采、可亲的面容，像一股春风吹进大厅。

李克农嘬起八字胡，两手向下一振，示意大家坐下，可是人们似乎没有看到似的，一味忘情地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对大家的这位叱咤风云、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奋斗半生的伟人。

周恩来经历这种场面已不止一次了。他深知人们尊敬他、爱戴他、崇拜他，但他却非常谦恭、虚心。他说：“同志们，请坐下，我周恩来同大家一样，也是一个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我也犯过错误，现在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完美无瑕。以后我们要长期共事，你们会看到我的优点，也会发现我的缺点。所以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提醒，外交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不允许有半点差错。”

周恩来的几句话，说服大家坐了下来。

李克农马上站起来，走上讲台，放开喉咙，带点安徽口音说：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现在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包括调干部、找房子，今天终于准备就绪，宣告正式成立。我们首先请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讲话。”

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

会场上顿时紧张起来，人们心想怎么李克农刚到外交部当副部长就犯错误了，感到茫然。李克农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脸上显出一阵尴尬的表情。不过，他也是久经考验的，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常受到表扬，也受到过批评，他深知总理批评人并不记人的过失，照样信任你。所以他马上冷静下来，恢复常态。

“我今天是外交部部长，我到外交部来，你们称我周外长，不要称我周总理嘛！”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一阵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大家觉得周恩来这位伟人又同自己靠近了一步。

周恩来缓缓坐下，端正而又潇洒地面东而坐，两只浓眉大眼睛扫视一下全场，英俊的脸上露出两个笑窝，和蔼地说：“在座的，有的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先认识认识，好吗？”说着，周恩来向秘书一招手，小何立即将外交部干部花名册，恭恭敬敬地递上来。

和蔼可亲的周恩来接过花名册，犹如一家人聚集谈天，令人毫无拘束之感。他从头点名道：“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他现在是我国驻苏联大使，也是我们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不在国内，但他还是兼着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位老同志，做过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他在苏联留过学，很受斯大林和苏联同志信任。”周恩来又点到李克农，他说：“李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的常务工作，他是个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是代表我党中央第一个同张学良将军接触的人。”然后

他侧过身来，对着坐在他旁边的李克农说：“你是安徽芜湖人，陶行知也是你们安徽芜湖人嘛。”

李克农马上应道：“是，我们芜湖还有位文学家钱杏邨。”

“你们芜湖是鱼米之乡，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周恩来又侧过身来，问坐在他左边的章汉夫：“你是江苏武进人，同瞿秋白、张太雷是同乡，这两位都是才气横溢的革命家，可惜他们死得太早，只有30多岁。”

“这两位我都认识，也曾领导过我。”章汉夫一边抚摸着他那高度近视的眼镜，一边回答问题。“克农没有上过大学，汉夫是留美、留苏的学生，还在美国参加共产党，你的英文很好，俄文怎样？”

“俄文忘掉很多，但还能听懂一些。”

“做外交工作的一定要学习外语，已经会外语的要提高，不会的要从头学，我们是不行了，岁数大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周恩来一边说一边翻看花名册。他翻到外交部办公厅，说道：“办公厅主任王炳南，这你们都知道，他是德国留学生，好像还在日本留过学？”

“是的，时间很短，日文没有学好！”王炳南回答。

“我在日本一年多，日文也没有学好。现在想来有点可惜，真是用时方知学时少。”

“可是，您在日本学了不少社会科学，受到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还写了不少抒发救国救民伟大抱负的著名诗篇，如‘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和《雨中岚山》《雨后岚山》都是脍炙人口的。”章汉夫插话。

“我的那些诗词，比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差得远呢！”周恩来谦虚地说，“好，我们不谈这些。我看王炳南算是老外交人员了！”

“总理才是我国外交家呢！”王炳南说。

“炳南，我刚才纠正了克农的错误，你又重犯了，你们这些人啊……”

王炳南脑子反应很快，立刻检讨说：“我这个人忘性太大，应该称周外长，不应叫周总理。”

全场一阵笑声，周恩来也笑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是周外长起草的，最早同外国人打交道也是我们的周外长。可以说恩来同志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王炳南又谦虚地说，“我从西安事变起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和外交工作，今后还要在我们敬爱的总理领导下，做好新中国的外交工作。”

会场上又是一片笑声。

王炳南愣了一下，不知大家为何笑。但他毕竟是位聪明人，马上明白了人们发出笑声的原因，他十分尴尬地说：“真是本性难移！”然后他转过脸对周恩来说：“我们叫总理惯了，叫外长不习惯。我看总理呀，您还是让我们叫总理吧！”

会场上的笑声更大，并且把目光注视着周恩来。

周恩来温和地笑笑：“你们今后就叫我周恩来吧。起名字就是让叫的嘛！”

“办公厅有三位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都是经过考验的老同志，也或多或少从事过外交工作和统战工作。阎宝航是张学良的老部下，赖亚力当过冯玉祥的秘书。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没有到任。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共产国际代表，做过李德的翻译，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以后一直在军队工作，现为东北军区参谋长。由他来同苏联、东欧国家打交道是合适的。副司长徐以新是位老红军，也在苏联留过学。”周恩来翻开花名册下一页，说：“亚洲司司长沈瑞先（即夏衍），杭州人氏，日本留学生，中国有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开拓者之

一。他也没有到任，暂由乔冠华兼任代理司长，副司长陈家康。”

周恩来又翻开花名册下一页，说：“还有美澳司司长柯柏年，欧非司司长宦乡，这你们都已熟悉了，他曾在顾祝同那里当过少将参议，我就不介绍了。副司长温朋久是德国留学生，曾在杨虎城部下工作过。现在我想着重介绍一下我们外交战线上的秀才乔冠华同志。”

乔冠华立即站起来，他那高大清瘦的身体，神情潇洒，恭恭敬敬地看着周恩来，同时向主席台上的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点点头。

周恩来以目示意，对着乔冠华说：“你坐下来吧！”又接着说，“乔冠华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然后又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杜宾根大学攻读，获哲学博士学位，我们这里外国大学的博士学位不多吧？”

“有，总理。”龚澎站起来说，“我们司的副科长浦山同志，就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

“噢！”周恩来略带惊讶的口气说，“我们外交部还是有人才呀。浦山同志你今年多大了，是哪里人？”

浦山立刻站起来说：“总理，我是江苏无锡人，1923年11月生。”

“江浙才子多，可我这个江浙人就不行啦！”周恩来又问，“那你的英文一定很好了？”

“不行，马马虎虎能用。”

“你不要谦虚嘛，英文这门工具，你将来可以大显身手。”周恩来停顿一下，“乔冠华回国后，用乔木的笔名写了大量的国际时事评论文章，流传于国内外，在延安的胡乔木同志也用笔名写了大量的文章，他们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故而一时有‘南乔’‘北乔’之称，传为佳话，以后乔冠华参加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以于怀



的笔名撰写《国际述评》。抗战胜利后随同我在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1946年底，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代表团的工作遭到破坏，撤离上海，乔冠华和龚澎夫妻俩赴香港从事党在文化知识界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突然向大家发问道：“龚澎同志，你们不认识吗？她是我们情报司司长！”

全场回答：“认识、认识，她是我们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不，还有龚普生同志，龚澎同志的姊姊，章汉夫同志的夫人，是我们的国际司副司长。你们俩姐妹都是出自安徽名门望族。龚澎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那时你在燕京大学读书？”周恩来问龚澎。

龚澎马上站起来：“是的，总理，我同黄华同志是同学！”

“司徒雷登是你们的老师了？”

“是的。”

“这人后来当了美国驻华大使，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就是指的他，这个人回去以后干什么去了？”

“听说，回他自己家乡赋闲了。”乔冠华站起来回答。

“乔冠华从香港回来后，参加了全国政协工作，现在担任政务院国际新闻局局长，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刚才我说还兼任亚洲司代理司长，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我兼的。现在我们需要有人研究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建议，供中央决策，乔冠华在这方面是个人才。乔冠华同志你可要费心，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周恩来对乔冠华寄予殷切期望和信任。

“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总理的教导！”乔冠华诚恳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同时他心里也感到责任重大。

“下面我想改变一下做法，不用我来介绍，而是自我介绍。”

周恩来说：“韩叙，你介绍一下你的简历！”

韩叙十分谦恭地站起来说：“我是江苏江宁人，1924年5月24日生，燕京大学经济系一年级。”

“没有读完大学？”

“是的，因为参加抗日斗争。”

“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

“1942年参加工作，1944年入党。”

“你现在是在办公厅礼宾处当副科长？”

“是的。”

“礼宾工作很重要，这是个门面，外国人首先看你待人接物是否友好。当然，我们新中国的礼宾工作，要有自己的风格、特色，不卑不亢。不像清朝和国民党政府见到外国人卑躬屈膝，我们既要有骨气，又不要有骄气。总之，是慢慢摸索，要总结经验，制定出一套制度。你们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副处长沈平，要尊重他们的领导，把礼宾工作搞好。”

韩叙连连点头。

“凌青，我们在延安时就认识了。”周恩来翻到美澳司一栏。

凌青马上站起来，自报山门：“我是福建人，1923年生，大学毕业，在中央外事小组工作。现在是美澳司的科长。”

“你是林则徐的后代？”

“是的，我是他的玄孙。”

“林则徐禁止鸦片，抵抗英国侵略者，是一位颇有见识和才干的民族英雄，一直受到后人的尊敬和敬仰。你要继承和发扬你们祖上的遗志和荣誉。”

“是的，总理，我一定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贡献。”

“噢！对不起，我把你们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忘记介绍了。他是一位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老同志，人都称他柯老。其实，我看

他一点也不老嘛！”

“周总理，您比我永远是年轻呢！”柯柏年谦虚地说，引起会场一阵笑声。周恩来把到会的人都一个个地点到。

### 第一次重要讲话

随后，周恩来发表了外交部成立后第一次重要讲话。周恩来在内部讲话，极少用起草好的稿子，他都亲自动手写一个简要的提纲。今天，他手里只拿了一张纸条，便侃侃而谈。

他说：“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斗争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只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周恩来轻轻地抿了一口茶。

“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就联合这方面说，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

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

“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一百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所以，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看待，享受法律的保护，他们犯了法，我们一样照法办事，它们对我们没有办法。”

周恩来又抿了一口茶，精神抖擞地说：“我们对每一个战斗，每一件事情，都要重视，都要有信心，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就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义和团的民族情绪是可贵的，然而它们领导者造成了盲目排外情绪是错误的。我们要善于掌握这种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善于斗争。外交工作与其他工作比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

要打败仗。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同志，往往最容易轻视敌人。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我们应该加倍谨慎。”

周恩来一边喝茶，一边用他那锐利的目光扫视一下全场，会场上鸦雀无声，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每个人都用笔在记。

他略为提高声调说：“另外，联合方面，到现在已经有9个国家承认我们，加上阿尔巴尼亚，共有10个国家。除此而外，资本主义国家也许要来承认我们。加上印尼、越南等，便要有十几个国家了。就兄弟国家来说，我们是联合的，战略是一致的，大家都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能没有差别，在民族、宗教、语言、风俗习惯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要是认为这些国家之间毫无问题，那就是盲目乐观。乐观是应当的，但对这些国家也要注意联合中的某些技术问题。‘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个联合工作是不容易的，做得不好，就会引起误会。误会是思想上没有沟通的结果。我们应当研究如何改善关系，不要因为是兄弟国家，就随随便便。”

周恩来强调：“我们要藐视帝国主义，但不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大家要在具体工作中，加强团结，才能把外交工作搞好。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再告诉我们，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

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周恩来话音一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不少人还站起来鼓掌，足足有五六分钟之久。因为这个讲话既新鲜又生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政策又有策略，既有方针又有具体做法，给大家的鼓舞很大，等于上了第一堂外交课。

周恩来的这个第一次正式外交讲话，虽然很短，内容却十分丰富，一开始就显示了他创建的新中国新型外交的光辉思想和超人的才华。

周恩来讲话以后，已是吃晚饭的时间了。他在王炳南陪同下来到楼下食堂，同外交部工作人员一道排队，买了一盘豆腐，一碗清汤，二两米饭，随便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就餐。外交部工作人员见此情景，无不感动，有的竟激动得流下泪来，认为有这样才华横溢又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领袖、外交部部长，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真是无限幸福、心情舒畅，而且一定能干出一番震惊世界的伟业。人们个个信心百倍，劲头很大，暗下决心，一定要不辱使命，努力工作，作出成绩，报答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的殷切期望。

晚饭以后，举行新部成立晚会，邓颖超也赶来参加，周恩来翩翩起舞，潇洒自如，风流倜傥，舞姿优美动人。外交部的女同志们争先恐后地陪同周恩来跳舞，因为女同志太多，大家自觉地排队，轮流同他跳。周恩来跳舞，一方面是为了休息，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接触群众，他同舞伴们一面跳一面聊天，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思想和工作，在舞间休息时还同大家谈心。周恩来非常平易近人，如同兄长一般，没有一点儿领袖的架子，大家都愿将自己的心里话告诉他。他都耐心听取，循循善诱，启发提高。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一些解不开的疙瘩，经过他的开导，都豁然开朗。自此以后，外交部的人都愿意接近周恩来，哪怕是见上一面，说上

## 大外交家周恩来

几句话，或者因为工作上出了岔子，犯了错误，被他批评，也都觉得痛快，心里高兴。周恩来凭他的品格、智慧、才能赢得了外交部人的心，他依靠大家，大家也全力拥戴他、支持他，这样上下一条心，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外交工作能不蒸蒸日上突飞猛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

### 三、出访苏联缔结条约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以总理兼外长身份率团访问苏联，这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出国访问，也是第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周恩来为什么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国内外事情多如牛毛，急需处理之际，率领一个包括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旅大市市委书记欧阳钦等几十人在内的代表团冒着严冬寒冷，风雪漫天，乘坐北京到满洲里的火车，在赤塔改乘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穿过人烟稀少、茫茫的草原、森林，经过十天之久的长途奔驰才到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这是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他希望周恩来前去与苏联领导人商谈中苏两国关系问题。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给中央发来电报说：“（一）最近两天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8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两位



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基础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国家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恩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

“（三）以上是否可行，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要多一两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早在1948年三、四月间就打算去苏联会晤斯大林，但是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没有马上答复。他考虑，这个时候毛泽东有什么问题，想谈什么？他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考虑之后回电说：“现在是中国革命接近胜利的关键时刻，你是统帅，不能离开，

你有什么话要说，我们愿意听，我可以派人去，派政治局的人去。”后来苏方派了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的西柏坡，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举行了5天会谈。毛泽东等主要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战略和策略、各项方针政策、成立新政府的考虑特别是政府的性质和形式，目的是想让斯大林了解我们的打算，事先打个招呼，免得到时候他们脑子转不过弯子来。担心中国原是半殖民地国家，如果现在一屁股坐在苏联一边，全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国家会承认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又派刘少奇率领代表团于1949年7月访问苏联，也是向斯大林说明，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斯大林同刘少奇会谈后，他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成熟的党。并说，长江以南指日可待，你们迟迟不成立政府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无政府状态，会不会被帝国主义用来干涉你们？斯大林还表示，过去由于不了解情况苏联会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和承认错误、表示道歉的话，并把原定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便亲自于1949年12月6日，轻车简从赴莫斯科，其目的是祝贺斯大林70寿辰：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得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是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又要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也就是“一边倒”的方针。那时的客观事实是，新中国刚刚诞生，世界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中国

的胜利还不巩固，既要对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封锁，又要恢复和建设贫穷落后、千疮百孔的国家。因此，中国需要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和后盾，而苏联当时在国际国内困难很多，也需要有中国这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作为自己的盟友，在政治上、道义上给予支持。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中苏两国的关系必须友好，必须结盟。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情况下访问苏联的，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也是第一次离开中国大门。

毛泽东的访问，受到斯大林和苏联党政的特别重视和最高规格的接待。

### 毛泽东要学周恩来

毛泽东一行所乘列车于1949年12月16日12时正点到达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还有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部长缅什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的热烈欢迎。由于莫斯科天气寒冷，欢迎仪式从简，毛泽东在莫洛托夫陪同下匆匆检阅仪仗队之后，便乘车前往莫斯科郊区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住过的别墅。这幢别墅除住房外，还有一套完整而坚固的地下设备：办公室、会议室、休息室、食堂及水电供应设施等，离斯大林住的孔策沃地区的房子不远。莫洛托夫招呼毛泽东好好休息，并告当晚10时斯大林约他在克里姆林宫会晤。

毛泽东休息一个下午，在别墅的周围走了一会儿，欣赏冬日莫斯科郊外的景色。吃完晚饭，毛泽东整理一下行装，考虑一下见斯大林说些什么。不久，警卫人员把毛泽东和翻译师哲送到克里姆林

官斯大林的秘书处。因为到达时间比约定的时间早了3分钟，秘书长包斯特列贝舍夫请毛泽东稍候一下，他走进去向斯大林通报。10时整，斯大林的办公室门开了，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排成一行列站在门口迎接。斯大林首先走上前双手紧握毛泽东的双手，注视端详一会儿说：“你还很年轻，很健康嘛！”说完回过头来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里站成一圈，相互问好，交谈祝愿。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激动地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永远健康、健壮！”

毛泽东回答道：“我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有苦难言……”毛泽东言犹未尽。

斯大林非常机灵，他怕毛泽东再谈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急忙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随后大家围着长方形的会议桌就座，一边是毛泽东和师哲，一边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坐在桌头边。谈话开始时，斯大林还是关心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然后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加重了砝码，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斯大林停顿一会儿，用锐利的眼光看着毛泽东，问道：“你这次不远千里而来也很不容易，你看我们应该做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从容而又风趣地说：“我这次来是应该完成某项事情的，要提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苏联领导人听了毛泽东的回答，不知所以然，得不到要领，贝利亚甚至大笑出声。

斯大林毕竟老练有经验，沉着冷静，仍然继续探问，“你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很含蓄地说：“我打算邀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斯大林马上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些什么事情，那么又请周恩来干什么呢？”

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其实，斯大林当时的想法很明确，他认为不管中苏之间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应该由他代表2亿人民的苏联，由毛泽东代表5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但是斯大林又不愿由他主动提出与中国签订这样或那样的条约、协定，以免有“强加于人”之嫌，尤其是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曾犯过错误，而今更是格外小心谨慎。毛泽东的心里则有另一番打算。在他出国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此行的决定是：给斯大林祝寿，然后利用时机在苏联休息一个时期，有关双方签约事宜的谈判则由周恩来随后去办。所以，尽管斯大林以后又再三询问毛泽东的想法和愿望，毛泽东仍然答复说：“等周恩来来后再说。”

周恩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50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及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在车站发表了简短演说。他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主席的指示，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其实，周恩来早在火车上就与毛泽东通了电话，交换了会谈的内容和意见。

车站仪式结束后，苏联安排周恩来一行下榻在莫斯科郊区的高级别墅里。

## 周恩来三赴莫斯科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一样，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三次到过苏联，早就同斯大林打过交道，对莫斯科的情况，他也很熟悉，许多往事和情景都记忆犹新。

他回想第一次到苏联是1928年4月，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中共中央决定他和瞿秋白赴莫斯科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装扮成古董商人和夫人，也是亲密战友邓颖超从上海出发。这是他们1925年8月结婚以来第一次一起出国。途经大连时，发生过一段意外的遭遇，因自己沉着机智地应付，从容地化险为夷。事情是这样的——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和小超（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称）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督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董生意的。又问你们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回答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警察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吉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上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他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他们问到他舅舅姓什么、叫什么时，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他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他于是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他说，你就是周恩来！他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一系列的盘

问，他都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大约盘问了两小时，才放他走。周恩来来到邓颖超的住处，开始什么话也未说，安然无事的樣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投入马桶里，接着他们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用餐。

他和邓颖超在当天下午离开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去看望他们的伯父。在车上仍遇到跟踪，上车后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当时，他们已识破是跟踪自己的。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回片。一般人名片都放在西装小口袋里，实际上他没有名片，他装着找名片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对不起！”并作出要去取的手势，对方说不必，不必了。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以后，似乎没有人跟踪了，住进旅馆，他立刻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有敢直接到伯父家去，先住旅馆，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去。正好周恩来的三弟恩寿在，一看就认出是他的笔迹，就把他们接到伯父家。他们在伯父家住了两天，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住在他的二弟周恩溥家，邓颖超隔一天后，由他三弟陪送到哈尔滨。他们的接头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只得在哈尔滨再等几天，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通过李把关系接上了。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继续乘火车到莫斯科。

6月9日，斯大林同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分析论述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

6月18日，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周恩来、瞿秋白夜以继日地积极筹备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各地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者84人），代表党员4万多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的报告，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周恩来除在讨论政治报告时作了长篇发言，还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大会闭幕时，他致了闭幕词。

周恩来作为大会的秘书长，工作异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7月19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政治局委员。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等5人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周恩来第二次到莫斯科是1930年3月初，他途经欧洲，在德国停留一段时间，还应德共《红旗报》的约请，发表了《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社论。文章被认为“生动具体地展现了中国革命巨大高潮的图景”。5月间抵达莫斯科。这次，他来莫斯科主要是解决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对中国革命形势、政策上的分歧。

大约在7月下旬，周恩来会见斯大林，同他进行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斯大林这时和1928年不同，接受一年多来中国红军有重大发展的事实，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

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由周恩来首先作报告，瞿秋白、张国焘也参加会议。周恩来在作结论时说：“现在是革命高潮在日益成熟过程中，虽然苏维埃已经推翻了乡村封建统治，但在全国来说，还没有形成直接革命形势。”

23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再次强调：“此刻还没有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



任务。”

周恩来同瞿秋白离开莫斯科，8月下半月分别到达上海。

周恩来第三次到莫斯科是1939年，因膀子骨折，于8月27日离开延安经新疆迪化，于9月中旬到达苏联，住克里姆林宫医院。当时陪同周恩来到莫斯科的有邓颖超、王稼祥、陈昌浩和孙维世。

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除了治病，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将毛泽东的《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兄弟党。和陈林（即任弼时）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中共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半年来由于缺军事技术和教员，致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或允许将学习较好的学员派到苏联办训练班。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文章。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连续作了两天报告，详细分析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以及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英勇作战的情况，说明抗战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够取得胜利。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按照中共中央的委托，致信斯大林，说目前中国抗战正进入艰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摩擦，投降与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会见莫斯科一区委副书记，听其介绍工作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作出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共产国际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运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将决议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向季米特洛夫陈述中国革命情况和王明的错误。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问题的审查。分别会见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马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当时德国、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莫

斯科中心党校作《关于中国抗战问题的报告》。同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交谈如何解决边境人民生活问题、受到中国法币贬值的影响问题；征求对方意见。还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最后应邀赴季米特洛夫的家宴。于1940年2月25日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到阿拉木图，同行的有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琼英、陈郁、师哲、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等，然后乘飞机离开阿拉木图到新疆迪化。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三次到莫斯科，实际上办的是党内外交，同共产国际、同苏联、同斯大林进行广泛的联系和交谈，沟通中国共产党与他们的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许多重大问题，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同时，在苏联莫斯科期间，也了解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并参观游览了苏联特别是莫斯科。周恩来非常喜欢这个红色而又古老的莫斯科。因为它不仅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而且它有着许多吸引人的魅力。

## 中苏条约的艰苦谈判

莫斯科位于东欧平原也是苏联欧洲部分的中部，傍莫斯科河而建。它历史悠久，是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城。

在莫斯科的中心，莫斯科河畔高耸的山冈上，有一带朱红色的齿形城墙，这就是有名的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是俄国历代帝王的宫殿，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成了苏联最高政权机关的所在地。克里姆林宫是由许多教堂、宫殿和美丽的多层塔楼组成的，它是几个世纪以来俄国建筑艺术的集中表现。克里姆林宫的宫墙，围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的每一边，各有7座塔楼。这些塔楼的外观都不一

样，有的高，有的矮，有圆形的，有椭圆形的，有四方形的，也有十六边形的。在5座最高的塔楼尖上，装置有玛瑙石的五角星。五颗星都安在轴承上，所以能随风转动。

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全身心地投入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中心的中苏关系谈判，他挤不出什么时间再旧地重游，欣赏莫斯科的风光美景和重建后的莫斯科新貌。只是莫洛托夫陪同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看了一场芭蕾舞《天鹅湖》。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商量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基本内容后，于1月23日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会见了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老同志、老朋友见面，彼此问好、别后情景、寒暄一阵之后，即就条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进行商谈，因为彼此都有需要，都关系到双方的切身利益，因此，很快达成协议，并确定条约的文字措辞由周恩来同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进行会谈、草拟。

随后，中苏双方开始了正式会谈。中国方面由周恩来以外长身份出面，按照外交上对等原则，苏联方面由外长维辛斯基出面进行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王稼祥、李富春、叶季壮，苏联方面有米高扬、罗申。双方各就条约的基本思想主要内容、条款以及文字措辞讲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开始，苏方按照周恩来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起草了一个条约给中方代表团。

周恩来看后，生气地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完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大力修改！”

他立即将王稼祥、陈伯达找来，并提出由我们自己拟一个东西，还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非常赞成。

周恩来一向做事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他认为中苏条约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关系到当前的国际斗争、关系世界和远东的和平，是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必须搞好，要防止出漏洞，以免后人

吃亏。他反复思考，反复同代表团商量，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然后，他亲自动手，整整花了两天多的时间，草拟了一个条约。主要条款为：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制止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

——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遵照平等、互利、互助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周恩来又是一向十分谨慎的人，特别在外交工作上更是慎之又慎。他将起草好的条约，再交给代表团全体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他告诫大家：这个条约不仅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检查。

周恩来身体力行，他对自己起草的条约，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他连吃饭、睡觉都想着条约，呕心沥血，为条约付出了巨大的智慧和劳动。他发现条约中“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国家之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便又找王稼祥、陈伯达、伍修权等商量，经过再三考虑、研究、斟酌，改为“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在条约的名称上，周恩来也动了一番脑筋，原是双方商定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觉得仅是“友好同盟”还不够确切，因为条文中有互相帮助的意思，不仅是苏联方面帮助中国，而且也是中国帮助苏联，因此他在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两字，即成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了。

《条约》文本起草完以后，周恩来交给当时担任主要翻译的师哲译成俄文，又找王稼祥、伍修权等俄文专家反复推敲，认为准确之后，这才交出去。

苏方见到中方的条约对案，非常满意。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都说，没有想到中方起草后这么好，未作什么修改便全部接受了。

1月25日，周恩来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旅顺、大连、中长铁路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草案。

关于中长铁路和旅大问题，都是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同意”由俄国修筑、经营和租借的，这原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结果。而且中长铁路早在日本占领东北期间，已经向苏联付款买下了铁路的主权，虽然钱少了一点，但是总算给过钱了。1945年苏军进入东北和日本投降后，苏联重新占领了中长铁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后，苏联本应无条件地移交铁路的主权，但是他们因为经过中长铁路到海参崴等远东城市，比走苏联本国的远东铁路还要近许多，所以苏联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共同享有中长铁路的主权和利益，苏联实际上是多占了便宜。周恩来和中国政府考虑我国尚无足够的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在此情况下暂时由两国共管共用，对我国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便同意中长铁路暂时由两国共享权益。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及大连的协定》中还说苏联应将在我国东北从日本手中获得的财产，也就是一批工厂、矿山及其机器设备等等，无偿地移交中国，但是实际上苏联军队在撤离东北时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等大部分搬到苏联去了。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地方，只是“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里的高级家具都被他们搬回苏联去了。可见他们的风格是不高的，暴露了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同他们口头上宣称的并不是一回事。不过，我们还是以大局为重，从大处着眼，未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同他们计

较争执，在总的方面，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对我们的态度还是相当热忱的，他们对中国的援助也是很大的。因此，整个会议过程还是十分顺利和圆满的。协定规定：在缔结对日和约之后，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地交给中国；苏军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由中国偿还其费用；大连港在对日和约缔结后移交给中国，其中苏联代管和租用的所有财产均交中国接收。苏联给中国经济贷款协定，给中国3亿美元之贷款作为偿付购买苏联机器设备和器材之用，利率百分之一，10年内中国用以战略物资为主的原料及茶叶、现金、美元来偿还。

这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马林柯夫和贝利亚商讨关于新疆石油开采、有色金属的开发、稀有金属开采以及把苏联曾在中国新疆边境储存的大量武器移交给中国等问题。这次会议谈得非常顺利而有成效，双方决定签订有关几个协定。事后，由新疆自治区主席赛福鼎前往莫斯科与苏方签字。

在条约、协定大都已准备就绪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拜会了斯大林。这次会见除了谈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以外，斯大林提出中国革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总结这些经验，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毛泽东也有这个想法，周恩来亦极力赞成，但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希望斯大林派一位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帮助工作，斯大林立即允派苏联哲学家尤金来。这便是后来《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出版的缘由。

## 中苏条约正式签署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

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王稼祥、李富春等中方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文本上签了字。

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说：“缔结中苏条约的根据，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东方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条约的签订使得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挑拨中苏两国的企图，完全失败了。”

维辛斯基说：“中苏条约表明了两国友好合作和各国人民和平安的愿望，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伟大。”

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两国共同声明，1945年8月苏联与中国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与协定，均失去效力。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会，庆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招待会上斯大林对毛泽东、周恩来说：“我听说你们希望我出席你们的告别宴会，这种场合我一般不出席，一次也未出席过这样的宴会。但听说你们有这个愿望，我们政治局专门研究了一次，并决定我出席你们的告别宴会。”

毛泽东、周恩来回答道：“我们欢迎你，斯大林同志，参加这次宴会，不过你如果身体不能支持，健康状况不允许的话，可以提前退席。”

斯大林摇摇头：“不，既来之，则安之，我会坚持到底的。”

王稼祥听说斯大林要出席宴会，情绪非常高涨，他立即赶回使馆，着手安排晚上的宴会。

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个大旅社，它的第一层楼全被中国大使馆包了。下午6时，宾客陆续到来，在500多名宾客中有苏联高

级干部、知名人士、各国驻苏使节，但他们都不知道斯大林要出席当天的宴会。当斯大林快要到达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都到大门口迎接。

不一会儿，斯大林率领苏联全体政治局委员走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握手问好后，便一起走向餐厅的正席。这时许多宾客都惊呆了，他们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到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见斯大林。一时间，大厅里骚动起来，接着爆发一片热烈的掌声，直到中苏两国领导人穿过大厅走进主宾餐室，各自就座之后，掌声才停息下来。

宴会厅是用玻璃板隔成一大一小两厅，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小厅里，其他来宾都在大厅里。

周恩来开始致祝酒词时，因玻璃门隔着，大厅里的人听不清讲话都拥向小厅，人们拥挤在玻璃门边，门快要被挤碎了。周恩来见此情景，忙叫人把活动板壁撤去，两厅变成一大厅，才使大家安定下来。

周恩来的祝酒词，事先把讲稿给翻译费德林看过，并译成俄文。周恩来讲话时，没有拿稿子，但他把两千多字祝酒词与原稿一字不差地讲出来。他主要说：“中苏友好要世代继续下去，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贡献，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

周恩来的祝词激动人心，全场热烈鼓掌。

斯大林祝酒，讲得很轻松，他说：“中苏友好团结和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这是各国劳动人民所希望的，这些周恩来都讲到了，也代表了我的意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也应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团结就是力量。”

席间还互相祝愿：“健康、长寿、友谊……”宴会一直持续到



## 大外交家周恩来

午夜，才尽欢而散。

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一个小型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送行。参加的人只有三四十人，围在一个长方桌上。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也参加了。

可能斯大林对这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很高兴，他兴致勃勃地不断同客人谈话，甚至开玩笑。席间，胡志明很羡慕中苏签订友好条约，他向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你请示。”斯大林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该向你请示。”胡志明接着半开玩笑地说：“你们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我们也订个条约吧！”斯大林说：“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胡志明幽默地说：“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斯大林不好回答，讲了一句笑话说：“你们东方人想象力太丰富了。”周恩来在这种场合一向很活跃，谈笑风生。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去以后，立即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引起巨大的反响。

——《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一个“惊人的胜利”。

——美联社说：“中苏条约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台。”

——一位美国参议员说：“这个同盟严重打击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法新社说：“这个条约必然成为反殖民主义的强有力的武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协定的签订，使中苏关系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中苏结成同盟，这对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对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的历

史意义。这是周恩来就任新中国外长以后，第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也显示了他的杰出的外交才能。

## 从中苏条约谈到战争

周恩来回国后，1950年3月20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上的报告，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次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大家都很高兴。”“现在我只想讲一讲里面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条约的目的和任务。条约中有反对和争取两个方面的任务。我们所反对的一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由此烘托出另一方面，也是积极争取的一方面，这就是要争取世界永久的和平。这两个方面体现了我们今天的外交斗争和我们在和平阵营所从事的神圣伟大的任务。”

“这个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个国家7万万人民力量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8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所以这个条约是有其历史意义的。”

周恩来强调说：“帝国主义是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了解新世界和人民力量的，所以每次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像这次中苏缔约，都出乎他们的意料。这种情况说明，和平阵营的行动击中了帝国主义的要害。帝国主义不愿意看见革命，因为革命要消灭它，即使是改良，它也害怕，因此它不得不从战争中找出路。”

周恩来引申说：“战争究竟打得起来打不起来呢？这是我们大家要研究的问题。今天的世界形势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是困难的。我们今天工作做得越好，战争就越打不起来；人民力量越强，打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国际上的斗争也是力量的

对比。刚刚说过，现在已经有8万万人团结起来，这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所面临的情况已经不同了。那时苏联受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处境很艰难。而今天我们8万万人背靠着背，从柏林到上海，联结在一起，这样大的力量，是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可以打破的。这个力量只有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才能表现出来。8万万人团结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再以帝国主义营垒来看，它们从哪里能动员那么多人力来打仗呢？帝国主义最理想的是希望别的国家替它打。但是，今天的欧洲人是最不希望战争的。欧洲是工业发达地区，打烂了不容易恢复。欧洲人坐上一夜火车醒来就出了国境，一打仗全国都被打乱了，所以他们希望最好是不打仗。自卫战争是迫不得已，侵略战争是尤其不愿意。今天可以肯定地说，英法等西欧各国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这一点美国人也是知道的。”

“在东方，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要控制日本。它企图单独缔结对日和约，而中国和苏联却提出要共同缔结和约，日本人民懂得，单独缔结和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处在被动地位。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也不得不承认。因此，现在美帝国主义也在大喊要缔结和约，要求和平。当然，这只是斗争的开始，事情还是要继续发展下去的。美帝国主义也希望动员其本国人民来打仗，但这是很困难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占了便宜，而现在想要本国人民打先锋，这就要危及本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因为从美国人民来说，打仗将使几百万人丧失生命，大量财产遭受损失，这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美国人民过着和平生活，没有哪个国家要侵略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没有那么大，以致有人要去打美国，和平阵营又是主张和平竞赛的，所以让美国人打先锋，他们是不愿意的，但是也有一个弱点，就是美国人民被控制在

垄断资本之下。我们的消息不能进到他们国内去，垄断资本还用低级文化来麻醉他们的人民，所以要使美国人民觉醒起来，这是世界人民的责任。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民的责任也很大，我们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有这个意义。”

周恩来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进一步谈到外交工作问题。他说：“我们外交工作者要增强自信心，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这对我们外交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的外交传统不是旧的，但将来外交工作开展了，这是要与旧的外交传统接触，也多少会受点影响。因此，我们要打破旧的外交传统，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则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卑不亢才是我们的态度，在这方面必须得体。”

“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对于敌人，旧中国的外交传统容易流于自卑，而今天革命胜利了，却又容易流于骄傲。我们要不卑不亢，便不得不一套统一的礼节。当然，这些都属于外交形式，为什么要照顾外交形式呢？这是因为我们要争取外国人民，某些形式与制度是必须建立的。有时，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这一点，对某些从学校中出来的知识分子和从部队调来的同志来说，可能不习惯，但必须要重视。注意形式并不是迷信形式，而是为了完成外交任务，但形式还是重要的。从这一点上说，外交机关就是不同于其他一般机关和学校。”

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外交部全体干部的热烈鼓掌和好评，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和决心。

## 四、朝鲜战争爆发运筹于中枢

周恩来总揽内政、外交大权，如同《西厢记》里的红娘角色一般，里里外外一把手。他正紧张地、不分昼夜地忙于国内建设和对外工作的开展。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刚刚开过。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代表，有的刚刚返回自己的工作单位，有的还在途中，有的还没有离开北京，正在京城商定人才、筹集恢复生产的资金。他们带着周恩来“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的，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走的”会后嘱咐，准备回去大干一场，恢复和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1950年6月25日拂晓，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苏美两国军队分别占领，苏联军队1945年8月15日在朝鲜北部登陆，美国军队9月8日在朝鲜南部登陆，按照苏美协议以北纬38°为界，分别接受日本投降。根据战时大国协议和有关声明：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苏美英《波茨坦公告》和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声明，朝鲜应获得“自由独立”，因此苏美军队驻扎于朝鲜应只是暂时的现象。为此，苏美曾组织联合委员会，以协助成立临时朝鲜民族政府为主要任务。可是，事实上在

朝鲜南北两部分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情况，在北朝鲜建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展开了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各项民主改革，进行了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在南朝鲜，美军恢复了日本统治时期的警察和审判系统，扶植了李承晚政权，对人民实行反动统治，并破坏北朝鲜关于由各人民团体和政党的代表协商筹备普选、建立统一的政府、完成朝鲜独立统一的建议。在美国破坏下，苏美联合委员会于1947年10月解散了，美国随即操纵联合国大会于11月通过决议，设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监督朝鲜的议会选举、政府的组成和武装力量的编制。这样就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干涉一国内政的规定。

在美国扶植下，1948年8月在南朝鲜成立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终于正式宣告了朝鲜的分裂。在这同时，在北朝鲜进行了有南北朝鲜选民普遍参加的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南朝鲜有77.52%的选民选出自己的代表到北朝鲜海州进行选举。1946年9月，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中央政府，宣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以后，苏联军队于1948年12月26日全部撤离北朝鲜。随之，美国政府也于1949年6月30日声明将美军全部撤离朝鲜。但是，美国政府在南朝鲜设立一个庞大的有500人的军事顾问团，继续指挥李承晚军队，并军事控制南朝鲜，美国政府还给李承晚集团大量军事装备，以扩充军队。1950年1月，美国同李承晚集团签订了“联防互助协定”，南北朝鲜出现了对峙局面。

李承晚依仗着美国的支持，妄图军事吞并北朝鲜，狂妄地一再公开叫嚣军事北进。1950年5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和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亲临三八线视察南朝鲜军队，为南朝鲜打气；6月19日，杜勒斯还在南朝鲜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表示美国给予南朝鲜以一切“必要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对于这种形势，北朝鲜人民是不能不予

以充分警惕的。

战争发生后，朝鲜人民军仅仅3天之内就解放了汉城和将近2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美李军队在整个战争中开始崩溃。

### 杜鲁门推行他的国际战略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一天，指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下午2时，也就是北京时间26日下午3时，举行非法的紧急会议，在苏联代表缺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按照美国的提案，会议一开始就企图把侵略者的帽子戴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头上，只是由于有代表不同意，才把“武装侵略”一词改为“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安全理事会讨论的结果，以9:0票通过了略加修改的美国提案，南斯拉夫代表力争无效，又来不及请示，只好弃权。安全理事会“断定”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请求“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尽快提出关于局势的建议，号召“各会员国对联合国执行决议给予一切帮助”，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退到三八线以北。

安全理事会是由11个理事国组成，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5个常任理事国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当时的中国席位被蒋介石当局的代表非法窃据着。苏联代表团为驱逐蒋介石代表出联合国的提案被否决，从1950年1月30日起拒绝继续出席会议。6个非常任理事国当时是印度、南斯拉夫、埃及、挪威、古巴、厄瓜多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七条规定，安理会一切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至少需有7个理事国的同意票，其中必须包括安理会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由于没有中国

的合法代表和苏联代表的缺席，6月25日安理会这个决议是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是非法的。

在成功通过安理会决议后不到4小时，6月25日晚8时30分，美国总统哈里斯·杜鲁门，从密苏里州独立城北特拉华街家中，乘“独立号”专机赶到华盛顿布莱尔大厦，在这里举行了“极其重要”的晚餐会，参加晚餐会的名单是由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提出并亲自邀请的。

参加者为：

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

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

陆军部长：弗克兰·佩斯

海军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

空军部长：托马斯·芬勒特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

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

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

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薛尔曼

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

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

布莱尔大厦是杜鲁门官邸，他当副总统时原住在狄格路公寓，继任总统后，搬进白宫，但因白宫急需修缮，从此，他就搬到了坐落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51号的布莱尔大厦。它原是一位名叫布莱尔的人的住宅，主人把这幢建筑献给了美国政府充作宾馆。它坐落在白宫的斜对面，同白宫旧行政大楼仅有一墙之隔。这是个老式建筑，古朴典雅，内部装潢非常考究，可以说都是艺术品。客厅里那精致的水晶吊灯和金框镶边的大型穿衣镜，使官邸显得更加富丽



堂皇。

布莱尔大厦的主人哈里斯·杜鲁门，1884年5月8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拉玛小镇，出身世代农家，早年生活很苦。1901年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做过杂工；1904年他加入蒙太拿州义勇军，曾去投考美国著名的西点陆军大学，未能考取，便在某药厂当药剂师助手、报纸的发行员、书局及银行职员，但都不合他的兴趣，闷闷不得志，被父亲逼迫回家，在家乡农场干活。少年时害了一场病，弄得视力减弱，经常戴一副没边的眼镜，所以从小就是坐在屋子里读书，户外活动较少。他爱读历史、战史和历届总统的政绩实录。杜鲁门在父亲逝世后，又先后毕业于凯萨斯市立法政学校和福特西尔炮兵学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鲁门参加军队，被派往法国作战，因英勇善战，由一个不出名的炮兵上尉提升为少校。1919年退役，在独立城经营服饰用品店，1921年该店倒闭后投身政界，1922年任杰克逊镇法官，1924年至1934年任法院推事。1934年11月至1944年任联邦参议员，1944年罗斯福竞选第四届总统时，他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当选为副总统。1945年罗斯福病逝后，杜鲁门继任总统，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1948年竞选连任总统获胜。

杜鲁门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正是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从未遭受战火破坏的头号强国，在他的桌子上经常摆着一块“决断在我”的座右铭，他的确是一位世界头等强国的发号施令者。

他下令于1945年8月6日、8月9日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造成无数人的死亡和原子弹受害者。

他坚决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镣戮了几百万中国人。

他从一开始就把联合国当作推行美国政策的工具。

杜鲁门是一个权术家，一个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者。他常常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事务，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当1941

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曾经这样主张：美国应该观望，如果希特勒胜利了，就帮助俄国；反之，如果俄国胜利了，就帮助德国，让他们两败俱伤，美国坐收渔利。

1945年5月8日，德国刚刚宣布投降，杜鲁门就立即签署了关于停止租借法案的命令。6月12日，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克劳利下令，所有在运的租借物资尚在途中的船只均需返回美国，所有在码头上等待装船的物资包括已装上了一半的物资统统卸下来送回工厂。

英国、苏联及其他欧洲国家对此强烈不满。

战后，杜鲁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

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坚信一个强盛的、团结的和民主的新中国，对于联合国组织的成功及世界和平最为重要”，“美国的支持将不扩展到以美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战的过程”，但是，实际上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也承认的，“1945年一直到1948年初秋，国民政府在人力和军备上较其对手具有显著的优势”，“的确在那一个时期之内很大一部分由于我们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他们的部队援助，他们遂能推广其在控制及于华北和满洲的大部分。到马歇尔将军于1947年初离开中国时，国民党在军事上的成就和领域的扩张上，显然是登峰造极的”。

杜鲁门的出尔反尔，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演可算是一个典型。1943年的《开罗宣言》已明文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占有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杜鲁门亲自参加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已经接收了台

湾，但在解放战争后期，杜鲁门政府却又说什么“台湾地位未定”。1949年2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表声明说：“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属于美国对日占领军总部。”同年8月，美国政府照会李宗仁提出，“把台湾置于盟国军事管辖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不干涉台湾的声明，确认日本投降后，“美国及其盟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并称“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别称，有殖民色彩）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未掠夺的野心”，“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同日，艾奇逊专门就杜鲁门的上述声明进行阐述，他说：“中国管理福摩萨已有四年了，美国及其盟国均未对这种权力和占领提出任何疑问，当福摩萨成为中国一个省时，谁也没有提出任何法律上的问题。”可是到了朝鲜战争时，他的调子又变了。

1943年3月，他在国会发表讲话，提出不能对希腊、土耳其政府面临的进步力量的打击“坐视不救”，要求国会拨款4亿美元“援助”两国、干涉崩溃的政府。他要求把美国的权益扩展到全世界。他宣布美国要包揽全球事务，要将世界一切反共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他宣布干涉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共产主义，包括可能被怀疑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国内革命。这篇讲话，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

1947年6月，杜鲁门支持国务卿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以“美援”为手段，打开欧洲门户。1949年提出“开展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向第三世界进行渗透。杜鲁门为推行他的世界战略，早就准备打一仗。1948年7月10日，他在给丘吉尔的一封信中说：“你们打倒世界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伟大贡献，值得引以自慰，所谓共产主义是我们紧接着要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我们无须付出战胜法西斯的血和泪的代价，就能解决它。”杜鲁门这种野心，在他1948年3月3日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中更为露骨

了。他说：“极权国家，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不管你称之为纳粹、法西斯、共产党或佛朗哥西班牙都一样。”“他们还在搞乱朝鲜、中国、波斯和近东的局势。”“决策将是非作不可的，我正在打算作出决策。”“我们也许不得不为争取世界和平而打仗。”

杜鲁门的这些经历，使他的性格既刚强、狭隘，又独断、自信。

杜鲁门从在布莱尔大厦的晚餐会一开始，就宣布一条禁令，说晚餐结束和服务员退出以前，不要讨论任何问题。然后，他摆动一下他那中等身材的身体，摸摸一下无边的眼镜说：现在我首先请迪安·艾奇逊国务卿详细报告朝鲜情况。艾奇逊宣读了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尔来电，建议由美国提出关于朝鲜局势的提案，搞出个决议，根据《联合国宪章》“对和平的威胁，破坏及侵略行为”的制裁条款，请各会员国采取行动。

杜鲁门表示接受这个建议。

然后，艾奇逊又宣读了由国务院和国防部准备的“待总统决定事项”。经过一番讨论，杜鲁门于1950年6月25日23时50分发出包括以下内容的指示和命令：

命令麦克阿瑟应将美国人——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团人员的眷属撤离韩国，为此应当守住金浦其他航空港，击退对这些地方的一切进攻。在履行这项任务时，麦克阿瑟的空军部队应当留在三八线以南。命令麦克阿瑟以空投或其他办法把军火和物资供给部队。

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在6月26日晚9时，又在布莱尔大厦开了一次同样规模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新的情况，检查头一天决定事项落实情况 and 世界上的反映。会议只开了40分钟。

布莱尔大厦第二次会议后，对外声明的文稿已经敲定。6月27日12时30分，也就是杜鲁门6月27日公开声明前1个小时，他

约请了 15 位国会领袖们，把准备公开声明的文稿读给他们听，并且告诉国会领袖们，“我们已经命令美国部队对韩国支持到底。”艾奇逊为了解除议员们对苏联可能干涉的顾虑，还特意说明，苏联还来不及回到安理会使用否决权，即使他们回来，6月25日的决议也已经否决不了啦。

于是，6月27日下午1时30分，杜鲁门的公开声明发表了。声明说：

在朝鲜，为了防止边境袭击及维持国内治安而武装起来的政府部队，遭到北朝鲜的进犯军的攻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进犯军停止敌对行为，并撤退至三八线。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反而加紧进攻。安理会要求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给予联合国一切协助以执行决议。

在这些情况下，我已命令美国的空海部队给予朝鲜政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

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进犯与战争。

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据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行动。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约的签订或联合国的审议。

我并已指示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及加速对菲政府的军事援助。

我同样也已指示加速以军事援助供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及其联邦成员国的部队，并派遣军事使团，以便与这些部队建立密切工作关系。

我知道联合国的一切会员国将仔细考虑最近在朝鲜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行为的后果。在国际事务中恢复强大统治将有广泛影响。美国将继续支持法律统治。

我已训令美国驻安理会代表奥斯汀大使向安理会报告这些步骤。

在杜鲁门的声明发表之后，于6月27日晚美国又利用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说：“必须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供给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

7月1日，美国陆军先头部队到达朝鲜。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朝鲜局势急剧紧张，炎热的夏天，朝鲜半岛阴云密布，惊雷滚滚，西太平洋卷起的狂风暴雨，笼罩着朝鲜半岛三千里锦绣江山。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近邻怎么办？

## 中国政府反应强烈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

由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严厉驳斥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

周恩来于1950年6月27日发表如下声明：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府挑起朝鲜内战之后，于6月27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七舰队并已奉杜鲁门之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的海军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诸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致意，并坚信

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同时，周恩来针对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强调指出：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联合国宪章》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内管辖之事件，而安理会6月27日的决议正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这一重要原则。因此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

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国内经济恢复的工作部署不变，把当前支援朝鲜反抗美国侵略斗争的工作，主要交由东北行政委员会负责。并在全中国开展“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以动员全国人民，为抗美援朝做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为在军事上做必要的准备并争取朝鲜战争和平解决，7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会议，会议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的十三兵团各部先后于7月下旬火速抵达东北沈阳、本溪、安东等地集结。任命邓华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



谋长。

6月30日，周恩来亲自选派柴成文为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及参赞、武官、一等秘书等6名外交官赶赴朝鲜，以了解和掌握朝鲜局势的发展。7月8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室接见了他们。周恩来面带笑容，同被接见的外交官们一一握手。他按照名单，非常仔细地询问每个人的经历，认真检查了各项准备工作。他见参赞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二人表情有些拘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便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同志真会绷脸呀！”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然后，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精辟地阐述了当前朝鲜战争的情势和外交上的任务，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美国的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根据刚收到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又授权由美国指挥参加侵朝的各国部队。从安理会的决议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者必将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的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朝鲜人民军英勇顽强，斗志旺盛，令人钦佩。你们见到金日成同志时，首先祝贺朝鲜人民军在劳动党、金首相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还要感谢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在我们困难时期对我们的帮助。”

周恩来停顿一下，自己先端起茶杯喝茶，他也要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被接见的同志喝茶。

接着，他又说：“你们几个人都没有在东北战场上工作过，可能你们不了解1946年、1947年东北战场的情况。”他介绍说，“1946年冬天，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南满解放区连续进攻，先后占领了安东、通化等城市。南满我军为了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所以，解放区逐渐缩小，到1946年底只剩下临江、抚松、蒙江、长白等县，其他都变成了游击区，敌人于1947年春继续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在我南北夹击下，终于粉碎

了敌人‘先南后北’消灭我军的阴谋。东北战史上说‘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指这时的情况。在这期间，南满我军家属都不得不撤到朝鲜北部，他们受到了朝鲜党、临时政府和人民的亲切照顾。不仅如此，在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下，朝鲜又成了东北战场同关内交通联络的重要通道。”

周恩来进一步说：“至于历史上，朝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你们都很清楚，所以说中朝人民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对于朝鲜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

周恩来顺手拿起服务员早就放在桌上的小毛巾，擦了擦脸，消除因为通宵未眠带来的疲劳。他擦完了脸，又擦了手，然后将小毛巾放在桌上的小瓷盘里，说道：“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中国同志表示支持，看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让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保持两党两军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情况，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你们几个人去就是干这个事情。”

周恩来又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柴成文问道：“据说朝鲜人民军里有一个苏联顾问团，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就是总顾问。工作中会有接触，对待他们应持什么态度？”

“他们如何对待你们，你们就如何对待他们。”周恩来直截了当地作了回答。

最后，周恩来又亲自审定外交部草拟好的给朝鲜外交部的介绍信，并签上他的名字。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亲切地同每个同志握手告别，目送大家离去。

## 雷英夫等判断美军仁川登陆

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7月初，已基本上歼灭了李承晚军队的主力。7月4日水原战役，人民军重挫了美国侵略军，使美国运到朝鲜的地面部队损失三分之一以上。7月14日，人民军突破锦江美军防线；7月20日，人民军发动总攻，全歼美重要据点大田的美国军队，美二十四师遭到覆灭，师长迪安被击毙。从1950年6月25日至9月上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占南部人口92%的人民，美李军损失8万人。美国虽一再增兵，集结了10万的兵力，也只能据守大丘、釜山等桥头堡阵地。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大好形势，是令人可喜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弃它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麦克阿瑟和五角大楼正按照杜鲁门总统的旨意，制订一个大规模的入侵朝鲜的罪恶计划。

毛泽东、周恩来都是久经考验的伟大谋略家和军事家，他们一直密切注视着朝鲜局势的发展，预料美军要在朝鲜哪个港口登陆和越过三八线侵入朝鲜北部地区，一方面提请金日成注意，一方面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警告。但是，此时中国政府考虑到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恢复长期的战争创伤，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原拟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有关的远东问题。

周恩来于1950年7月13日就亲手拟订了一个解决方案：

- 一、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 二、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和台湾；
- 三、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五、由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开会筹备对日和约。

周恩来还将这个设想告诉了苏联，得到苏联的赞同。

斯大林在7月15日复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他7月13日致斯大林和艾奇逊建议和平解决朝鲜战争使其局部化的答复说：

我欢迎你的和平倡议。你认为宜经由包括中国人民政府在内的五大国的代表必须参加安全理事会，来使朝鲜问题得到和平处理，这一观点，我完全赞同。我相信，为了朝鲜问题的迅速解决，在安全理事会上听取朝鲜人民代表陈述意见，是适宜的。

同时，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乘轮任安理会主席之机于8月1日回到安理会。8月4日，他在安理会上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并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

中国政府于8月20日致电表示支持。

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操纵下，于9月1日否定了马立克的倡议。

杜鲁门到底想干什么？

周恩来在想，毛泽东在想，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想，外交部在想。

1950年8月，朝鲜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双方主力在洛东江一带相持不下，战事呈胶着状态。各方都对战局发展作出种种猜测，

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8月份将是他们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刻，要把美伪军赶下海，而国际上有人预言朝鲜要失败。美国报纸则一会儿说美军要撤回日本，一会儿又说美军要增派部队到朝鲜半岛登陆作战。而美国军方则对此闪烁其词。它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究竟如何？可以说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扑朔迷离，捉摸不透。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主管军队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时刻关心朝鲜战局的发展，他要他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和总参谋部作战局随时报告最新情况，有时一天要报告三四次。8月23日，总参作战局和其他有关部门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研讨朝鲜战局，争来争去，最后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取得共识。

当晚，雷英夫赶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告会议讨论情况，他说：大家判断美军下一步一定要在朝鲜登陆作战。在诸多战略要点中，可能性最大、威胁性最大的登陆就是仁川港。

周恩来问：“有什么根据吗？”

雷英夫答：“我们大家归结为6条理由：（一）敌军现在在洛东江地区集中了十几个师固守，那么狭小的一块地方挤满了那么多的兵力，不进攻，又不撤退，想干什么呀？无非是想以此吸住朝鲜人民军的主力，使其不能走，也无法机动。（二）美军在日本原有两个师，最近又成立了新的机动兵团，按道理，它要么去增援洛东江防线，要么就在日本布置防务，不然朝鲜丢掉了怎么办？可它既不驰援，也不布防，反而在搞登陆训练，意欲何为呢？（三）侵略朝鲜的美军及麦克阿瑟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在太平洋地区，一直进行岛屿作战，因此登陆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它不发挥这个优势，简直不可思议。（四）美、英等国正将好多舰队（包括登陆舰）向朝鲜方面调，这些军舰显然不是为解决供应问题，而是用于登陆。（五）朝鲜人民军把敌军压到洛东江后，使敌人形成了密集防守，构筑了大量的工事。战局到了啃骨头的阶段了。这个硬骨头看来一时啃不

掉，可是啃不掉还要在那儿啃，就有被敌人机动兵力反咬一口的危险，最险的就是被敌人从侧后袭击。（六）朝鲜半岛是个狭长地带，从北到南，战略补给线就是那么一条，现在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已经拖得很长了，而汉城是个枢纽，铁路、公路交通都要经过这里，其他港口当然也可考虑登陆，但离洛东江战线不是太近就是太远，近了难以形成包抄，远了一时也威胁不大。而一占仁川可就要命了，马上就能拿下汉城，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搞不好人民军的主力就被包进去了。所以朝鲜战局表面上看很好，实际上很险，面临一个大转折点，这一着棋无论如何要防啊。”

周恩来耐心仔细地听取雷英夫的陈述，然后用肯定的证据说：“哟！这可是个大事，是战略性的大问题！”接着他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便拿起电话对毛泽东说：“雷英夫他们根据很多材料判断美军可能要在仁川登陆，他们有6条理由。”周恩来把6条理由简单说了一遍，又说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听后说：“这确实是大事。这样吧，你带雷英夫马上到我这儿来，详细谈一下。”

周恩来、雷英夫前往毛泽东住处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毛泽东正翻开十三兵团邓华、洪学智的报告。报告说：“美军在大批轰炸机掩护下，实施迟滞对方攻势、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战术，继而拼死扼守洛东江，沿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四形地区建立了环形防御圈，扼制了朝鲜人民军的攻势”，因之，“北朝鲜人民军各个击破和歼灭敌人的机会已成过去”，加之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补给线延长，暴露出战略弱点，“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一为以一部分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一小部分兵力于现地与对方周旋，攻人民军，其主力则在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

毛泽东在桌上铺开地图，仔细地在朝鲜东西海岸线上往来巡睃，不停地吸着烟。他认为邓华、洪学智分析得很有道理，恐怕不得不提防敌人从侧后登陆这一手。

毛泽东见周恩来、雷英夫进来，忙说：“请坐、请坐。”随即说：“恩来！十三兵团邓华、洪学智的报告你看了吗？”

“我刚看完，就听了雷英夫同志的汇报，我看邓华、洪学智的报告和雷英夫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是的！”毛泽东说，“现在请雷英夫详细讲讲你们作战局的意见。”

雷英夫将向周恩来陈述的看法和6条理由重说了一遍，毛泽东一边听一边点头，听完后，连称“有道理、有道理”。

“麦克阿瑟这人有什么特长，他的性格如何？”毛泽东问雷英夫。

雷英夫在毛泽东面前有些紧张，加上8月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满头是汗，他掏出手帕擦了一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太平洋对日军作战时，麦克阿瑟常常使用海军陆战队实施机动登陆作战的方法。比如美军在攻打马努斯和洛斯内格罗斯岛的战役中，麦克阿瑟便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冒险从洛斯内格罗斯岛实施两栖登陆攻击，取得胜利；还有美军进攻吕宋岛的战役中，麦克阿瑟以主攻部队第一军和第十四军在林力延海湾登陆，向马尼拉进军，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苏比克海湾西北的海岸和马尼拉湾南面的纳苏格布海岸登陆，对锁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切断日军的退路，并从马尼拉的后方向马尼拉进攻。现在麦克阿瑟故技重演，他的第八集团军困守南端的釜山港，新从美国调运来的几个师在日本集结，没有投入使用，如果把这些部队用舰艇运到朝鲜中部的港口登陆，那就切断了人民军的退路，同时也切断了运输补给线，这样人民军就可能腹背受敌。”

毛泽东默默地听着、思考着。

“至于，主席问麦克阿瑟的性格，据外电报道，这个人是个倔老头儿，他下的决心谁也不能改变，另外他还是个好战分子。”

毛泽东听到这儿，兴致很浓，说：“好！好！他越倔越好，越好战越好，骄兵必败！”

“主席，我看情况判断已经清楚了，我们应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才好，否则就会失去战略的主动权，被动挨打。”周恩来建议。

毛泽东果断地说：“对，总理，这事马虎不得，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应该马上采取重大措施，否则就来不及了，就有被人堵在家门口的危险。”

“我意，首先命令十三兵团采取一切措施务必于9月底前做好一切准备，只要他们能在9月底以前开到鸭绿江边并做好作战准备，我们就主动了。”周恩来说。

“好，事不宜迟，立即给邓华、洪学智发报，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不得有误。”毛泽东略微停顿一下又说，“要立即通知朝鲜、苏联方面，我们判断美军要在仁川登陆，向他们讲清仁川登陆的利害关系，建议人民军主力立即从洛东江一线适当后撤，布置一些部队在仁川进行防守，做好工事，以防敌人登陆。”

“你看是否给我们驻朝大使倪志亮发个报，请他把我们的意思转告金日成？”周恩来说。

“好，可以！”毛泽东同意。

“至于苏联方面或者请王稼祥通知他们，或者我们直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通知他们。”

“这由你定吧！”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还要总参谋部、外交部密切注意敌人的登陆活动，随时向我们报告，以便决策。”周恩来又建议。

“总参谋部聂老总、李涛外，雷英夫也可把别的事情放下，集



中力量管作战，外交部要李克农，他还兼副总长情报部长，章汉夫、乔冠华、龚澎多注意国际上的动向和情报。”毛泽东补充周恩来的建议。

周恩来同毛泽东商量完了应该采取的措施，正准备告辞去具体落实。

毛泽东做了个手势，请周恩来坐下，问道：“恩来，你看莫斯科对朝鲜局势会怎么看？”说着，毛泽东站起来，随手从桌上捡起一支烟，点燃了，猛抽一口，两眼盯着周恩来，看他的反应和表情。

周恩来非常敏捷地回答道：“苏联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我们也表示了支持。但美国操纵安理会拒绝了，可见杜鲁门是要打下去的了。”他没有马上回答苏联采取什么态度。

“当然，杜鲁门是不会同意的，那就等于把朝鲜交给金日成了。”毛泽东扔掉手上的烟蒂，说道，“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隔重洋来干涉，硬是要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它美国怎么能管得了，到头来一定会陷入泥塘里淹个半死。”

“杜鲁门恐怕不这么看，他要维持在西方世界的威信，保全自己的面子，一定会在朝鲜孤注一掷。”周恩来说着也站起来，同毛泽东并肩在屋内踱着方步，但他不抽烟。毛泽东却又点起一支烟，喷出浓雾，轻声说：“不过，一旦战局恶化，我们那是不能也不应袖手旁观的，苏联到那时会怎样，你说它就撒手不管吗？”

周恩来见毛泽东又回到苏联的态度问题上来了，他回答道：“根据我的感觉和分析，苏联认为美国不会在朝鲜大动干戈。”

“那为什么？”毛泽东半信半疑地问。

“因为苏联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也以为美国也害怕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担心在朝鲜大打出手，会引起苏联出兵，这样美苏直接交战，不就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吗？”

“说得好，说得好。到底你同苏联同斯大林接触多，把他们的底都摸透了。”毛泽东赞许地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消耗太多，急于要恢复经济，需要有个喘息的时间、和平的环境。”周恩来补充道。

“我们也同样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医治战争的创伤，可是形势逼到你的头上，你想躲也躲不了，只有硬着头皮干。就像解放战争一样，原先我们不是也打算争取和的吗，作出让步就算了，可是蒋介石一定要打，那好，打就打吧，虽然很困难，很担忧，结果不是把他打败了吗？”毛泽东连抽了两口烟，又说，“你说如果真的同美国打起来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呢？嗯，当然有可能。但不要怕，美帝国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它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支持蒋介石还不是被我们打败了吗？原子弹又不是美国一家有，斯大林那里也有那件东西了嘛！对待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来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打出中国和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非打不可，那结局很难说，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一厢情愿，说不定又会出现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呢！”

毛泽东送周恩来走出菊香书屋时，已是深夜了。在月光下，草坪上一片金黄色，没有风，空气显得燥热，毛泽东用手打着白衬衫，有意无意地说：“今年是我们开国后的第一年，这个夏天好热哟。”

周恩来停下脚步，转身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看着毛泽东，他明白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知道他们现在肩负的重担，他虽是暗示，却非常清楚地说：“要热大家都热嘛！”

“是嘛，杜鲁门那里也不会太凉快的吧。大家一起热吧。天要

下雨，娘要改嫁，随他去吧！”

说罢，两位老战友紧紧地握手告别。几十年战斗在一起，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临别几句暗语，实际上彼此已达成一种默契，必要时准备派兵参战。

## 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时隔一个多月，果然不出毛泽东、周恩来所料。根据麦克阿瑟的要求，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从美国大陆、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地中海舰队抽调相当的兵力到朝鲜前线，于是麦克阿瑟指挥美国海陆空三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集中美国陆军一师、第七师、李承晚的陆战部队，在美国和英国 300 多艘军舰和 500 多架飞机掩护、支持下，于 9 月 15 日至 16 日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巨大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对朝鲜人民军最为不利的情况发生了。

此时，周恩来批复了东北边防军（即原十三兵团）建议在出兵朝鲜之前派一个先遣小组前往朝鲜熟悉情况的报告，但在中央未就出兵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仍不宜用先遣组名义，而用中国驻朝鲜使馆武官的身份。9 月 17 日，周恩来接见了新任武官：

张明远：东北军区后勤部队副部长；

崔醒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

何凌登：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

汤敬仲：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参谋长；

黎非：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正在国内汇报工作的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正在考虑出兵朝鲜问题，要他们尽快出

发前往朝鲜北部，前往勘察地形，了解情况，为出兵作准备，并要柴成文单独会见金日成，告诉他中国新派来的5名武官的任务。

两天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又一次研究朝鲜战局，认为朝鲜人民军难以抵抗美军发起的强大攻势，后方又空虚，情况十分危急，而且从战局的发展来看，美军必将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到中朝边界，威胁中国的安全，唇亡齿寒。因此应该大力支援兄弟的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要准备拿出足够的力量击退美国侵略者。

总参谋部的同志开会，并于9月20日亲自拟定赴朝作战方针的基本原则：“抗美援朝战争应是自力更生的持久战，在战役战斗中，须集中兵力与火力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以利长期作战。”毛泽东对这个方针非常赞同，并且随后给十三兵团下达了准备出兵的命令。

9月30日，李承晚军队第三师越过三八线。

10月1日，麦克阿瑟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当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他风趣地说：麦克阿瑟“要我举手投降，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说着他挥了挥拳头，并交给大使一封信，要求中国十三兵团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10月1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扩大会议，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到了会。会上，毛泽东要求与会者着重摆摆出兵的不利条件和困难。与会者畅所欲言，摆出不少不利条件。

林彪发言说：“美军师出无名，是不义之师……”“不过”，林彪话锋一转，“美军是高度现代化的军队，我们部队目前装备太差啦，一个野战军仅有几十门火炮，还不抵美国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装甲部队又极少，我们过去打国民党军队还可以，现在打美国军队没有把握，如果美国对我们再丢几个原子弹可够我们吃的。按

目前我军的装备情况和美军作战，我估计……至少要集中五倍甚至六倍于敌的兵力才能取胜。依我看，还是加强边防为好，待敌人进入我们东北再打。”

高岗也说：“出兵朝鲜要慎重，我们国家已经打了二十多年仗，现在刚统一，元气还没有恢复，再打，怕是经济上负担不起，现在是政权到手，百废待兴，打仗又不是用拳头，要花钱的。如果我们出兵入朝，没有三倍、四倍于美军的炮兵和装甲兵，是顶不住的，一旦顶不住，美军打过鸭绿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以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这些天周恩来几乎没有闭过眼，他反复地权衡出兵还是不出兵的利害。他从个别交谈和会上发言，知道多数同志是不赞成出兵的，他们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全国人民饱尝了几十年战火劫难，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而美国又是头号军事强国，还汇集了十多个国家的精兵，装备比我们强，海空军占绝对优势，手中还有原子弹，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连苏联都不愿参战，我们却要出兵，确实是困难极大。可是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不出兵就将遭到美国的侵略、欺侮、压迫。他经过慎重而又慎重的考虑，权衡全局，认为还是出兵更有利些。于是他说：“防？怎么个防法？积极进攻是更好的防。我们鸭绿江一千多里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都得准备打，不知它哪天打进来。”周恩来停一下，斩钉截铁地说，“既然早晚都要打，我看还是早打为好”。

“跟美国这一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最近根据法新社透露，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的各个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就会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同他们较量。既然美国决定从三个重要方向来实行对中国的进攻，朝鲜、台湾和越南，那我看，我们还是选择朝鲜为好。理由是

朝鲜北方多为山地，对美军机械化行动不利，便于我们打运动战，而且，朝鲜与苏联接壤，也便于我们获得苏联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还是不可少的嘛！”周恩来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浓眉下两只大眼睛，放射出炯炯、威武的眼光和神情，放大声音说，“现在我们如果对美帝不抵抗，一旦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他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

“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去，给它以挫折，让他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

“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

“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

在这里，周恩来把中美必有一战，不是在朝鲜打就在别地打，而在朝鲜打对我更有利的道理，把战场上的抵抗和胜利同进行谈判、争取和平的关系，把朝鲜战争的前景和结果都分析得一清二楚。

周恩来的讲话，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许多人认为讲得好，有道理，晚打不如早打，尤其在别的地方打不如在朝鲜打，只有打才有可能进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的问题。

但也还有人不这样认为，胸中有疑虑，担心打不赢，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插话说：“我非常赞成周恩来的意见。有人害怕美国的原子弹，我认为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

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无非是纸老虎。”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毛泽东和周恩来又商量了一会儿，最后决定派志愿军援朝作战。会议又讨论了一会儿，毛泽东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后天再继续讨论，但宣布中央已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

为什么叫“志愿军”呢？毛泽东、周恩来是有过考虑的。因为叫志愿军意思就是政府不出面宣战，是人民志愿组织起来的军队，这样就不给美国以国与国宣战的口实，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同时，也可不泄露军事秘密。

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找林彪谈话，拟要林彪率领志愿军入朝作战，因十三兵团原是第四野战军的主力，是林彪的部下，林彪在东北工作过几年，对东北的情况熟悉。但是林彪没有马上表态，考虑良久，觉得以志愿军现有设备和美军作战，风险太大，搞不好要把他在辽沈、平津战役中打出来的威信全部丢光。况且到朝鲜作战肯定会十分艰苦，部队又没有制空权，飞机狂轰滥炸，指挥部也要钻洞子，且他的身体状况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他神经衰弱，怕水、怕风甚至听到水声流动也使他皮肤过敏。

毛泽东、周恩来见林彪难以担此重任，便决定另请大将军彭德怀来挂帅。

## 召见印度大使，阐述中国立场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他表明了“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的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

**周恩来：**前天收到大使先生转来尼赫鲁总理的来函，谢谢。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范围很广，因此需要一些时间来研究。我们感谢他的好意，对于他的努力表示赞赏。尼赫鲁总理所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比较紧急的，那就是朝鲜问题。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

**潘尼迦：**我曾经预料到这种局势，因此于9月26日致电我国政府，报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其后果将非意料所及。尼赫鲁总理于是致函阁下，据我所知，他还以公函分致英美政府，提出警告。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劳氏把阁下10月1日报告中有关朝鲜的一段，在记者招待会、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大会上宣读了。我国政府正在尽其所能，继续施加压力。

**周恩来：**关于朝鲜事件，我们曾经交换过意见。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我在10月1日的报告中也声明了我国政府的态度，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尽管在三外长会议中有了协议，不经联合国协议，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美国政府不一定受其约束。



**潘尼迦：**有些迹象已经表明，美国政府有背弃三外长协议的可能，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的压力很大。昨日有消息报告，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9英里。

**周恩来：**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消息，据说是在东海岸。另一个消息说，瓦克将军指挥的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但是并未说明是南朝鲜军队还是美军。

**潘尼迦：**我当即刻报告尼赫鲁总理。除了以上阁下所述，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我报告的？是否有任何建议？

**周恩来：**其他一切，容我们研究尼赫鲁总理来函之后，于下次会面时再告。

**潘尼迦：**阁下所称朝鲜事件应该地方化，是否应该把朝鲜战事限于三八线以南？或是应该把朝鲜战争即刻停止？

**周恩来：**朝鲜战事应该即刻停止，外国军队应该撤退，这对于东方的和平是有利的。朝鲜事件地方化的意见，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事件。

**潘尼迦：**朝鲜事件地方化在目前包含两个问题：第一，美军即将越过三八线，因此，朝鲜事件地方化，可能是指所有已经越过三八线的美军必须即刻撤回。第二，朝鲜事件必须和平解决，有关各国，如中国、苏联必须参与讨论此事。为了使我向尼赫鲁总理作报告时较为明确起见，任何可能被中国所接纳的建议究竟应包括哪种意义？

**周恩来：**这是两个问题。第一，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以扩大战争，我们要管，这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严重情况。第二，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停止，侵略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潘尼迦：**我必须郑重说明时间之短促。美军可能在12小

时之内越过三八线，而印度政府接到我的电报并将采取有效行动，需要在18小时之后。届时，任何和平方案可能为时已晚。

**周恩来：**那是美国人的事情。今晚谈话的目的是奉告我们对尼赫鲁总理来函中所提的一个问题的态度。

其实，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潘尼迦大使之前，他在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祝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对美国提出严正警告。他在全面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时，全面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指出：“美国为着进一步扩大在东方的侵略，故意制造了李承晚傀儡集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随即借口朝鲜的形势派遣海军空军侵略我国的台湾省，宣布所谓台湾地位问题应由美国所操纵的联合国解决，同时多次派遣侵略朝鲜的空军侵入中国辽东省上空，实行扫射轰炸，并派遣侵略朝鲜的海军炮击中国的航海商船。美国政府由于这些疯狂横暴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已经证明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早已透露了美国政府的侵略计划，并且正在继续制造扩大侵略的新借口。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暴行，并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及其他领土。”

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警告美国说：“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杀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杜鲁门、麦克阿瑟错误地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更多的意义在于实行一种政治恫吓。中共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工业能力。而三八线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它不过是一条纬度线。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联合国军跨越它。”对于周恩来同潘尼迦大使的谈话中警告美国如果越过三八线，“我们要管”，杜鲁门认为“潘尼迦先生在过去都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对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的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不予重视。

### 彭德怀临危受命

两天后，麦克阿瑟在东京联军总部主持召开作战会议，麦克阿瑟在会上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了他的作战计划。他说：“诸位将军，我认为我们每个人以后都不再涉及什么三八线的问题——没有任何限制，就像踢足球时可以任意越过球场中线一样，有本事你就带球猛攻对方大门。现在我宣布如下简要计划：第一，沃克将军率第八集团军以现有兵力打过三八线，主攻方向是开城、沙里隆、平壤轴线，目标是夺取平壤。第二，阿尔蒙德的第十军由我直接指挥，以现有兵力在元山实施两栖登陆，同第八军在朝鲜北部会合，对敌军形成包围。”

1950年10月4日午后不久，一架银灰色的伊尔-18型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起飞。这是毛泽东、周恩来派来接赫赫有名的大将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

彭德怀是湖南省湘潭县人。生于1898年，出身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从11岁起就给地主放羊，当过煤窑工人和挑土工人，饱尝了地主资本家的欺凌压榨。苦难悲惨的童年，使他幼小的心灵

中种下了对压迫剥削者的仇恨。有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了一次大灾荒，加上地主逼租逼债，弄得湘潭一带哀声载道，饿殍遍野，人民为了活命，自动组织起来吃大户。而家藏万石粮的豪绅大户们不仅颗粒不给，而且残酷镇压。当时年仅十几岁的彭德怀目睹这一情景，再也遏止不住心头的怒火，带领数百名饥饿的群众，冲进一个大地主家里，运走了仓库的大半粮食。他的性格第一次迸发出耀眼的光芒。1916年他抱着为工农大众寻找出路、为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强烈愿望投入湘军。1919年，他当连长时，在连里组织“救贫会”，团结进步官兵，为工农谋利益。1920年冬，驻防南县注磁口时，为了减轻当地农民痛苦，经“救贫会”讨论，秘密派人杀了一个姓欧的恶霸地主。这个恶霸地主是大军阀赵恒惕的一个少将参议的哥哥。此举在当时震动很大。被告发后，他弃职潜逃。1923年他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历任连长、营长，以“救贫会”为核心，组织“士兵委员会”，提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打倒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等6条纲领，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大革命时期，彭德怀参加了北伐战争，他指挥的营作战英勇，屡建战功。1926年秋，他任代团长，在北伐军团攻武昌时，认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段德昌对他进行了党的教育，介绍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这时，他才真正寻找到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于192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在中国革命低潮的时刻，彭德怀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任军长，之后，他又创立红三军团，任军团总指挥，积极开展湘鄂赣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同年11月率领主力红军奔向井冈山，经过辗转苦战，于1928年12月11日到达宁冈地区，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

红四军胜利会师。从此，他和兄弟部队紧密配合，纵横驰骋于巍峨井冈、苍茫赣水和碧绿闽山之间，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跨越万水千山，冲破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击，胜利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后期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中央军委副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同朱德一起率领八路军，英勇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华北抗日根据地，指挥了有名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日本侵略军无数次的围攻、“扫荡”，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挑衅、进攻，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受命于危难时期，率领了人数不多、装备又差的第一野战军，在十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面前，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容不迫，泰然自若，声东击西，连战皆捷，终于消灭了蒋介石、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马继援的军队，解放了大西北，立下了以少胜多的赫赫战功。

彭德怀既有勇又有谋，既擅于将兵又擅于将将，高瞻远瞩，成竹在胸，既是个战略家又是个战役指挥家，他组织指挥过无数次重大战役、战斗。他提挈百万大军如一人，令则行，禁则止，静如山，动如虎，攻必克，守必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国际国内有名的大军事家、杰出的将帅。毛泽东曾经写了热情赞扬他的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现在，当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攻，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时候；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又用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美帝国主义，而在我军装备落后、国力弱、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必须挑选一个能征惯战，又有威望的大将军来统率志愿军入朝作战，才能稳操胜券。所以毛泽东、周恩来认定了他，看中了他，选定了他。

彭德怀靠在飞机座椅上，脑子里一时无法安静下来。中央命令他紧急赴京是什么任务呢？他想是不是有关大西北的建设呢？他已让秘书把资料带上，以备汇报。飞机在西北和华北上空飞行，白云下，隐约可见山峦、平原和银带状的河流。他侧头向下望去，华北大地呀，多少年来，数百次战斗，东渡黄河，沂口战斗，百团大战，敌后坚持，攻克太原、归绥，这些熟悉的、战斗过的地方，现在应该休养生息；再向西北望去，只见茫茫一片，大西北呀，是他眷恋的地方，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和毛泽东、周恩来首先到达陕北、甘肃、宁夏，保卫延安、沙家店战斗、攻克西安、进军新疆等等，这片解放了的土地，建设的重任落在他身上。可是，他又想，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我国外交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及其仆从悍然越过三八线侵略朝鲜》，莫非同这件事有关？他忽然想起8月下旬毛泽东曾经给他发过一次电报，告诉他：需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但此事于9月底再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现在是10月初，看来可能就是这件事。他曾同十九兵团、二十兵团的司令员打过招呼。不过，中央不是已将十三兵团派往东北两个月了吗？而且，他看过中央军委先委派粟裕为司令员，萧劲光、萧华为副司令员的任命，以后又改任邓华、洪学智等为正副司令员，现在会不会是增兵东北或出兵帮助朝鲜？若是帮助朝鲜同志，率先出动的是十三兵团，而十三兵团大都是原来隶属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如果要派一位大将率领部队出征，那首先应该是点林彪的将嘛！

彭德怀一下飞机，中央办公厅的一位负责同志已经等候在停机坪，他说：“彭老总，我们来接您去中南海，中央正在开会，要您一下飞机就去开会。”

当彭德怀迈着稳健的步子走进颐年堂会议室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

毛泽东、周恩来见彭德怀进来，都笑着向他打招呼。

毛泽东说：“老彭呀，你是准时到达。我们催你赶快来，是很急的事哟，可是也没有办法，是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休息嘛！”

彭德怀向毛泽东点头笑笑，说：“让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立即进京。中央的命令一下，我家就是着了火，也得赶来的哟。”

周恩来说：“现在是我们邻居家着火了，而且越烧越大，我们能安之若素吗？现在我们开会就是讨论这件事，出兵朝鲜问题。德怀同志你先喘口气，等会儿你也要准备发言啦。”周恩来神采奕奕，泰然自若。这位大政治家、大外交家、大军事家，一向潇洒自如，春风满面，对待每一个同志都是非常诚恳、热情，对待每一件事都非常认真、仔细、周到。今天是他主持会议，从他的神情看是临危不惧，胸有成竹。

彭德怀坐下以后，环顾会场四周，发现除政治局委员及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章汉夫外，参加会议的几乎全是高级将领，可以说是一次最高的军事会议，一定有重大的军事决策和行动。

彭德怀是个敏感的人，他意识到中央急召他来京，可能又要给他什么任务。但他想，还是先不露声色，听听别人的发言再说。

周恩来催促大家发言，他说：“中央已在10月2日决定派志愿军赴朝作战，并已电告苏联斯大林，请其予以支援。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既要看到出兵赴朝的有利条件，也要看到不利的条件。这样才能扬长避短。”

高岗开口道：“我还是那个意见，出兵朝鲜要慎重。我认为林

彪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待敌人进攻到我国境内再打不迟。所以我主张早打不如晚打好。”高岗讲出他的理由，“美国战争潜力很大，从他们的南北战争结束到现在，将近100年了，美国本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成为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别忘了，美国的钢产量每年达到8000万吨，超过我们140多倍。不要说还有原子弹。我们呢，大家都知道，百孔千疮，百废待兴。刚刚解放，大多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完成，许多边远地区的土匪、特务和国民党军队的残余武装还未肃清。不如等我们经济发展了，部队的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那时候再打，恐怕更有把握些。”

高岗的发言，引起大家的争论。有的说，我们准备不足，美国准备也不足。美军分布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在朝鲜的兵力明显不足；有的说，与其坐等美国打进来，不如打出去；有的说，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比我们好；有的同意林彪、高岗的意见。各种意见相持不下。

周恩来宣布今天散会，明天继续讨论。

众人起身离去。

毛泽东、周恩来叫住彭德怀：“德怀同志慢走一步，我们还要同你谈谈哩。”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并肩走出颐年堂会议室，穿过颐年堂院门，走到菊香书屋。

毛泽东从办公桌的卷宗中翻出一份电报，递给彭德怀，忧虑之态溢于言表：“我给你看个东西。这是金日成和他的外相朴宁永10月1日那天通过我们的大使发来的电报。你看看，形势很危急，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已越过三八线。我们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那个渠道向美国提出警告：不要越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要管。可是他不理睬，要用军事解决问题。昨天凌晨，恩来同志再次召见



潘尼迦，重申我们的态度，可美国的好战分子料定我们不敢参战，料定我们怕他们，所以才对我们的警告当耳边风。他美国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不得了的原子弹。”

周恩来接着说：“骄兵必败，哀兵必胜。历史上常常是弱者战胜强者。我看我们是有把握打败美国侵略者的。”

彭德怀看完朝鲜的求援电报，沉思良久：朝鲜已面临亡国之灾，向我们发出紧急求援的呼吁，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更不要说两国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彭德怀认为应该出兵赴朝。他反问一句：“主席、恩来同志，你们是否已经下定了决心？”

毛泽东吸了一口气，说道：“德怀同志，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哟。我和恩来同志考虑很久，商量过多少次，政治局也讨论过。你知道，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常说，性命关天嘛。打得好那没么子可说的，打得不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丢了江山，那我们对人民没法子交代喽！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家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急了，我们要是不管，那我们将来危急了，斯大林也不管，都那样的话，社会主义阵营不就成了了一句空话？我告诉你德怀同志，斯大林对我们党有些瞧不起呢！他以为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搞农民运动的土地改革者，农民党。我们现在困难很多，经济落后，这是实情。但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们毕竟是大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地援助朝鲜。话又说回来，帮朝鲜也利于我们自己。我们的重工业都集中在东北：鞍山的钢铁，沈阳的机械工业，抚顺和本溪的煤，小丰满大型水力发电站。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

周恩来见毛泽东讲完了，不紧不慢地说：“朝鲜战争发生以来，我就一直考虑我们怎么办，出兵还是不出兵，出兵的结果会如何，

不出兵的结果会如何？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有哪些困难和不利条件。开始我也觉得我们国家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应该集中力量搞建设。待我们实力雄厚了，再同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可是，再一想这是一厢情愿，美国不让你这样做。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这几天的讨论，我认为晚打不如早打，干脆打了以后再建设。我同总参谋部、外交部的同志们研究分析过多少次。认为：美国的国力比我们强得多，经济发达，我们很落后，美军装备先进，具有现代化的装备，机动性强，陆军地面火力很强，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同美军相比，我军的装备则明显劣势，步兵就那么几门迫击炮。其他重一点的花炮都是缴获的国民党的，用骡马牵引，运动隐蔽都很困难，主要是靠步枪和手榴弹发挥作用。但是，我们也有美军所不具备的长处：

第一，我军是为了反侵略而战，为了国际主义而战，是正义之师，出师有名，得到国内国际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指战员政治觉悟高，士气旺盛，在政治上我们占绝对优势；美军是为了侵略而打仗，他们是不正义的，出师无名，遭到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士气低落，在政治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第二，我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几十年一贯以劣势的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我军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美军虽有现代化的优良装备，但他的军官与士兵不善于进行夜战、近战、白刃战，在这些方面我军占有绝对优势。

第三，我军作战机动灵活，善于打运动战，从侧面包抄消灭敌人，还善于分散、隐蔽、独立作战，美军则是一切按条令规定，打法比较呆板机械。

第四，我军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能吃苦耐劳；美军很多是少爷兵，不能吃苦。

第五，我军是背靠祖国作战，离后方近，组织供应比较方便；

美国远涉重洋作战，需要的东西很多要从美国本土运来，即使有些物资可以从日本运来，供应线也比我们长得多，人员物资补充困难。美军的装备虽然现代化，车多、大炮多、飞机多，但是他们消耗的油料、弹药也多。我们的装备差，车少、炮少，但消耗的油料、弹药也少。

另外，从战略上说，美国的战线太长，从北冰洋、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一直搞到东方来，战线从西欧到东亚，比当年希特勒和日本的战线都长。美国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军事基地，好比10个指头按跳蚤动弹不得。美国的同盟国都不强，可派的兵也寥寥无几。美国依仗有原子弹，也并非他一国所独有，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同时，苏联答应派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所以，只要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掌握敌人的长处和弱点，避开敌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我们的长处，趋利避害，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就一定能以劣势的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席话，连连点头，说：“你们说得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我看我们有把握取得反美战争的胜利……”说到这里，彭德怀停下来不说了，他想，听高岗刚才告诉他的“要点你的将喽”。毛泽东、周恩来叫他来，莫非是真的？可是他马上把话题岔开：“现在十三兵团只有4个军，那力量不够呀。”

毛泽东马上接过话题说：“我想再给他们编两个军，把五十军和六十六军调去，你看怎么样？”

“我们还准备调华东野战军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去。”周恩来补充道。

彭德怀见毛泽东、周恩来的话已到嘴边，就是没有明说让他率领赴朝作战部队。他问道：“十三兵团都是四野的部队，林彪他现在怎么样了昵？”

毛泽东立刻手一挥，淡淡地说：“不谈他不谈他，这个人打起

仗来谨慎有余，胆力不足。今天我们不谈他。”毛泽东用眼神同周恩来交换了一下意见，说，“好吧，老彭，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你回去休息、吃饭。”

毛泽东、周恩来把彭德怀送出菊香书屋，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老彭，你要好好想一想哟。”

“给我多少时间？”彭德怀停下脚步问。

“我不吝啬，给你……”毛泽东伸出两个指头。

“两天！”

“两个小时。”周恩来说，“想好了以后，你给主席打个电话。”

彭德怀走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志愿军的统帅有了，这就好办了。”

“老彭是个难得的人才啊！”周恩来赞赏地说。

“有他赴朝指挥作战，我就放心了。”毛泽东兴高采烈地说。

彭德怀回到北京饭店住处，连饭也无心吃，翻来覆去地想，他已不能回大西北领导那里的建设了，他将要奔向相反的方向去东北了，然后率领几十万上百万大军出征朝鲜，在战场上同美国人厮杀了。想到这里，他毅然决然地抓起电话，拨响了毛泽东的电话号码。

“怎么样老彭？两个小时到了。”毛泽东浓重的湖南乡音，彭德怀对这是很熟悉的。

“我想好了，主席，听从组织安排。”

“那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明天会上见。”

第二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颐年堂继续进行，彭德怀作重要发言。他说：“美国占领朝鲜，威胁我东北，又控制了台湾，上海、华东受到严重侵扰。它要发动战争，随时都能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我看不同美帝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他呷了一口茶，说：“我们常说，社会主义阵营，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我们不出兵支援朝鲜，那么怎样显示强大呢？为了鼓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也要出兵，为了展示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

彭德怀又讲了入朝作战的战略战术，他说：“美国同我在朝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我利对付日本鬼子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日战争时期有利得多。即便打烂了坛坛罐罐，无非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我赞成主席、恩来同志的考虑和中央的决定。”

“好嘛，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很好。”毛泽东说，“我给大家通报一个情况，我和恩来、少奇、朱德等同志商量过，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昨天晚上恩来和我找老彭谈了一次，他欣然接受这个重担。老将出马喽！好吧，德怀同志，我谢谢你，中国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哪，有你去我们就放心了。”

## 彭德怀指挥四野主力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责任心很强。他受命以后，即于10月8日到达沈阳，9日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电令：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

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队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 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北京

彭德怀身着戎服，威武庄严，虽已50出头的人了，但讲话仍像洪钟似的。他说：“我是4日到的北京，5日受的命。8日就到沈阳来了。昨天晚上，会见了金日成同志的代表朴一禹，今天又来和同志们见面，马不停蹄仓促上阵！”

接着说：“昨天晚上朝鲜的内务相朴一禹同志专程抵沈阳，向

我通报了目前朝鲜的战况，当夜又乘车返回。朴一禹说：美国最近又从日本动员了5万兵力补入李承晚部，并且他们还拟再次从美国调7个师来朝作战，从东西朝鲜湾登陆。金日成同志再一次紧急要求我军迅速出动。所以，我军的出兵不仅是定了，而且是很快就要出动了。”

然后，他又谈了入朝作战的方针。他说：“当前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侵略者，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作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在敌人技术装备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我军过去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作战，已不适合于朝鲜战场，而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方针。敌人来攻，我们要把它坚决顶住，不使之前进；发现敌人有弱点，即以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存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某一阵地。我们不是单纯的防御，最好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守住阵地。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完成好。”

10月11日，彭德怀从沈阳赶赴安东前线，听取了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韩先楚，参谋长解方的汇报，并向中央建议增派兵力，不久中央决定调六十六军到前线，第九兵团昼夜兼程从华东赶来。

彭德怀听完汇报，研究了入朝作战部署以后，在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和朴一禹的陪同下，亲自登上中朝交界的白头山和鸭绿江边，察看地形，选择进朝作战的路线。

白头山，位于中朝国境线上，朝鲜五岳中之北岳，白头山脉，即摩天岭山脉，它的最高峰是朝鲜最高的山峰。它是早更新世火山活动的产物，在近世纪时期，曾于1597年、1668年、1702年先后喷发过。主峰海拔2750米，名将军峰。山顶有一椭圆形火口

湖，称白头山天池（中国称长白山天池），周围有大片玄武岩，一般厚200—300米，部分地区厚600米，覆盖于片麻岩之上，形成以火山口为圆心，半径170公里，面积45000平方公里，高大广袤的白头山台地。由此向南延伸，连接朝鲜地势最高的部分，即“北部山地”，有白藏高原、盖马高原和鸭绿高原。中朝交界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又称豆满江）发源于白头山，东西分流。这一带年平均温度-1.7摄氏度，年平均降雨量700—800毫米。山顶除7—8月份外，其余时间均为白雪覆盖，白头山直到海拔2000米处，都长着茂密的树林，再往上为高山草原带，山里长着100多种药材、110多种野菜和香料植物，有51种野犬和137种鸟类。

彭德怀登上白雪皑皑的山头，他先朝北看看祖国的东北，已是冷雨飘飘，树叶已经枯萎了，庄稼也快收完了，但是大地仍然生机勃勃，香烟缭绕，他无限眷恋地说：“啊，祖国，母亲，你的儿女们，为了保卫你，明天我们就要出国打仗了！”他又朝南望，一片乌云遮着大地，战火纷飞。他感慨地说：“啊，我的朋友，我的邻邦，你们正在帝国主义侵略魔爪下遭灾受难，为了帮助你们，援救你们，明天，我们就要进入你们美丽的国土，三千里锦绣江山，同你们并肩作战！”

陪同彭德怀的人们，每人都有一番感叹，说不出的复杂心情，走下山来，到了鸭绿江边。彭德怀走到江边，捧起碧绿的江水，对着随行的人说：“鸭绿江名不虚传，它的水真是绿的，我还第一次见到如此绿的水呢！”他又试试水的温度，让侦察人员量量水的深度。并且说，“如果万一敌人把鸭绿江上大桥炸了，我们就涉水过去。长江那样宽那样深，还挡不住我百万大军横渡呢，小小的鸭绿江有何难哉？”他对着邓华和洪学智等说：“十三兵团都是哪里人？”邓华嘬嘬嘴：“这老洪最清楚，他在这个部队时间最久了！”洪学智笑笑说：“这个部队有您、彭老指挥过的红一方面军老底子，有徐



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有八路军一一五师。抗战后，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我就是三师的，从苏北到东北，罗荣桓率领的山东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经过解放战争又吸收了东北青年。这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四野主力部队。”

彭德怀笑笑说：“解放战争期间，我没有直接指挥这支部队作战。”

洪学智说：“您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他们都会听您指挥的！”

彭德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都得听共产党的指挥，党中央既然任命我为志愿军的司令员，那当然得听我指挥。我是想问部队的成分，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南方人都会水，北方人旱鸭子，渡江要挑选那些会水的在前面开路。”

洪学智说：“原来老总问的是这意思，我想问题不大。这支部队里苏北人多，尤其是中下层骨干有相当多的苏北人，他们过去生长在水网地区，又在那里作过战，所以涉水过江都可以。”

彭德怀听了洪学智的介绍，非常满意地说：“好，现在万事俱备，只等东风了！只要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就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

## 五、再访苏联谈军援

10月，莫斯科的建筑物和街道都已披着一层银白色的雪衣。

周恩来刚忙完了派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命了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十三兵团已经做好了一切战前准备，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中央一声令下，就立即向朝鲜出动了。又于10月7日偕同翻译师哲飞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讨苏联派飞机支援朝鲜作战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0月2日，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就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

菲里波夫（斯大林的代号）同志：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

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 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 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的 12 个师于 10 月 15 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 根据我们所知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 7 公分至 24 公分口径的各种炮 1500 门，而我们 1 个军（3 个师）只有这样的炮 36 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 1951 年 2 月才有 300 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目前我军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

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4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4个军对付敌人的1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2200门至3000门7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1500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1个军。

（六）除了上述12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24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 苏共初步应允出动空军

已经是深夜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的浅灰色塔楼在号叫的寒风中，俯瞰着寂静无人的宽阔的红场，高高的克里姆林宫墙内，一座三层小楼内的一个房间还亮着灯光。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正在举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来报。

斯大林拿着燃烧着的烟斗，在地毯上来回踱步，一面听取政治局委员们的发言，一面在思考。

斯大林已经显得苍老，他的向后梳的头发已变得灰白、稀疏，前额与头顶相连的部分已经秃谢，并且他的脸色似乎也因嗜酒的缘故而透出一种铝灰色。只是那一双永远沉思与洞察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露出犀利与智慧的锋芒。

莫洛托夫首先发言说：“中国同志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是对的、英明的。根据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朝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以三十八度纬线为分界线，分为南北朝鲜，现在李承晚和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就破坏了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的决议，我们为了维护国际协议、维护国际上现在的格局，应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负责地面作战，我们派出空军负责空中作战，中苏朝鲜合起来，可以对抗美国的侵略，粉碎美国的企图。当然，我也赞成中国同志意见，力争使朝鲜战争地方化，但也做最坏的打算。”

伏罗希洛夫发言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袖们决定派志愿军入朝作战，表现了他们的伟大气魄和决断力，值得我们钦佩，我高兴有这样可靠的盟友。当然，中国刚刚解放不久，国力比较弱，面对美国这样强大的敌人，没有国际支援是不行的。我们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破坏，损失很大，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恢复元气。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兄弟国家，不能坐视不管，出点飞机支援中国、朝鲜还是可以的。”

“我担心，苏联出动空军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提出质问，“依我看，为了稳重起见，苏联还是不要出动空军，让中国、朝鲜和美国先打去，看看情况再说。”

“我同意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对于苏联出动空军要特别慎重，否则，如果美国空军轰炸中国大陆，苏联为了援助中国，去轰炸日本的美军基地，那么战争就没有边缘了，完全可能扩及欧洲和世界各地。苏联无疑要被再次卷入战火之中。”贝利亚发言。

斯大林停来说：“我也担心，苏联出动空军，可能导致苏美直接作战，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符合我们目前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方针。”斯大林边走边说：“原先，我们不是估计美国不敢在朝鲜大打吗？可是美国竟敢在仁川登陆，大举进攻，朝鲜很危险，中国愿意出兵支援这很好。但是没有相应的空军配合，中国军队和美国作战，困难很大，结果就很难说，万一中国军队顶不住，被美军打进中国东北部，那里离苏联很近……”斯大林却又停下来，脸上

露出一种坚毅的神态，说：“不久以前，我们不是同中国签订《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条约中明文规定：一旦条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是信义，这是义务，这是责任呀！”

莫洛托夫又说：“斯大林同志说得对，我们必须信守《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如果失去信用，谁还同我们签订条约呀，所以我们应该答应中国方面的要求。”

“那好吧，莫洛托夫同志，请你告诉外交部通知罗申大使转告周恩来，苏联负责空中作战。”斯大林作了决定。

事物常常不是按人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就在毛泽东、周恩来令志愿军向朝鲜境内迅即出动，通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告诉了金日成，请朝鲜方面派专人去沈阳与彭德怀商谈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具体事宜，同时把这些情况通报了莫斯科。可是不到两天，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告知周恩来，说：“原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军队入朝作战之事，由于苏联方面没有做好准备，所以空军暂不能出动。”

## 空援落空，周恩来再赴莫斯科

周恩来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很震惊，他说：“我们不是一切都商量好了吗？怎么在中国军队已下令出动的情况下，苏联却单方面决定改变呢？是因为时间太匆促，苏联空军确实未准备好，还是别有原因。请罗申大使转告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我们不理解……”

罗申大使一走，周恩来立即赶到丰泽园，将苏联的通知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顿时脸色变白，他抽着烟来回在室内走动，足足考虑了十多分钟才说：“恩来，你看这样一来，真让我们为难。”

“是啊！苏联不出动空军，我们就丧失了制空权，敌机狂轰滥炸，大部队白天无法作战，困难太大了。”周恩来说，“他们说因为没有准备好，暂缓出动，主席，你相信吗？”

“我才不相信哩！他们没有准备好，我们也没准备好，许多部队过冬衣服都没发下去，武器装备也有待更换。依我看暂缓出动不过是个托词，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单独对美军作战，以避免风险。”

“暂缓出动是外交辞令，实际上他们害怕卷入这场战争。我们也要慎重哟。”

“你看苏联迟不说早不说，偏偏等我们命令一下，他们才说，让我们话说出去了，无法收回。”

“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定可靠，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

“恩来，我看这件事要重新考虑，不过还要争取一下。”毛泽东点起烟，狠抽了一口，又说，“恐怕要劳你大驾，去一趟莫斯科了。”

周恩来在去莫斯科之前，同毛泽东商定暂缓出兵，等他的消息再走。

周恩来乘坐专机到达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等到机场迎接，并送至莫斯科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八号高级公寓。

周恩来告诉维辛斯基，请转告斯大林，说他要尽快见到斯大林同志，有重要的情况告诉他。周恩来要王稼祥通知正在莫斯科休养的林彪立刻前来，陪同他去见斯大林。

林彪怕打不赢麦克阿瑟，丢了他“林彪”的面子，担当“千古罪人”之名，借口身体不好，给中央打报告，请求到苏联治病，把抗美援朝的重担撂了下来。

第二天，维辛斯基通知周恩来，斯大林立刻见他。斯大林正在

靠近黑海边的克里米亚半岛阿布哈兹区休假，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也在那里，将由布尔加宁陪同前往。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南部，临黑海和亚速海。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时常在克里米亚这个风景胜地休息和疗养。

今天，斯大林在他的阿德烈尔斯休养所的办公室里等待周恩来的到达。

周恩来、林彪在布尔加宁陪同下于上午到达克里米亚阿布哈兹区，先参观了一番疗养院，然后又休息了几个钟头。午后，前往斯大林的住处，进行会谈。

斯大林在他那宽敞明亮、温和舒适的办公室里，同先行到达的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交谈起来。

“这次，周恩来到苏联来，是要我们派苏联空军支援他们出兵朝鲜？”斯大林不急不慢地问。

“是的，斯大林同志！”维辛斯基小心翼翼地坐在斯大林的对面，摆出一副听候询问的样子，并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维辛斯基同志，我们政治局是曾经决定支援中国的空军问题。不过……”斯大林拿起桌上的烟斗慢慢装上烟丝，缓缓地走动，划了根火柴，点着烟，抽了一口，停下脚步。“可是后来，政治局有几位委员，如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还有……他们坚持认为苏联不宜出动空军，那样就等于苏联直接参战，就可能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苏联不利，因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很大，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需要休养生息，重新建设，我觉得他们的意见也有道理，但是我又有一种担心，如果苏联不出动空军，那么中国志愿军入朝会不会有变化？”

“我想不会的，斯大林同志！”维辛斯基也站起来恭敬地回答，“毛泽东、周恩来早已下决心参战，这从他们10月初发给您的电报



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斯大林被维辛斯基提醒，他停下脚步，放下烟斗，从办公桌上的档案夹里找出中共中央的来电，又仔细看了一遍，说道：“从这份来电中，倒是没有讲到苏联出动空军作为中国派志愿军的先决条件。不过通过外交途径磋商过，我们是允诺过他们的要求。”

“但是，斯大林同志，如果中国军队没有苏联空军支援，赴朝作战是很困难的。”维辛斯基脸上露出担心的神色。

“你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维辛斯基同志，不要过高估计美军的实力，他虽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但是兵力所限，要知道，战争中最后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陆军。美国哪有那么大的胃口，吞了朝鲜，还敢去吞中国，它消化不了，而且还会撑破肚皮的。”

“斯大林同志，您考虑得很周到。”维辛斯基说。

“不要说这个”，斯大林打断了维辛斯基的恭维，“你看看周恩来是不是到了，维辛斯基同志？”维辛斯基看了看手表，从长桌的椅子上站起来：“是的，斯大林同志，时间到了。”说着，他匆匆地走出办公室。

这时，在通向斯大林办公室的走廊上，装饰壁灯把长廊映得金碧辉煌，猩红的地毯上，周恩来、林彪、师哲正徐徐走来。

周恩来走在最前面，他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脚着一双棕色皮鞋，步履轻捷，还像平时一样潇洒自如，神态安详。但他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这次来莫斯科见斯大林不比以前几次，这一次是要解决一件棘手的事情。怎么把这件事处理好而又不影响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他从北京上飞机到莫斯科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由于原先答应出动空军支援中朝军队作战，现在又通知中方苏联空军暂缓出动，而中国志愿军也暂缓出动，斯大林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发脾气？斯大林会不会改变主意，立即出动空军？

周恩来凭着自己同斯大林多次接触，知道斯大林曾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国首脑会谈中，以政治远见和外交手腕解决了世界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在同政界、外交界包括兄弟党在内的接触中，还是极有分寸、注意礼貌的，并非西方传说那样专横的样子。在斯大林办公室的门口，苏联外交部的接待人员已经等在那里，微笑着向周恩来等问好。就在此刻，维辛斯基从里边打开了斯大林办公室的雕花烫金大门，躬身同周恩来等握手，用俄文说一句欢迎的话。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其他政治局委员见周恩来进来，也都站起来向前挪动几步，笑着同周恩来等握手问好。

周恩来发现斯大林似乎比半年以前见到的时候更加衰老了，面部肌肉显得很松弛，握手的时候感觉十分无力。

“毛泽东同志让我代他问候您。”周恩来微笑着对斯大林说。

“毛泽东同志好吧，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我想他现在一定很忙。”斯大林试探着说，想看看周恩来的反应。

周恩来没有正面回答，他却介绍说：“林彪同志也来了，你们很早就认识了吧。”

“是的，”斯大林说，“林彪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我们苏联养病，病好以后还在苏联参谋部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听说你正在莫斯科养病，怎么也到我这里来了？”

林彪恭敬地欠了欠身子，说道：“我是在莫斯科养病，不过，我很想和周总理一道来看望你，这正好是一次机会。”

周恩来为什么要带林彪来见自己，是因为林彪同自己熟悉呢，还是因为林彪任过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对东北比较熟悉呢？或者是由于怕说服不了自己派空军，怕毛泽东猜忌，所以要林彪做证呢？斯大林猜想着，仿佛没有注意林彪在说什么，没等翻译把他的话翻完，就转向周恩来，用一种非常平淡的口气说：“朝鲜同志由于战

争开始时军事进展顺利，疏忽了对情况逆转时的思想准备，也许产生了轻敌思想，但当美帝在仁川登陆反扑后，对朝方压力很大，现在招架不住了。看来敌人不会就此止步，不会停止前进，如果碰不到强大的阻力的话，而且，朝鲜目前已受到极大的挫折，战场形势很严重的，对我们都是很不利。”斯大林停顿一下，看看周恩来的反应。他见周恩来不动声色，又说：“今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看法和想法。”

周恩来见斯大林在放试探气球，他仍然沉住气未说什么。斯大林急了，便单刀直入地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任命了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率兵赴朝。我听说彭德怀作风勇猛，很会打仗，是位好统帅。”

“是的，斯大林同志，无论在红军时代，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打得都很出色，所以毛泽东同志才点他的将。”周恩来回答道。

林彪坐在那里一阵脸红，心中有愧，但他忙掩饰说：“不过和美军作战，情况就不同了。”林彪虽然承认彭德怀作战勇猛，打了很多大仗、漂亮仗，但他认为彭德怀勇气有余谋略不足，不及自己善于讲究战略战术，权衡利弊得失。这次彭德怀受命援朝，未免有点冒险。他想他在苏联养病，本是借口回避，未想到周恩来又叫他来见斯大林，谈中国因为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也暂缓入朝作战。他心里直是叫苦，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搞不好给斯大林留下坏的印象。不过已经来了，只好硬着头皮随机应变。反正有周恩来挡着，问题不至于太严重。“美军有什么了不起，林彪同志，你要知道，他们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不义之战，士气必然低落，你说的是吗？”

林彪一惊，才知道斯大林是对他说的，于是赶忙回答：“当然，美军师出无名，是不义之战……不过，目前我国部队装备太差啦，火炮和装甲部队太少，我估计至少要集中五倍甚至六倍于敌的兵

力，才能取胜。”

斯大林靠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勾勾画画，一会儿，一只线条简单的狼跃然纸上。这个习惯是斯大林多年形成的，不论是在出席重大会议，还是在外交场合，他时常这样做，或者是画一只狼，或是画一座教堂……这些熟练的动作，并不影响他的思考和同别人谈话，而是常常在画着什么的时候，对某一个问题的决断就在头脑中形成了。

“是的，林彪同志，你说得也有道理。”斯大林的眼睛依然在欣赏纸上的那只狼，“中国的装备有待改进”。斯大林对着周恩来说：“你们提出要苏联帮助你们装备40个师，我们同意，但要分步骤来。目前，我们马上先为你们装备20个师。不过，我们的经验，不必等装备好了再作战，应该边作战边装备，这样士兵会更快地熟练运用这些装备，在实战中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

“我们党中央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周恩来认为时机到了，立刻转入正题，“毛泽东同志一再嘱咐我向斯大林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我还想向您反映一下我们的困难情况，那就是我们的空军刚刚组建，飞行员正在训练，还不能立刻投入战斗，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暂缓出兵。”

“怎么？你们不是已经出动了么？”莫洛托夫一愣，急忙说，“为什么要暂缓呢？要知道，朝鲜情况非常紧急。”

斯大林不动声色，他把烟斗轻轻放在桌上，两眼默默地盯着那张画了一草图的纸。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是由于苏联空军的暂缓出动，中国方面也就暂缓出兵了。

好半天，斯大林不紧不慢地用低沉的声音说：“关于空军问题，我想我们还可以再设法解决。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应该告诉总参谋部，空军方面应该加紧对中国空军进行战前训练。还有援助坦克、大炮等装备。”

“是，斯大林同志，这事我们马上去办。”布尔加宁回答得非常干脆。

“请原谅，”斯大林对周恩来说，“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了空中，很难划定界限，如果和美国正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在战后恢复阶段。”

“我看苏联空军可以穿中国志愿军的服装，以志愿军的名义作战。”林彪灵机一动说，“这样既可解决我们的制空权，又避免了美苏的直接冲突。”

“可是，如果有的飞行员被对方捉去，那只穿一身中国志愿军的衣服又有什么用呢？”斯大林微微一笑，令人捉摸不透。

停了片刻，斯大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那么您这次来莫斯科，就是来通知我们这件事的？”“是的，斯大林同志，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作战，我们暂不出兵。”周恩来不容置疑地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斯大林拿起那只早已熄灭的烟斗，说道：“那么好吧，我们是不是应该通知金日成，让他在中国东北通化建立流亡政府？”

周恩来明知斯大林是将他一军，因为谁能忍心让北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呢？这个结局将是令人痛心的啊。可是中央没有授权他如果苏联不答应派出空军，中国也要出动志愿军。所以，他没有作出反应。

“不过，金日成可以带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嘛！”林彪却说，“北朝鲜山多林密，背靠东北，适合打游击，革命一定会成功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将在手中的烟斗一摇晃，然后站起来，在室内踱步，边走边说：“我理解中国的困难，只是暂缓要缓到什么时候？你们看，朝鲜的事情，对于我们最好的结局是：既不引起世界大战，同时又能有效地制止侵略。”

“也许朝鲜问题在短时期内得不到解决，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

战争准备。”周恩来强调说，“希望苏联答应提供我们20个师的装备能尽快运到，而且我们还需要大量的运输汽车……”

斯大林非常注意地听着周恩来的话，忽然，他停下步子，转身对周恩来说：“这个问题，我讲过，装备还是在实践中更换更好，部队可以在实战中训练，在实践中迅速掌握使用技术，发挥先进装备的效力。”

周恩来不露声色地笑了，脸上依然非常严肃。心想斯大林到底是谈判老手，不愧为智斗罗斯福、丘吉尔的斯大林，他居然轻而易举地把问题又引回到中国应该出兵参战的问题上来。不过，我周恩来见斯大林的目的也已达到了，将中共中央暂缓出兵的决定向他作了解释，事情既已办完，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免得陷入被动。于是也说：“好吧，斯大林同志，我们会将您的建议向我党中央政治局报告的。”会谈后，斯大林为周恩来举行宴会。

为了使气氛轻松、缓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同周恩来海阔天空地闲谈、聊天，时而谈些奇闻逸事、奇风异俗，时而谈些历史故事，时而谈些世间奇闻、历史事件、奇异人物，加上各种奇异的酒会，斯大林还不断向周恩来敬酒，以表示好感。

离开斯大林的住地，天色已经微明，周恩来丝毫没有睡意，因为与斯大林的会见使他的神经高度紧张，睡意早被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认为，他现在完成了一项使命，精神稍稍轻松一点儿，但是向苏联要军事装备，还得一项一项地谈。既不能过于讨价还价，又要机智灵活地达到目的。各种事情都要掌握好分寸，谈何容易。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等在布尔加宁的陪同下，飞返莫斯科。

林彪在路上问周恩来，“总理，您看斯大林今天的态度怎样？”

“经验丰富，不露声色呀！”

周恩来回到下榻的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八号公寓，坐下休息喝茶，机要秘书康一民把国内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送来。

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阅过，眉头一挑，对站在一旁的师哲说：“立即译成俄文首先送给莫洛托夫，要求他立即转告斯大林，并约定时间，举行新的会谈。”

## 中国决定单独出兵

周恩来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电文：

恩来同志：（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

1950年10月13日

周恩来久久凝视着电文，一种振奋之情油然而生。说实在话，毛泽东的气魄令他钦佩不已。现在看来，不管苏联出不出动空军，我们也要打了。

“总理，电话要通了。”翻译的话打断了周恩来的思绪，他健步

走到电话机旁，拿过话筒，用俄文说：“莫洛托夫同志吗？我是周恩来，请翻译同志给你讲话。”周恩来将话筒交给师哲，一句一句地口授：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发来重要电报，有关朝鲜问题我们又有重大决策，请安排我尽快和斯大林同志会见。”

莫洛托夫立即报告斯大林，这时斯大林也已回到莫斯科。

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刚刚见了不久吗，怎么又要见呢？莫洛托夫同志，他们又要提出什么条件？”

“是的，斯大林同志，这很可能，据我了解，您同周恩来谈话以后，中国方面一点动静没有，看来他们真的暂缓出兵了。”莫洛托夫说。

斯大林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中国是个大国，周恩来是位大人物，他要求见我，我能不见吗？何况，此时非常需要中国的支持，尤其是朝鲜战局，没有中国参与是绝对不行的。莫洛托夫同志，你懂吗？”

“我懂，斯大林同志。”

“那你就通知周恩来，请他明天上午来！”

“好的，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他在等我答复呢。”说着莫洛托夫退出斯大林的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健步走进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的表情有些拘谨，他请周恩来坐下，板着脸，没有说话。

“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先开口，他态度自然、轻松而又充满信心，声音朗朗地说，“毛泽东同志刚刚发来电报，我们中央政治局已经再次作出决定立即出兵朝鲜！”

当翻译把周恩来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后，斯大林半晌沉默无语。他想，周恩来刚刚通知中国暂缓出兵，怎么现在又突然通知立即出兵呢，变化真快。他怕翻译翻错了，又问苏方翻译周恩来同志刚才



是说中国立即出兵吗？

翻译说：“是的，斯大林同志，师哲同志是俄文专家，他的翻译从来是又准确又流利的。”莫洛托夫也笑容满面地说：“周恩来同志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的脸上笑容可掬。他意识到中国同志作出这样重大的决策，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将克服多大的困难，付出多大的牺牲！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啊！斯大林不禁感动地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好啊！”他像是对周恩来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周恩来忽然一怔。他看到一种液体物质涌上了斯大林灰黄的眼睑，并且熠熠闪光。

他流泪了，周恩来看在眼里。

周恩来见事情已经办完，斯大林也未再说什么，便起身告辞了。

斯大林突然迅速地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拥抱着周恩来，并且大声说：“请您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感激他，朝鲜人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感激他，他是一位真正了不起的伟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党是成熟的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高举国际主义旗帜的党。请你们放心，你们出兵之后，我们苏联一定尽力援助你们。”

周恩来回到公寓以后，立即将见斯大林的情况电告毛泽东。

## 六、出兵朝鲜与外交周旋

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刻，冷雨霏霏，细密如麻，浓云低低压着大地。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第四十、三十九、四十二、三十八4个军和3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工、长甸河口和揖安3个鸭绿江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入朝以后，周恩来更是忙中加忙了，他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觉。他除了同毛泽东商定战略战术，指挥朝鲜战争具体实施外，组织和调动部队增援朝鲜前线和一切后勤保证，事实上的副统帅兼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长；领导和指挥围绕朝鲜战争的外交斗争；设计和安排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防止美国入侵，保证朝鲜前线的需要和后来的外交谈判。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周恩来去运筹帷幄，精心安排，身体力行。

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仗，他于10月20日由朝鲜副首相朴宁永陪同从新义州来到大榆洞，这是金日成从平壤撤退下来的临时住地。彭德怀和金日成这两位伟人要在这里进行历史性的会见，商讨中朝两国军队如何联合作战的问题。

大榆洞原是朝鲜有名的一座金矿。它位于清川江以北的北镇

西北3公里的一个山沟里，四面环山，从东北向西南方向有一条沟，沟的西南有一个豁口，口外有一条由昌城到球场的可行汽车的土路。沿着沟往里进，西侧有一个农家的草房，便是金日成下榻之处。此外，零零落落还有三五家依山向阳的农舍，是金日成的警卫人员、电台工作人员的住处。

由这个地方往东，有一片洼地，依地势有几块形状不一的稻地，地里庄稼已经收了，只剩下将要枯黄的稻秆之类的东西，被风吹得左摇右晃。洼地以东，就是大榆洞金矿。金矿洞口有一间宽敞的大板房，是矿工原来放工具的棚子。这里就是彭德怀起先一段时期在朝鲜作战的指挥部。

这个木板房后边就是一洞，洞口直径有十多米宽，洞里大洞套小洞，冬暖夏凉，遇有飞机轰炸，便是一座天然防空洞。

在这以前，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就代表中共中央给金日成去过电报，电报说：

倪志亮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四）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上午9时，金日成派专人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请他前往。中国

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柴成文陪同前往。金日成早已站在他的住地门口迎接彭德怀。他见彭德怀来了，趋前几步，亲切地同彭德怀握手，连声说：“欢迎你，热烈欢迎你，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也忙说：“你好，首相同志！”

随后，金日成引彭德怀到住室门口，按照朝鲜习惯，脱鞋进入室内，在榻榻米上席地而坐。

金日成办公室兼卧室，整洁明亮，炕上的油纸擦得锃亮，室内四壁挂着白布帘。

宾主坐定以后，女服务员端来三杯清茶。

金日成两只锐利、智慧的眼睛盯着彭德怀这位 50 出头，却已闻名世界的大将军，身材不高不胖，两只聪明的眼睛炯炯发光；智慧的大脑袋藏有百万雄兵；威武刚毅，沉着稳健而又朴实无华、可亲可爱的形象，心中十分高兴。毛泽东、周恩来选择这样一位志愿军统帅入朝作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人民有救了。他衷心地感谢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伸出无私的救援之手，真正体现了朝中两国兄弟情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

金日成首先非常感激地说：“让我代表朝鲜党、朝鲜人民和朝鲜政府再一次向你、彭德怀同志表示最热烈的欢迎，现在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刻，在我没有接到倪大使和柴同志的通知的时候，我就相信你们是会来的。后来毛泽东同志来了电报，我就放心了。现在你来了，非常欢迎，非常感谢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非常感谢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非常感谢彭德怀同志。”彭德怀坐下以后也不断打量，这位年轻的朝鲜人民领袖，在这样国家面临存亡的危急关头，仍然那样沉着、冷静、胸有成竹，心中非常钦佩，他谦虚而又诚恳地说：“首相同志，你辛苦了。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已经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我们理应支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要我转达对你们的问候和慰问，如果说感谢，应该感谢朝

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

金日成：“谢谢、谢谢！情况很紧急，是否先请你谈一谈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有什么打算？”

彭德怀：“我们的部队 19 日晚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开始渡江，向朝鲜战场开进。”

金日成：“我已知道了。”

彭德怀：“这次出动是仓促的，部队改换旧装备还没有完成，临战前的训练，有的部队还没有进行，第一批入朝参战的部队 4 个军 12 个步兵师，3 个炮兵师，大约 26 万人，作为预备队随后还有两个军 8 万人近日也将入朝。为了防止意外，中共中央已计划再抽调 20 多个师作为第二、第三批入朝参战的部队。总计可达 60 余万人。”

金日成：“好，好！”

彭德怀：“我们准备先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德川、宁远一线以南的地区构筑防御线，构起两三道防御线，求得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作为今后消灭敌人的基地。半年之内如敌人来攻，则在阵地前面予以分割歼灭，如平壤、元山同时来攻，则打孤立薄弱一部；如果敌不来攻，我们也暂不去攻他，等我们换装、训练完毕，空中和地面都具有压倒优势的条件以后，再去攻击平壤和元山。我们这种想法，行不行，听听首相同志的意见。”

金日成：“非常感谢，感谢毛主席、周总理，中共中央的决定我完全赞成。”

彭德怀：“现在的问题是部队过江和开进都需要时间，修筑工事又需要时间，根据现在敌人疯狂冒进进攻的情况，这一设想能否实现，令人担心。所以我们希望人民军继续组织抵抗，尽可能迟滞敌人的前进，以争取时间。”

金日成：“敌人十分嚣张，不可一世。昨晚得到的消息，东路

敌人 17 日已占咸兴，正企图继续北上；中路敌人 19 日已占阳德、成川，西路敌人 19 日已进到平壤南郊。人民军由南方撤回来的部队，西线已指定地点集结，进行整顿，东线多数电讯中断，估计他们很困难，我已经派人送命令给东线军团，让他们占领黄海道、江原道地区，开展游击战拖住敌人，可是派去的人至今没有消息。”

彭德怀：“现在手上能作战的兵力有多少？”

金日成：“现在马上能作战的只有不足 4 个师的兵力。1 个工兵团、1 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10 个师在德川、宁远以北，1 个师在肃川，还有 1 个坦克师在博川，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抵抗。”

彭德怀：“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党中央下这个决心的确是不容易的事，中国大陆刚刚解放，困难很多，现在既然决定出兵了，第一要看能不能在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上有所帮助，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歼灭美国侵略军队；第二不能不准备美国宣布同中国的战争状态，至少要准备它轰炸东北和我国工业城市，攻击我沿海地区，这方面已经有所准备。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部队过江了，究竟能不能站住脚，我看无非是有三种可能。”

彭德怀喝了一口朝鲜茶，明确而又精辟地说出三种可能：“一是站住了脚，歼灭了敌人，争取朝鲜公平合理解决；二是站住了脚，歼灭不了敌人，僵持下去；三是站不住脚，被打回了去。我们力争第一种可能。”

会谈结束后，已时近中午，主人留客人吃午饭。在这荒山僻岭的山沟里，只能简便地吃一顿午饭了。一只炖好的鸡，几个罐头，一瓶葡萄酒。宾主频频举杯，亲切友好，十分融洽。

就在彭德怀入朝与金日成会见的前几天，10 月 1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乘“独立号”专机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见。

麦克阿瑟，1880 年生在美国一个军官家庭，1903 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年方 38 岁即被晋升为少将，被称为“最年轻的将

军”，20世纪20年代，他任美国西点军校校长、1930年升任陆军参谋长，是美国唯一的四星上将，在他之下当时还有一名三星将军，艾森豪威尔只不过是手下的一名少校副官，著名的乔治·巴顿将军当时也是他手下的少校。当时美国陆军只有一辆高级轿车，归他一人独自享用。麦克阿瑟为人极为粗暴，狂妄自大，动辄骂人，甚至不把总统放在眼里，桀骜不驯，违抗总统命令，自作主张。他常挥舞着手上那只镶宝石的烟斗，随意发号施令。麦克阿瑟1935年被调到菲律宾，他子承父业，继任美驻菲军和菲军总司令（他的父亲在美西战争中远征菲律宾，取得这一职位）。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得逞后，进而围攻马尼拉，麦克阿瑟逃亡澳大利亚，随后，他担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1944年他同马歇尔、艾森豪威尔、李海、金·尼米兹、阿诺德一道被升为五星上将，成为美国最高军衔。论资历，他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论战功，他却是“乏善可陈”，他是日军手下败将，在莱特湾大海战中日本海军彻底瓦解以后，麦克阿瑟才有了转机。指挥过许多次两栖登陆作战，一直把日军驱逐出巴布亚，占领新几内亚许多战略要地，直至攻占菲律宾。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他任盟军驻日总司令，执行美国独占日本的任务，君临东京，成为日本的太上皇，更是不可一世。

被号称为“小人物”的杜鲁门接替罗斯福担任总统，不用说更不被麦克阿瑟看在眼里。杜鲁门为了笼络麦克阿瑟，在战后，曾多次邀请麦克阿瑟回国一行，并准备以迎接艾森豪威尔得胜归国那样的隆重仪式来欢迎他。但是麦克阿瑟却借口在日任务繁重，难以脱身，予以拒绝。杜鲁门说：“我一直对麦克阿瑟在日本任职期间不愿接受返回美国表示遗憾。”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讲得更明白：“父亲怀疑他宁愿等待共和党发出政治邀请召唤时回国，以便一举两得，既是得胜而归，又是荣获总统候选人提名。”

1950年7月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侵朝联合国军总

司令。

1950年8月25日，麦克阿瑟写了一封准备在芝加哥五十一届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大会上宣读的信，信中说：“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前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提出乏味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保卫台湾，我们会疏远亚洲大陆，没有比这再荒谬绝伦的了。”当这封信一被披露，杜鲁门立即命令麦克阿瑟收回这封信，他说：“这一切意味着，麦克阿瑟摒弃了我们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他却热衷于更冒险的政策。”反映了麦克阿瑟与杜鲁门之间在政策上的矛盾。这矛盾当然不是主要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而主要是在战略上欧亚位置的摆法上，杜鲁门、艾奇逊等坚持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麦克阿瑟则主张重视亚洲。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国陆一师、步七师、李承晚的陆战部队等，在美国和英国的300多艘军舰和500多架飞机掩护支持下，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在仁川港登陆之后，迅速向三八线及其以北推进。杜鲁门立即给麦克阿瑟发出贺电，认为胜利已成定局，战场上北朝鲜已“丧失了抵抗能力”。但是杜鲁门还有些不放心，苏中两国有无最后介入的可能？从麦克阿瑟已暴露出的“亚洲第一”的思想来看，会不会不听约束，要来一个“更大冒险”？整个局势中问题如何解决？战后朝鲜重建问题，都需要他与麦克阿瑟共同商量。

照道理，作为总统兼美军总司令完全有权召见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但鉴于麦克阿瑟这样倚老卖老、骄横跋扈的人，杜鲁门只好移尊就教，百般迁就，把两人会晤地点定在太平洋上的威克岛。杜鲁门从华盛顿飞到威克岛航程是4700英里，而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威克岛只有1900英里。



威克岛是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小岛，在关岛和夏威夷群岛之间，北纬 $19^{\circ}17'$ ，东经 $166^{\circ}36'$ 。面积8平方公里，人口1600余人，现在被选定为杜鲁门、麦克阿瑟会晤的地方。

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乘“独立号”专机飞到威克岛，他原以为麦克阿瑟在机场等候迎接。据杜鲁门的女儿玛格丽特说：“爸爸飞航两倍于麦克阿瑟将军的行程，而且按级别和礼仪的一切规格，麦克阿瑟作为远东军司令，应当到机场迎接他的总司令。”然而，麦克阿瑟却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直到看见杜鲁门走出机舱，他才下车，慢步走到舷梯前，和杜鲁门握手为礼。他如此傲慢，竟然不向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总统行礼，使在场的人大为吃惊。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木屋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雷德福海军上将、穆乔大使、陆军部长佩斯·布莱德雷将军、菲力普·杰塞普、迪安·腊斯克、阿弗里·哈里曼和布莱德雷的参谋长汉布伦上校。会谈主要研究朝鲜局势。麦克阿瑟首先作了简短的汇报。他说，我保证朝鲜战争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会参战，日本准备接受和约。他坚信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能够在圣诞节前把第八军撤回日本。他将留两个师和其他联合国国家的部队在朝鲜，直到那里选举了以后，就有可能从朝鲜撤走所有非朝鲜部队。选举可在1951年1月份举行。

麦克阿瑟讲完后，就拿出烟斗，装上烟丝，在准备划火柴的时候，他转过头来对杜鲁门说：“我抽烟，你不会介意吧？”杜鲁门转过头来向他悻悻地盯了一眼，然后生气地说：“抽吧，将军。别人喷在我脸上的烟雾要比喷在任何一个美国人脸上的烟雾都多。”

停顿一会儿，杜鲁门问麦克阿瑟：“中国和苏联干涉的可能性如何？”

麦克阿瑟说：“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很小，最多他们可能派五六万人进入朝鲜，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南下到平壤，那一

定会遭到惨重的伤亡。苏联有空军，但他们的飞行员素质都比我们差。我看不出苏联在冬季到来以前可能调出大量的地面部队。苏联的空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根本就配合不起来。”

接着会议又讨论了一旦冲突结束，复兴朝鲜所需的援助问题和日本问题。

最后，杜鲁门批准了麦克阿瑟的部队可以越过三八线直到鸭绿江畔。

彭德怀与金日成会晤之后的第五天，便发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第一次战役。

## 二次战役与美国的诱饵

彭德怀对于入朝的作战方针，早在10月9日，他抵达安东后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上就明确指出：“根据敌情和地形的条件，过去我们在中国所运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于朝鲜，因为朝鲜地面小，敌人还占某些优势，因此，在战术上应采取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形式，要敢于断敌后路，敢于逼近敌人。”根据他的这个作战方针和思想，他把入朝的4个军、3个炮兵师，全部使用上，集中优势兵力打了这一仗，只用了6天时间，便胜利结束了。歼灭敌军15000余人，把疯狂进犯的美军、李承晚军队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美军企图在感恩节前占领全部朝鲜的计划，取得了志愿军入朝初战胜利，稳住了朝鲜的战局。

第一次战役结束之后，彭德怀又计划部署第二次战役。他深知麦克阿瑟恃强蛮横、刚愎自用、居功傲上的性格和脾气以及美国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力量的错误估计，采取诱敌深入、部队佯装后撤、

待其深入后歼灭之的战略方针。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出现在北朝鲜，有三种可能：

第一，为了边境的安全，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

第二，从战略上控制美国的军事力量，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

第三，将联合国军彻底驱逐出朝鲜半岛。

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抗衡，所以三种可能中，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麦克阿瑟通过美军从空中和地面侦察，在朝鲜境内未找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踪影。因此，他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离开朝鲜。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手法，搞虚张声势而已。他决定从地面和空中两个方面实行进攻。

杜鲁门最后拍板决定：

第一，在没有判明中国军队出兵意图之前，不改变麦克阿瑟占领全朝鲜的计划，但要麦克阿瑟见机行事；

第二，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试探，以“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阻止中国进一步介入。

霎时间，朝鲜北部，鸭绿江上，炸弹声不绝于耳，燃烧弹火光四起，天亮到傍晚，整日不停，大批农舍城镇变成瓦砾。美军地面部队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及李承晚的军队也于11月6日开始做试探性进攻，声势浩大。与此同时，美国通过英国、印度给中国传话。11月23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应约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潘尼迦告称，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态度有所变化，英国政府承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利益，建议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后，能与之讨论朝鲜问题。章汉夫问：“你们的见解如何？”潘尼迦：“印度政府的见解是：安理会必须有中国参加，才能讨论朝鲜

问题，英方提的两点是非正式协商的一个开端。”周恩来召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研究了朝鲜战局和印度、英国的传话，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初战胜利，不足以打击美国的嚣张气焰，更没有迫使美国放弃占领全朝鲜的计划，美国的外交试探，完全是一种诱饵，目的是软化我们抗美援朝的决心。因此，决定置之不理，并立即用毛泽东的名义批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要其狠狠打，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正当麦克阿瑟下达“总攻击”命令，公开声称：“毫无疑问，我们的弟兄们可以回家吃圣诞晚餐了。”得意忘形地答记者问：“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兵力到底有多少？”他信口开河地说：“大约3万正规军，3万志愿军。”麦克阿瑟完全错误地估计形势。彭德怀早已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让他自愿钻进的“口袋”。这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除已进入的6个军外，又从华东地区调来第九兵团的3个军。11月25日，彭德怀命令对深入北朝鲜的美李军发动全线反击。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击，势如破竹，美李军全线崩溃，自相践踏。美国一位作家小克莱·布莱尔描述当时美军溃败时的情景说：“11月25日天黑不久，灾难降临了，约20万中国人穿插进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十军之间的空隙，向第八集团军的右翼，即韩国第二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崩溃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美国第九军暴露出来。第九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与左边的第一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集团军攻击了第十军的奥利佛·史密斯的第一陆战师，中国军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局势很快就明朗化了，联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八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开始全线后撤。”

第二次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仅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歼灭敌人

36000 余人，其中美军 24000 多人，报销了敌军汽车 6000 辆以上，坦克、炮车成百上千辆，美军一个黑人连投降，敌军狼奔豕突。志愿军解放了除襄阳以外的全部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和三八线以南的翁津、延安半岛，使得麦克阿瑟吹嘘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圣诞节总退却，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确定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基础。

这两次战役充分体现了彭德怀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实践运用。美国军事家评论说：“主力沿南韩军序下第八师毗连地区集中突破，敌人（指志愿军）突破方向之选定完全正确而巧妙。”

就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打得美李狼狈溃败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特派代表伍修权于 11 月 24 日到达纽约，讨论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问题。

早在美军入侵朝鲜和占领台湾之初，周恩来考虑到这两个严重事件，直接关系到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新中国的安全问题，又鉴于美国竭力为其侵略行径辩护，企图扩大其侵略战果，很有必要派代表到联合国这个讲坛上阐明中国的立场和谴责美国的侵略。因此他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身份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略者，使其撤退侵略军。而美国政府则利用联合国进行反扑，于是在联合国的安理会议程上，就出现了两个重要议题：一是由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是美国反诬“中国侵略朝鲜案”。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问题时，应当邀请有关的当事国参加讨论。

因此，安理会于 1950 年 9 月 29 日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一决定由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于

10月2日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在当时，新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决定，可以说是新中国外交上的一个胜利。

周恩来和中央领导人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出有外交工作经验又敢于斗争的伍修权为特派代表、外交部才子乔冠华为顾问的9人代表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指导下，代表团进行充分的准备以后，周恩来以外长的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通知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其他7人为特派代表之助理人员，共9人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提出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

经过许多周折，中国代表团于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30分到达纽约。一位美国记者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对我来说非常荣幸，作为一名记者，安心地在机场等待一架飞机的降临，它将第一批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载到了我们的国度。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我站在显得很空旷的机场上，晨风是冷飕飕的，头顶上飞机正在低飞降落，进口处在一排警察的临视下，三五成群站在那儿的一百多个摄影师、记者和政府官员们，起了无声的骚动……服务人员将红地毯一直铺到飞机降落的地方，照相的灯光和汽车的强光直射着飞机门，使黑夜如同白昼，联合国的汽车都发动起来了。”

11月27日，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引起各方的注目，座无虚席。众人想看一看被国内外反动派描绘成一群青面獠牙可怕的“土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个态度坦然自若和仪表端庄正直的中国代表就是一次最好的亮相，就是对诽谤者无声的驳斥和有力的回击，就是周恩来领导下新中国外交官员的光辉形象。

11月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

侵略台湾案。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作了长篇演说。他说：“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包括澎湖列岛）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接着他针对美国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须由美国”“托管”或“中立化”等谬论，引用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1950年1月杜鲁门自己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言论一一驳斥，又进而揭露：“美国的实在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自海参崴到新加坡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演说还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说“美国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等说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帝国主义已经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它正在走着1894—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所开始走的侵略中国和亚洲的老路，而且想加速地进行。但是1950年究竟不是1895年，时代不同，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的中国人民，也必定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伍修权最后严正提出：“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庄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于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有其义不容辞的制裁责任。因此，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建议：

- 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
- 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

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力量，以保证太平洋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

伍修权的演说，轰动国际政治舞台，新闻界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此举“是突破，是成功，是胜利”。

伍修权连续几次出席安理会会议，申述中国的立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驳斥诬蔑“中国侵略朝鲜”。他严正指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一开始就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各位代表先生，朝鲜离美国的国境约有 5000 哩，说朝鲜的内战会影响到美国的安全是十足的骗人鬼话，但朝鲜和中国的国境却只有一江之隔，美国武装部队侵略朝鲜不可避免地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事实也证明了侵略朝鲜的美军，已直接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伍修权列举了美国侵朝后，美国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杀伤我国和平居民，损坏我国财产等大量事实后，强调指出：“所有这一切美国侵朝武装力量直接侵略我国的行为，都是向中国人民公然无忌的挑衅，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中央人民政府曾向联合国陆续提出控诉，并要求联合国立即采取措施，制止美国政府此种暴行，撤退美国侵朝部队，以免事态扩大。”“美国的武装侵略朝鲜就不可能认为只是有关于朝鲜人民的事，不，不可能的，各位代表先生，美国对于朝鲜的侵略严重地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密友邦，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江之隔；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侵略朝鲜的这种严重状态和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眼见台湾遭受侵略，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火焰迅速地烧向自己，因而激于义愤纷纷表示志愿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乃是天经地义、完全合理的。”伍修权引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



言人 11 月 11 日的声明说：“中国人民这种志愿援朝抗美的合理表示，世有先例，无可指责。大家知道，18 世纪，前进的法国人民就曾在拉斐德的倡导之下，用这样的志愿行动，援助过独立战争中的美国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各国拥护民主的人民，包括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也同样用这样的志愿行为，援助过西班牙内战中反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民。这一切都是举世公认的正义行为。”因此，他着重申明：“中国人民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们志愿前往朝鲜，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指挥之下，参加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伟大解放斗争。”

联合国会议上面对面的舌战，和朝鲜战略上“武斗”的胜利，使得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异常混乱，美国舆论惊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国会上吵得不可开交。有的说美军已丧失对朝鲜军事局势的控制，有的说朝鲜局势的发展已使世界面临严重危机。有的指责麦克阿瑟判断错误，指挥笨拙，应该撤职；有的把责任归咎于杜鲁门和艾奇逊，要求撤换国务卿，弹劾现总统。有的说，不进攻中国的东北是一种“姑息”；有的说，美国从此只应该照顾自己家里的事。麦克阿瑟则公开把失败的责任推给杜鲁门，说他“本来是可以打胜仗的，只是杜鲁门不让照他的办法干下去”，未批准“轰炸”满洲的计划。杜鲁门则指责麦克阿瑟对形势估计错误，认为中共不会参战；即使参战必将惨败，“如果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平壤，那他们简直是自投死路”。更谴责他不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推诿责任；甚至考虑要撤麦克阿瑟的职。美国广大群众则采用各种方式表示不满；不少地方烧掉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模拟像。它的英法等主要盟国则普遍担心美军深陷朝鲜半岛削弱在欧洲的力量，艾奇逊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秋季的那种热情消失了。”

周恩来是位非常善于审时度势的人，他从朝鲜战局的发展，预计到美国必将在军事、外交上采取新的行动。他指示解放军总参谋

部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迅速制订第三次战役的作战计划，要外交部密切注视各国动向，研究美国可能玩弄什么花招。

## 美国人玩花招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1月3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说：“中国人使用了大量的军队对我们进攻，而这种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目前战场上的情况是不稳定的，如果联合国部队大部分被迫撤退，我们可能节节败退，就像我们从前所遭受的失败一样，但是联合国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有些人曾经希望通过联合国所提供的正当的、和平的途径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在成功湖的代表，顺利地进行讨论和谈判。然而看不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愿意进行这种讨论和谈判的表示。他们避而不谈实际问题，却仿效苏联代表为了阻止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所采取的惯技，进行猛烈抨击，假话连篇。”杜鲁门在回答记者问是否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时说：“我们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它。”第二天，美联社在纽约向它的华盛顿分社发出指令，要将这个消息列为头条新闻。这条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西欧等各国报纸也都用大幅标题刊登这条消息。意大利一家报纸宣称：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已准备从日本的机场起飞。《印度时报》以《坚决不答应》为题发表一篇社论。

接着，麦克阿瑟于12月3日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对中国进行报复的四点建议和措施：

- 一、封锁中国海岸；
- 二、轰炸中国本土内的军工企业及其设施；
- 三、派蒋军入朝作战；

四、要蒋军对中国大陆进行牵制性进攻。

很显然，这是对中国进行威胁和讹诈，企图吓退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兄弟的朝鲜人民反美斗争的支援。

但是，无论是杜鲁门的威胁，还是麦克阿瑟的狂叫，都吓不倒中国人民。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美国的诡计。他们除增派部队加强朝鲜前线的战斗外，并在全中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群众纷纷自愿捐款，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坦克。从北方到南方，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广大地区，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家家户户都升起炉火，架起铁锅为志愿军赶制炒面。周恩来亲自带领挥起了炒面的锅铲。许多的妇女甚至老大娘为志愿军赶做军鞋。一批又一批的青年自愿报名参加志愿军，他们被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被欢送上前线。在思想战线上正在深入开展反对恐美、崇美、媚美的运动。孩子们个个都在唱一首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但是美国的盟国却是吓坏了。英国伦敦极度恐慌。英国下院工党100人签名请愿，声称如果首相艾德礼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意图给予支持的话，他们就退出工党使政府垮台。不仅是安奈林·比万的追随者，而且还有丘吉尔、艾登和巴特勒都表示了“忧虑”，他们普遍希望得到朝鲜事件不至于把全世界搞进一场大战的保证。这样，惊慌失措的艾德礼再也坐不住了，急急忙忙于12月4日越过大西洋飞抵华盛顿。从4日起到8日艾德礼和杜鲁门举行会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艾德礼说：“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可以将它带到正常的谈判中来，从而实现停火。”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立即插话说：“不相信中国人会停火，不能让大陆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

艾德礼说：“从朝鲜和福摩萨撤退，并把联合国的中国席位给共产党中国，这并不能算是过高的代价……没有什么比保持亚洲对

我们的好感更为重要的了。”

艾奇逊立即尖刻地顶上去：“美国的安全更为重要。”

杜鲁门揶揄地说：“我们将待在朝鲜继续打下去。如果我们得到别人的支持，那很好；倘使得不到，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待下去。”

艾德礼还是极力主张停火，说：“达成停火协议，可以使中国同俄国人分裂明显起来，我要他们（指中国）在远东抵消俄国的势力。”“我们单纯把中国看成苏联的卫星国那才是中了俄国人的诡计。”

经过双方争论的结果，达成了一个公报，其要点是：“朝鲜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在没有与对方事先磋商之前，任何一方都不会使用这种武器（指核武器）”。美国得到了“朝鲜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英国得到了“在没有与对方事先磋商之前，任何一方都不会使用这种武器”的保证，总算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艾德礼的华盛顿之行，不仅代表英国人的态度，也代表了法国、加拿大等盟国的态度，他们反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也担心麦克阿瑟胡来。由此可见，美国的盟国对支持朝战的热情已经降到正如艾奇逊所说的“不能再低的程度了”。

杜鲁门则处于既要打下去，又要慎重行事的无可奈何的处境。他又听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局势的分析：“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于是他制定了这样的政策：

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不再向朝鲜派任何增援部队，尽可能稳在三八线附近的战线，然后寻求停火，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前的状况，如果顶不住就撤出第八集团军去保卫日本。

1950年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他向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由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宾、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倡议朝鲜战争先在三八线停战，然后举行一个与朝鲜问题有直接关系的各大国参加的会议，以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潘尼迦说：“这是所有非、欧、美国国家第一次联合起来提出的建议，这一建议不能被认为是支持美国的。因此，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这个建议几天之内将向安理会提出。”

章汉夫回答说：“我将把十三国的倡议和大使谈话的内容报告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看了十三国的倡议和潘尼迦的谈话，召集李克农、章汉夫、伍修权、王炳南、乔冠华、陈家康、龚澎、柯柏年等进行讨论研究。大家一致意见，这些亚非国家由于害怕美国使用原子弹和扩大战争，出于要求和平的愿望，希望朝鲜战争早日结束，得到公正解决，可又害怕得罪美国，只好来束缚中朝人民军队的手脚，搞一个“倡议”。但是不管动机如何，却是有利于美国的，为它寻求喘息的机会，稳住阵脚，以便它争取时间进行准备，然后选择时机再反扑过来。它的要害是“先停”后谈。这个亏我们是吃够了的，1946年马歇尔在中国搞的那一套，宣布停战令，然后帮助国民党运兵，妄图歼灭人民解放军的把戏，我们不能上当。

周恩来于是决定先叫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约见印度驻华大使馆参赞，向他提出四个问题：

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对朝鲜的侵略？

为什么十三国不宣言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十三国不讲话？

为什么十三国还有菲律宾（当时菲律宾是参加“联合国军”入侵朝鲜的美国盟国）？

12月11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他非常诚恳地指出，问题的关键在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美国或联合国有关方面有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表示和步骤。不仅如此，联合国正在讨论“六国提案”，企图以指责中国志愿军的正义行动来阻止朝鲜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又指出，菲律宾不仅在联合国通过侵朝决议时追随美国，更以其军队跟随美国进行武装侵略，现在菲律宾也参加提案国主张先行停战，它的真实意图就非常清楚了。周恩来最后指出，朝鲜问题和东方的和平问题是分不开的。

1950年12月14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十三国提案”，主张由五届联大主席安迪让以及印度和加拿大代表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来确定可以在朝鲜议定满意的停火基础并尽速向大会提出建议。

本来自朝鲜战争一开始，中国就主张尽快把这一战争停下来，而美国却不断反对这样做。到朝鲜战争的形势对美国不利时，美国突然对停火大感兴趣，显然是别有用心。

12月22日，周恩来用外长名义发表声明，揭露美国玩弄的“停火”阴谋的意图，指出现在“停火”，美国就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进。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一切重大决议，中国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准备与“三人委员会”进行接触。

但是在拆穿美国“停火”诡计的同时，郑重重申“中国人民渴望朝鲜战争能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

国侵略军必须撤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和配合外交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鉴于运输困难、气候寒冷和部队相当疲劳外，特别是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坚战需要进行临时训练，建议第三次战役“暂不越过三八线”，以便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现在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决定第三次战役要提前开始，而且必须越过三八线。并且由周恩来拟定，用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名义给彭德怀发了一封电报：

彭并告高：

12月8日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已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灭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个时期。（三）明年1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9个军）抽调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部目前即需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当时，“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总兵力已达34万人，一线

兵力为5个军13个师，另3个旅共20余万人，主力部队仍是美国第八集团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第一线作战的有6个军，约23万人，朝鲜人民军可投入第一线作战的有3个军，14个师，近8万人。为了保证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三次战役顺利进行，中朝两国协商决定中朝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活动，统由联司指挥，决定由彭德怀任联司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

彭德怀在第三次战役开始前说：“军事要服从政治，既然政治形势要我们打，中央也下命令要我们打，我们打起来实际上又有很多困难，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适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们突破三八线，那么我们就坚决突破三八线。”

彭德怀还根据第一、二次战役的经验，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机白天轰炸很厉害等敌我双方的特点，制订了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这是他运用了避敌之长、攻敌之短，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的军事原则，也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法。他向指战员们说：“敌人离开了飞机大炮，攻不能攻，守不能守，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夜间，实行大胆迂回包围穿插作战，是可以歼灭敌人的。”他还根据朝鲜战场上的实战经验，提出在晚上打仗，在有月亮照耀的晚上，更能发挥我军夜战的优势，所以打仗最好在月圆期。但发起攻击时，不能选在月正圆时，选在月圆时攻击，越打月亮越小、越暗。最好是选在月圆前几天，这样打到战役高潮时，月亮正好最圆最亮。因此，彭德怀与洪学智、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和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等商量，选择在1950年12月31日黄昏，约200公里宽的正面上全线发起攻击。



### 第三次战役胜利与中国的“和解性”

美李军没有想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会这样快就发起进攻，以为我们疲劳之师要休整呢，没有做什么准备。当我军一发起攻击，敌人就慌了手脚，纷纷后撤。

经过7天7夜的战斗，中朝两军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歼敌19500余人，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敌逐至三七线。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敌人内部矛盾和悲观情绪，扩大了中朝两国之国际上的影响。

周恩来的住所兼办公室中南海西花厅，这时那肃穆苍翠的松柏、海棠和其他许多树木都已覆盖一层层的白雪，在寒风中摇晃，纷纷飘落。但是冬日和煦的阳光，照进西花厅内，格外的暖和、舒适、安静。

周恩来开了一夜的会，直到早晨8时半才睡觉。秘书上班时，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下一大堆亟待批阅的中央各部委、各省市、政府、中央军委送呈的文电。

上午11时，周恩来起床漱洗、吃早饭，然后走进办公室里迅速地处理文件和电报，当他看到朝鲜前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来第三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不禁高兴地站了起来，连声叫道：“好、好、打得好！”并且马上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走动，分析朝鲜的局势和考虑下一步的斗争。他想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连连遭受失败，美国的国内、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剧，要求停战的呼声会越来越高；而我们的士气旺盛，战斗意志很强，全国上下欢欣鼓舞，胜利的信心越来越高，我军又打到三七线，增加了我们的发言资本。为了调动和利用敌人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美国统治集团，

可以考虑把美国要求“停火”的倡议接过来。他又想了一想，现在美李军虽然连遭失败，但尚未将其打痛、打服，也就是说消灭美李军的有生力量还不够，它还有力量同我们较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的“停火”要求，不能表现过于热心，以免给人中国急于求和的错觉。

周恩来最善于把外交战术和军事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他不仅是一位罕见的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位多才多艺的领导人。他想问题、看事情很广很深很周到，这是一般人所不能比拟的。

周恩来的思想高度集中，他边走边想，走着想着，竟然不知不觉地走到邓颖超的办公室里来了。

邓颖超见周恩来进来，这对相敬如宾的夫妻，处处都心心相印，时时都相互尊重。邓颖超立刻将自己的目光、注意力从文件上移向周恩来，用关切而又深情的眼神看着他。周恩来忽然发觉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忙毫不掩饰说：“啊！小超，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他灵机一动又说：“我们家还有酒吗？今天中午我想喝一杯！”

“小超”是周恩来对自己爱人邓颖超的爱称。

今天，周恩来正忙于朝鲜战争的事，为了庆祝前方打胜仗，想喝一点酒。邓颖超喜出望外，立即亲自到厨房，让厨师准备，并加一个周恩来平时最喜欢吃的苏北淮安名菜红烧狮子头。饭菜准备好了，邓颖超亲自端上桌，一盘豆腐、一盘清蒸鱼、一碗红烧狮子头、一小盘花生米和一小盘海蜇皮，一小锅米饭和两个玉米窝窝头。邓颖超斟满了一杯茅台酒放在周恩来平时吃饭时坐的那面，邓颖超走到他的办公桌边，说：“恩来，饭菜已摆好了。”周恩来抬起头来对着邓颖超深深地笑一笑：“谢谢你，我就来。”说着他就放下文件，挽着邓颖超的手一起走向饭桌，不像平时饭菜摆好了，催了几遍，等饭菜都凉了才来吃。

邓颖超见周恩来今天兴致高，总是满脸堆笑，喜滋滋的，她也就陪着周恩来吃饭。他们进城以后特别是朝鲜战争以来，不常在一起用餐。邓颖超先拣了几个花生米和几根海蜇皮放在周恩来面前的盘子里，让周恩来喝酒，接着又拣了一块鱼放在周恩来的盘子里，拣了一块豆腐放在自己盘子里，她一边吃，一边看周恩来高兴的样子，说道：“恩来，我今天上午开会了，又未来得及看电报，是不是彭老总又在朝鲜打胜仗了？”

“你未看电报怎么知道的呢？”周恩来问。

“我看你高兴的神情。”邓颖超说。

“你倒会察言观色，可以做个福尔摩斯了。”周恩来说，“是的，老彭他们志愿军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这一来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军事、外交都有了较大的主动权。”周恩来又说，“所以，我今天要喝酒庆祝胜利，并遥祝取得更大的胜利。”说着周恩来举起杯郑重其事地满饮了一口酒。

邓颖超用钦佩的口气说：“彭老总真是一位战将，一位大将军。在苏区他就战功赫赫，长征他又是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后又任抗日先遣队司令，一直打到陕北。抗日战争中又同朱德司令率领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打了许多胜仗，最有名的是百团大战，开辟了大片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担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用两万多人的部队，打败了胡宗南 25 万精锐部队，还保卫了党中央和你与弼时同志。真是了不起，现在又以装备落后的志愿军打败最现代化的美军，可以说是天才的军事家。”

“毛主席夸奖他，有一首诗你记得吗？”周恩来说。

“记得。”邓颖超答道。

俩人同时吟道：“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斯大林说他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麦克阿瑟、沃克、李奇微

这些美国赫赫有名的将军，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周恩来脸上露出赞许的神情，“我同他共事近20年，深知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略家和战术家，攻守兼备，勇猛善战和独当一面的统帅，尤以打‘苦’仗著称，能扭转局势，转危为安。他为人坦诚、耿直、刚正、豪爽、无私无畏、光明磊落。”

邓颖超见周恩来酒喝得差不多了，挟了一块红烧狮子头放在周恩来的盘里，又盛了一小碗米饭给他。周恩来也忙挟了一块狮子头放在邓颖超盘里，并说：“你比我还更需要营养。”他随手又拿了一个窝窝头就要吃。邓颖超说：“窝窝头太硬，你还是先吃点米饭，软一点食品，然后再吃窝窝头。”

周恩来像小孩一样，微微地笑了笑，点点头说：“好，今天就听你的。”他边吃边想，又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邓颖超说的，“看来，朝鲜战场，志愿军还得再打几个胜仗，美国人才会服输。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才能有外交上的胜利，军事是后盾，反过来外交上的胜利，又可推动军事上的胜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过老彭他们很是艰苦，很是困难，任务又重。我正在给他们解决困难，保证给养和调兵遣将。你们妇联也要动员全国妇女支援抗美援朝啊！”“恩来，这你放心，我们妇女界决不会落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的广大妇女，都行动起来了，正在赶做军鞋、碾米磨面，保证志愿军的需要。”邓颖超非常自豪地说。

周恩来说：“好，只要全国人民都起来支持抗美援朝，这声势、这力量很大、很大，何愁打不赢美国佬！”

“不过，也需要国际上的声援，比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道义上、物质上的支援。”

“这个自然！还要加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像宋庆龄、郭沫若他们搞的和平运动，动员世界人民和舆论，谴责美帝，支持中朝人民的正义斗争，就是一支很大很重要的力量。”

周恩来几口吃完了小碗米饭，拿起窝窝头吃着，并说：“这东西又香又禁饿。”

邓颖超说：“你还是那个军人作风，吃得那样快！”她赶忙拣了几块豆腐和一块狮子头放在周恩来的盘子里，又舀了一勺红烧狮子头的汤倒在周恩来的碗里，并说：“恩来，你蘸着汤吃好一点。”

“谢谢你，小超！”周恩来非常感激邓颖超对他的照料，而邓颖超则因今天能同她的丈夫在一起吃饭感到很满足。

周恩来一会儿又说：“今天下午我想找外交部的克农、汉夫、冠华、炳南、龚澎、家康来商量，美国人前一段不是说要先‘停火’吗，被我们拒绝了，因为那是阴谋，目的是取得喘息机会。现在美国又吃了一次败仗，倒是可以把美国的先‘停火’建议接过来，以显示中国方面立场的和解性，政治上比较主动，可以争取许多中间国家的同情。”

“好啊，那你叫秘书通知他们，我叫服务员准备茶水。”

经过同外交部同志讨论商定：于1951年1月13日，周恩来建议在中国举行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埃及七国会议，以谈判结束朝鲜战争。为了促成谈判的开始，中国外交部在给印度驻华大使的备忘中又进一步表示：“关于朝鲜战争，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可以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可以在七国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第二，停战全部条件必须与政治问题联系讨论商定。”

在中国提出召开七国会议后，阿富汗、缅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等亚非12个国家，也于1月24日向第五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召开七国会议的提案。但是，美国对于中国为争取恢复朝鲜和平而提出的这些合理的、和解的新建议仍拒不接受，操纵联大于1月30日否决了“十二国提案”。进而又操纵联大于2月1日通过了

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一切，暴露了美国并未放弃侵略朝鲜的政策，并不愿停火、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 美国拒停火，再打第四次战役

2月2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诬蔑案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同时指出：“联大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而且僭越安全理事会权限的情况下，竟通过美国诬蔑中国的提案，显然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美国拒绝“停火”“谈判”和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英国在英联邦会议上公开提出：他们“不愿使美国政策把联邦拖得太深”，主张同中国谈判。侵略集团内部矛盾加深。

苏联斯大林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的一方，而保卫他的边境并力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倒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

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正在为求得谈判解决而作各种努力的时候，通过这一决议，似乎是不明智的……因此，印度反对这个决议。”

事情的发展，正如周恩来所估计的那样，中国的“和解性”取得了国际上的同情，揭露了美国的所谓“停火”建议的虚假性。

3月24日，麦克阿瑟公开狂叫“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5月18日，美国再一次操纵联大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对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有用的物资。这是美国企图在军事压力和“舆论”压力之外，进一步加强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就范。美国第七舰队还在太平洋上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不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杜鲁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必须做长期打的准备。因此决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使全国每个人都能受到这种教育；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需要时间，至少要做两年的准备，这样就要轮番派出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根据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的经验，规定每个军歼灭敌人的具体任务；要做好后勤，充分保证前方作战的需要；积极开展外交斗争，揭露敌人，争取朋友，孤立美帝。

按照上述考虑，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一方面部署军队休整，一方面同金日成会谈，并于1951年1月25日在君子里召开中朝两军高干联席会议，总结前三次战役的基本经验和今后的作战方针，提出至少要再消灭敌人7万至8万人的战斗任务。

与此同时，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代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及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等在沈阳举行志愿军第一次后勤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如何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保证前线作战的需要。

1952年5月22日，根据周恩来指示，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名义就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联合国大会继非法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可耻提案后，又一次破坏《联合国宪章》、僭越安全理事会权限并蓄意扩大侵略战争的非法行动；这一行动丝毫也不影响中朝两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

斗志。声明进一步提出这一美国提案的另一实质是：美国利用所谓中朝两国实行禁运的非法决议，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关系，压低某些原料市场价格，以使美国军火商人独占这些原料，并操纵这些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命脉。

这些有力的措施，打破了美国企图通过政治上的诬蔑、经济上的封锁，给中国制造许多困难，以便有利于他在朝鲜的作战。结果美国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

1951年1月25日起，美军集中了5个军16个师、3个旅、1个团共23万人由刚刚接任在朝鲜战场上死去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的李奇微指挥陆军向我全线200公里的防御正面上发起了进攻，企图乘我军疲劳和补充困难之机，全力北犯，将我军压回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实施其新的进攻计划。

当时，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没有预料到任的李奇微会这样快地把第八集团军恢复起来，会这样快地向我发起进攻。但彭德怀不愧为英勇善战的大将军，他察明了敌人的企图以后，立即于1月27日电令各军停止休整，准备再战，并立即把正在召开的中朝两军高干会议也改为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的动员会议。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经过前三次战役，部队减员很大，又没有很好地休整，十分疲劳，而且战线推到三八线以南，战线延长，补给困难。

这次战役实在是被迫打的，非常担心它的后果，所以，彭德怀在1月31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电报中曾明确指出：“第三次战役即带有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

正是因为彭德怀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孙子兵法中的重要原则，因此，他能按照客观现实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避实就虚，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他同洪学智、韩先楚、解沛然仔细分析了敌我态势后，决定力争阻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局面，从各



方面加紧准备，仍做长期艰苦的打算。他决定改变前三次战役进攻的方针而采取防御的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改善供应，掩护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入朝集结。

在具体打法上，彭德怀决定派副司令员韩先楚到西线汉江、汉城方向组织一个指挥所，指挥三十八、五十军和朝鲜人民军一军团，阻止敌人的主要进攻集团。派副司令员邓华到东线指挥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军，采取诱敌深入，尔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敌1至2个师，进而向敌纵深发展突击，从侧翼威胁西线敌人主要进攻集团，动摇其阵势，制止其进攻。

彭德怀部署完毕之后，同洪学智亲率志愿军司令部向南转移，前进到金化，靠前指挥。这是彭德怀指挥作战的一贯作风，每逢大的战役，他必亲临前线或前进到不能再前进的地方。他为了正确无误地实施指挥，常常冒着战火硝烟，奋不顾身，亲临前线考察地形、敌情，力争做到“知彼”。他多次告诫大家，“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在江西苏区进行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扑向红军。从地图上看，红军的确濒临绝境，难以突围，但是彭德怀放下地图，亲自察看前沿地形，终于发现一条十分险要的路径，他立即指挥部队，由此轻装急行，突出重围。随后，他又率领部队，突然袭击敌军的后背，重创敌军，所以，他认为只有亲临前线，才能亲自掌握战局的发展变化，便于及时调整部署，打击敌人。

金化靠近大山，到处都是很密的森林和一条条山沟，虽然是冬季，大多数的树木树叶已经落光，但是因为它长得密，无论从外面或天上都看不见树林内的动静，是一个天然的掩蔽体。山沟里大部分干涸，只有少数山沟里有潺潺细流，因为是山上流下来的水，没有丝毫污染，而且又清又甜，可以供人饮用。

彭德怀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去处，非常满意。他选择又深又宽的山沟，让战士们挖了几个防空洞，架起几个帐篷，将司令部安置在那里，架起电话、电台同前后方、朝鲜人民军、金日成保持密切的联系，整天整夜在正开掘的工事里阅读前方来电。

由于西线志愿军第五十军、三十八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打得英勇顽强，连续作战十昼夜，才撤退至汉江以北第二线更有力地阻击敌人，因而为东线的反击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和有利态势。彭德怀当机立断，立即命令邓华，首先歼灭横城之敌。

邓华指挥第四十军、四十二军主力和第六十六军一九八师分别于2月11日下午5时至12时晨，经过一夜的激战，将李承晚的第八师打乱并切断其退路，歼其一部，其大部向横城逃窜。12日白天，三十九军和四十军将李承晚第八师大部分被包围于加云北山、鹤谷里地区。四十军一二〇师和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也于广田地区包围敌军一部，经过一天激战，将伪第八师三个团全部歼灭。朝鲜人民军歼灭了伪第三师第五师各一部，于13日进到横城东南之鹤谷里、下安兴里，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13日晨胜利结束了横城反击战，共歼敌12000余人，其中俘敌7500余人。

李奇微在他的《朝鲜战争》回忆录中描写说：“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美第二师又一次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更为严重。这些损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鲜第八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一次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美第二师的翼侧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所以，过了很长时间，才使南朝鲜军队树立起抗击敌军夜间进攻的信心。脚踏胶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现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上，总是把许多南朝鲜士兵吓得头也不回地飞快逃命。”

第四次战役，持续了两个多月，歼敌78000人，取得了辉煌的

战果。我军虽然主动撤出汉城和三八线以南地区，但却争取了时间，得到了补充，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开进、集结，并诱敌进入对我有利的地区，为下一次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朝鲜战场酣战的时候，周恩来和聂荣臻正忙着调兵遣将，支援朝鲜前线。毛泽东也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他在1951年2月7日给他们的信中说：

恩来同志并告聂：

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3个军，西南3个军（先开两个军，另一个军于到达河北后教育两个星期接着开），杨成武两个军（在六十六军及五十军接防后开），四十七军（2月底集中岳州，3月初开东北，训练两个星期开前线）及董其武兵团两个军（先补充1万人，武器方面需亦有改善，准备4月间开前线负守备任务）。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其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的第十三兵团6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3个月至4个月（其中五十军、六十军并同时担任天津营口线守备，其他4个军位于平壤沈阳之间休整），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补充计划，九兵团回华东再补，十三兵团需于撤到休整地点后即予补足。西南已到之两个军，杨成武两个军，须令其即开始作战的各项教育，应召集这些军的负责人来京开会授予任务。西南第二期3个军，须令其于2月准备完毕，3月开始出动，4月到达河北。

### 彭德怀回北京会商战略方针

不久，彭德怀利用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的空隙时间，回到

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中央军委汇报朝鲜战争的情况和商讨今后的战略方针。

这是个春寒料峭的季节，毛泽东穿着一套厚呢黄色制服，晨曦刚退的早晨，在他的住地前面、林荫之下，来回踱步，他一面抽烟，一面在思考。

“主席，早啊！”清脆嘹亮的声音注入他的耳内。他猛一回头。

“噢！恩来，你这样早就来了，大概是刚下班，又是一夜没有睡了吧？”

周恩来微微一笑，没有正面回答。

“一个大国的总理难当啊，事情又多又难，还兼着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前方后方，对内对外总管，可把你给累坏了。不过，现在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子了，只是要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身体是工作的本钱啊，我要让颖超同志管着你和多关心你的身体。”

“请主席放心，我的身体很好。”周恩来随即同毛泽东一起漫步，边走边说，“昨天晚上，我到北京饭店看望德怀同志了，他让我向你问好！”

“他怎么样，身体还好吗？”毛泽东急切地问。

“他瘦了，痔疮又出血，我叫他到医院检查一下，我已同北京医院的院长说了。”周恩来一向关心同志。

“是啊！朝鲜战场非常艰苦，老彭又是一心挂在工作上的人，又碰上美国这个强大对手，呕心沥血，够他受的了。这次回来，要他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关照北京饭店生活上照顾好一点。不过，老彭人脾气很犟，等会儿我们好好劝劝他。”

周恩来点点头，表示赞同。

一会儿，一部黑色轿车，从中华门直驶颐年堂，毛泽东、周恩来忙趋车前迎接，彭德怀从车里走出来，急忙同毛泽东、周恩来

握手。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同恩来在恭候你这打得美国人呱呱叫的彭大将军。你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留一点情面，你这样打法，叫美国人怎么下台啊！”

“打得还不够狠！”彭德怀说，“还要狠狠地打几仗，非叫他认输才行！”

“对，只有以实力为后盾和战场上的胜利，杜鲁门才会坐下来谈！”周恩来说。

“原来你们两人都是好战分子，我这个温和派便是少数了，少数服从多数嘛！”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说说笑笑，一同走进颐年堂毛泽东的办公室。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作战部长、情报部长已在那里等候。

彭德怀刚刚落座，突然又站起来，向毛泽东深深鞠躬，沉重地说：“我很对不起，岸英侄我没有保护好……”

毛泽东虽然已经知道他的大儿子在朝鲜战场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但是一提起此事，他非常伤心，脸色一沉：“是啊，岸英他不幸牺牲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伤心的神情连忙说：“德怀和志司早就报告了，并且做了检讨：没有很好注意安全，保护好岸英。我怕主席伤感，没有即时报告，后来我给你和江青同志写过一封信讲了此事。”

周恩来的信是这样写的：

主席、江青同志：

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事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致电志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

回来的人亦常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周恩来

1月2日

“是啊，我就是看到你的信才知道岸英牺牲的事。”毛泽东两只温润的眼看着周恩来，好久，才沉痛地说，“岸英这孩子太苦了，8岁的时候，就同妈妈一起被关进监牢，他母亲就义后，经熟人出面说情、作保才出狱，被送到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1933年，上海地下党机关遭敌人破坏，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无人收养，岸英就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岸青和岸龙，在上海街头卖报纸、捡破烂、推人力车，维持生活，居无定所，兄弟三人到处流浪，在几次迁移中，小龙失散了，至今没有下落。岸英、岸青几经周折，才到了延安我的身边，然后又送他们到苏联去学习，刚学点本领回国，又不幸牺牲了，我对不起开慧啊！”

室内沉默了好一会儿。

毛泽东毕竟是位伟人、坚强的革命家，“为有牺牲多壮志”这是他的信条。昔日三国刘备兵败荆州，大将赵云在长坂坡大战曹军，突出重围，救了刘备的儿子刘禅，双手交给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赵云见刘备如此器重他，忙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胆涂地，不能报也！”后人都称刘备：“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儿掷马前。”一个封建君主尚且如此爱护部将，人民的领袖更是爱护自己的大将军，更何况彭德怀正在不顾个人安危、生死，在前线指挥作战，怎么能责备他呢。毛泽东用手帕轻轻擦去眼睛里溢出的泪水，喉咙略带嘶哑地说，“老彭，这怎么能怪你呢？打仗嘛，就要有牺牲，别的子弟能牺牲，难道我

毛泽东的儿子就不能牺牲吗？”毛泽东停顿一会儿，关切地说，“老彭啊，我可要提醒你，一打仗，你就不顾个人安危，总要朝前靠，亲临前线，这自然是名将之道，但你是三军统帅啊，朝鲜战场没有你指挥不行，必须确保安全。何况，现代战争，有电话、电报这些现代的通讯设备，完全可以运用来指挥前面作战。”

“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接受这次教训，以后一定注意。”彭德怀悲怆地说，“你看岸英的遗体怎样处理呢？是运回北京安葬呢，还是……”

毛泽东沉思片刻，振作精神，大声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何必马革裹尸还！’就同其他牺牲的战士们一道葬在朝鲜吧！”

“我赞成，这也是我们国际主义的一个见证，中朝友谊的一个象征，我想金日成同志是会欢迎的。”周恩来说。

“那好！我们不谈岸英的事了，现在还是请老彭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吧。”

彭德怀咳嗽两声，清清喉咙，扫视一下会场，神志谦恭地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出师朝鲜，在主席、总理、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和及时指挥下，在极其艰苦和困难条件下，同朝鲜人民军协同一致，已进行了四次战役。歼灭美伪军 10 万人左右，其中美军及联合国军 3 万余人，还俘虏一部分美伪军，其中有一些美国军官，美军第八集团军沃克中将在仓皇撤退中丧命。收复了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并曾一度打到三七线，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我军军威大振，信心百倍，美伪军士气低落，一片失败沮丧的情绪。”

彭德怀大口喝了一口摆在他面前香喷喷的龙井茶，继续说：“原先我们估计入朝作战，有三种结局的可能：第一种是站住了脚，歼灭敌人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第二种是站住了脚，但双方僵持不下；第三种是站不住脚被打了回来。现在看来第一种可能性最

大，第三种则完全可以排除。”

彭德怀提高声调说：“从四次战役中可以看出，美国乃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也是最现代化的军事大国，从未打过败仗，非常骄傲，尤其是麦克阿瑟这个家伙骄横至极，不消灭他的主力，美国是不会认输的，不会退出朝鲜，也不会接受和谈的，至少需要再消灭敌人五六个师，这就决定了朝鲜战争的长期性，而不可能速胜。至于今后如何打法，采取什么战略原则，请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决定。”

周恩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彭德怀的汇报，不时地用铅笔记下一些要点，当他听完了汇报以后，马上发言说：“事实证明主席和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那种崇美惧美怕美的思想是错误的，还派德怀同志统率志愿军，出兵朝鲜，连战皆捷，这一方面说明主席知人善任，指挥得当，另一方面也说明老彭同志勇挑重挑，临危不惧，在强大的敌人疯狂进攻面前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容不迫，泰然自若，随机应变，出色地运用我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连续取得四次战役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美帝认识到新中国是不可侮的。”

周恩来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浓眉下两只大眼放出神采，脸上流露出坚毅的神态，说：“我赞成德怀的分析，现在美帝虽已被打痛，但还未认输，必须成建制地消灭它几个师，它才会接受停战、和谈，朝鲜问题才能解决，所以，我们要立足于长期作战，但同时要争取尽可能早些取胜。”

周恩来停顿一下，又说：“我认为这是可能的，首先，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等已意识到在朝鲜很难取胜，如果长期打下去，只能越陷越深；第二，美国当前的主要利益在欧洲，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在亚洲，而美国用在朝鲜的兵力，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空



军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这在战略上是轻重倒置，主次倒置。麦克阿瑟这样做是违反美国利益的，五角大楼和艾森豪威尔都极力反对在朝鲜战场投入更多的兵力，我看麦克阿瑟这个统帅要当不下去了；第三，经过这段时间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和举国上下思想的动员、物质的准备，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足够的力量打败美帝，现在，我可以保证给朝鲜前线提供更多的兵力和先进的武器，包括炮兵、火箭炮，甚至我们年轻的空军也可以参战，荣臻同志你们说对吗？”

“对，对，总理讲得完全正确，现在我们的后勤工作比入朝初战时期好得多了，更有保证了。”聂荣臻说。

彭德怀突然笑呵呵地从座位上跳起来说：“只要总理、总长在后勤上充分保证，我彭德怀也向你们保证，不打败美帝绝不回国！”

“那你就入朝鲜籍了！”毛泽东风趣地说，“三千里锦绣江山，勤劳勇敢的人民，实在令人可羨可爱啊！”

“是啊，没有朝鲜人民的支援，金日成同志的关心支持，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下令志愿军同志要爱护朝鲜一草一木。”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说。

“中国革命，有许多朝鲜同志参加了，有不少献出生命。现在朝鲜遭到美国侵略，我们帮助它打败美国，那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其实中朝两国军队挡住侵略者北进，也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口号是非常正确的，很有鼓动性、战斗性、号召力。”周恩来说。

毛泽东猛抽一口烟，然后将烟揷在烟灰缸里，说：“我看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我同意恩来、德怀的分析和意见，朝鲜战场在德怀的正确指挥下，已取得了四次战役胜利，把美国的威风给打下去了。从目前情势看来，朝鲜战争要作长期打算，至少也得两年，当然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问题是要成建制地消灭敌人几

个师，断其一指不如断其一手。至于具体如何打法，让老彭和志司研究决定。现在敌人正在继续北进，我想在敌人之地面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暂不进行战役性出击。如敌逼我应战，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军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战役。我估计，敌占领三八线以后的行动有三种可能：第一，趁我疲劳继续北进；第二，暂时（10天至20天）停止于三八线；第三，较长时间（两三个月）停止于三八线，进行永久筑城，待阵地大部巩固后再进。这三种可能以前两种可能为多。但敌发现我有大量援兵到达时，第三种可能不仅存在，而且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变为长期相持于三八线。”

毛泽东喝口茶，清清嗓子，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力求避免这种情况，我军应在第二番部队入朝后，趁敌进至三八线以南地区立足未稳时，在4月15日至6月底，两个半月内实施反击，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伪军建制部队几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地区推进，最为有利。”

“我完全赞成主席和总理的意见，我回去后就同志司同志研究，坚决贯彻执行你们的指示，再打几个漂亮仗，报答祖国人民的支援和期望。”彭德怀态度坚毅。

“主席！”周恩来说，“我建议德怀同志在北京多住几天，同总参、总后同志再谈谈，同时休息一下，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如果时间允许还可到外地看看，前线有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他们，最近陈赓同志要去志司任副司令，甘泗琪同志要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前方领导力量加强了。”

“那好，就按恩来意见办，老彭你要注意身体啊！”毛泽东是十分尊重周恩来的意见的，也很关心彭德怀的健康。

## 七、美国人发出和谈信号

1951年2月，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到朝鲜战场东线进行视察，美国海军加强了对朝鲜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封锁并对沿海岛屿进行侦察活动。同时，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增调援兵，拟将两个国民警卫师调赴日本，准备增援朝鲜战场，南朝鲜至少有两个师约3万人在日本加速训练，装备美械。种种迹象表明，敌在加紧登陆准备。登陆地点可能在东线东岸的通州二元山地区，以配合其陆上进攻，企图打到三八线以北，避免我军由东面山区向其出击。3月中下旬，我十九兵团和三兵团已开进朝鲜，向预定地区开进。

彭德怀根据北京会议的精神和设想以及敌我双方的情况，考虑进行第五次战役，对敌人发动大反击。

中朝人民部队第四次战役的胜利，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整个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在朝鲜问题上争吵不休，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对美国进行公开责难。当美国侵略军重占汉城、收复三八线附近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先后表示所谓“联合国军”不要再越过三八线，以免遭受更大打击和扩大战争。杜鲁门鉴于在朝鲜军事和外交上到处碰壁，为了取得英国等盟国的支持，乃“保证”非经与各有关国家协商不向中朝边境发动攻势，并呼吁与中共进行谈判。

杜鲁门让美国国务院草拟了一个声明。为了求得上下一致，1951年3月2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项声明预先发给麦克阿瑟，打个招呼。

电文称：

国务院正草拟一个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军已肃清了进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的发展。鉴于三八线并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问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你具有什么条件才能在以后的几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表达意见。

当麦克阿瑟看到这个电报后，认为杜鲁门的声明与他的主张背道而驰，再加上他一向居功自傲，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他于3月21日回电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要他表达意见的要求不予理睬，他再次抱怨对他指挥权的限制，“使他根本无法去扫清北朝鲜或者不能作出明显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他说现有的指令很适合当时的局面。同时他于3月24日擅自发表了一项声明：

战事仍按照预定的日程与计划进行中。现在我们已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朝鲜的有组织的军队。愈来愈明显，我们昼夜不停的大规模海空袭击已使敌人补给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就使敌方前线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这一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已无疑地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惯于作这种形式的战斗。敌人的渗透

战术只能加重他们的被零星消灭的损失。敌人的持久在气候、地形与战斗的困难条件下显得不如我们的部队。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这个敌人——赤色中国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地渲染所夸大了。它缺乏工业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工业基地，甚至连建立、维持和运用普通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料也感缺乏。它无法供应顺利进行地面战斗所必需的装备，例如坦克、重炮和在战争中已被使用的其他科学发明。从前，它在人数上的巨大潜力很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随着现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方法的发展，人数上的优势已不能抵偿这些缺陷所固有的弱点。制海权和制空权在当前的的重要性及其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并不逊于过去，有了制海和制空权，就有了对补给、交通与运输的控制权。由于这种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再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方面的劣势结果就形成战斗力的悬殊，而这种悬殊决不是勇气（不管它是多么疯狂）或完全不顾生命的损失所能克服的。

自从赤色中国加入朝鲜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以来，这些军事弱点就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联合国部队目前是在联合国当局的监督下进行作战的，因而相应地使赤色中国得到了军事优势，即使是这样，事实还是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现在必然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鲜能够按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福摩萨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绝不能牺牲已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关系至为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军事方面的结局得在战斗中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的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之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员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麦克阿瑟这个对中国人民挑战的声明，威胁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来，暴露了美国准备再次侵略中国的意图，立即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英国、法国等国害怕把它们牵进直接对中国作战中去，就麦克阿瑟的声明向美国政府提出非正式的抗议，同时要求撤换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发表声明以后没有多久，众议院少数派领袖马丁于4月5日在众议院宣读了麦克阿瑟给他的一封信。马丁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他长期反对杜鲁门的对外政策，3月初他给麦克阿瑟的信中，谈起不在朝鲜利用国民党军队简直是“愚蠢透顶的事”。

麦克阿瑟3月20日回信说：“5日来函附来了你在2月12日发表的演讲稿，至为感谢。我以莫大的兴趣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消逝了，而你当年的英风却丝毫未减。”

“关于共产党中国在朝鲜参加对我们作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呈交给华盛顿。总的说来，大家都知道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大的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你关于利用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这个传统。”

“有些人似乎不可思议地难以认识到，共产党阴谋家已选择亚

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我们已经在战场上参加了由此所造成的争端；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舌战。而如果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了。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很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了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杜鲁门看了麦克阿瑟的声明和致马丁的信，火冒三丈：

麦克阿瑟批评了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申他关于亚洲同欧洲一样重要，美国应把亚洲的战争扩大并进行到胜利，违背、抗拒和破坏美国政府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的战略决定；

麦克阿瑟一再主张在侵朝战争中要动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这同杜鲁门、艾奇逊的主张有分歧；

麦克阿瑟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要轰炸中国的东北，而杜鲁门、艾奇逊对此是迟疑的，因而也有分歧；

麦克阿瑟声明和信件，公开暴露了他同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一派在政策上、侵略步骤和范围上的矛盾，而且政出多门，侵犯了美国总统的职权，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很大混乱。

杜鲁门为了平息帮凶国家对美国的不满，缓和国内外舆论的抨击，他多次召集哈里曼、艾奇逊、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等研究，如何解决麦克阿瑟问题，最后一致认为应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

4天后，杜鲁门发出一项命令：

我以总统和美军最高统帅的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的驻日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司令的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李奇微将军。

同时，杜鲁门还任命詹姆斯·范佛里特接替李奇微的第八集团

军司令。

后来，杜鲁门回忆说，在朝鲜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在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时间”。

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的职务以后，为贯彻杜鲁门的既定政策，再次越过三八线，并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即元山至平壤一线）建立新防线。他认为这条线正面狭窄（只有170公里），地形对他有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是朝鲜的腹地，占领这条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利的。

4月6日，彭德怀在金化的金矿洞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部署第五次战役。

他说：“现在朝鲜战争仍处于艰苦紧张的阶段，各方面的情况及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在第四次战役中进占三八线后不但还要继续北进，而且从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也很大，其目的是为了占领三九线，即安州、元山一线。如果敌人这一阴谋得逞，我军的主要供应线就会被切断，这将对我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对敌人的登陆企图要做充分的估计，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粉碎敌人从侧后登陆以配合正面进攻的阴谋，避免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我军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环节，先敌发起攻击。”

彭德怀又进一步说：“第四次战役打到此时，敌人已十分疲惫，伤亡、消耗尚未补充，预备兵力也尚未赶到，我军立即组织反击最为有利。但是，此时我军的战略预备队集结尚未完成，因此还须再等一段时间，将敌人大体放至金化、文登里、开城一线再进行反击，如敌人进展快，我即于4月20日开始反击，如敌人进展慢，我便于5月上旬开始反击。在第五次战役中，我们要争取成建制地更多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实施反击的地域主要是西线纹山至春川一线，该地域有伪军第一师、英第



二十九旅、美第三师、第二十五、第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和伪第六师。根据敌人战役部署纵深小，其援兵主要来自横的方向等特点，决定我军在战役指导上，实行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战役包围迂回与战术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兵力部署上拟首先以一部兵力从金化、加平一线，利用这一带的大山区劈开一个战场，将东西线割裂。与此同时，以三兵团由正面突击，以九兵团和十九兵团分别从东西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东线人民军金雄集团和西线人民军一军团分别向当面之敌进攻，积极配合作战。”

彭德怀最后强调说：“后勤工作再三重复一句，要特别认真对东线5个军的粮食供应。如一两天没饭吃，再好的作战计划都完了。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 发动第五次战役

4月，朝鲜大地已经冰雪融化，枝头吐出嫩嫩的绿叶，山林里花开鸟鸣，一派生机。然而，人们却生活在炮火连天之中，他们一方面抗击美国侵略，一方面盼望早日实现和平，安居乐业。

4月19日，美军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进至铁原附近。这两个师在敌军整个战线上形成了突击态势，有利于我军对其实施攻击。彭德怀审时度势，断然决定：第五次战役于4月22日黄昏发起。以3个兵团共12个军，在西线实施主要突击，以分割北汉江以西敌人之目的。以第三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从正面突击，以第九和第十九兵团为左、右突击集团，从两翼进行战役迂回，首先分别歼灭伪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土耳其旅和伪军第六师共5个师（旅），然后再集中兵力会合歼美第二十四师和

第二十五师。东线人民军第三、第五兵团积极压制敌人，并乘机歼敌。

经过激烈的战斗，至4月29日，彭德怀命令停止攻击，结束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攻势。因为口子张得大了，想一下子消灭敌人五六个师，再加上战役发起时出现的误差，没能插入敌人侧后，形成迂回包围，所以打了个平推仗，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后勤上仍靠士兵们身上背的那点弹药、粮食，不能进行持久的战斗。

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一直参与朝鲜战争的指挥作战、组织，后勤工作更是由他负责筹划。他洞悉前方情况，深知作战除了战略战术之外，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有它的重要性。因此，他认为朝鲜战争要长期打下去，必须做好后勤工作，有充分的物质供应。

朝鲜战争是一场极其复杂、尖锐而又艰苦、长期的斗争，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许多工作都要周恩来承担，他也主动承担、勇于承担。军事上，他要负责调动军队，掌握战场形势，运筹帷幄，协助毛泽东指挥前线打仗，组织后勤供应等；政治上，他要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外交上，他要同时处理前方和联合国内外的斗争；又要协调中、朝、苏三方的行动。为此，他每天批阅、修改大量文电，及时作出决定，发出指示，召集会议，会见外宾和使节。累得他筋疲力尽，瘦了许多，甚至还病了一场，但他仍然振作精神，为朝鲜战争操劳。

今天，他为了加强朝鲜战场的后勤，想了很久很久，决定给志愿军司令部发去一个电报，要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国汇报，并决定和解决一些问题。

他刚处理完这一大堆事，秘书何谦走进来，提醒他说：邓大姐

在南方养病，给您来了信，至今未复。她很关心您的工作和身体，您不给她复信，她会不安和担心的。周恩来看了一眼何谦，又批完一个文件后说：“要不是你提醒，我倒给忘记了。”

周恩来提笔写道：

超：

昨天得到你 23 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个星期前，陆瑾答应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好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还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乒乓之战，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始发青，你如在 4 月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那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在后证了。

周恩来

3 月 31 日

## 成立志愿军后勤司令部

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说：

4 月下旬，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后期的一天，我正在楠亭里第二分部检查督促物资前运工作，忽然接到彭总的电话，让

我马上回志司。我放下电话，便匆忙赶到志司所在地——空寺洞。这时，天已经擦黑了。一走进彭老总的矿洞，他就大声对我说：“老洪呀，你马上回国。”

“回国？”我感到很突然。

彭总背着手，在洞内踱了几步，烛光把他的身影射到洞壁上。

“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对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很关心。”他转过身，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你回去一趟，向周副主席汇报一下我们前线后方供应的情况。”

我心想，让党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一下前线后勤的实际情况，实在太有必要了。

当时，正如我前面已讲过的，美军正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部的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还以少架多批的战斗轰炸机，依山傍道，昼夜不停地超低空搜索扫射，不放过一人一车一缕炊烟。朝鲜北部山多河多，铁路多在沿海，腹部地区铁路很少。公路纵线多，横线少，盘山跨水，弯急坡陡，又多与铁路并行，往往一处被炸，铁路、公路各线受阻，道路布局不适应战时运输的要求。志愿军后勤运输主要依靠汽车，而敌人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交通作为重要手段，使我后勤运输陷入极度的困难之中。第三分部汽车第四团刚入朝时，因经验不足，车辆待避过于集中，一次就被敌机打毁了73台。再加上战况复杂多变，部队推进迅速，第一次战役打到清川江，第二次战役延伸到三八线，第三次战役插到了三七线，运输线迅速延长，第四次战役后和第五次战役中参战兵力又成倍增长，后勤跟进供应十分困难。

志愿军党委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陆续增加战区的后勤力量，调整后勤保障单位的部署，主要是

沿袭国内解放战争后勤开设兵站线的经验，通过兵站线实施跟进保障。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为了抢时间，争效率，减少损失，志愿军各级后勤都把主要工作转入到了夜间进行。但是，因为敌人破坏严重，部队前出深远，后方供应仍十分困难。现在，彭总让我回国向周副主席汇报情况，使中央领导直接了解前线的情况，以便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真是太及时了。

这时，彭总又说：“你回国后，把我们决心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想法也向周副主席汇报一下。”

我说：“知道了。”

我简单地收拾行装后，带着警卫员，当夜就坐吉普车出发了。路上车多、人多，经常阻车。由于夜黑，路窄，不准开灯，汽车险些翻到沟里。天亮时，敌机又俯冲下来，向吉普车扫射，幸亏山头的高射炮部队及时开炮，我们的车才得以安全通过。

到北京后，我先到中央军委驻地，聂荣臻代总长对我说：“周副主席正等着你呢，快去吧。”当时，我穿着志愿军的单军装，由于日夜兼程，浑身泥污。但是也顾不了许多，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中南海周副主席办公室。周副主席已站在门口等我了，我向他敬了礼，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洪学智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

我说：“周副主席辛苦。”

周副主席工作很忙，他显得很憔悴。

当时，由于敌机轰炸，部队白天不能生火做饭，晚上又要行军作战，做饭条件极困难，只好吃炒面。为了给部队供应更多的炒面，周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亲自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前线将士知道此事，感动得无法形容，真是吃一把

炒面，长一股劲呀！

周副主席让我坐下，关切地问：“前线作战情况怎样？”

我向周副主席简要地汇报了前线的基本情况，然后说：“几次战役打下来，我们吃亏就吃在没有制空权，敌机的轰炸破坏使我军遭到极大的损失，敌机经常一折腾就是一天，见到人就猛冲下来嘎嘎地扫射，扔汽油弹，化学地雷，定时炸弹、三脚钉……晚上是夜航机，战士们叫‘黑寡妇’，也不盘旋，炸弹便纷纷落下，到处是大火。主要是阻滞我军的行动。”

周副主席十分严肃地说：“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疯狂到了极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的海空优势下，我们却打到了三八线，美军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吃败仗。不过，志愿军要想不吃亏，就得研究对付敌机的办法。”

我说：“志司在后方的支援下，已经加强了高炮部队，并已在关键点上增设了防空哨。现在我军主要是靠勇敢精神。比如运输车遇到敌机轰炸时，有的就开足马力，猛跑一阵，带起数百丈尘土，搞得敌人不知怎么回事，惊呼共军施放了烟幕弹。”

周副主席笑了，说：“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打掉了恐美病。同志们付出了鲜血，但教育了4亿人。”说到这儿，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美国会不会登陆中国？现在还不能肯定。但是，前线我方胜利越大，登陆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前线一定要打好。中央军委考虑，要尽快出动飞机。当然，我们的飞机有限，只能给敌机制造一点混乱，振奋一下士气。”

我说：“前线将士都盼望我军出动飞机。”

周副主席说：“中国有飞机，许多与我国有伟大友谊的国家有飞机，但是飞机参战还不是时候，这个你当副司令，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一想，也确实如此，飞机要吃汽油，如果用朝鲜战场上现有运输力量来供应，就把一切军需弹药都停运，也不见得行呀。后方供应制约着战役的规模，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接着，周副主席又问：“供应主要是什么问题？”

我汇报说：“志愿军没有防空力量，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第三次战役时，前面兵站与后面的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通讯系统，常常联络不上。”

周副主席说：“所以，外国军事家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中央军委考虑，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

我说：“军委的决定太正确了。后勤现存的主要问题是供应不及时。前三次战役，部队是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如果供应得好，胜利会更大。现在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无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周副主席神情严肃地听着、点着头，不时地用铅笔在纸上写几个字。

“现在敌人参战的飞机已由 1000 多架增加到了 2000 多架，并由普遍轰炸转向破坏我运输线，特别是凝固汽油弹对我地面仓库设施危害最大。敌人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我后方指示目标轰炸。4月8日，敌机向我三登库区投掷的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了 84 节火车皮物资，其中有生熟粮食 287 万斤，豆油 33 万斤，单衣和衬衣 408000 套，胶鞋 19 万双，还有大量其他物资。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百分之六七十到前线，百分之三四十在途中被炸毁……”

周副主席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十分严峻的神情。

我又说：“我们志愿军也采取了一些积极预防措施。”

周副主席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说：“每天战役发起前，除汽车装备、马车装足外，人员还加大携带量，一个战士携行量达六七十斤。在部队运动迅速，供应困难、后勤跟进不及时的情况下，这是一线作战部队生存和战斗的必要保障手段。”

周副主席说：“我们的战士辛苦了。”

我说：“战士虽然苦一点，但感到还是这样保险些。”

周副主席问：“听说美军常常把丢弃的作战物资炸毁呀？”

“是这样的，所以在前线，取之于敌十分困难。正因为如此，志愿军采取的第三条措施就是与朝鲜政府协商，开始就地借粮。”

“这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吧？”

“可以。但是在三八线以南至三七线一段地域不行，这里原为敌人占领，经过敌人反复搜刮，而且当地人民志愿军也不了解，就地筹措非常困难，形成了300里的无粮区。”

周副主席焦急地问：“对此，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没有？”

我说：“采取了。彭总让尽量想办法解决。我们主要是改进运输方法，组织多线运输，并由成连成排运输改为分散运输跑单车。另外，实行分段包运制。这样各汽车部队可以熟悉本段敌机活动规律和道路情况。再就是在沿线挖掘供汽车隐蔽的掩体，这可以减少人员、车辆的损失。”

周副主席问：“这样做有效吗？”

我说：“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

周副主席说：“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后方供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一下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美帝国主义者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扬言去年‘圣诞节’就结束朝鲜战争。事实上，不但没有结束，我军反而打到了三七



线。我们以劣势装备打败了有海空优势、装备先进的美国，这对我们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很大的鼓舞。对世界各国人民反帝斗争也是很大的支援。过去，美国南北战争时，北美的装备比南美差，也是北美打败南美。我分析美国不敢在中国大陆登陆。英法怕扩大战争，说‘进攻中国就是战略上失败’。我们同朝鲜人民一道，克服困难，不怕牺牲，一定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

周副主席又问后方去的司机怎样，能否适应前线的形势。我告诉周副主席：“这些司机很有勇敢精神，但由于不熟悉情况，伤亡大，所以，先让他们担任司机助手，慢慢积累通过敌机封锁的经验，逐步过渡到当正式司机。”

汇报到这儿，周总理问我：“你还有什么问题要讲？”

我说：“彭总还让我向你汇报一个重要问题。”

周总理：“什么问题？”

我说：“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问题。”

“啊？”周总理感兴趣地问，“说说你们的想法。”

我说：“从朝鲜战争中彭总和我们都逐渐认识到了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50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而且也在后方打。现在，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了我们在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我们只有打赢了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诸多

兵种联合作战，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导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总理一边听，一边点头，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很重要，军委一定尽快地加以研究，尽快地采取措施。”

汇报结束，我站起身要走时，周副主席说：“马上就‘五一’了，你准备一下上天安门吧。”

我看看自己的一身破旧的军装，笑着说：“我这个样子，怎么上天安门呀！”

周副主席说：“怎么不能上，穿这衣服好呀，你代表志愿军嘛！”

我还是笑着推辞，周副主席说：“这样吧，我告诉杨立三，给你做一套新军装。”

“五一”节，北京市人民举行了盛大游行，体现了国家空前的团结、强大。

我上了天安门城楼以后，工作人员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你。”

我问：“什么时候接见？”

他说：“你等着，到时候我来带你。”

不一会儿，我就被带进了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见到毛主席，敬了个礼，毛主席对在座领导同志说：“洪学智同志是志愿军的副司令员，是从朝鲜前线回来的，是志愿军的代表。”接着毛主席问，“彭总的身体怎样？”

我说：“彭总的身体很好。”

毛主席又说：“你们打的敌人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海军的优势，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朱总司令说：“你们打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

毛主席说：“你们每打一仗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接着又问，“你回来汇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说：“已经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已做了安排，他还要找我谈一次。”

我临回朝鲜以前又到总理那儿去了一趟，将前线需要解决的问题，又进一步做了落实。

五次战役后期，军委专门派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张令彬、空军司令刘亚楼和炮兵司令陈锡联等到空寺洞志司，具体了解后勤困难，研究如何加强对志愿军后勤的支持，如何加强志愿军的后勤建设。

杨立三、刘亚楼他们认为彭总的意见很有道理。回去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徐老总、聂老总等军委领导做了汇报，军委很快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并给我们发出指示，决定“在安东与志司驻地之间，组织志司后方司令部”。

5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决定命令：

着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管理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包括铁路，军事运输在内）；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直接受志司首长领导；

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勤务之各部队（如工兵、炮兵、公安、通信、运输、铁道兵各部队、工程部队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等，今后统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中央军委任命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周纯全为政治委员，张明远为副司令员，杜者衡为副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漆远渥（后名李雪三）。

中央军委的决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后勤在现

代化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职权和范围，标志着后勤由单一兵种向诸军种合成的重大转变，是志愿军后勤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

这乃是周恩来关心和指挥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一个创举。

## 美苏的刺探接触

再说，朝鲜战场前线，彭德怀于5月6日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命令。

他以九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由九兵团统一指挥），首先歼灭县里地区的伪第三、第五、第九师，尔后视情况继续歼灭伪首都师、伪第十一师。以第三兵团割断美、伪军联系，阻止美第十军东援。十九兵团在西线积极行动，钳制美军主力，配合东线作战。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作战，于6月10日结束。整个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是最长的一次战役，中朝双方共投入15个军，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摆脱了我军在第四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我新参战的部队取得对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同时，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也迫使敌人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自从1950年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到1951年6月10日，8个月的时间里，已进行了5次战役，总计歼敌23万余人，其中美军115000余人。虽然和三次战役后相比，在第四、五次战役中敌军又往北推进了一些，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将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到了三八线附近。

美国在侵朝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根据他们的兵员和物资消耗，平均每月为85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比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消耗多一倍。本来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现在却把重兵放在朝鲜战场，放在亚洲，总兵力已达69万人，而且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伪军3个师以及在美国国内的六个半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美国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胜利却十分渺茫。这不仅引起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激烈。

在这种军事和政治上均不利的局面下，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哀叹道：“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美国统治集团已经认识到单靠军事手段，打败中朝军队，解决朝鲜问题是不可能的了。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遂作出“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6月初，美国又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多次透露愿意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意图。正如艾奇逊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艾奇逊先是要当时在巴黎玫瑰宫的查尔斯·波伦向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也许对方没有懂得他的意思，试探毫无反应。

艾奇逊让驻联合国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向马立克或者是苏联驻联合国的副代表西门·查拉普金进行非正式的试探，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一些谣传。艾奇逊又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秘密试探一下，同样没有回声。艾奇逊想，也许直接去找中国。于是他让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伯顿·马歇尔去香港寻找接触的机会，然而，辛苦了一阵，仍然没有获得成功。艾奇逊着急了，这时他想起另一个人，乔治·凯南。这

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得力助手、临时代办，长期在苏联工作，回国后又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任美国国务院顾问，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里工作，他同苏联政府、外交部交往甚多，有许多朋友。国务院请他5月中旬来华盛顿，向他交代一项特别任务，让他去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

凯南受命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马立克，要求作为私人拜访去看望他，并希望马立克接信以后打电话或写信通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给予回答。

马立克在苏联外交部工作时，认识凯南，因为经常打交道，那时苏联同美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所以马立克接到凯南的信，便立即复信欢迎他来做客。

5月13日，凯南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驱车到达纽约海滨长岛格伦克福庄园的一幢幽雅的别墅，受到了主人热情的接待。

坐落在长岛乡下的这所别墅，被习习海风缠绕，环境十分幽雅恬静安逸。这里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领导人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度假的地方。

马立克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接待了凯南，桌子上摆着水果、香烟，马立克以尊敬的口气问凯南：“老朋友，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威士忌还是康雅克？”

凯南说：“我喜欢威士忌。”服务员很快送来两杯带冰的威士忌，恭恭敬敬地递给凯南和马立克。

于是，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用俄语开始了“朋友式”的交谈。

凯南从美苏联系说起逐渐引向本题。他说：“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最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的政策和目的。当然，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会是苏联的希望。”马立克一听，立刻感到乔治·凯南此行决不只是为了看望老朋友，话中有

话，似乎负有使命，他发问：“既然美国的政策和行动会造成这样的危险，难道不应该改变你们的政策和行动吗？”凯南不理睬马立克的提问，直接触及本题，他接着说：“看来，中国人所引导的航向不可避免地会招致这样的结果。不管北京是否希望这样，但对我们两国来说，这是引向严重麻烦的趋势。”

“是这样吗？”马立克说，“我们不止一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去解决。凯南先生提到中国的行动，你知道，中国曾多次提出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而且当你提到中国时，难道你不应该回想一下杜鲁门总统去年6月27日的声明，你们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和你们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错误政策吗？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美军逼近鸭绿江直接威胁到它的安全时才进入朝鲜境内的。”

一个外交家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就像一个侦察分队为了完成任务，置途中任何干扰于不顾一样。凯南仍不反驳。他说：“我说的是现在的危险趋势应该得到制止。我看制止这种趋势的唯一办法是双方的司令官进行停战和停火的谈判，我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于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

马立克也不理会凯南的提问，他两手一推做了个手势：“你知道，苏联并未介入朝鲜战场上的作战。”

凯南单刀直入地说：“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至此，凯南总算把他受命要说的主要问题都捅出来了。马立克马上追问：“是恢复朝鲜战争战前状态吗？”

“是的，马立克先生。”凯南说，“各自回到战前位置。”

“一切外国军队应该立即从朝鲜撤离。”马立克说。

“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

“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连在一起的，美国的政策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只是朝鲜问题，还有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

“考虑到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一般利益，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落在和美国敌对力量的手中，同样不能同意整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凯南喝了口威士忌，又说，“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应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与其他更广泛的远东问题无关。……关于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目前不可能涉及这些问题，包括朝鲜的前途问题在内，准备以后讨论。”

双方谈话结束了，稍有外交常识的人都知道，像这样谈话是不会作任何结论的，各自只能向自己的政府作报告。

马立克同凯南的谈话，传到北京，周恩来同外交部、总参谋部进行研究，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缓兵之计，以谈判作为幌子，争取时间，调集兵力，再打，甚至大打；一是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5次战役，使美国认识到依靠武力征服朝鲜已不可能，企图通过谈判得到它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朝鲜战争一开始就主张和平解决的，现在既然凯南找马立克要同我们谈判，不管美国出于何种动机、哪种可能性，我们都应接过来，不好拒绝也不应拒绝。在谈的过程中，利用矛盾，分化敌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这样对我们有利。但鉴于美国还很强大，还没有被打得很痛，不甘心于使朝鲜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因此，谈判可能是长期、曲折、复杂的斗争；军事斗争和谈判斗争可能交替进行，即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打边谈，时断时续，最后取决于战场的胜负而定。所以我们必须作两手准备，尤其军事上要有充分的准备，防止敌人在谈判期间向我进



攻，甚至是大的进攻，以期逼我订城下之盟。对敌人的进攻，我们必须坚决反击，将其打败、打痛、打服，方能取得谈判的胜利。无论是谈还是打，都必须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协商好，步调一致。为此，建议邀请朝鲜首相金日成同志来北京共商大计，同时要把我们的想法告诉苏联和斯大林同志，在斗争中很好地配合、协调。

1951年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着重研究了谈判的时机和谈判的条件。双方一致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后进行了5次战役，中朝两国军队艰苦奋斗，已消灭敌人20多万，把美国的侵略气焰打了下去，恢复了战前的状态，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局，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达77万人，朝鲜人民军增至34万，我方总兵力已达112万人，敌我兵力之比为1:1.6；我占绝对优势，但技术装备比敌人差，敌人有火炮3560余门，坦克1130余辆，飞机1670余架，舰队270余艘，我军仅有少量的飞机和坦克，火炮的数量质量亦远远不如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企图消灭敌人重兵集团也是困难的。我要在军事上解决朝鲜问题，关键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需要时间，需要有个敌我力量消长的过程，需要一个改善我军技术装备，提高我军现代化作战能力的过程。这样战争就要长期打下去，速胜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如能在谈判中讨论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和朝鲜的前景问题，我们则不应放过这个谈判的机会。这样一方面准备持久作战，再多消灭一些敌人有生力量，一方面通过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双方还就谈判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讨论。

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也同意中国与朝鲜的分析和意见。

于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于6月23日在联合国举办的

“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

他说：“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最巨大的价值。”

“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6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却又受到威胁了。”

“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种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采取这种步骤是可能的吗？我认为是可能的，只要有结束朝鲜境内的流血冲突的真诚愿望。”“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马立克讲话以后，周恩来立即召集外交部副部长、有关司长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响应，但认为不宜用政府名义出面，要看看美国的反应，而用《人民日报》的名义表态，回旋余地比较大，这时恰好又是朝鲜战争一周年，所以，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朝鲜战争一周年的社论。7月3日又以《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奋斗》为题发表社论。社论说：“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我们以前一向要和平，我们今后永远要和平。我们要中国的和平，我们要亚洲的和平，我们要全世界人类的持久和平。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社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一向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

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而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的努力归于失败。”社论又说：“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6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土拉霍马一个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政策演说，他一方面叫嚣要继续进行朝鲜战争，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谈判。”

6月27日，美国国务院训令驻莫斯科大使寇克就马立克的演说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回答马立克所表达的乃是苏联政府的意见。

### 李奇微发出和谈建议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举行谈判的建议：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更提议此会议可在元山港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 李奇微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发出复电。电称：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本年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双方通过电文交换，顺利达成了如下的协议：

一、谈判地点：选在三八线上的开城。

二、正式谈判日期：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

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

四、应对方的要求，我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我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五、双方代表团的军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谈判将要开始了，双方都保持高度的警惕。

中央和军委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谈判期间，如遇敌人大举进攻时，我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彭德怀告诫所属部队“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李奇微在发出愿意谈判的电报的同时，向联合国军也下达了两点特别指示，要部队注意不要松懈战斗意志。一、注意“众所周知的苏联两面性和欺骗性”。二、注意“像安理会这样的国际机构要采取决定性措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希望全体将士在战场务必继续保持斗志，严防松懈”。

全世界都在注视朝鲜停战谈判，盼望从这个朝鲜的古都发出和平的福音。

在中国，这次谈判的实际指挥者和主持人是周恩来。从马立克和凯南会谈后，他就注视各方的反映和动向，考虑谈判方案和人选。

周恩来首先想到的是李克农，这是合适的人选：他现在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他能坚定不移地比较好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为人比较谨慎小心，又有丰富的谈判经验，由他担任谈判的第一线指挥是可以放心的，同时又选了对国际问题有研究而又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的乔冠华作为他的助手。乔冠华当时是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

谈判班子组织好以后，毛泽东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则多次同他们一起研究谈判方案、对策、要点等。

7月5日，李克农、乔冠华告别了前来送行的政务院办公厅、外交部、总参谋部等同志、战友和亲属，登上从北京前门车站出发的专列火车。车厢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吊篮，是由珍珠、玛瑙、金丝、银丝织成的，做工精细、考究，这是清朝慈禧出行时的“御辇”，今天成为新中国谈判代表团的专车。

夏风习习、车轮滚滚，火车奔驰在祖国华北和东北的大地上。当晚便到达祖国的边城安东，中国驻朝使馆参赞柴成文专程由平壤前来迎接，他是谈判代表团的中方联络员。

当天夜晚，谈判班子乘吉普车赶赴朝鲜，车队在漆黑的夜空，跨过鸭绿江，两岸盛开的山花吐出芬芳的馨香，送别离开祖国前往友邻国家执行和平任务的人们，他们迎着阵阵清爽的凉风，顶着满天繁星，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前进。7月6日晨，李克农、乔冠华等一行到达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根据地。这里环境优美，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山林，满山满坡皆是绿油油的青草、树木，百花争艳，

姹紫嫣红，令人心旷神怡。李克农操着皖南乡音，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不是到了世外桃源了吗？”是的，朝鲜是很美的，三千里锦绣江山是世界闻名的，要不是战争的破坏，这里是令人向往的好地方。

金日成的作战指挥部就在这里，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也住在这附近。

当天上午，金日成在他的办公地点亲切地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倪志亮、柴成文。

在这之前，7月2日上午4时，周恩来以毛泽东名义就准备和谈问题给彭德怀、金日成发了电报：

彭德怀同志，并金日成及高岗同志：

（一）同意彭留在联司主持作战及7月10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二）同意邓华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请邓即日动身去平壤，务于4日晚上或5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意见即告邓带去。（三）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于7月2日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于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5日早晨或5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速布置在开城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需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

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望速查告。

在同一天 24 时，周恩来又以毛泽东名义给彭德怀、高岗、金日成就谈判期间我军部署问题发了一份电报：

德怀、高岗同志并金日成同志：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 10 天到 14 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 10 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 10 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7 月 4 日，周恩来又以毛泽东名义就筹备谈判会场及开会事宜连续给金日成、彭德怀等发了三份电报：

第一封电报内容是：

金日成同志，并告彭德怀同志：

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请你派出一位负责同志，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参谋长解方同志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如该地无房屋，就需带帐篷去。双方会

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需带去。一切均需于7月8日以前准备完毕。

第二封电报内容为：

彭：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第三封电报内容为：

金日成同志，并李克农、乔冠华同志：

（一）金于7月4日13时的电报，李乔于7月4日12时由安东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二）李乔及邓华均可于7月5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日满、金波、柴军武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7月5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6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三）如果你们同意认为于7日上午我们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车去开城帮助会议工作则那个通知仍可于6日上午发表。究竟是否发表那个通知，请金于明（5）日再给我一电。但李乔南邓金金柴等同志，最好于5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从上述电报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和处理问题之精明、仔细、周到和远见卓识，他们既预计到美帝国主义在谈判过程中采取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即谈判和军事行动同时并进，或交叉运



用，军事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寻求，谈判中得不到的东西则施加军事压力，使你屈服退让。我们则必须用革命的两手策略对付其反革命的两手，在谈判中认真地谈，诚心诚意地谈，一丝不苟地为和谈做准备，用事实表明中国人是多么地渴望和平！在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如遇敌人进攻，坚决打败它。这样从谈判一开始，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驾驭着局势的发展。

解方和几位参谋、中方联络官到开城实地选择了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为朝鲜停战谈判的会址。来凤庄看上去是一位富有家庭的宅第，它坐北朝南，房前有用自然石块砌成的花坛，中间是一棵经过精工造型的古松，周围是一些木本花草。

大门是个过厅，再进去是宽敞的三间正厅，里间西边的屏风已经破旧，去掉屏风，中间摆上一张长桌，南北对坐，后边还可以各摆一排稍窄的长桌，供参谋助理人员就座。在当时条件下，我们的联络官认为是比较理想的会场。

来凤庄的西南，靠松岳山边有几家民房，再靠西南边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作为志愿军代表团的驻地，人民军代表团安排在南山中学附近的民房里。来凤庄西北约400米处有一幢石砌白色的两层小楼，原来是个教堂，从会场到那里有便道，略加平整就可通行汽车，准备作为对方代表团会间休息的地方。

根据中朝两党中央的协议，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出面谈判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志愿军代表是邓华和解方，朝鲜人民军代表是李相朝和张平山。南日曾在苏联留学，先攻习教育后又学军事，回国后担任过教育局长、人民军参谋长。

邓华，1928年参加红军，出席过著名的古田会议，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辽宁战役、平津战役。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司令员，挥戈南

下，解放广州和海南岛。后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专管作战的。他战功卓著，是位有勇有谋的高级指挥官。

解方，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参谋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达延安，先后担任军委情报部的局长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兵团参谋长，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是我军难得的既富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

李相朝，抗日战争期间，曾是活跃在中国太行山朝鲜义勇军的队员，为人敦厚，对朝鲜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

张平山，朝鲜人民军一军团少将参谋长。

李克农、乔冠华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主持第一线谈判工作，深知责任重大，身上的担子很有分量。他们一到开城便开过多次会议，检查谈判的准备工作，他们处处学习周恩来，事无巨细都是亲自过问，直到落至实处为止。几天来，他们几乎没有片刻休息，利用一切时间尽快熟悉自己班子里中朝双方的每个同志，个别谈话，布置工作。李克农忙得原有的哮喘病又犯了，只能靠药物来控制。乔冠华年轻，身体好，又是乐天派，整天乐呵呵的，有说有笑，风趣诙谐。

明天，7月10日，停战谈判就开始了。李克农、乔冠华还是有点放心不下，晚上10时，李克农又召开了一次中朝同志会议，对出席明天会谈的人员再作一次交代。

寂静的夜空，时常传来一阵阵炮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还在浴血奋战；为争取和平付出血汗和牺牲，中朝两国参加谈判的同志披星戴月，一个个默默地步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驻地一幢别墅的客厅里。这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心愿，希望谈判早日举行，获得成功，让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早日回到和

平安定的环境下建设和生活。因此，每个成员都感到自己肩负着祖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期望，既光荣又沉重。

会议首先由乔冠华把第二天谈判的安排作了一番汇报和说明。接着，李克农就停战谈判的全局性问题及注意事项再作一次系统的全面的阐述。

李克农习惯地用手轻轻地摸一下他的八字胡，再端起茶杯喝一口茶润润喉咙，又吃了一片止咳药，才开始讲话。他说，这次谈判不同寻常，是中朝两国军队同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了近一年的军事较量，而且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举行的，可以说举世瞩目，牵动着十几亿人的心。我们方面准备提出三条原则，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它既符合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和平愿望，也是对方曾经表示过基本上可以接受的条件。停火休战、双方撤离三八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双方的意见虽有距离，但是不很大。从朝鲜撤退问题，对方表示现在不能讨论，但也答应将来再讨论。所以，这次谈判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正如周恩来总理所一再告诫我们的，美帝国主义很狡猾，出尔反尔，同它打交道不那么容易，要多从坏处想，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可掉以轻心。这就需要中朝双方同志在毛泽东主席、金日成首相领导下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实际主持下，紧密团结，群策群力，努力争取。

李克农咳嗽了两声，他忙抿了一口茶，提出四点要求：

第一，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把我们的和平主张摆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使它产生一种力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的威力。我们准备提出的三条原则是非常合情合理，得人心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武器，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要抓住这三条原则反复宣传，使它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斗争口号，同我们一起来争取和平，切切不可在枝节问题上同敌人纠缠，那样就容易上当。

第二，谈判是在我们的区域内进行，较之在对方提出的在丹麦伤兵船上在政治上对我有利，工作上我们也比较方便。但是安全问题是件大事，让人担心。这里是个新解放的地区，群众基础差，日本人在这里统治了36年，美国和李承晚在这里统治了6年，社会情况相当复杂，而且又处在三八线上，离敌人很近，双方都在这里埋了不少地雷，要全部清除也不容易。无论哪一方在安全上出了问题，我们都要承担责任。因此，安全是第一个大问题。开城地区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要保证在安全上不出问题，请李相朝、解方同志认真检查一下，慎之又慎，切不可麻痹大意。

李克农移动一下他那胖胖的身体，微笑的圆脸带有几分严厉的神情，说：这第三么，同志们，谈判即是打仗，但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武仗”那是我们彭老总的事。打“文仗”，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事关大局，说了话就要算数，在谈判桌上说了的话是收不回来的，所以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不要抢先一分，要尽量使用已经准备好的稿子，除了主稿之外已经准备了一些小稿子备用。这些稿子都是经过恩来仔细审阅和修改过，或作了原则指示。会场的情况同战场一样，一旦打响，就会千变万化，作为谈判代表你们中途回来不方便，请柴成文同志随时回来通通气，没有把握的时候，宁肯休会商量一下也不要急。

他停顿一下，强调说：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讲，我不担心哪位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同美国人打交道多数同志没有经验，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要注意观察会场上每一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较快地摸透对方的脾气。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停战谈判一刻也脱离不开战场情况的变化，请解方同志及时掌握战场上的情况变化，马上告诉我们，如果

离开战场情况变化，停战谈判是无法进行的。好比唱戏一样，我们搞谈判的在前台表现，如果没有后台的化装、道具等做后盾，那么前台就成了空中楼阁，必然要塌下来的。所以“文仗”要有“武仗”的支援和配合。

李克农讲完了，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仿佛克农不像以往那样幽默诙谐，笑语连篇，比较和蔼亲切，而今天他讲话时的脸色比较严肃，甚至严厉，这大概确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强大而又狡猾的敌人，有一场艰苦的战斗，与老虎搏斗。而克农的讲话确实是经验之谈，语重心长，害怕我们这些初出茅庐，尤其是对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们在谈判桌上最难忍受敌人的气，容易沉不住气而发火，把事情搞糟，所以克农这位谈判老手的忠告，十分重要，十分及时，可以说是切中了要害。

## 八、开城谈判针锋相对

开城位于朝鲜半岛的中西部，在汉成江和汉江之间，距汉城西北 65 公里，距江华岛约 20 公里。登上开城的南山隐约可见汉城的后山。开城西北 20 公里处的朴渊瀑布为朝鲜的三大瀑布之一。它旧称松岳，是朝鲜的古城，从公元 919 年至 1392 年为高丽王朝的古都，始称开京，即开国都城之意，是当时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市区有 15 公里的古城墙及王陵、故宫等名胜古迹。日本投降后，南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开城在三八线以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的第二次战役中被解放了。

7 月 10 日这天，是朝鲜入夏以来少有的好天气。宽阔的原野上，稻浪滚滚，蛙声一片，鸟语花香，风和日丽。卷入战争旋涡被窒息得喘不过气来的开城人民露出一丝喜悦，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停战谈判。

上午 8 至 9 时，美方代表及工作人员分乘吉普车、卡车和直升机到达开城来凤庄。我方联络官和安全官前往迎接。

10 时整，双方代表在来凤庄的过厅会晤，然后步入会场，互阅证书。按照国际惯例，任何国际谈判，都要由派出国的政府首脑签字的证明书，谈判代表才为对方所承认，像朝鲜停战谈判必须由双方司令官签字的证书，即朝中方面必须由金日成、彭德怀签字，

对方必须由李奇微签字的证书，才证明派出的代表是合法的、有效的。

谈判大厅中间，东西向摆着一张铺有绿色台绒的长方形条桌。桌子的南面坐着美国的代表也即是所谓联合国军五名代表，中间是谢·特纳·乔埃中将首席代表。他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有名将领。此人中等身材，沉着老练，善于谈判。乔埃的右手是白善焯少将，他是南朝鲜第一军军团长，“是南朝鲜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亨利·霍迪斯少将，他是美国第八集团军的副参谋长，曾在欧洲指挥过一个步兵团。左手是劳伦斯·克雷吉少将，他是美国远东空军的副司令，曾在北非指挥一个战斗机联队；奥尔林·勃克海军少将，他是美国远东海军的副参谋长，曾在太平洋战役中使用驱逐舰战斗而闻名。

桌子的北面是朝中方面的代表。中间是南日大将，右手是邓华和解方将军，左手是李相朝和张平山将军。

双方代表的后面，各坐着人数大体相当的参谋、翻译和记录人员。

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会议在我方驻地召开，本应由我方先发言，但美国人不讲礼貌，不等我方开口，乔埃便抢先发言。我方宽宏大量，没有计较。

乔埃在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之后，说，在停战协定没有生效之前，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延迟达成协议将会延长战斗，增大伤亡。他说：“我们谈判的范围仅仅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如果你方同意，请在此签字作为我们谈判的第一个协议。你同意吗？”

我方代表对对方的问题没有置理。

南日将军致辞说：“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我的总司令金日成将军和中国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根据朝中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与要求，赞成与李奇

微将军举行谈判，并派我代表朝鲜人民军出席这次谈判。朝鲜人民历来主张，现在仍然主张，朝鲜战争应该迅速结束，因此热烈赞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6月23日提出的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为了停止朝鲜战争，我们认为就要解决停火，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实现朝鲜休战的基本条件及撤退外国军队以保证朝鲜战火之下再复燃等重要问题。因此，我代表朝鲜人民军提出下述建议：

第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陆军停止对对方的进攻、袭击与侦察；海军停止对对方的轰击封锁与侦察；双方空军停止对对方的轰炸与侦察。显然，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停火的第一步。

第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之。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双方皆不驻扎武装部队或进行任何军事行动。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与此同时，立即进行关于交换俘虏的商谈，使各国俘虏早日还乡与家人团聚。

第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人民、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美、英人民在内，都热烈要求早日停止朝鲜战争，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次谈判中达成协议，以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

南日发言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接着致辞：“我奉协助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之命，出席这次会议，与朝鲜人民军代表一同，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的代表，商讨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实现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等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上，走了重大的一步。中朝两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结束朝鲜战争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同样是中国人民一贯的要求，并为之不断奋斗的目标。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军的目的，就是恢复朝鲜的和平及保障中国的安全。因此，当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根据苏联政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主张，建议由朝鲜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时，这一建议，便立即获得中国人民及中国政府的热列支持。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我们认为朝鲜人民军的代表所提出的三项建议，是停止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提与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衷心支持这些建议，并认为应把它们作为谈判出发点。各国人民都痛恨战争而热爱和平。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停止朝鲜战争的任务。”

本来，朝中双方曾商定，谈判桌上主要由南日代表我方发言，今天邓华的发言是特意安排的，因为全世界都清楚，在开城谈判桌上美国人找的就是中国人。如果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不发言，不仅不能满足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愿望，而且美国人也不会放心。

原先，凯南同马立克的谈话，已经有了大部分的共同点和接近点，可是对方在听我方发言后，却提出以下九项议程：

- 一、通过议程。
- 二、俘虏营地点和准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前往访问。
- 三、会议所讨论之范围，只限于有关韩境纯粹的军事问题。
- 四、停止韩境武装部队之敌对及军事行动并商定保证敌对及军事行动不再发生之条款。
- 五、议定韩境之非武装区域。
- 六、韩境停战监督委员会之组织、权力及职司。
- 七、协议设立军事观察小组在韩境视察之原则，该项小组隶属

于停战监督委员会。

八、以上小组之组织及职司。

九、关于战俘之处理。

美国人一开始就出尔反尔，狡诈多变。中朝代表立即研究对方的议程草案。大家认为，对方提出的第一项只是个程度，二、三两项明显是硬加进去的，国际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不必要在这里讨论。谈判的范围虽然凯南曾经讲过停战作为一个单独问题进行讨论，但是真正讨论起来，仅纯军事问题的定义就可能扯个不休。估计对方提出这两项议程，无非说明他们害怕谈到牵涉到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第四项是停火，第五项是非军事区问题，这两项当然是要讨论的，但是对方却没有提出军事分界线的划分问题，这样就失去了确定非军事区的依据；六、七、八项及第四项最后一句，都是保证军事停战后军事行动不再发生的停战监督问题，第九项是战俘问题，当然也是要讨论的问题。对方提出的九项议程草案，其中真正要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我三项原则建议都已包括进去了。然而对方却只字未提自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也没有提自三八线撤退的问题。而这些又恰恰是应该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些都不难看出，对方的立场有了变化。

李克农说，看来美方没有像凯南约会马立克时那样急迫了。这个动向很值得注意。大家研究决定，既然谈判是对等的，对方提出了议程，我们不好反对，我方也应提出对策，有个议程。于是，马上起草了一个议程，经过李克农、乔冠华的批准，于下午在会谈中提出：

一、通过议程。

二、以“三八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并设一非军事区，作为停战的基本条件。

三、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四、实现朝鲜停战的具体措施。

### 五、关于战俘的安排。

第一天的谈判结束了，留下了两个谈判草案。一对比，分歧明显，焦点突出，世界各大通讯社对我方提出的三项建议，进行了广泛突出的报道，给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和希望；对美国的发言未触及实质，未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议程很不满，特别是记者们向美方施加压力，他们认为美方发布的新闻过于简单，远不能满足新闻界人士的要求。

美方为了摆脱其被动局面，于第二天停战谈判会议上，提出新闻记者采访谈判问题，并要求我方于12日即容许20名记者前来开城进行采访。我方允许考虑美方的意见。

12日上午4时45分，我方通过联络员答复对方，表示赞成我双方记者在适当时机前来开城进行采访活动，一俟谈判达成某项协议，我方即欢迎记者前来。但美方不顾我方的答复，而采取要挟手段，将20名记者和65名代表团人员组成一个车队于7时45分开至开城东我板门店防区。对于美方这种做法我方当然不能允许，当即派联络员前去告诉他们，由于新闻记者采访会议尚未达成协议，我方不同意记者通过。美方却连代表团人员全部返回，12日的谈判未能进行。

## 记者采访成为问题

接着，美国首席代表乔埃海军中将来信说：

南日将军：

一、1951年7月12日9时30分，载有我方在会议地点所需的人员沿汶山、开城路上行驶的我方汽车队，被贵方的武

装卫兵拒绝通过贵方的岗哨。

二、我已命令这个车队驶回联合国军前线。

三、在接获贵方通知携带我所选择的人员，其中包括我认为必需的新闻代表人员，将不受阻碍而到达会议地点时，我准备偕同我的代表团重来，并继续昨天休会了的商谈。

海军中将、联合国军首席代表 特纳·乔埃

李克农、乔冠华和谈判代表团立刻研究乔埃的来信，认为我们当时对记者的采访这个敏感性的问题，认识是不够的。只想到谈判还没有任何结果，连议程都未统一起来，记者采访是没有必要的。没有想到，朝鲜停战谈判，是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一件大事，世界各大新闻机构在争取时间抢新闻、抢镜头、抢发稿，早发一分钟和迟发一分钟，新闻的价值就悬殊，它牵涉到记者们的工作甚至饭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方的新闻代表不能进入开城，不能进入会场，自然要向对方代表团施加压力，而外国官方一般都害怕记者。同时，在谈判的当天上午，我方确有一名摄影人员进到会场内拍摄过会谈的照片，虽当即被我首席代表挥手出去了，但不管怎样，我方的记者照了，他们没有照，这样就有伤对方的面子。因此，大家认为，有必要给对方一个答复，一方面要坚持我方的立场，一方面作一些缓解，即双方记者都不进入会场，建议继续开会，暗示可以在会谈中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答复请示周恩来，得到他的同意批准。

7月13日一早，南日复函乔埃。

乔埃将军：

你的来函收到了。答复如下：

一、我们12日上午7时45分并未阻拦你的代表团前来开会。至于随车同来的新闻记者，因为双方并未达成协议，自然

不能允许他们来谈判地区。你们的代表团因而拒绝到会，是没有道理的。

二、对于新闻记者及新闻代表人员采访问题，我们的意见是：未得双方协议，任何一方的新闻记者与新闻代表人员，均不能进入谈判地区。

三、我们建议：今天上午9时（平壤时间）继续开会。

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 南日将军

但是，美方仍抓住记者问题不放，立即把这个问题升格到双方司令官一级进行交涉，并把它提高到双方在会场区享受平等待遇问题的高度。7月13日，李奇微致函金日成、彭德怀要求划开城为中立区。函称：6月30日，他曾建议在丹麦伤兵船上会晤，因为那样可使双方都有同等的出入自由，包括属于任何一方的新闻记者这种人在内。这种地点可以有一种完全中立的气氛，不致有任何一方的武装部队在场而产生威胁的作用。当他接受以开城为会晤地点时，原以为开城能完全具备上述条件的。他说，7月8日联络官会议上，他们曾建议沿着金川—开城—汶山公路建立一道10英里宽的中立区，双方武装部队让出开城，遭你方联络官拒绝……但自从谈判以来，事实证明双方的待遇是不平等的。

李奇微在信中建议：划一个圆形地区为中心区，以开城的中心为圆心，半径为5英里，东面以板门店为界。在整个会议期间，在中立区内不能从事任何敌对行动，会议区和双方代表团人员前往会场区所经过的公路不驻扎武装人员。并建议每方代表团在中立区内的人员总数任何时候最多不超过150人，在上述限度内每方代表团人员构成应完全由该方司令官决定。来信最后说：如果你方同意这些建议，目前休会即可终止，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而且可望有所进展。

李克农、乔冠华、南日、邓华等当即研究李奇微的来信，认为李奇微同意在我控制的开城地区谈判后悔了，可能挨了上面的批评，他想借“记者问题”大做文章，抓住“中心区”问题振振有词，以推翻这个协议。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原则立场，揭露和驳斥对方的观点，同时，为了争取谈判能够继续进行，不在枝节问题上同对方纠缠，同意其合理的要求，随即起草复信和请示我党中央的电报。

周恩来接到李克农的来报后，立即召集外交部和总参谋部进行研究和修改复信。

7月14日，以毛泽东名义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李克农。

第一封，7月14日上午1时45分。

克农：

7月13日21时30分来件收到，待修正后发给你，你在收到修正稿以后即可发给对方。北京广播当在7月14日20时即下午8时左右。

第二封，7月14日上午7时。

克农并金、彭：

(一)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二) 请你们立即准备在敌方代表重来开城时注意解决下列几点：(甲) 中立区的面积究以多少公里为适宜，为保障双方代表的安全，应考虑撤退当地居民问题，是否能迅速撤退

(撤退时保障居民不受损失)。(乙)我方武装撤退后应否以非武装人员维持秩序。(丙)设立板门店双方联络员联合办事处问题。

(三)给李奇微复文已重写,另电发来,北京准备在今日下午8时才发广播。

第三封,7月14日上午10时。

克农并金、彭:

(一)在给李奇微的复文里没有答复李奇微所提的将双方代表团的全部人员限制为150人的问题,使你们留下有机的余地。如果美方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们可以照你们的意见提出双方代表团工作人员各由自己规定互不干涉,但如美方坚持要规定同等人数,你们也可以同意这种规定,因为这是无关大局的。

(二)在划中立区面积的问题上以能保证双方代表安全为原则。如果可以不要迁运大范围的居民则可以同意美方半径5英里的数目,否则可以划一个通板门店的走廊及一个开城附近的较小圆圈,以便只迁移较小范围内的居民。

究应如何,请按情况灵活决定。

第四封,7月14日上午11时。

克农并金、彭:

7月14日2时30分的电报收到,关于记者问题的公报不必再发,因为主要的内容已经公布,再发这个公报就重复了。

这里提到的“公报”，是李克农向中央建议就“记者问题”，发一个公报。毛泽东答复，因为《人民日报》已在1951年7月14日以《坚持双方协议原则并建议继续开会，南日将军函复美方代表》为题，刊载了新华社平壤13日电，其中谈到朝中方面对新闻记者问题的基本态度。

第五封，7月14日下午6时。

克农并金、彭：

(一) 7月14日15时10分的电报收到了，同意你的修改文句（从一百十三个字至一百七十字），但在13字下仍须加上“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一句，下接“我们同意你所提的……”

(二) 北京仍在下午8时广播，你处可注意收听。

(三) 请平壤广播亦照此修改。

这里所说的“修改文句”，是李克农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说：“我们仔细研究李奇微来文，发觉中立区与会址区域有大小及含义的不同。对于中立区，他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而对于会址区域，则须摒除一切武装人员。与其改动他的建议，不如全盘接受他的，对我主动。因此，建议对复文一百十三字至一百七十字作下述更改……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具体问题，我们建议……我们等你复示后，再将给李奇微的复文发出。”

周恩来是个从善如流的人，他处理任何问题既有自己的主张，又喜欢发扬民主，听取别人的意见。他主持外交部工作，经常召集



外交部的副部长、司长们开会研究问题，如遇重大国际问题，他要把那些主管科员、科处长以及翻译都要找来一道研究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当他充分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才把大家提出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吸收进去，作出结论和决定方针。所以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心情舒畅，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但他对同志对工作要求很严，一丝不苟，不对的或做错的事，他立即指出，严肃批评，不留情面。例如这次关于中立区问题，他就批评代表团在预备会时拒绝对方所提划一个中立走廊和中立会场区问题的建议，考虑不周，结果把双方代表团的安全问题都压在自己身上。当然对方以此为借口任意中断谈判的责任只能由对方承担。但是周恩来批评人从来不记账，批评以后，只要你接受批评、承认错误，改正了，就行了，一切如初，不再算老账。所以外交部以及经常接触他的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被周总理批评也是高兴的、光荣的。

正是由于周恩来既善于发扬民主、听取别人意见，又对同志要求严格，及时指出错误所在，所以他能兼听则明，作出决定，处理问题都是切合实际或比较切合实际，完善或比较完善的，很少有偏颇或失误。

金日成、彭德怀按照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文稿，于10月14日给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复函称：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行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下

一次会议上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样的消息：（新华社平壤14日电）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总部获悉：昨日美方代表团借口新闻记者未得我方同意仍然不来开城开会，以致会议又停顿一天。昨日下午，此间收到了李奇微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划中立区的新问题。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本日已予以答复。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

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方在原则上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期间的暂时的中立区。有关新闻记者问题也给了美方以便利。这样，就解除了美方在最近提出的一切借口，使开城会议有可能重开。

报道还附金、彭两将军给李奇微的复函。

美方制造“记者问题”，纯属借口。后来乔埃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因为牵涉了新闻记者，有人就遽下结论，以为问题的焦点是在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固有其莫大的重要性，但在此处则并不完全恰当。那一次的意外事件，我方是利用为对于当时双方享受平等的待遇的现实问题，迫使共方摊牌，其中包括整个会议区域的自由进出的问题，双方统帅对于代表团的组成有毫无保留之决定权问题，其后经过了三天的休会，共方统帅部对李奇微将军的要求，提出了若干简单的保证，会议就重又恢复了。”

### 达成停战谈判议程

7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继续讨论议程问题。在讨论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问题；一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关于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没有从问题的实质讲什么理由，仅说议程只应提出讨论的题目，而不应提什么结果。我方代表接受了这个观点，至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这就触及了对方的痛处和要害，我方坚持应该列入会谈议程，对方坚决反对，使尽全身解数进行反驳，成了讨论的焦点。

早在1947年9月10日，苏联政府就曾一再建议：将1945年进入南北朝鲜的美国和苏联军队于1948年初同时撤走；以便“重建朝鲜成一独立国家”，均遭美国拒绝。南朝鲜的李承晚长期流亡

海外，要是没有美国军队的支持他是上不了台的，上了台也是站不住的，所以他是最怕美军撤走的。在这一背景下，1947年9月19日魏德迈到朝鲜进行了考察，并给杜鲁门写了一个“秘密报告”，建议美军不要撤出南朝鲜。

然而，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主张是深得人心的。世界各地凡有美军驻扎的地方都引起了共鸣，有的国家还举行群众游行，喊出“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1948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从朝鲜撤军完毕，更为这股势不可当的和平浪潮推波助澜，逼得杜鲁门被迫于1949年6月30日声明从朝鲜撤军完毕。

现在，美军借着朝鲜战争，打着联合国旗号又入侵了朝鲜，他怎么肯撤走呢？杜鲁门对朝鲜的方针一直是要么由美国武力统一，要么保持长期分裂。麦克阿瑟的“圣诞攻势”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头破血流，用武力统一朝鲜的美梦破灭了，只好被迫坐下来谈判，而今他要用武力来保持朝鲜的长期分裂。他当然不愿意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的议程。

在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指示李奇微：“你和敌方部队司令员之间的谈判应严格限于军事问题，你尤其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或考虑与朝鲜问题无关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处理。”所谓“不应进行关于最后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就包括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所以美国谈判代表顽固坚持不同意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以便于它随时破坏谈判和长期驻军南朝鲜。

我方根据中央7月17日的指示“我们提出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能够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有权讨论撤兵”的精神，提出撤退外国军队必须列入议程。

我方说，撤退外国军队是防止战争复杂的必要条件，外国驻军是战争的根源。美方说，朝鲜战争爆发时并无外国驻军，恰恰是外国撤出不久就发生了战争。我方说，照此说来，只有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各国驻军，才有可能防止战争、保持和平了。美方无法反驳，于是又搬出这次谈判只讨论军事问题，撤退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联合国军”总司令只有对这些部队的指挥权力，而没有让某一国家撤军之权。这个问题，经过8次讨论，没有结果。

很显然，美方是用各种借口和托词拒绝讨论撤退外国军队，再讨论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同时考虑到凯南在同马立克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经说过“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的讨论”。经李克农、乔冠华、南日、邓华、李相朝、解方等研究提出解决方案，并根据谈判可能出现的情况，草拟了两个发言稿，送中央审批。

周恩来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并以毛泽东名义复电李克农：“明25日只用第一个发言稿，并应坚持其中建议的立场不要让步，看对方如何表现，第二天上午还是如此。到第二天下午（26日下午）如对方坚持反对我方的新建议时，再用第二稿发言。”

我方代表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于7月25日提出新的建议，即在议程上列上“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一条，以便在此项议程下讨论向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经过中朝双方的努力，既揭露了美方的阴谋，坚持了原则立场，又在策略上机动灵活，做了一定的妥协，终于7月26日双方达成停战谈判五项议程：

- 一、通过议程；
-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

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谈判取得了一点进展，朝鲜停战有了一线希望，全世界人民都翘首以待，但愿议程变成现实。

## 进入实质性谈判僵持不下

随后谈判就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的问题。

谈判一进入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常常僵持不下，反复无常，变化多端，接踵而来的事件和战场上的较量不断发生。谈时想打，打时想谈，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判与打仗交替进行或同时进行。

第二项议程的谈判，一开始双方的分歧就很大，斗争非常激烈。

10月26日，我方建议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当时交战双方虽在“三八线”南北各占有若干地方，但双方所占面积几乎相等，“三八线”正是反映了当时军事形势和双方军事力量相对平衡的一条线，美国既然从“三八线”上挑起战争，战争结束，仍然恢复“三八线”当然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恢复“三八线”是停止朝鲜战争的基础。

但是，美方拒绝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美方代表在10月27日会议上提出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我军阵地的后方，即从东海岸我方现有阵地胡坡里前线以北约20

公里之西峨里起，向西南经我方现有阵地平康前线以北约 30 公里处之道修垦，再经我方现有涟川前线以北约 20 公里之月岩里，然后穿过临津江向西经过金川附近以迄瓮津半岛。就是无理要求我在临津江以东应从现有阵地后撤 30 公里至 40 公里，在临津江以西则须撤出约 2000 平方公里至 3000 平方公里之土地，这就明显地暴露了美方企图从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接着，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在美国参院外委会上说，马立克的朝鲜停战建议，已严重影响美国的“防御计划”。美国侵朝军总司令李奇微的总部发表公报，主张在鸭绿江上的海空战线与陆军战线中间某处“划定军事分界线”，以此来支持美国在谈判中的“海空优势应该补偿”的论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不能接受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论点。美国从外交、军事两方面对我施加压力。

8 月 1 日，我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文章，严厉批驳美方的论点，指出朝鲜停战应以三八线与撤退外国军队为基本条件，坚决顶住美方的压力。

于是，美方便寻找各种借口，破坏停战谈判。先以我方警卫部队误入会场区，大做文章，中断谈判，经我方批驳和实事求是处理了这一问题后，才又被迫复会。我方在会议上对美方借口与谈判无关的事，中断谈判五天半表示遗憾。在讨论第二项议程时，美方表示只愿讨论以现有战线和军事实际控制线为依据的军事分界线，不愿再讨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的主张。我方当即批驳对方的所谓“海空优势补偿论”“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指出对方没有理由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可是美方对我方的发言，拒不表态，竟长达 2 小时 12 分默不作声，这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是很少见的。继而又用袭击我方巡逻人员，打死我排长姚广祥，用飞机侵

入开城中立区，轰炸、扫射朝中代表团住所等卑鄙手段，妄图迫我就范和破坏谈判。我方代表团向美方代表团、我方司令官向美方司令官分别提出严重抗议，严厉批驳和揭露对方的中断谈判等阴谋。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方在谋杀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姚广祥以后，又派遣飞机侵入开城中立区轰炸，扫射朝中代表团宿舍附近地区，企图谋杀正式和他们谈判的代表。“这是外交史上没有前例的卑鄙和野蛮行为。”我方还组织双方人员实地调查，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美方仍多方狡辩，无理抵赖，妄图把破坏谈判的责任推给我方。但终究是理屈词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于是又提出所谓更换会谈地址，来掩盖它的丑态，借以恢复谈判。

与此同时，美方针对朝鲜问题和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利用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8月30日，美国同菲律宾在华盛顿签订《美菲联防条约》；

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旧金山签订《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并成立美、澳、新理事会，组成了太平洋地区军事集团；

9月4日，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会”；9月8日，美国强行“通过”《对日和约》。同日，美国国务卿和日本首相吉田茂在旧金山签订《美日安全条约》。

## 美日签订《美日安全条约》

关于对日和约这件事，说来话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名义上是由盟国军队占领，而实际上由美国军队一家独占；名义上是由11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握有对日本的



决策权力，而实际上由美国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独断专行，而且委员会的决定必须通过美国占领军总部去执行。同日本处于交战国地位的其他国家，如中、苏、英、法、荷、澳、新、印、菲等国家，其管制日本的权利实际上被排斥得干干净净。虽然如此，但是对日和约之签订，必须由所有交战国一起参加。1942年1月1日有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明明白白地宣告：“每一政府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缔结军事之停战协定或和约。”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国家的重要国际会议和文件的精神，联合作战的国家享有共同协商和安排对战败国的条约问题。而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国家，同日本军国主义作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从根本上牵制和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事实，因此，它在对日和约的协商、安排和讨论中应该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南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十分高涨。美国为了对付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便决定加紧扶植日本垄断资本的势力，要把日本变成美国称霸世界的东方的一个基地。从这个时候起，美国曾经几次要求独揽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1947年7月，美国政府就片面决定召开对日和会问题，因为遭到苏联的反对，而未能得逞。1949年5月和6月，在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维辛斯基两次提出召开五国外长会议就对日和约进行准备，均遭到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的反对。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积极准备片面对日和约，1950年10月，美国政府提出一份关于对日和约备忘录。苏联政府于同年11月在致美国的备忘录中，对美国的备忘录提出许多质询。周恩来和中国政府研究了美国的备忘录，决定以外长周恩来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郑重声明：“中国人民经过

八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订与签订。”

1951年7月12日，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同时公布对日和约草案，美国政府又于同年7月20日发出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准备签订对日单独和约。周恩来于1951年8月15日发表了《关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

声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美英两国政府所提出的对日和约草案是一件破坏国际协定、基本上不能被接受的草案，而将于9月4日由美国政府强制召开，公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的旧金山会议也是一个背弃国际义务基本上不能被承认的会议。

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不论从它的准备程序上或它的内容上讲，都是臭名昭著地破坏了1942年1月1日的《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1947年6月19日远东委员会所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等重要国际协定，而这些协定都是美英两国政府参加签字了的。《联合国宣言》规定不得单独媾和，《波茨坦协定》规定“和约的准备工作”应由在敌国投降条款上签字之会员国进行。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曾完全同意苏联政府的建议，主张所有曾以武力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都参与制定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但是，美国政府在长期地拒绝实施《波茨坦协定》原则以拖延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之后，竟由美国一国包办了现在提出的这一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而将大多数对日作战

国家尤其是中苏主要对日作战国家，排斥于和约的准备工作之外，并由美国一国强制召开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的和会，企图签订对日的单独和约。美国政府这一违背国际协定的行动，在英国政府支持之下，显然是在破坏日本与所有与它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缔结全面的真正的和约，并正在强制日本与某些对日作战国家接受只有利于美国政府自己而不利于包含美日两国在内的各国人民的单独和约，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并非真正的和平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一论断，是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的基本内容上得到无可辩驳的根据的。

声明列举了大量可靠的事例强有力地证明上述论断：

首先，由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美国政府与其附庸国家进行对日单独媾和的产品，所以这一和约草案不仅无视中苏两国政府历次声明中关于对日和约主要目标的意见，并且最荒谬地公然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对日作战的盟国之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是开始于1931年；至1937年，更发动了向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至1941年，日方发动太平洋战争。中国人民在抵抗和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经过了最长期的艰苦奋斗，牺牲最大，贡献最多，因之，中国人民及其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对日和约问题上是最有合法权利的发言者和参加者。可是，美英对日和约草案竟在它关于处理盟国及其国民于战争时期在日本的财产和权益的条文中，规定起讫日期，由1941年11月7日起至1945年9月2日止，而将1941年12月7日以前中国人民独力进行抗日战争那一时期完全抹杀。美英两国政府这种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敌视中国人民的非法蛮横行为，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并将坚决反对到底的。

第二，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在领土条款上是完全适合美国政府扩张占领和侵略要求的。草案一方面保证美国政府除保有对于前由国际联盟委任日本统治的太平洋岛屿的托管权力外，并获得对于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琉黄列岛、西之岛、冲之鸟礁及南鸟岛等的托管权力，实际上就是保持继续占领这些岛屿的权力，而这些岛屿在过去任何国际协定中均未曾被规定脱离日本的。草案另一方面却破坏了《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中的协议，只规定日本放弃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对于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的一切权利，而关于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岛屿交予和交还给苏联的协议却一字不提。后者的目的是企图造成对苏联的紧张关系以掩盖美国的扩张占领。前者的目的是使美国政府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得以长期化，但中国人民却绝对不能容许这种侵占，并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神圣责任的。同时，草案又故意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实际上，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虽曾一度沦陷，但日本投降后已为当时中国政府全部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此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享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

第三，对日和约的最主要目标，如众所周知，应该是使日本成为爱好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国家，并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保证日本不再度成为威胁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侵略国家。但是，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不仅对此毫无保证，相反地，它还破坏了《波茨坦公告》及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关于这类问题的规定。草案在安全和政治条款上，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任何限

制，对于残存的和复活的军国主义团体没有规定取缔，对于人民民主权利没有任何保障。实际上，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这几年的一切措施，已经竭力在阻止日本的民主化与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占领当局不是在毁灭日本制造战争的力量，而是违反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扩大日本的军事基地，训练日本的秘密武装，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团体，释放日本的战犯，尤其是在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已经开始利用日本的人力，恢复和发展日本的军事工业，来支援它的军事侵略。为了便利美国长期占领日本，不撤退它的驻军、并控制日本使之成为美国在东方的侵略前哨起见，草案更进一步地规定盟国占领军可以经过与日本的协定而在日本长期地留驻下去。美国政府这一显然违反国际协定义务的计划，是得到成为美国占领日本的政治支柱的吉田政府支持的。美国政府和日本吉田政府正在互相勾结，阴谋重新武装日本，奴役日本人民，将日本再度推上曾经使日本濒于毁灭边缘的侵略道路，并且是服从于美国侵略计划并为美国政府火中取栗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化的道路。这是阻碍日本人民走向另一条和平、民主、独立和平幸福的道路的阴谋。根据上述草案的规定，美日军事协定正像美英对日和约的草案一样，它是敌视中苏两国，威胁着过去曾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的。由此可见，美英政府之所以急于签订对日单独和约，决不是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推进日本民主，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而是为的重新武装日本，为美国政府及其附属国家准备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此不能不表示坚决反对。

第四，美国政府为了加紧准备新的世界侵略战争，就必然会更加紧对于日本经济的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曾一再声明，对于日本和平经济之发展及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不应加以限制和垄断。然而，由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敌视中苏和威胁亚洲国家的对日单独和约，所以它的经济条款也就是排

除中苏的，并且是排除不能接受这一合约草案的许多国家的；同时，美国政府更可利用它经过美国公司在日本经济中已经取得的特权及它对于日本和平经济的各种限制，使这些经济条款更适应于它的垄断要求。因此，这一对日单独和约如被签订，日本经济领域于美国的殖民地化的地位将更加深，不仅军事工业将依照美国的亚洲经济侵略服务，而日本与中国及其他邻国为着发展和平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正常贸易关系，将受到更蛮横无理的限制。这将是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应该予以坚决的反对。

第五，关于赔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必须澄清美国政府在美英对日和约草案上故意造成的混乱。草案承认在原则上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之损害及痛苦给予赔偿，但同时又说如欲维持健全之经济，则日本缺乏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能力。从形式上看，好像美国政府最关心日本经济的健全似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占领和管制日本的6年当中，已经利用各种特权和限制，窃取了并仍在窃取着日本的赔偿，损害了并仍在损害日本的经济。美国政府不让其他曾受日本侵略损害的国家要求赔偿，其不可告人的隐衷，就是为保存日本的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能力，继续供给美国独占资本的榨取。如果说，日本的赔偿能力和履行其他义务的能力已经感到缺乏，那就是美国占领当局过分窃取和损害它们的结果。只要美国政府遵守国际协定的义务，在各约签订后早日撤退占领军，立即停止建筑军事基地，放弃重新武装日本和恢复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取消美国公司在日本经济中的特权，取消对日本和平经济及日本对外正常贸易的限制，则日本经济就会真正健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看到日本能够健全地发展和平经济，并恢复和发展中日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使日本人民的生活不再受战争的威胁和损害而得到真正改善的可能。同时，那些曾被日本占领、遭受损害甚大而自己又很难恢复的国家应该保

有要求赔偿的权利。

声明进一步指出：根据上述各项，足以证明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是完全破坏国际协定，损害对日盟国的利益，敌视中苏两国，威胁亚洲人民，破坏世界和平安全，并不利于日本人民的。美国政府及其附属国家在这个和约草案中只追求一个中心目标，即是重新武装日本，以便继续和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战争，并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所以这个和约草案是中国人民及曾被日本侵略的亚洲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政府为了便于迅速签订这一对日单独和约，于是在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通知中，也公开排斥主要对日作战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它就彻头彻尾地破坏了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关于不得单独媾和的规定。很显然，美国政府强制召开旧金山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就是为了分裂对日盟国，组织新的远东侵略集团。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所谓“三边安全条约”及密议中的美日军事协定都将在这个会议中或会议后成立，它将继续威胁着整个太平洋及亚洲人民的和平安全。因此，这个旧金山会议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情况是不可能签订对日共同和约的，即使美国及其附属国家径自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也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承认的。

声明明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历来主张，应在《联合国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远东委员会所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等主要国际文件的基础上，经过对日作战主要国家的准备和所有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参加，在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的而不是单独的、公平合理的而不是强制独占的、真正和平的而不是准备战争的对日和平条约。为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曾授权本人于1950年12月4日就对日和约的问题发表声明，并于1951年5月22日照会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先生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

和约的具体建议。凡在那个声明和照会中所提出的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主张，中央人民政府认为继续有效。

声明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现在再一次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声明最后说：为了真正有助于恢复亚洲和平及解决远东问题起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主张，应该根据苏联政府的提议，召开以军队参加对日战争的一切国家的代表的委员会，来商定共同对日和约问题。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以《联合国国家宣言》《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和协定及远东委员会所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为基础，与参加对日作战的一切国家，就共同对日和约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的这个极其重要的声明，是他亲自找国际法专家、日本、美国问题专家听取意见，并看了大量有关材料，亲自用毛笔起草的，约5000字洋洋洒洒的文章，非常严谨、准确、有力，淋漓尽致地揭露美国的阴谋，有力地配合苏联等国在会议上的斗争。现在这份23页的手稿，珍藏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室里，成为国家一笔十分重要的财富。从这手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

1951年9月8日，美国强行通过“对日和约”，并于同日美国同日本签订《美日安全条约》。中国政府和周恩来认为，在当时形势下，其矛头显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因此，周恩来在9月18日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在这个战争中，英勇奋斗，整整八年，一直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投降。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经过时间最久，遭受牺牲最大，所做贡献最多，美国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 美军夏季攻势失败谈判重开

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美国从本土运来十多万兵员补充部队满额，增加炮兵、坦克部队，美空军一七六师、一三六师两个战斗轰炸机联队进驻日本，美第一四〇、第四十五师由日本调进朝鲜，增加其陆、空军作战力量。将英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旅和加拿大第二十五旅、新西兰炮兵第十六团组编为英联邦第一师，扩大了大丘机场，新开辟原州、水原等十几个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修建东豆川里、永平、麟蹄等十几处前沿机场，还抓紧修筑道路，运输作战物资，出动大批轰炸机轰炸志愿军交通运输线和后方基地。

1951年7月20日，朝鲜北部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漫溢，泛滥成灾，一般河流水位上涨3—4米，最高达11米，水流速度达到每秒4—6米，最高达7米。洪水所至交通中断，堤防溃决，房屋坍塌，物资冲走，装备毁坏，人畜伤亡，其水势之猛、之急，持续时间之长，危害范围之广，为朝鲜近40年来所未有。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美军则乘机发动所谓“绞杀战”，对我方狂轰滥炸，企图彻底切断我军供应。我方除采取各种措施，克服极大的困难，保证朝鲜前线的供应外，我国政府、外交部对美机不断侵入中国境内提出抗议，揭露敌人的暴行和阴谋。

美方见第二项议程争执不下，在谈判桌上曾公然宣称：“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所以它趁朝鲜北部遭受特大洪水所造成的灾害和“绞杀战”危害的极端困难之机，集中美伪军3个师的兵力，在航空兵、装甲兵的支援下，于5月15日向北汉江以东海约

80 公里的我军防御阵地发起进攻，发动所谓的“夏季攻势”。美国企图以军事压力逼迫中朝方面接受其在谈判中提出的无理要求，非法夺取三八线以北 130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宣称：“停战谈判的唯一药剂，就是联合国军队的胜利。”一语道破了美国的阴谋诡计和罪恶目的。

在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之后，彭德怀于 1951 年 7 月 24 日，给毛泽东一封电报，谈他对朝鲜局势的看法、前景估计和会后方针。电报说：

美帝国主义处在矛盾状态中。我再有几次胜利战斗，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再撤回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国军队，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反复斗争，争取和平的可能是存在的。如经过上述办法而不能达到和平，则继续打下去，最后赢得战争胜利是肯定的。从全局观点来看，和的好处多，战亦不怕。我军于 8 月中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在 9 月举行。最好是待敌进攻，我则以阵地出击为有利。

毛泽东、周恩来研究了彭德怀的来电，同意他的看法、想法。于 7 月 26 日，以毛泽东名义复电彭德怀，电报说：

德怀同志：

7 月 24 日电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字、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 9 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

7 月 26 日

随后，中央和志愿军司令部又在兵力上作了调整、补充和安排，这时陈赓已就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因为邓华在前线谈判，后来又回国述职，陈赓代替他的工作。

对于敌人的夏季攻势，彭德怀这位大军事家，善于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和战场的实际情况，随机应变，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他考虑到在第五次战役结束之后，敌军已增至55万余人，第一线兵力密集，工事大为加强，我军若继续采用运动战形式，将面临重重困难，便决定以阵地战形式对付敌人。采用朝鲜多山、多林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休整、轮番作战，“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削弱敌人，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这种长期对峙的阵地战，其时间之长、战斗之激烈，我军之英勇、悲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国年轻的空军也参加了战斗，迫使敌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撤到清川江以南。敌人的夏季攻势被我军粉碎了，我军消灭敌人28万余人，而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仅突入我阵地2—8公里，占领我土地179平方公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这次的攻势是没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

由于美方在夏季攻势中的失败，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东西，于是又想回到谈判桌上来，企图能捞到点什么。

这时美方利用美机于9月10日在开城上空扫射，击中满月里地方的民房，被称为“满月里事件”。我方要求调查。美方必须承担责任，随即它改换了调门。首先美军总部电台广播，首次承认此次事件为“联合国军”所为；第二天，美方首席代表乔埃正式致函南日，承认满月里事件是美方飞机造成的，并表示遗憾。接着，9月1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又主动给金日成、彭德怀来信，

承认此次事件的责任并表示遗憾。

我方接到李奇微来信后，李克农、乔冠华及代表团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各种迹象表明，对方有可能重新回到会场上来，尤其是美军“夏季攻势”失败，伤亡惨重，敌人只有回到谈判桌上来才是它的出路；另外还有一个信号，那就是早在9月2日李奇微总部任命李亨根接替白善焯为谈判代表，即谈判将继续，如果他不想谈是不会任命新代表的。为了不放过时机，可以电金日成、彭德怀致函李奇微，复函起草后，经过字斟句酌，报请中央审批。经周恩来审阅同意，于9月19日金、彭复函李奇微：

鉴于你方已经对最近一次联合国军破坏开城中立区的事件表示遗憾，并愿于开城中立区的破坏持负责态度，因此，为了不使上述那些未了事件继续妨碍双方谈判的进行，我们建议：你我双方代表应即恢复在开城的停战谈判。

金日成、彭德怀给李奇微复函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称：美国“愿尽一切努力促使朝鲜冲突获和平解决”。

但是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言而无信，出尔反尔。李奇微于9月23日来信，继续推卸历次事件的责任，并将拖延谈判的责任诿之于我方，又提出更换谈判地址的问题，建议双方联络官于9月24日在板门店会晤，讨论双方满意的复会条件，这样又挑起了一场争论。

周恩来考虑美方反复无常的态度，说明美国仍未承认朝鲜战场的失败，除了军事上给予狠狠打击，在谈判桌上也要严厉批判美方的态度和谬论。他指示，要以金、彭名义复函李奇微驳斥美方拒绝承认破坏开城中立区协议的各次事件。这样9月24日金、彭给李奇微的信中明确指出：“人所共知，你方所造成的8月22日的挑衅

事件及其以后一连串的同类事件，是使开城谈判无法继续进行的直接原因，其责任当然属于你方。”并说：“我们已命令我方联络官于7月24日上午10时与你方联络官会晤，以洽谈在开城恢复谈判的日期和时间。”双方联络官虽然在板门店会晤，但双方争执不下，没有结果。

9月27日，李奇微又来信，要求更换会址，把会址迁到一个不在任何一方单独控制之下的地区，并具体建议设在板门店以东的松贤里。

李克农及我代表团研究及请示毛泽东、周恩来，10月3日以毛泽东名义答复代表团：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关于更换会议地址问题，经我们再三考虑，认为目前还应采用你们原先的主张，拒绝敌人这次无理要求，并准备与敌人拖一时期。因为敌人目前的政策是拖，我们急他不急是无用的，到了敌人真想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时就可以扯拢了。因此，所拟复件便可简单，对于未了事件的处理，既不取消，也暂不提，看敌人如何反映，复件现附上，可于10月4日上午送出。北京拟在4日广播，5日登报，请平壤亦同时发表。

毛泽东

10月3日18时

金、彭在给李奇微的复信中指出：改变谈判地址没有任何理由，再次建议立即在开城恢复谈判。

李奇微于10月4日复函，又提出：“既然你们拒绝了我所提在松贤里开会的建议，我建议我们的代表团在一个你们所选的而为我们能够接受的大致位于双方战线之间的中途地点会晤。”美军夏季

攻势失败，国际上要求停战的呼声很高，连美国的主要盟国英国的《泰晤士报》也发表文章，要求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止朝鲜战争，这对美国的刺激很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不得不出来说话。他说：“共产党拒绝把停战谈判搬到一个新的地点，不一定是会谈达成停战的希望破灭。”以安慰那些要求恢复谈判的人们。

中朝方面顶住不换谈判地址，杜鲁门、艾奇逊又无法说服李奇微改变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再一次求助于苏联。10月5日，美国驻苏联大使寇克往访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寇克说，他是奉美国政府之命，请求就朝鲜局势和苏美关系的声明通知苏联政府，请求斯大林大元帅予以注意：朝鲜问题是目前最尖锐、最危险的、需要立刻解决的国际问题，希望苏联帮助朝鲜谈判圆满解决。如果谈判结局不利，可能在美苏之间造成不良影响。美军司令部反对在开城讨论关于停战的问题，它认为这是政治性的问题。然而，共产主义集团没有表示出愿解决国际问题的悬案的意愿。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坚持不可调和的态度，这种态度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惶惶不安。

维辛斯基当即指出了美国大使自相矛盾的谈话和声明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同时苏联将这一谈话情况通报给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并经过三方协商之后，苏联政府就朝鲜局势与苏美关系向美国政府提出声明。声明指出：朝鲜停战谈判延宕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司令部制造的各种障碍所致。因此，保证停战谈判得到最好结局的最好方法，就是训令李奇微不要使谈判复杂化，并停止制造人为的障碍。美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帮助使谈判圆满结束，可是苏联政府并不是参加谈判的一方，正相反，美国政府却是谈判的一方，因而，恰恰是它可以采取步骤使谈判顺利完成。

苏联的这个声明，既指出美方司令部制造谈判障碍，使谈判不

能进行下去的责任，又不承担调停或要中朝方面接受美国建议的责任，而是压美方采取措施，使谈判能圆满结束。而实际上，中朝双方协商，为了使谈判能够进行下去，不在枝节问题上长期纠缠下去，拟接受美方更换谈判地址的建议，但应扩大中立区以保障谈判会场和我方人员的安全。

金日成、彭德怀于10月7日对李奇微4日的来函作出答复：

你方破坏开城中立区的协议的事件，决不是移会议地址所能抹去的，你方对于这类事件所应负的责任，也不是迁移会址所能逃避的。同时指出，目前的问题应该是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在双方代表团的会议上严格规定关于会议地区中立化及会场安全保障协议，使对方过去这类违协事件不再重犯，尤其是要使双方对这个协议负责，再不容许像过去那样只用来约束我方而对方可以借口对该地区没有责任而肆意破坏和抵赖。为此建议：停战会议地区中立范围，应该扩大成为将开城和汶山都包括在内的一个长形地区，而将会移至板门店，并由双方负责保护这一会场地址。

李奇微于第二天即来函同意会址设在板门店，建议双方联络官10月10日会晤，讨论恢复谈判事宜。但对扩大中立区未表态，既未说同意，也未说反对，玩了一个滑头。

10月10日，双方联络官在板门店路北野地的一个绿色帐篷里举行会谈。气氛虽较前轻松、缓和，但是会谈一开始，对方就表示只愿划定新的会议地址周围一个小的中立区和开城、汶山通往板门店的公路不受干扰、攻击，实际上是仍要保留对开城我代表团驻地的空中威胁。鉴于以往事件的教训，我方坚持开城、汶山中立区应予扩大，以保证停战谈判得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进行。

就在双方联络官会谈时，美机不断在会场上空盘旋，进行干扰。10月12日下午，美机在板门店会址帐篷附近扫射，当场打死一名12岁朝鲜儿童。

当时，李克农和代表团拟就扩大中立区问题，由金日成、彭德怀出面给李奇微写信进行交涉，并拟了电文请示国内，周恩来考虑还是由联络官出面交涉，在双方代表团会议上讨论比较好。他亲自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给李克农的电报，指出：在联络官会议上可以相机表示，扩大中立区问题应由代表会正式讨论，但为准备代表会的讨论，不反对在联络官会上就此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毛泽东又在电报上加了两句：这样转变比由金彭出面转变要好得多，并且以早一点转变为宜。从这样一件小事上看，毛泽东、周恩来之间配合得何等默契、合拍和相得益彰，所以有人包括一些外国要人称他们是双英双魁。

经双方联络官现场调查之后，10月14日傍晚6时，李奇微致电金日成、彭德怀完全承认10月12日美机打死朝鲜儿童的事件，且电文语调缓和，未作任何辩解，不仅承担责任，还表示要采取迅速而合适的纪律制裁。接着，对方又发表一声明，公开表示道歉。

对方联络官反复争论多次，终于在10月14日会议上，对方提出以开城中心为圆心，3英里为半径的圆形免受攻击的区域。我方当即表示接受，并提出由开城至板门店、汶山的通道宽度改为400码。对方也同意了。时至10月22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双方代表团复会事宜的协议》八条，《双方联络官的共同谅解》五条。“协议”和“谅解”规定了谈判地点、中立区范围、会场区一切武装人员均不得进行任何敌对行动，除警察外双方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会场区，双方代表团及组成人员可自由进入板门店会场区并在会场区自由行动，谈判会议及会场区所需物资设备及通讯举行政事宜的安排由双方联络官协议之。这样，就宣告了对方两个多月来抵赖违背协议事件的卑劣手段的彻底破产。由美方破坏而中断了63天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10月25日在新的谈判地点板门店复会了。

从7月10日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算起，用了44天的时间，开



了32次代表团大会和小组会，只达成了一项议程协议和讨论了几次军事分界线而未获结果，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现在又将在新的地点进行新的谈判，将给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曙光。

## 九、谈谈打打有进有退

10月，在北京是最美的季节，也是最忙的时候。

作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军委常务副主席的周恩来，这位天下大忙人，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他从9月份开始，便忙着准备庆祝国庆的活动。1951年，这一年非比寻常，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抗美援朝一周年，朝鲜前线正处于又打又谈的关键时刻。为了显示新中国的力量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必胜信心，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得大些、好些、热烈些，鼓舞人民的斗志。

于是准备陆海空三军军事检阅，几十万人的群众游行队伍，各种文艺节目，举办国庆宴会、邀请外宾、中央领导人接见、国庆讲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甚至连出席国庆宴会，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人员、座位、名次，等等，都得由这位大管家来亲自设计、亲自组织、亲自安排和进行预演、反复检查。这位称得上特殊材料制成的钢铁奇人，尽管忙得几天几夜不休息，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仍然始终是精神旺盛，气宇轩昂，他那英姿勃勃的脸庞上，炯炯有神的眼睛在两道浓眉下闪烁着坚毅而又活泼的光芒，令人可亲可敬。他把所有的国庆活动，无一不弄得准确细致、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恰到好处。主人、客人、群众，人人感到满意，称赞

不已。

所有这些，又一次显示了周恩来的政治才能、组织才能、外交才能和超人的智慧、超人的精力。

但是，萦绕在周恩来心头的，还是朝鲜的战争与和谈。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特殊的和谈，战争中的和谈，和谈中的战争。对手又是掌握最先进武器的头号军事大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又极其老奸巨猾，诡计多端，而我们自己虽然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但军队的装备落后，供应困难，外交上经验不足，不少人是第一次走上谈判桌，同敌人面对面地进行唇枪舌剑还不熟练。而他作为这场斗争的主持人，如何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如何把“武斗”和“文斗”结合起来，运用好这两杆枪，为我们的政治服务，为我们的国家利益服务，为新中国争光，提高它在国际上的威望，奠定它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从而鼓舞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援民族解放运动。

他深深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兢兢业业，不能掉以轻心。但他认为这是正义的事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又有社会主义阵营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因此，他信心百倍，只要认真对待，不出大的差错，一定稳操胜券。

北京真是一派美景胜境，风和日丽，天高云淡，花香鸟语，再加上朝鲜战场的胜利，和谈重又开始，人们怀着喜悦、欢愉和希望的心情，携妻带子纷纷走进公园游山玩水，划船、跳舞、唱歌、做游戏，十分热闹、欢乐。可是周恩来却没有时间享受这种欢乐，连他自己住处的西花厅庭院里盛开的鲜花，香飘满园，沁人心肺，也无心去欣赏。他思考着、盘算着、设想着朝鲜前线的大事。他想现在朝鲜前线正面临着敌人军事上的“秋季攻势”，停战谈判刚刚恢复，敌人虽说态度有所转变，气氛有所缓和，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敌人不会有什么让步，在谈判桌上将可能要价很高，采

取攻势，以配合军事进攻，从军事、谈判两个方面同时向我施加强大压力，逼我让步，以达到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以牙还牙，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要坚决顶住，不仅不能后退，而且要进攻、要反击，打破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幻想，才有可能迫使敌人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停战、和平才有希望。于是他去找毛泽东商量，给彭德怀、李克农下达指示。

10月25日，双方代表团的专队几乎同时到达板门店这个新会议地址。此时，双方代表团都有调整，我方以边章五代替邓华，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以李亨根代表了白善焯，特纳接替克雷奇。

边章五，当时51岁，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31年12月14日参加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起义时他任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的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任局长，跟随周恩来、叶剑英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任武官，从苏联调回不久就前来朝鲜接替邓华将军，参加停战谈判，邓华仍回志愿军司令部协助彭老总指挥作战。边章五是一位忠厚长者，为人稳重，性情温和，言语不多。他离开北京时，周恩来找他谈话，交代他说：“那里有克农负责，他情况熟悉，对敌斗争又有经验，你去协助他们工作。”

我方在会上就第二项议程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即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战，双方各自后退5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脱离接触。而对方却在会议上提出一个反建议，这个反建议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我军阵地的大后方，要使中朝军队在临津江以东从现有阵地后撤38到53公里，在临津江以西从现有阵地后撤约68公里，也即是说，根据这个方案，对方不打一枪，不伤一个人就可以获得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它不仅没有让步，反而提出更多的要求，继续向我们进攻。他们的理由“是以战场的

实际为依据的”。他们不同意我方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说三八线只是一个纬度线，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以此军事分界线不利于建立防御阵地与部队的安全。他们坚持以往的谬论，说，战场的实际除了有一个地面战线，还有一个海空战线。地面战线仅仅是双方地面部队力量的反映，他们的海空力量占优势，所以要确定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只能在地面战线和海空战线之间划定。他们蛮横无理，公开提出海空优势必须在划定军事分界线时得到补偿。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朝鲜战场的地面战线，恰恰正是两军综合力量较量的结果，对方如果没有海空优势，早就被赶出朝鲜了，地面上早就没有美伪军存在的余地了。而且对方也承认，中朝军队在地面部队力量占绝对优势，如果海空优势需要补偿，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要不要补偿？

南日将军批驳了对方的“海空优势补偿论”“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对方无理由拒绝我方的合理主张，便又采取“耍死狗”的方针，首席代表乔埃拒不发言。南日用怒不可遏的目光直射乔埃，乔埃却低着头、避开南日的目光，有时则用两手捧着两腮，有时玩弄着铅笔，有时抽起烟来，轻轻地吐出一缕缕烟雾，在会场上缭绕，就是一言不发，其他的代表抽烟的抽烟，玩铅笔的玩铅笔，也都一言不发，有的还抬起头望着我方代表，意思在说，“看你们怎么办？”一分钟、一刻钟、一小时、两小时地过去了。

我方代表也很沉着，都静静地坐着，李相朝则用铅笔在纸上画画。

我方联络员请示了李克农、乔冠华。他们听了以后，说：“那好吧，就这样坐下去吧。”

一直“静坐”了两小时零一刻钟，最后乔埃才说：“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继续开会。”

外交上“沉默”是一种斗争，一种策略，以“沉默”对“沉

默”也是一种斗争，一种策略。美国人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态度，周恩来指示代表团、李克农、乔冠华要认真研究，并提出措施和方案。

## 军事分界线的纠缠

经过多次研究，李克农和代表团认为美方之所以不同意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一是美方的方针有所变化，不像凯南同马立克谈话时说过的恢复战前的状态；二是美方只看到美、李军三八线以北占据的地方比我们在三八线以南占据的地方多些。后来在艾奇逊的回忆录里证实了我方的看法。艾奇逊说，第二次议程谈判之所以僵持，“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并且一开始就发生的”，是我们“欺骗了对方”。“当我们在开城表示坚决要把不接受三八线为停战线作一项主要原则时”，对方“很可能感到惊讶懊恼，并且觉得是受了骗”。“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有几个原因。第一，凯南同马立克谈话时，第八集团军还只是刚刚越过三八线，它的西翼确实是在三八线以南，虽然凯南只是含糊地提到了一条停战线，但马立克却在他的广播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提到‘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而且我们最初提出的议程规定‘讨论仅限于有关朝鲜的纯军事问题’，同时，从日本投降以来，我们一直坚持三八线完全是一条军事线，别无政治上的意义。因此，现在要变更它，在共产党看来，就很可能具体政治意义了。”“原来谈判是为了要恢复‘以前的状态’，在一开始他们就发现我们提出的是一条有利于我们势力范围的新界线，它不仅具有更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似将使他们大大丧失威望，这就使他们大大震惊。他们决不会想到，这经过看来好像是在玩弄诡计，实际上却完全是由于我们方

面的粗心大意。这恰恰又是他们喜欢玩弄的一种策略。”

李克农和代表团认真分析计算目前的实际接触线同三八线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利弊如何？经过测算对比，一致认为在东线美、李军在三八线以北占据的地方比西线我在三八线以南占据的地方要多一些。但东线那里多是山区，交通不便，人口少，可耕地不多；而西线那里多是平原，交通发达，人口多，产量多，又有开城的高丽人参，另外开城在三八线以南，它是朝鲜的古都，现在又是朝鲜谈判地址，如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谈判以后我方再让出去，对开城地区人民不好交代，在政治上很不利。因此，无论从经济、土地面积、政治上讲，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我并无不利，而且如果我方提出接受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中朝方面为了争取和平、朝鲜停战，作出让步，反而能争取世界各国和广大人民的同情、支持。

于是，以李克农的名义向毛泽东、周恩来发报把分析研究的结果和新建议报告给中央。

毛泽东、周恩来、外交部、总参谋部等研究来报，认为前方的看法是对的，建议是好的，遂复电批准。之后，双方代表团协商同意，就第二项议程进行小组讨论，我方由李相鲜、解方出席，美方由霍治、勃克出席。

在战场上，敌人夏季攻势失败之后，仍不甘心，又于10月3日在本线发起“秋季攻势”，集中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美骑一师、第三师两个团、泰国二十一团、英联邦第一师在200多辆坦克、300多门大炮和大量飞机支援下，从铁原西南地区的高旺山、马良山为进攻重点，敌人每天以一两个团的兵力向我军猛烈攻击，激战至4日下午，我军守高旺山及其以西227.0高地的部队主动撤离了。10月5日，敌又将进攻重点指向马良山及其西南216.8高地，每天均以一个多团的兵力在大批飞机和猛烈的炮火支援下，进行多梯队

的轮番攻击。我军马良山阵地曾五次失而复得，防守 216.5 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的掩护部，即两个“猫耳洞”贯通的马蹄形防炮洞，一天内连续击退敌 20 多次的冲击，而我军却以很少的代价大量杀伤了敌人，表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多么地英勇善战。激战至 8 日，敌因伤亡过重被迫停止了进攻。

防守在天德山及 418 高地的我军，每天抗击敌人两个步兵团的猛攻，平均击退敌人十余次的冲击，阵地被炸成焦土，只剩下一名副团长率十余名轻伤员，顽强地守住阵地。

敌人的秋季攻势进行了 1 个多月，各路进攻之敌，均被我军打败，被迫停止。我军在东西两线共歼敌 79000 人。而敌人只在西线前进 3—4 公里，东线前进约 6—9 公里，共占我方土地 467 平方公里。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遭到巨大的伤亡。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同样在战场上也得不到。

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显示我军力量，配合板门店谈判，彭德怀同志愿军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决定向敌人发起反击，猛烈进攻。我陆军第六十四、四十七、四十二、二十六、二十七 5 个军的各一部和海军登陆艇、空军一部先后向 26 个敌人防守点进行攻击，五十军一部在清川口至鸭绿江口之间的朝鲜西海岸附近进行了 4 次渡海作战，炮兵第四十七团进行了远程火力支援，航空兵首次配合步兵作战，空军第八师、第十师出动飞机轰炸敌人守岛部队，先后攻占了椴岛、岩岛、大小和岛、牛里岛、牛岛等十余个岛屿，有力地配合了前方“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的谈判。

这次反击战，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意义却是不小。首先是我军第一次进行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这在中国革命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我国高级将帅中彭德怀第一次指挥了三军联合作战；其次，它显示了我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



大增强了，现代化了。第三，使得美国人进一步认识到想用军事压力迫我在谈判桌上让步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第四，用军事力量和军事上的胜利，配合我前方谈判，真正起到显示我方军事，枪杆子支持笔杆子的作用，对谈判的同志是个很大的鼓舞。这也构成周恩来外交思想、外交政策的重要一部分，即以实力做外交、谈判的后盾，军事与谈判两手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

敌人不得不又坐下来谈判，在第二项议程的小组讨论会上，气氛比较平和。当霍治再次提出海空优势的时候，解方说：“我劝你还是不要再谈那一套刺激感情什么补偿论吧！如果一定要谈，那么地面部队的优势要不要补偿？现在你的问题是，你们不同意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我们决不能接受你方的无理主张，难道我们就这样僵持吗？”

霍治说：“如果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根据地形，我方在东线后撤之后难以重新攻取；而你方在西线后撤之后，则易于重新攻取。”

解方当即驳斥说：“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战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

霍治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被解方说得无言以对，他着急了，于是说：“我建议我们现在丢硬币，各自选择一面，以丢硬币的结果来确定谁先走下一步。”谈判本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而霍治竟像一个小孩子以打赌来决定问题，岂能不令人捧腹大笑。

11月6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向美国发起外交进攻，他建议召开一个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世界“和平会议”，要求沿三八线实现朝鲜停战，并在3个月内撤退所有外国的军队。美国的盟国也对美国在朝鲜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不满。荷兰驻联合国大使冯罗杰在联合国大会上说：“过分强调保留开城作为谈判地点的问题，而且继续进行战斗……实际上是不必要的。”英

国、南非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对美国的态度都有所不满。

这些国家的态度，对杜鲁门是个不小的压力。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说：“早些时候决定选择满足我们主要要求的分界线的原则性协议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李奇微则回电反对：他说：“我认为，向共产党方面宣布你们所指示的立场很有可能会加强共产党的不妥协立场，并将削弱我们以后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在亲身经历了这一发展变化的形势之后，我有一种内在的强烈感受，这种感受毫无疑问是基于朝鲜形势的对比，那就是，多一点铜铁少一点丝绸，美国应更为直截了当地坚持我们立场中不可改变的逻辑，这将会达到我们为之光荣战斗的目标。”

“相反，我认为，你们所指定的方向将一步步导致牺牲我们的基本原则，和摒弃如此之多英勇无畏的人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抉择，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就能步步成功。如果退却让步，就会损失一切。我以我的全部良心，力主我们坚定不移。”

但是李奇微的意见，华盛顿并没有接受，因为杜鲁门考虑他的盟国态度和朝鲜战局发展不利。乔埃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代表团，而且甚至是李奇微，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华盛顿又会发出一道改变我们获得一项体面的和稳定的停战协定的基本原则的新指令。”“在这种情势下，要形成健全的计划，令人信服地提出见解，表现出无懈可击的坚定立场和最后言行，都是极为困难的。在我看来，美国政府没有确切地了解它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结果，联合国军代表团总是瞻前顾后，生怕从遥远的地方又发来一道新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往往要求采取与目前正在采取行动不相一致的做法。”

周恩来一向是善于审时度势，他了解形势、研究了形势、分析了形势，洞察了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间的矛盾、美国统治集团的内部

矛盾。联合国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都在开会，朝鲜问题都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重大的议题，为了利用矛盾，孤立打击美国和美国统治集团中的好战分子，以及考虑到朝鲜战场对我有利的形势，认为是推动谈判进展的好时机，决定批驳对方11月8日要把开城划在非军事分界线之内，实际上是要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地区，并提出我方的新方案：

一、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各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

二、小组委员会应即根据上述原则校正现有实际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确定军事分界线两侧各2公里之线为非军事区的南北线，划出非军事区。

三、小组委员会在停战协议全部商定后但尚未签字前必须按照双方实际接触线届时所发生的变化，对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作相应的修改。

我方这个方案打出后，美方又害怕这样实际上形成停火，士气无法维持，还怕“军事压力”的武器在以后的议程谈判上难以使用，不便讨价还价。因此，他们不想就第二项议程作出具体决定。经我方多次批驳，美方不得已于11月17日接受我方的建议，但加上有效期30天的限制，如30天停战协定未能签字，则由双方确定彼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我方根据双方讨论的意见，又考虑了一个修正案，修正案的内容是：

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

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兹达成以下协议：

（一）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双方各退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为原则。

（二）双方小组委员会应立即根据前条原则，校正现有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而军事分界线两侧各2公里之线，即成为非军事地区的南北缘。

（三）鉴于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至停战协议签字为止，如果代表团大会批准本协议及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的具体位置后的20日内，全部议程已经达成协议，则不论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已经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地区应不再变更。如超过20天，而全部议程尚未达成协议，则应按照停战协议及签字前的双方实际接触线所发生的变化加以修正。

这个修正案，李克农于11月19日电报中央，请示批准。

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同外交部、军委总参谋部进行讨论研究，认为代表团所提方案可行，但是根据我们不怕拖、不怕打的方针，代表团将美方原提议30天内不变，而改20天内不变，还是急了一点，还有怕拖的思想。因此，立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报给李克农：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望即根据你们11月19日24时来电所提三条，在小组会上提出。唯20天仍改回30天，即同意敌人所提的时间，因敌人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比敌人更急。我们的态度是能在30天内成立协议固好，拖长时间也不怕。

毛泽东

11月20日18时

11月22日，小组委员会就“作为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达成了协议”。

### 中方作出重大让步

这个时候，朝鲜开城地区已进入初冬季节了，朔风阵阵袭来，寒气逼人，大地早已被白雪覆盖过了，在树荫下、屋角边、山坳里则是一堆堆的积雪。但中朝谈判领导班子和代表团人员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组织有关工厂、运输单位，及早送去冬季需用的物资，所以，他们都已穿上了棉衣，炕头也已烧热，无丝毫的冷意，虽说斗争非常之激烈，但人们的生活却是很愉快的。

一天夜晚，李克农在他的“小别墅”会议室，召开一次只有各级领导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传达11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方针的指示。指示说：

10月25日恢复谈判以来，在国内、国际对美要求停战的压力增大，因此，达成协议的可能增长，但美国又要保持紧张局势，采取种种讹诈手段拖延中心问题的解决。在停战线问题上，美方虽放弃了深入我阵地后方划分停战线的无理要求，而又要把开城划在中立区内，我主张以实际接触线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估计可能达成协议。在停战监督问题上，美方主张无限制的监察，我拟同意在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关于中立国的提名，我拟提苏联、印度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如对方反对亦可提名瑞典为中立国。关于俘虏问题，我主张有多少交换多少，估计不难达成协议。关于高级会议有三个方案，一是双方各派高级代表开会；二是苏、中、美、英四国

代表和南北朝鲜代表开会；三是苏、中、美、英、法五国和印度、埃及七国开会，南北朝鲜代表参加。争取在上述意见轮廓下，我采取灵活策略，不表现急于求和，争取年内达成协议，但也准备打他半年到一年。这样“和固有利，拖亦不怕！”

李克农传达以后说，中央的指示很重要，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总理的思想，当然是得到毛主席同意的，中央站得很高，看得很远。我今天把中央的底都交给你们了，希望大家认真学习、领会，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

然后，李克农又发挥说：朝鲜停战谈判，那是美国在国内国际压力之下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内国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这就是形势发展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认为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长了。这就是我们毛主席、周总理、金首相的共同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

有些同志对今年内达成协议将信将疑，快人快语的沈建国说：“我看难呀！”

李克农瞥了他一眼，喝了口热茶，摸了摸唇上短胡，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又说：“你说难，肯定不那么容易，但可以争取的。周总理经常讲，谈判一是看时机，一是看条件嘛，时机刚才我已经讲了，现在讲讲条件。

在停战线的问题上，我们主张以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停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估计很快可能达成协议。这个方案经中央批准，打出去之后，对方有些慌乱，虽然他们放弃了深入我阵地后方划分停战线的要求，却仓促提出了以讹诈手段索要开城的11月8日的方案，我当时就认为他们难以坚持下去，因为对方说不出任何理由来，果然，17日不得不原则上接受了我方建议。

停战线的问题是停战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最主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当然我们不是说别的议程就没有麻烦了。同美国人打交道，你不要设想没有麻烦，比如第三项议程，停战监督问题，根据美方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所持的一贯主张，是无限制的监察，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打仗之前我们不会同意，停战了难道能允许敌人到我后方视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又要僵住，我们准备提出在双方的后方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

李克农见大家的信心很足，情绪很高，又说：“那么中立国提名恐怕也会遇到困难，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提谁，总之会有争议就是了。但是只要中立国视察的原则决定了，中立国提名总不至于僵持不下吧？”

李克农最后说，中央的方针是“争取停，准备拖，和固有利，打也不怕”。至于战场，不用我们管，彭老总早就说过，“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我们的任务就是谈判。

李克农讲话后，休会夜餐时，人们脸上喜形于色，他也高兴，拿出一瓶茅台酒来，同大家共同干了一杯。

接着又继续开会，首先南日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拥护毛主席、金首相的重大决策，问题是敌人太狡猾了，出尔反尔，总是层层设置障碍，现在时机较为有利，战场上敌人无可奈何，我们又有了全盘设想，我们应该努力争取。

乔冠华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弗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讯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什么八十一师二十三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

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我没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

后来的事实证明乔冠华的预感和分析是对的，显示了这位杰出的外交家的才华。

11月27日谈判会议上，双方代表团批准第二项议程达成的协议之后，会谈立即进入第三项议程：

南日将军当即提出我方五项建议：

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三天内，自非军事地区撤出。

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五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的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则对方为维护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地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

五、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

美方代表乔埃却要求停战监督机构得以自由出入朝鲜全境，在维持停战军事力量现状不得增加军事力量水平的幌子下限制朝中方面修建机场，但却主张兵员和武器弹药进行无限制的输换和补充，



朝中方面代表反复批驳了对方的论点。指出，为了真正保证敌对行动不再发生，就必须彻底消除战争状态而不是保持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平衡；应该减少双方的军事力量，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其装备。对方却说谈判代表团无权讨论撤出外国军队问题。我方代表当即质问对方既然无权讨论外国军队的去留问题，何以有权讨论外国军队的补充与输换问题呢？李克农、乔冠华和代表团讨论了对方的建议和论点，为了反对其在朝鲜全境视察问题，提出两点补充意见，形成七项原则方案，报请中央审批，经周恩来批准，在12月3日的全体会议上提出：

一、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与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二、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三天内自非军事区撤出。

三、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五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对方后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四、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任何武装行动。

五、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除本项第六条所规定的监察范围外的全部停战协议的实施。

六、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器和弹药。

七、为监督第六条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督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视察结果的报告。

12月4日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的讨论转入小组会进行。我方代表为李相朝、解方，对方代表为滕纳空军少将、霍治海军少将。以后改为我方为解方、张春山代表。

到11日，停战谈判代表团又开始分两个小组，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和第四项议程两个小组进行。第四项议程的代表是李相朝、柴成文，对方代表是李比海军少将、希克曼陆军上校。在第四项议程时，我方一开始即提出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而对方却拒绝表示态度，坚持必须首先交换战俘名单。

12日，我方提出五点原则：

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二、商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限内，双方分批释放并遣送完毕其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三、建议双方交换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俘虏的交接事宜。

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

在第三项议程的讨论中，对方拖了9天之后，于12月12日拿出一个对案，勉强同意我方提出的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

但是仍坚持要大量的轮换部队与补充弹药、武器，并且节外生枝，提出要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为谈判设置新的障碍。谁都知道，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可能容许限制自己国境内的航空设施的，这等于切断它的国家航空交通。

新中国的外交，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凡是合情合理的就接受，凡是不合情不合理的就坚决拒绝。应该说，美国军队远涉重洋，正常的轮换是必需的。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是美国统治者的责任，不是士兵之过。美国的国家制度规定，每一个士兵在前线服役 10 至 12 个月就要轮换回国。这是一个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人道主义问题，不给予照顾那是不合人情道理的，也是一个争取人心的问题。因此在 12 月 14 日，即对方提出对案以后的第三天，我方又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将原先的方案中“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协议签字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部队、军事人员、战争装备和弹药”之后加了一个“但双方的任何一方如需要对其在朝鲜的军事人员轮换时，应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请求，取得批准，此项轮换的人数，每月不得超过 5000 人，并应经过中立国监察机构的实地监督，在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

但是，对方置我方的让步于不顾，它在 12 月 23 日的方案中，除把我方让步的地方接了过去之外，干涉朝鲜内政的要求依然坚持不动，借口所谓机场与航空设施的恢复与修建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我方军事力量。

我方为了解除对方这种戒心，争取早日就第三项议程达成协议，又于 12 月 24 日再次对 12 月 14 日的方案进行修正，也即是明确规定“不得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作战飞机”，同意对方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的一方向中立国监察机构提出调查违反事件请求时，中立国监察机构即须负责进行视察”。

我方这一让步乃是一个重大原则性的让步。1946 年北平军事

调处执行部及其所属的执行小组里，我方是有否决权的，那时蒋介石却不止一次地提出主席有仲裁权，因为当时三人小组美方是召集人，也即算是主席吧。美国显然是偏袒蒋介石的，我方坚决反对。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我方打破了这个原则，同意了在调查违协事件中任何一方不使用否决权，在军事委员会上只要一方提出就可以请求中立国监察机构派出小组前往视察；中立国监察机构接到通知“即须负责进行视察”。

前面说过，11月27日双方达成的第二项议程以实际接触界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中说：“如30天停战协定未能签字，则由双方确定彼时的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现在30天已到了，而停战协定由于美方的破坏、拖延、阻挠，仍遥遥无期，这给渴望和平的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泼了一瓢冷水，这怎么向他们交代，这是谁的责任？我方代表解方将军在小组会上义正词严地说：“你方已经把会议拖延了这样久，当然你方还可以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们认为必须把我们争议的问题公之于世界，让世界人民知道谁在拖延朝鲜停战谈判。”

美方之所以不愿就第三项议程早日达成协议，除了它们本来谈判就是被迫的，从根本上说是不愿意谈的，但是在战场上又打不赢，盟国同它和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越来越大，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声浪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和矛盾，欺骗人民，不得不谈，就同赶着毛驴上山，打一步走一步，而把幻想寄托在军事上、战场上。另外就是美帝国主义那种习以为常的霸权逻辑，仿佛干涉别国的内政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因此，顽固地坚持要干涉别国的内政。没想到碰到中国这个强手、硬汉，就是坚决反对美国干涉别国的内政。

所以，当美国代表说：“现在我们正在干涉着你们的内政，你修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对美国这种狂

妄的、厚颜无耻的言论，解方将军毫不客气地、气愤而又严厉地斥责说：“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到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内政，妄想干涉也没有干涉得了，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对方狡辩说，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完整的主权，完整的主权既不存在，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主权的完整和内政的不可干涉呢？

我方驳斥说，这正是你们美国统治集团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的露骨表现，你们企图侵略别的国家，因此你们就否认世界各国还有什么主权。

对方说，主权、内政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你们应该将它忘记了吧！

我方说，确实不错，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在你们美国的压迫之下，已经没有完整的主权和内政了。但是，你们千万不应忘记，你们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现在已经在世界的不少地方碰了壁，将来会碰更多的壁，直到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因为，在这些地方不仅有主权完整的国家，而且有些国家还要拿起武器为保卫自己的主权，为反对外来的干涉而斗争了。

对方仍不肯认输，强词夺理地说，停战总是要放弃一部分主权的，你们既然建议保证不从朝鲜外面进入任何军事人员、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和弹药，并邀请中立国家代表到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视察，事实上就已经同意了我方对你方的内政干涉。

我方进一步批驳说，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推理，是故意抹杀这样一种事实；限制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力量，并由与朝鲜战争无关的中立国家来进行监察，这件事它的本身就是限制外来力量干涉朝鲜的内政。我们的建议是严格地划分朝鲜的对外关系与内政事

务的，并且是既能保证稳定的军事停战而又不涉及双方内政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这种奇谈怪论，后来在乔埃将军的回忆录里写道：“战争本身对于双方内部政务就构成了最大的干涉，而停战则为战争的另一种技术形态，唯因成立协定，而减少干涉的程度。”这就是美国官方的逻辑、立场，帝国主义的逻辑和立场，霸权主义的逻辑和立场，它同人民的逻辑和立场完全对立，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逻辑和立场截然不同。

这是第三项议程之所以僵持不下的主要症结之一。

## 解决战俘问题障碍重重

话说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的讨论比第三项议程的讨论更加困难，美方设置的障碍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

就拿交换战俘名单来说，朝中方面为了解除美方拖延谈判的借口，同意双方立即交换全部战俘资料，并在12月18日将完整详尽的战俘资料交与美方，而美方交来的战俘资料却只用英文拼写的姓名编号。名单上的人数较美方在谈判会议上所声称的人数少1456名，较美方交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来的战俘名单所列人数少44205人。朝中方面要求美方就此作出交代，但是美方一直避不作答。在我方追问之下，先说什么印机不好，坏了，又说遣俘不需此项材料，非常尴尬、狼狈。

接着，美方提出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人到双方战俘营访问。12月21日，李奇微致信金日成、彭德怀说：

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几次请求你们

以及你们政府当局许可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鲜，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们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中开始时起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俘虏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以援助。

朝鲜停战领导班子和代表团研究李奇微的来信，并决定以金日成、彭德怀名义复信李奇微，并报请周恩来修改审阅批准。复信说：

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们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

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愿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是在饮食、被服、居所或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给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关切。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中朝方面既拒绝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单独视察战俘的建议，又留有余地，建议在停战协定生效之后，由朝中两国的红十字会代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到双方战俘营去访问。因为那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站在美国一边的，为美方说话，金、彭的复信打破了美国的诡计，美国当然不愿意接受朝中的建议了，这样红十字代表访问战俘的问题便暂时搁在一边了。

于是，美方又玩了一个新花招。1月2日，竟把中世纪人口买卖的野蛮契约搬了出来，说什么他们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的交换。如果一方交换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在美国、蒋介石、李承晚的特务严密控制之下“愿”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美其名曰“自愿遣返”。

这个方案的实质是一个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方案，也是一个为



谈判设置一大堆难以逾越的绊脚石的方案，又一次暴露了美方蓄意阻挠谈判的阴谋诡计。它给那些抱有希望尽快达成停战协定的人们，那些被双方收容的希望尽早回家的俘虏们一瓢冷水，使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破灭了。

这种蛮不讲理、毫无人道主义精神的方案，怎能不使朝中代表气愤和进行痛斥呢？于是一场新的唇枪舌剑开始了。

1月3日，我方代表李相朝严厉地指出：

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你们的方案是假借“自愿遣返”以“一对一的基础”的名义实行扣留战俘的方案。我相信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方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体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协议的前途。我方坚决拒绝你方的这个“方案”。

此后，我方在小组会上抓住对方的提案，集中批驳其“一对一交换”和“自愿遣返”。指出：“一对一”交换就是人口买卖。还指出，“自愿遣返”就是违反《日内瓦公约》。1929年61国缔结的、1949年8月12日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一一八条明文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第七条还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之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对方在我方义正词严的驳斥下，理屈词穷，无可奈何，不得不说可以“让步”，于是他们将“一对一交换”改为“同等数目的交换”，将“自愿遣返”改为“不得强迫遣返”。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

在我方进一步的批驳下，对方竟说：释放战俘就等于增加你方的军事力量。

我方当即指出：这说明你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战俘的人权与幸福，而是战斗人员与武力。

小组会开了 50 多次，双方对峙着，而且越来越僵。

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指示代表团研究，吸收对方合理的意见，提出新方案。经过代表团反复讨论研究，提出一个扫清外围、孤立重点、迫使对方在遣返战俘原则上作出让步的方案。

报经周恩来审阅批准后，于 2 月 3 日，由李相朝将军在第五十五次小组上提出。方案全文如下：

（一）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立即释放并遣返各自所收容的全部战争俘虏。

（二）双方同意保证其全部被俘人员，在被遣返后应恢复和平生活，不再参加战争行动。

（三）双方同意遣返重伤重病战俘。双方在遣返此类战俘时，应在可能范围内同时遣返被俘的医务人员与之随行，以便照顾。

（四）双方同意应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分批遣返双方所收容的除第三条优先遣返者以外的一切战俘。

（五）双方同意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为双方交换战俘的地点。

（六）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即各派校级军官三人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督导之下，负责具体计划并监督双方实施本军事停战协定中有关战俘遣返的一切规定。该委员会如对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

成协议，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战俘遣返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所在地附近。

(七) 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立即分别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到双方战俘营进行就地访问，并在双方交接战俘地点，协助遣返工作。

(八) 双方同意在可能范围内，尽速并至迟本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的十天内，将所有的被俘期间死亡的战俘姓名、国籍、级别及其他有关材料提交对方。

(九) 双方同意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应协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

甲、联合国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准许并协助原住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南而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前，流落于现有军事分界线以北的平民返回其家乡。

乙、双方最高司令官负责将上述协议之内容，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内广为发布，并责成其有关民政机关，对所有上述愿意返乡的平民予以必要的指导与协助。

丙、双方在军事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即各派校级军官二人，成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督促之下，负责办理协助上述返乡平民通过非军事区及其他有关事宜。该委员会如其有关任务的任何事项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即提交军事停战委员会决定之，协助失所平民返乡委员会的会址设在军事停战委员会总部所在地附近。

这个方案解除了对方可能的一切借口，如“释放战俘等于增加

军事力量”等，打破对方利用“拘留平民”扣留战俘的企图。这个合乎情理的方案，给谈判注入了新的希望，国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不能久拖而又打破僵局的好方案”，连美方代表李比将军也向记者说“终于用香烟熏出了一个方案”，并于第二天正式建议转入参谋会议研究讨论具体问题。

## 美军发动细菌战

1951年12月31日，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乔埃致函南日，建议同时召开第五项议程小组会议，我方建议2月6日召开大会。在这个会议上我方对第五项议程提出如下建议：

双方在停战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各指派五名代表举行政治会议，讨论：

- 一、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 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 三、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对方则说：“双方司令官并没有审议有关在朝鲜的政治解决的各种问题”。建议“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双方向各自有关政府与当局建议在3个月的限期内采取步骤在政治会议中或其他政治方法处理各项问题”。不仅不承担召开政治会议的义务，而且还企图以“政治方法”来代替“正当会议”。他们还把我方建议讨论“与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改为“与和平有关的其他朝鲜问题”，目的只限制在“朝鲜”，更不谈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这样，朝鲜停战谈判第三、四、五项议程同时进行，会场上展

开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

同时，在战场上也展开激烈的军事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坑道阵地战，用铁锹、铁镐、钢针、斧头、铁板条在朝鲜连绵不断的山地，构筑了西起汉江口东至高城长达 250 公里的整个战线上 20 到 30 公里纵深的坑道，并以它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彭德怀亲临前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表彰先进、推广构筑方法。他高度赞扬指战员们大造地下工事的光辉行为，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他要求坑道工事必须达到七防：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还规定坑道口厚度 10—15 米，每条坑道要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幅宽 1.2 米，高 1.7 米。坑道的厚度在以后有的由 30 米发展到 50 米，每条坑道要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可以顶住 500 磅至 2000 磅炸弹的轰击。坑道内部设备也越来越完善，不仅有连、营、团部的电话总机等办公室，还有粮食和弹药库、伙房、厕所、澡堂、俱乐部等。战士们自豪地说，我们的坑道是攻不破、炸不烂的钢铁阵地，是我们的“地下长城”。

这种坑道工事，不仅是为了防御、保存我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我军利用这些工事，以劣势装备打退了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多次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使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使敌人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更得不到，有力地支持了谈判。同时利用这些坑道，保证了前方的供应。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合军的空、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切断共军的供应，然而共军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美军在前方多次进攻均遭失败，于是想出一个灭绝人性的可耻办法，从 1952 年 1 月 28 日向我军阵地及后方用飞机撒播大量带菌

昆虫，进行一场细菌战。到3月份以后，撒播细菌已扩及朝鲜北部的7个区44个部。

朝中方面发现美国使用细菌战，并从实地调查和美军被俘空军驾驶员口供等方面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在外交上、舆论上采取了措施。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宁永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军进行细菌战。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支持朴宁永抗议美国政府进行细菌战的声明。3月8日，周恩来外长再次发表声明，严重抗议侵入中国领空进行细菌战。3月15日，中国组织以李德全、廖承志、陈其瑗为首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3月31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发表《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报告》，报告证实了美国和李承晚军队的非人道罪行、战争罪行特别是进行细菌战的罪行。4月1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发出题为《反对细菌战》的告世界男女书，号召全世界人民要求停止细菌战和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但是，我方却未在谈判桌上提出美国进行细菌战，因为估计到美国杜鲁门政府是绝对不会承认进行细菌战这种遭到全世界人民反对的罪行的，如果在谈判中提出就必然把美方逼到墙角导致谈判完全破裂，别无结果。这样同我们争取和谈成功的初衷相违背，而且也有失众望。这也是周恩来外交思想和谈判技巧高人一筹之处。

此时，美国在战场上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了，细菌战又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声名狼藉，不得不又坐下来谈判。

1952年2月16日，在双方代表团大会上，我方代表就第五项议程提出修正案：

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分派代表

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等问题。

这项议程终于达成了协议。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也是美方蓄意阻挠和破坏谈判的一个举动。

### 巨济岛战俘屠杀事件

2月18日拂晓6时，一支美国军队，将美方在巨济岛六十二号战俘营中的约5000名战俘包围起来，由美方人员对战俘进行所谓甄别，当战俘拒绝进行“询问”和“甄别”的时候，即遭美军屠杀。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报告，战俘死伤373人。事后美方封锁消息。美联社透露，“新闻检查不许写出牵涉在这事件内的美国兵的番号，据说牵涉在内的大约有一个营。陆军方面说，他们都是在朝鲜战争中有显著战绩的部队中的人”。

巨济岛在南朝鲜庆尚进道海岸镇海湾南部的海岛，是朝鲜第二大岛，属巨济郡。面积376.37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81公里，最高峰老子山，海拔562米，与附近的闲山岛、峰岩岛、加助岛等许多岛屿组成巨济郡，并为该郡的首府古县的所在地。气候温和，沿岸山林茂密，多鸟类，近海水产业发达，居民以半农半渔为生。南部的加罗山，海拔555米，为该岛距著名的对马岛的最近点。该岛为朝鲜南部的海上要冲，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地。美军将被俘的朝中士兵大部分关在那个岛上，设有12个战俘营，关押中国人民志愿军10000多人。

我方查明事实后，于2月23日向美方就在巨济岛屠杀战俘事

提出强烈的抗议。《人民日报》于3月13日发表《必须追究美国对巨济岛惨案的责任》的社论，指出：

美国侵略者在朝鲜南方的巨济岛上所设的俘虏营，和他们在水原等地所设的俘虏营一样，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布瓦尔德、奥斯威辛等集中营更为黑暗、更为恐怖的人间地狱，这早已为世界人民所共知的了。在那里，美国杀人犯们残杀和虐待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暴行是罄竹难尽的。汽油烧身、电灯射眼、火烙、枪杀、打死、蒸死，以至作细菌武器的试验，造成疾疫蔓延、大批死亡，那一片血淋淋的屠场的阴森惨象，就连美国最反动的报纸、杂志和它们的记者在报道中也无法掩饰。但是美国杀人犯还不满足于这一切残暴的罪行，他们现在更制造了一个大规模谋杀我方被俘人员的血腥巨案，他们用集体的屠杀来证明他们是全人类的文明与和平、正义的死敌。

社论还指出：

这个大规模的谋杀案，又证明了美方在朝鲜谈判第四项议程上的所谓“自愿遣返”的提案，是极端荒谬和毒辣的阴谋。美国侵略者一贯采用虐待、残杀、强迫进行法西斯教育，强迫在身上刺反动口号，强迫参加所谓“反共救国团”等违犯国际公法的罪恶手段，企图达到大批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转帮台湾国民党残余匪帮和南朝鲜李承晚匪帮的卑鄙目的。

社论说：



在朝鲜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 23 日的参谋会议上，我们参谋人员就美方所制造的巨济岛惨案，提出严重抗议是完全正确的。

3 月 15 日，美方在停战谈判第四项议程的小组会上承认，3 月 13 日我方被俘人员又在对方的巨济岛战俘营内遭到屠杀，死 12 人伤 26 人。但美方代表李比竟把它说成是什么我方被救人员中的“相互攻击”。

3 月 27 日，中朝方面为了争取早日达成停战协定，提出双方所收容的非朝鲜籍的战俘及原籍不在收容一方地区的朝鲜战俘应全部遣返，原籍在收容一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如本人愿意返回家乡，恢复和平生活，可不予遣返的新方案。

4 月 1 日，在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上，美方提出一个遣返战俘的原则修正条文：交战双方应释放并遣返停战协定生效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实施则以停战协定签字前经双方校正并接受的名单为基础。但同时，美方却提出以下两点谅解：

一、每方所收容的一切战俘及被拘留平民，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居住于收容一方地区者，除愿留居原居住地者外，应予遣返；

二、其他战俘，除不以强力即不愿遣返者，予以释放并使其居于所选定之地点外应予遣返。

美方的用意十分明白，仍然是原封不动地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我方遂于 4 月 25 日宣布中止行政性会议，对方干脆提出“无限期休会”。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奉调回国，由他接替周恩来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军事上分担周恩来一部分日常工作，而由陈赓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5月，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回美竞选总统，美国驻意大利司令官马克·克拉克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李奇微离任时，让美方代表于4月28日抛出一个所谓“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方案。即：美方撤回对朝中方面修建机场的无理限制，但仍坚持在中立国提名的主张，坚持只遣返70000名朝中战俘。

针对美方“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方案，5月2日，我方提出如下建议：

- 一、中立国提名，同意只提双方已同意之四国，即波兰、捷克、瑞典、瑞士。
- 二、停战后，双方修建机场不受限制。
- 三、战俘问题，照我3月27日所提调整方案解决。

两个方案一对照，中立国提名和限修机场问题已取得一致，但遣返战俘问题，则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美方的顽固无理态度，使得谈判形成最后的僵局。

5月8日，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在代表团全体大会上的发言说：

我再次指出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断然拒绝你方4月28日的方案。你方企图扣留10万以上我方被俘人员的片面无理的主张是我方绝对不能考虑的。我方在5月2日的全面方案是解决所有未决问题的唯一的合理折中方案。我方在战俘问

题上，已经做了一切可能的让步。在3月21日和27日提出了完全合理折中的遣俘原则和调整方案。我方在5月2日方案中，更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作了重大的让步。你方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拒绝我方5月2日的合理折中方案。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全体实行所谓“自愿遣返”，企图扣留10万以上我方被俘人员的主张，违反了一切国际公约，彻头彻尾地破坏了《日内瓦公约》的明确规定。谁都知道你方战俘营中根本没有任何自由。你方在我方被俘人员中所进行的所谓“甄别”根本是荒谬的。你方所声称的所谓“甄别”结果是完全无效的。你方所提出在停战协定签字后对所谓你方“甄别”结果进行实地调查的办法是双重荒谬的。你方在应该完全清楚地了解到我方根本反对你方这种建议时提出这种建议，除了欺骗人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目的。在战俘问题上，自从去年12月11日以来，你方未作丝毫让步。不仅如此，在你方明白表示愿在我方3月21日原则轮廓内解决问题之后，反而倒退地提出你方在战俘问题上的无理方案。这除了证明你方毫不关心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的利益，证明你方还无意于达成停战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释。你方在我方被俘人员进行威胁策动，企图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的勾当，无须进行任何调查，已经是人所共晓的事实。你方自己的新闻报道公开承认你方利用蒋介石匪帮和使用李承晚特务在我方被俘人员进行强迫刺字，强迫请愿等的罪恶行为。你方自己的新闻报道公开承认，你方不惜采取成批屠杀的手段，企图强使我方被俘人员接受你方的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要求归返家园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在他们对于你方的一切威胁策动的英勇的反抗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表现。而你方对于历次的屠杀案件至今还没有任何负责的交代。你方还有什么资格提出所谓“甄别”的结果？你方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你在停战

后进行调查？全世界人民已经识破了这种欺骗伎俩。释放并遣返全部战俘返家园是《日内瓦公约》的明确规定，是一切国际公法所规定的，不容逃避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你方还有意达成停战协议，你方就必须撤回你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片面无理的主张。

## 周恩来领导发动舆论攻势

周恩来看完李克农发来的朝鲜停战谈判最新的情况电报，东方已经破晓，太阳就要喷薄而出，红艳艳的一大片。他伸了一个懒腰，信步走出办公室，来到西花厅院内的花园，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一股芳香沁入他的心肺。他抬头观看，只见桃花李花已经开过了，开始凋谢，海棠、玫瑰、月季正在盛开，花红叶茂，满院春色。他平素最喜欢海棠花，便首先走近几株海棠树边，猫着腰，两只大眼紧紧盯着它们，只见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朵，乃是一团团红红的，像是火球一般；那些正在开放的花朵，已经由深红色变为淡红色了，大而又香。他一朵朵地看，用鼻子嗅嗅它的香味，有时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一下，害怕会碰坏它。他一株一株看完了海棠之后，又走到那些低矮直立的玫瑰花和月季花前，在那些开着紫、红、黄、白五颜六色的花丛中，轻移脚步，欣赏这些美丽可爱的鲜花。从外表上看，仿佛他饶有兴致，似乎也很轻松、愉快。其实，他的脑子里还是一刻不停地想着国家的大事，经济建设，朝鲜战争和谈判。

他想，朝鲜局势已基本稳定在三八线上了，双方都处在胶着状态，要向前推进都很困难，小打不断，中打还会有，大打几乎不大可能了，美国没有这种力量，它的盟国不愿意。我们方面，从朝鲜

战争一开始就主张和平解决。谈判肯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是积极主动的，争取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但美国是被迫接受和谈的，不太积极，还不断给谈判设置障碍，因此，可能要再拖一段时间。国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也已接近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提到日程上来了，他前几天已让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制定方案，并准备向苏联提出援助我国建设的项目。他想得很多，很远，很深。最后他还是回到李克农昨天发来的电报上，反复想着、思考着美国为什么在战俘问题上态度如此顽固、僵硬？是它想多扣留我们的战俘？是不愿意停战而要利用朝鲜战争来扩大军备，刺激军火生产，为垄断资本家谋取更大的利润？还是它不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失败，要再打几仗，用军事上的胜利压我在谈判桌上让步？他想这些因素都存在，都起作用。

他想为了打破美国的这些幻想和阴谋诡计，必须三管齐下：即外交谈判，舆论攻势，军事斗争，迫使美国尽早接受停战。

于是，周恩来让秘书通知外交部副部长、亚洲司、美澳司、苏欧司、情报司和新华社、《人民日报》有关同志上午8时半到国务院办公厅开会。他吃完早饭，没有休息，批了几个文件，便来主持开会了。他说，现在要想打破在战俘问题上的僵局，仅靠在谈判桌上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加强舆论攻势，公开揭露美方的阴谋和态度，让人们都知道，以动员世界的舆论，对美国施加压力。与会的同志有互报情况的，有分析形势的，有提出方案对策的，广泛而又深入地进行讨论，最后决定由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向新闻界公布双方就战俘问题谈判的真相，《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行评论。

午饭后，周恩来只休息了两个小时，又召集正在北京的彭德怀、邓华和代总长聂荣臻及总参谋部的有关人员开会。周恩来在分析了朝鲜战场形势后说，根据近一年朝鲜谈判的经验和规律来

看，凡当谈判出现僵局，即美国在军事上对我发动进攻或将要发动进攻；凡是当它军事上失败以后，谈判便又重新开始或可取得进展。现在关于第四项谈判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又出现了僵局，很可能美国又在军事上对我发动进攻。美国新任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他是新官上任要露一手的，定会搞点新花样。所以，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志愿军高度警惕，美国是不甘心在军事上失败的。彭德怀发言说：“我完全同意总理的分析和意见，对美帝国主义必须要再狠狠地教训，它才会舒服，才会老实，谈判才会有进展，遣俘的僵局才能打破。现在陈赓同志的身体不太好，我提议邓华尽快回朝鲜前线，加紧准备，特别是要把坑道搞好，迎接敌人发动新的军事攻势。”邓华表示，请总理、彭老总放心，我们有信心对付敌人无论是陆上、空中、海里的一切进攻，我将尽早办完在国内事情，返回前线。

5月8日，朝中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公布了关于战俘问题的我方原则和方案以及对方对我方所提原则的表示。全文如下：

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奉命公布关于战俘问题的我方原则和方案三件及对方对我方原则的表示三件如下：

一、3月21日第四项议程参谋会上我方所提遣俘原则条文。

二、3月27日第四项议程参谋会上我方所提遣俘调整原则的谅解原文。

三、3月25日对方对我方3月21日遣俘原则的表示。

四、4月1日对方对我方3月21日遣俘原则的表示。

五、5月2日我方在双方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原文。

(一)3月21日第四项议程参谋会上,我方所提遣俘原则条文:“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的11559名全部战俘,联合国军方面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的132474名全部战俘。上述战俘名单由参谋人员予以最后校正。”

(二)3月27日在第四项议程参谋会上我方所提遣返调整原则的谅解原文:“为了迅速解决第四项议程,早日实现朝鲜停战,我方现在愿作再一的努力,提出在我方3月21日提案总的原则规定下的关于具体规定遣返的调整原则的谅解如下:

(1)所有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收容的非朝鲜籍的联合国军战俘和所有原居住于你方地区的朝鲜战俘应予全部遣返,所有联合国军所收容的非朝鲜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和所有原居住于我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应予全部遣返。

(2)所有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收容的原居住于我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及所有联合国军所收容的原居住于你方地区的朝鲜籍战俘,除愿返回其原住地区者可不予遣返外,应予遣返。”

(三)3月25日对方对我方3月21日遣俘原则的表示:“3月21日的提案经过这一适当调整,很可能构成这种解决方案的适宜的基础。”

(四)4月1日对方对我方3月21日遣俘原则中“联合国军方面释放并遣返其所收容的132474名全部战俘”一句的表示:“我们认为132000是没有把一切有关因素都考虑在内,因此,似乎是一个太高的数字,我们指出过,可能116000能更近似地表示出交换数量的大小。”

(五)5月2日我方在双方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上提出的

关于三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原文：“为了早日实现朝鲜的停战，满足世界千万爱好和平人民的初步愿望，我方愿在你方接受我方对战俘问题的合理折中的解决方案，并放弃你方限制朝鲜境内机场设备的干涉我方内政的要求的条件下，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考虑接受你方提出的以四个中立国家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方案。我必须明白无误地指出，我方提出的方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的让步，是以你方放弃限制机场的无理要求，并在战俘问题上同意我方的折中方案为其不可缺的前提的。”

第二天，1952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美国强迫扣留战俘》。

社论说：

朝中代表团在5月2日就已经提出了解决谈判中所剩下来的三个问题即中立国提名问题、限制修建机场问题和战俘问题的整套方案。我方在中立国提名问题上同意美方所提双方各提两个中立国家的办法，而美方必须在机场问题上同意我方主张，取消双方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并在战俘问题上，同意在我方3月27日所提折中方案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现在就是美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机场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而表示要取消对修建机场的限制了，因此，中立国提名问题与机场问题基本上已经不成问题。在今天，唯一障碍停战谈判使之不能达成协议，唯一阻挠世界人民对朝鲜和平的热烈愿望使之不能实现的问题，就是美国侵略者自始至终坚持主张的强迫扣留（即所谓“自愿遣返”）战俘的问题。



### 社论驳斥美方的论点：

美国侵略者深知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已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处于对立的地位。因此，美国侵略军统帅李奇微急忙于5月7日发表声明，把强迫扣留战俘问题用单纯的数字，即所谓美方遣返70000名我方被俘人员来交换我方遣返12000名对方被俘人员的说法来加以混淆。同时他并狡恶地说什么在停战以后，可以由国际机构访问在他们血手控制下的“反对遣返”的战俘，似乎这些被访问的人将在敌人的控制下，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李奇微更把他们这种卑鄙残暴的强迫扣留说成是什么“人道的立场”，好像这是为了“保护”战俘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综合这些无耻的欺骗说法，李奇微显然是要把他们自己说成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已经作了很大的让步，而我方并未作任何让步，因而他宣称“不会再退让一步”，以便造成其破坏停战谈判的根据，来继续延长朝鲜战争，并维持美国所急需的国际紧张局势。但是战俘问题开始谈判以来5个月的事实，却正在响亮地打着李奇微的嘴巴。事实证明，在遣俘问题上只有我方才真正作了实质上的让步，完全没有作过丝毫让步的正是美方。

### 社论指出：

自去年12月遣返战俘问题谈判一开始，我方就根据战俘自然的愿望和《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提出了全部遣返战俘的主张。而美方则一开始就蓄意背弃《日内瓦公约》，提出了实际是强迫扣留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的主张。在去年12月18日美方提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我方17万以上的战俘人员

竟只有 132000 余人的名字在内，这显然是敌人有意要扣下我方 4 万余人。我方为了解决问题，使停战谈判得以早日达成，来实现世界人民对朝鲜和平的迫切愿望，乃于今年 3 月 21 日提出遣俘原则，以双方在 1951 年 12 月 18 日提出的战俘名单的总数为根据，进行校正的工作。这一主张显然是我方的让步，因为在这个原则之下，美方就可以按其 12 月 18 日所交的 132000 余人的名单为根据而不以美方曾经承认的 17 万多人为根据进行校正。到 3 月 27 日，为了进一步照顾战俘能够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愿望，我方又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规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和联合国军战俘必须全部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和南朝鲜军队战俘凡原籍或家庭在其本方军队控制地区内者亦必须全部遣返，而双方朝鲜战俘之原籍或家庭在收容一方地区内者，如本人要求回家过和平生活，可以不必遣返。人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方在这个问题上，又做了一次让步，即不但照顾到了可能愿意留在家乡的战俘，并且照顾到了所有战俘和所有战俘的家属们要求一家团聚重度和平生活的愿望。这是一个完全合情合理的折中方案。我方这些让步，难道是美国侵略者所看不见的吗？不是的，美方在 3 月 25 日的会议中，曾经表示：“3 月 21 日的提案，经过适当调整，很可能构成这种解决方案的适宜的基础。”美方还曾在 4 月 1 日的会议中，表示要对方遣返 132000 人的数目太高了，116000 人的数目可能更近于要交换的数字。但在经过校正双方战俘名单的工作进行之后，美方的态度突然从其在 3 月 15 日和 4 月 1 日所表现的立场上缩回去，显出其一贯的反复无常的面目，竟于 4 月 19 日向我方提出了要扣留我方 10 万被俘人员而遣回 7 万被俘人员的可耻数字。与此相反，我方在 4 月 19 日所提出的 12000 人的数字，则是在 12 月 18 日所提出的名单中加上了新俘获的完全数字，

## 大外交家周恩来

并不也就是我方俘虏营中所有应予全部遣返的战俘数目。

日社论列举事实批驳所谓“战俘反对遣返”的谎言：

美国侵略者说他们站在人道立场，不能遣返全部战俘，因战俘为战俘自己不愿遣返，他们必须保护这些战俘。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不愿遣返的血淋淋的事实吧。根据美国空降特务众口一词索回的供状，美国侵略者是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制造这些事实的。他们人们违反《日内瓦公约》，任意把许多李承晚特务甚至与朝鲜战争完全无关的台湾蒋介石特务安置在俘虏联队中的负责地位，命令他们对战俘强迫刺字并强代战俘写血书。凡是拒绝这样做的战俘，就被特务们加以集体殴打，甚至在人已经被打伤打昏之后，特务们就在他们的身上刺字，或拉着他们的手指蘸血去打脚趾指印。有的特务甚至用自己的手指蘸着受伤者的血去盖假的指印。这些令人发指的事实，从什么地方显出美方的俘虏营中有丝毫“自愿”的痕迹？在那里，除了惨无人道的虐待、迫害和侮辱之外，哪里有人道的影子？美国侵略军根据这种所谓“人道”来制造的所谓“战俘反对遣返”，以及根据这种所谓“战俘反对遣返”而实施的强迫扣留战俘，是完全违反世界人类正义原则、破坏国际基本公约的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绝对不要干能容忍。

日社论进一步说：把战俘放在这样地狱般的控制之下，李奇微及杜鲁门之流，还居然敢于声称可以由什么国际机构去访问战俘是否要求遣返。试问特务的刺刀以及其他无数暗藏的虐待、迫害和威胁将

如何能容许战俘有自由意志的表现？假如不是美帝国主义者所豢养的所谓“国际机构”，有何具有自尊心和正义感的国际机构会愿意去忍受美帝国主义者的这种玩弄和侮辱？

社论最后强调说：

从李奇微的声明来看整个战俘遣返谈判问题，我们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美帝国主义者不是没有看到我方折中方案的合情合理，更绝对谈不到什么人道立场，而是为着他们有不可告人的隐衷、需要，甚至不惜破裂朝鲜停战谈判，以继续并扩大国际的紧张局势，因之故意在停战谈判下的唯一问题上，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使可以达成协议的朝鲜停战谈判又复陷入紧张状态。可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这种诡计阴谋做斗争已经有了长期丰富经验的中朝人民，是绝不会为美帝国主义者所制造的任何紧张状态所吓倒的。我们要明告美国侵略者，你们的恫吓讹诈，正如在战场上一样，决收不到任何效果，而且只会使我们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强，来为彻底反对你们的可耻阴谋而加紧奋斗，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这篇洋洋洒洒的社论，是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和审定的，它既摆事实讲道理，人情入理，又言辞尖锐、有力，淋漓尽致地批判了美国在遣返战俘问题上蛮横无理的立场，非常有说服力，很能打动人们的心灵。

接着，新华社、《人民日报》分别以报道和文章揭露美国遣返战俘的阴谋，残酷迫害在巨济岛的战俘的具体事实。美国被俘人员伊奈克、奎恩供认美国进行细菌战和谴责美国在战俘问题上的错误立场。

5月9日，在巨济岛的中朝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并向战俘营的总管杜德准将提出四项条件：

- 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 二、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
- 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 四、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5月10日，由接任杜德的战俘营总管和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

- 一、关于你方信中的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俘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 二、关于第二项，北韓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 三、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 四、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韓

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

这是我战俘斗争的一个胜利。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于5月16日、25日发表谈话，指责美方多次屠杀在巨济岛、釜山的朝中被俘人员，伤亡391名。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3月29日被我军捕获的美方特务王家悌供述美国侵略者在巨济岛俘虏营中制造所谓“自愿遣返”的罪行称，自上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为强迫扣留我方大批战俘，曾从台湾调来蒋介石特务100多人，在巨济岛俘虏营中充任“教官”和其他职务，在美国驻巨济岛的特务外号叫“麻脸上尉”的指挥下，强迫朝中被俘人员在所谓“自愿遣返”的“请愿书”上签字、按血指印并刺字。美国侵略军总司令李奇微，曾亲自到巨济岛视察战俘营，为了向李奇微报功，特务们赶制要求“自愿遣返”和“请愿书”名册，全部由蒋介石特务代按血指印，于当日下午2时交给了李奇微。这就是所谓“自愿遣返”的真相，也是所谓“甄别”的真相。

在英国，5月25日，有25位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丈夫。在我方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几乎一致签名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一封请愿书，要求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朝战俘，并且告诉这位将军，美国人虽然接二连三地杀害中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对他们作任何报复。为此，英国政府强烈要求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名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成千上万的人纷纷签名请愿，写公开信给杜鲁门、艾奇逊。其中有一封信

写道：

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立即采取行动，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

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美国一些报刊也相继发表评论，分析美国利用战俘问题拖延谈判的原因。早在1952年3月《美国》周刊说：“朝鲜就是加速我们自己军备和促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更多生气的刺激物。”5月8日，《纽约邮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12日，纽约《指南针日报》通讯指出：“美国对于休战的后果感到踌躇不决，因为，这意味着扩军的松弛以及已经鼓吹起来的紧急状态的总的松弛。”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令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在谈判桌上，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和第四项议程谈判代表金元武少将同美方新换的首席代表哈里逊少将、李比少将继续就遣俘问题进行谈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方常常在我方一连串的责问下，低下头去，无言以对，硬着头皮“顶着”，或者赶快建议休息，夹着皮包溜之乎也。板门店的谈判冷冷清清。

## 克拉克上场战火再燃

李奇微在离任前夕，于1952年3月1日致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封冗长的电报中把今后剩下的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作了一番概括：

以大规模消灭敌方人员和物资为目标的在朝鲜一场重大地面攻势，将带来敌军进行反攻的严重风险，这一反攻可能会给我方部队造成重大的物资和人员的损失。

即使我方行动成功，而且敌方的反攻（如果能发起的话）遭到失败，这些行动仍将需要美国付出重大战斗伤亡。

动用所有……现有力量来实现这一努力，即使行动大告成功，也不过只能给共产党部队造成痛击……并不能造成决定性的军事失败。

在没有大量有组织的增援的情况下，一场重大的地面攻势所提供的成功机会过于渺茫，不足以证明它是可行的。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李奇微的看法。

克拉克接替李奇微之后，他认为朝鲜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了，要改变这种态势，美国政府不增派陆海空部队，不采取攻势，不轰炸中国东北的重要目标，那么“用任何方法向鸭绿江推进都要遭遇惨重损失”。可是他也知道，再增派任何兵力都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捉襟见肘。于是他向华盛顿建议：“增强李承晚的军队”，“使用蒋介石的力量”；调其两个师到朝鲜作战以及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和五角大楼研究，只同意增强李承晚的部队，其他均不能同意。



可是，克拉克新官上任，总想搞点什么名堂出来，打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和会场上的僵持局面，希望打到一条能向中共施加“压力”而赢得“光荣”停战的途径。于是他同他的参谋班子朝思暮想，策划来策划去，提出了一个“克拉克的八点行动计划”：

轰炸水丰满发电站；

轰炸平壤；

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

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标；

“释放”“反共”战俘；

中断谈判；

增强李承晚军；

施放调用蒋军计划的烟幕。

1952年6月23日，美国空军以590余架次轰炸了中朝边境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发电设备。

水丰电站，为中朝国际电站，位于朝鲜平安北道朔州郡水丰区，中国辽宁省宽甸县拉古哨村。1937年动工兴建，1941年开始发电，到1943年大坝建成，安装了6台发电机和7台水轮机。在日本投降时和朝鲜祖国解放战争时就受到过严重的破坏。

1952年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平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位于大同江下游，距河口约100公里。历史悠久，公元427年高句丽从开城迁都于此。因其地处大同江冲积平原上，在这多山的国度里，这一片平原沃壤深受重视，故得名平壤。从美国侵朝以来，美国飞机就一直把平壤当作重要的轰炸目标，狂轰滥炸已成“家常便饭”，学校、医院、居民住宅早已荡然无存，北朝鲜的所有城镇、农村几乎无一幸免，

无数妇孺、儿童死于非命，克拉克轰炸平壤、朝鲜大大小小的目标的计划，无非是在炸弹坑上再倾一批钢铁就是了。

美机还轰炸扫射了设在昌城、江东、墨岷里的战俘营，炸死炸伤数十名被俘的美李军人员。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前线指挥部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方针，我地面高射炮部队采用游击战的方式，机动作战，不让敌人摸到规律，组织若干高射炮集群重点打击敌机。空军也积极参战，英勇出击，战斗英雄张积慧，在僚机单子玉的紧密配合下，将美空军飞机击落 21 架，其中将号称“空中霸王”的中队长戴维斯及其僚机击落，在美国国内及军队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这时，克拉克见空袭计划不成，又想在地面上发动进攻，他在第一线集结了 15 个师，第二线 3 个师。

我军也集中了 10 个军和人民军 3 个军团。其中一线展开 7 个军和人民军两个军团，二线 3 个军和人民军 1 个军团，用来对付敌人为了适应其政治需要和配合谈判的需要而再度向我军发动军事进攻的可能，更是为了对付敌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从延安半岛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我军为了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局部进攻，进一步取得阵地战的经验，决定在敌人向我发起进攻之前向敌人发起战术性的反击作战。

朝鲜又将燃起硝烟弥漫的战火。

## 十、率团访苏与中苏朝蜜月期

周恩来对什么工作都抓得很紧，对外交抓得更紧。他在外交部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就说过：“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打回来。”外交工作“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他不但自己谨守这些原则，身体力行，堪为模范，以自己的榜样教育大家，而且谆谆告诫外交工作者，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严肃认真。

他觉得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已经进行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外交斗争极其复杂尖锐，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比较成功，收效很大。贯彻执行了“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或称外交方针。有的使馆做得好，有的使馆还说得过去，也有的使馆差些，出点小毛病。使节们大多数是从军队和地方调来的，第一次搞外交工作，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因此，他向外交部提议，召开一次使节会议，请大使或参赞回国开会。

1952年4月，外交部召开第一次使节会议，几十位驻外大使、参赞，外交部司局长，二秘以上的大使、夫人都参加了会议。4月30日开幕那天，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首先讲话。他进一步阐

述了他的外交思想和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并实际上总结了两年多来外交工作的经验。

## 总结两年来外交经验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对外政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的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1949年党的建立28周年纪念日，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了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我们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略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想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

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是当前的目标是进出口平衡，现在我们搞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接着，周恩来以钢钟似的洪亮的声音和充满哲理的思想论述了“外交阵线”问题。他说：

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

他在谈到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时说：

在建国开始时，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和友是一方

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苏联争取瑞典保持中立，这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利的。假如那时挪威也被争取保持中立，对苏联会更有利，对欧洲的形势会更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对敌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15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值得怀疑的。敢于坚决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

同我们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

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们闹翻，就悬在那里。

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它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

同我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沉默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

来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现在还有人说它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有时是美帝国主义，有时是日本政府。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

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周恩来十分辩证地科学地概括了“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他说：“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然后他根据实际的情况和针对一些同志的思想和认识，概括为7个问题。即：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民族主义了。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制造大国的“世界主义”。



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

(三) 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外交工作中不允许有个人打算，不要因为人家一说好就沾沾自喜，应该想这是人民的光荣；如果人家说坏，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错了，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 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是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五) 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

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 要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

(七) 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周恩来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会议根据他的讲话，进行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他的讲话非常切合实际，切合我们的思想，切合我们的工作，表明他十分熟悉和了解驻外使馆情况，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问题并做了明确具体的指示。他站得高看得远，又生动又深刻，把两年多来的外交实践，总结、升华了一步，使大家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今后的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的确，周恩来这次讲话，不但从理论上、思想上、政策上进一步论述了新中国外交的内涵、特性，而且为树立新中国外交人员的思想品格、工作作风奠定了基础。从此逐步形成一套新中国的外交风格和特色，培养了一批新中国的外交战士，保证了我国外交战线上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会后，周恩来又找大使们谈话，再次强调外交工作授权有限，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多请示汇报，可以避免少犯或不犯错误。着重讲了国际形势、朝鲜战争、朝鲜谈判，指出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中央已考虑要把工作重点转入到经济建设上来，准备搞第一个五年计划。

不发展经济，不能增强国力，也不能加强国防，应付更大的战争，更谈不上提高人民的生活了。你们当大使的也要考虑这个问题，研究驻在国的经济情况，提出报告，供国内参考。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你们在国外也好工作，说话硬气。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也是外交的基础。

周恩来听说，有的大使和外交官的夫人，不愿当夫人，也不愿做夫人的工作，他虽然也做了一些说服教育工作，但总觉得不如女同志做起来方便。于是他让他的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出来找夫人们座谈。邓颖超认为使节夫人对外很重要，是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妇联的工作范围内重要的一部分。她记得在第一批大使出国时，她也同一些夫人座谈过，解决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和工作问题，起了一定作用。这次她也就当仁不让了。

一天，邓颖超召集回国参加使节会议的大使、参赞夫人，和外交部龚澎姊妹等一部分女同志座谈。她说，恩来要我请大家来聊聊天。听说你们在国外工作得不错，帮助丈夫办了不少事，有的是对外的事，我很高兴，说明我们女同志在国外也是有用武之地的嘛，说明我们女同志也是挺能干的，有人才的嘛。当然啦，我也听说，也还有少数女同志不愿做夫人，也不愿做夫人工作。前两年，你们出国时，我在学习班讲过一次，说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男同志女同志都是外交战士，男女同工同酬，男同志能当外交官，女同志也能当外交官，男同志按职务级别拿工资，女同志也按职务级别拿工资，都要安心工作安心学习，熟悉外交业务。但是，使馆毕竟不同国内，它的业务活动范围有限制，人员和外交官有限制，女同志特别是不懂外文的女同志工作不太好安排。有的女同志虽然安排了外交官，但不能对外，对外仍然是夫人。有的女同志连对内的名义也没有，就是一般工作人员，就是夫人。怎么办？这是工作需要，

就得服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把现有工作做好，把夫人工作做好，配合丈夫的工作。在国外，夫人的地位很高，因为是夫人，人家以为枕头边的话可以影响丈夫，愿意同你接近，有什么话愿意同你讲，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千万不要小看夫人的工作啊！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时，有时人家不叫我邓颖超的名字，而叫我周太太，因为我是周恩来的夫人嘛。

她笑着说，对这个称呼，开始时也不习惯，还闹过笑话。有一次，人家来电话找周太太。我当时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回答说我们这儿没有周太太，放下电话一想，他找谁呀？后来人家又来电话，才酌情过来，原来找的就是自己。我在中共代表团工作时，在内部也兼做过会计、抄写、刻蜡版，学了一些技术，这对党有利，对自己也有利嘛！国外环境特殊，人手少，什么工作都要做，多学点本领有什么不好呢？有时间学点外文，特别是学点驻在国语言，同外国人交谈就方便多了，同时对驻在国也是尊重嘛，何乐而不为呢？

邓颖超的一席话，使许多女同志茅塞顿开，打开了思路，对安定女同志情绪、安定使馆和夫人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周恩来从新中国建立那天起就认为确定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尽管他的工作很多，很忙，一会儿军事，一会儿外交，一会儿文教，一会儿经济，像弹钢琴一样节奏分明、和谐，但节奏的最强音始终是经济。他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军事、外交、文教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共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各部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早在1952年4月初步作出各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或轮廓框架。到8月，这些材料已汇编成两大册了。然后，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其内容：一、中国经济概况；二、五年建设方针；三、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

四、长期建设的主要工作；五、请苏联援助事项。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今后的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它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 “一边倒”再组团访苏

那个时候，新中国成立才两年多，没有制订五年计划的经验，必须求教于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唯一能给我们提供援助的，也只有苏联。美国正同我们在朝鲜较量，西方国家大都跟着美国走，对我采取敌视态度，实行封锁禁运，谈不上给我们提供援助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虽然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就决定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努力发明创造，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排除外援，而要取得外界的援助、支持，只有苏联这个对象，因此，那时无论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来说，只有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也必须同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而那时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虽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 and 行动，但基本上还是国际主义的，对战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仍是采取支持、帮助的立场，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提出“一边倒”的政策，即倒向苏联、依靠苏联、同苏联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美帝国主义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经济建设方面，有必要就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问题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于是中国政府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当仁不让是国家的总管家，既有组织领导才能，又有多方面知识、经验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了。代表团成员为政务院副总理、中国著名的经济专家陈云，政务

院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粟裕。代表团顾问为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宋劭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炮兵副司令员邱创成，一机部副部长汪道涵，邮电部副部长王诤，外交部政治秘书师哲，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和亚洲司司长陈家康等共60人。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离京，17日飞抵莫斯科，受到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康米金、维辛斯基等人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的三年时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又由于苏联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援助，曾经不断地克服国内外的种种困难，业已在国家建设的各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加重语气强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

苏联安排周恩来、陈云住在郊区国宾别墅，李富春率代表团其他成员住在城内苏维埃大旅馆。8月20日，莫斯科天气晴好，不冷不热，可以说是最好的季节，克里姆林宫一派繁忙的情景，上班的、游览的，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今天不同的是斯大林办公室小会客厅布置得十分整齐清洁、庄严肃静，会议桌上已放了中国国旗和苏联国旗。

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已提前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长费德林和礼宾司的干部站在斯大林办公室的外面等候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到来。

一会儿，身着黑色中山装的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迈着矫健的步伐，神采奕奕地走

来。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走出办公室，站到小会议厅门前迎候。

斯大林见到周恩来进来，上前一步，握住周恩来的手，说：“你好，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也说：“斯大林同志你好！”斯大林又说：“我们有一年多未见了，我老了，快见马克思了，你还是那样年富力强，春风满面。”周恩来又说：“我们希望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为世界共产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斯大林同中国代表团一一握手，周恩来等也同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费德林一一握手。

之后，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让周恩来坐在左边的客位主宾位上，陈云坐在周恩来的左边，师哲翻译坐在周恩来的右边，依次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分坐周恩来的左右边。斯大林坐在右边的主人位置上，两边为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担任翻译的费德林。

斯大林说：“我代表苏联政府热烈欢迎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先请转达我对毛泽东同志问好，他的身体好吗，我非常关心他，又是国内各方面的建设和工作，又是朝鲜战争，太劳累了，希望他注意保重。”

“谢谢，斯大林同志，我一定转达。他的身体很好，毛泽东同志也要我转达他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他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我们的帮助还很不够，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朝鲜战争，你们打得很不错，谈得也好，顶住美国巨大的压力。全世界人民都称赞你们，你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影响扩大了。”斯大林停顿一下又说，“按照我们的习惯，是先请客人讲话。”斯大林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抿了一口苏联的红茶。这种茶是煮熟了以后再加糖，喝起来又香又甜，但不如周恩来喜欢喝的中国绿茶芬芳滋润，浓郁可

口。他扫视一下全场，挥洒自如地运用中国普通话而又带有苏北乡音侃侃而谈。

他说：“我奉我党中央、我国政府和毛泽东同志之命，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同志、苏联党、政府商谈朝鲜战争、第一个五年计划及旅顺、中长铁路等问题。首先谈谈朝鲜战争和朝鲜谈判问题。”

## 话题围绕朝鲜战争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朝鲜人民军经过七个半月的并肩作战，取得了五次战役的伟大胜利，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美国侵略军在这七个半月里中死伤达10万人左右，约近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头一年中陆海空军损失人数的两倍。因此，美国共和党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把美军的失败叫作‘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发动侵朝战争的战争贩子麦克阿瑟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都不得不承认他们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麦克阿瑟承认：‘我们并没有使他们遭受致命的损害，而我们自己却在遭受重大的损失。美国人流的血越来越多了。’布莱德雷在广播中也公开承认：‘朝鲜战争是美国所进行的一次代价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魏德迈更绝望地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与此同时，世界人民，也包括美国人民，反对侵略、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以及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由于失败而引起慌乱、矛盾与日益激烈的争吵，都使美国侵略者十分狼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被迫接受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建议，与我方举行停战谈判。”

“但是，美国侵略者又极端害怕和平。从谈判一开始，就采取



节外生枝的拖延办法，仅仅议程问题，经过 17 天的时间才取得协议。美方在讨论这一问题中的主要阴谋，是拒绝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列入议程，企图使美军长期盘踞在朝鲜的领土上。结果，美方并未能达到目的。美方最后不得不同意在议程中规定第五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对方对第五项议程明确达成了谅解，将撤军问题及其他问题，留待双方各国高一级的政治会议来讨论和解决。”

周恩来端起苏制的高级的下半部带钢套的茶杯，抿了一口红茶，扫视一下对面的主人们，他见斯大林、莫洛托夫等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听着，莫洛托夫还在一沓纸上记了不少，而斯大林拿着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着什么。

周恩来说：“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问题（第二项议程）的讨论，前后经过 4 个月才获得协议。美方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在会议桌上强占朝鲜北部 1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为了拖延谈判并达到强占土地的目的，曾对开城中立区和会址采取各种疯狂的挑衅行动，迫使谈判停顿了 63 天，并在谈判期间发动了疯狂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但是，经过我方的努力，解除了美方的借口，粉碎了美方各种挑衅的阴谋和疯狂的进攻，第二项议程终于在 1951 年 11 月 23 日获得了协议，确定以双方实际战斗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地区。美方企图掠夺土地的诡计又失败了。”

“用中国的话说，叫不打不成交嘛！”莫洛托夫插话。斯大林、维辛斯基也连连点头，会场显得活跃。

周恩来说：“关于停战监督问题（第三项议程）的讨论，曾经拖延了 5 个月没有进展。美方在这一问题讨论中的主要阴谋，是妄图干涉朝鲜内政，要求限制朝鲜北部飞机场的修复和建筑。经过 5 个月的激烈斗争，美方终于不得不在 4 月 28 日放弃了这一无理要

求。美方并且曾无理反对方提名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我方在5月2日提出：在美方接受我方对俘虏问题的合理方案，并放弃干涉我方内政的条件下，可以同意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由六国减为四国。这样，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借口又被解除了。

在讨论第三、第四项议程的同时，也讨论了第五项议程。美方竟又企图推翻第五项议程，企图否定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分派代表举行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等问题。前后将近半个月的时间，美方终于不得不在2月17日接受我方的修正草案作为原则解决的方案。”

周恩来停顿一下，说：“关于俘虏问题（第四项议程）的讨论，从去年12月开始到现在已经7个月了，但至今仍无结果。美方的阴谋是：企图以扣留我方10万战俘的无理要求来拖延和破坏谈判。美方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对我方被俘人员大肆屠杀，进行所谓‘甄别’，企图强迫他们充当李承晚、蒋介石的炮灰。美方的无理主张，是完全违反《日内瓦国际公约》的。而巨济岛等地我方被俘人员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抗，更揭穿了美国侵略者的欺骗宣传，因此，美方代表理屈词穷，只能连续逃会，三番四次地片面停会三天，充分表明了美方阴谋的彻底破产。”

周恩来强调说：“在一年的谈判期间，美国侵略者为了拖延和破坏谈判的进行，用尽了种种可耻的无赖手段。美方从空中和地面对中立区、会址和我方代表团车辆进行疯狂的袭击，从挑衅威胁直到谋杀我方军事警察和代表团人员的重要事件共达20次以上。在一年谈判期间由于美方的拖延破坏，会议被迫停顿的时间共达80天之久。至于美方代表制造各种借口，进行反复的无理狡辩、抵赖，或者由于理屈词穷，一天只开几分钟会议就散会的情形，更占一年谈判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发展到最后，美方代表竟在庄严的谈

判桌上打瞌睡，吹口哨，甚至自动逃离会场。”

“这是耍赖！”斯大林说。

“在外交史上也少见！”莫洛托夫说。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周恩来继续说，“美国侵略者还极尽欺骗之能事，一贯进行歪曲、欺骗宣传。例如，明明是美方代表在会内提出了要侵占北朝鲜 12000 平方公里土地的要求，他们在会外却矢口否认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明明是美机轰炸了中立区和会址区我方代表团的住所附近，美方却说炸弹是我方自己丢的；明明是美方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美方却说是我方被俘人员‘自相残杀’。但是，由于我方坚决揭露的结果，美方不但没有达到任何目的，反而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的无耻面目。”

“对，对美帝国主义就是要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斯大林说。

“美国侵略军为了配合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的阴谋活动，一年来曾不断疯狂地发动进攻，施行所谓军事压力。”周恩来说，“但是，朝中人民不仅在会议桌上使敌人陷于政治破产，而且在战场上也使敌人遭受了更惨重的失败。从 1951 年 6 月到 10 月，敌军接连发动了所谓‘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重点进攻，总计使用了 30 万人的庞大兵力，几乎出动了侵朝美军所有的战车和炮群，并有大量飞机配合作战。在这些进攻遭受了粉碎性的打击之后，敌军一方面继续进行不间断的小股窜犯，一方面用空军进行所谓‘绞杀战’和‘重点突击战’。但是一年以来，朝中人民不仅壮大了自己的地面部队，建立了强大的炮兵部队，而且也开始建立一支勇敢而优秀的空军。朝中人民部队在地面和空中都取得了十分伟大的胜利。从 1951 年 6 月 26 日到 1952 年 6 月 15 日的 11 个多月中，朝中人民部队共歼灭敌军 325000 多名，其中美国侵略军占 129900 多名，并击落击伤敌军飞机 5900 多架，击毁击伤敌军战车和装甲车

900多辆。”

“朝中两国人民在两年反侵略战争特别是一年来的停战谈判期间所得到的辉煌胜利，不仅严重地打击了它侵略的气焰，而且打乱了它侵略世界战争的时间表，鼓舞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坚定并增加了世界人民对于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信心。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估计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周恩来郑重地说：“前面我已经说了，在这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以及一年的谈判斗争中，我们始终得到苏联、斯大林同志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的巨大支持和帮助，我再一次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和你、周恩来同志及党中央的领导下，派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在彭德怀将军的统率下，奔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并且在军事上、外交谈判中已经取得辉煌的、空前的胜利，挫败了美国的侵略企图。你们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令人钦佩和敬仰，全世界人民、包括苏联人民将永远感谢你们，记住你们为了和平、正义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斯大林看看莫洛托夫又看看维辛斯基，似乎在征求他们的意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斯大林的意见。

斯大林又说道：“周恩来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当然可以，斯大林同志！”

“我想问，美国为什么不愿和谈尽早解决朝鲜问题呢？”

“我正想谈这个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中央政治局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认为：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利用了侵略战争来增加他们的军火生产的利润。他们在1950年度获得空前巨大的224亿美元的血腥利润，也即是纯利，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平均利润一倍多。他们深恐朝鲜和平的实现，将严重地打击他们的扩军备

战、发动战争的计划。因此，在即将举行停战谈判之前，《华尔街日报》引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假如和平突然实现，我们的军火生产数字实在太大了，没有法子可以停下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维特公开发表谈话，担心‘朝鲜战争的结束，将松弛人民对扩军计划的支持’。美国国防动员署署长威尔生说：‘国际紧张局势的丝毫缓和，都是对美国经济的威胁。’杜鲁门更加露骨地说：‘假如朝鲜问题的解决延缓了我们的动员计划，那就是我们国家最不幸的事情。’人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侵略者一年以来坚持拖延与破坏停战谈判的根本原因。美国侵略者的另一个目的，是妄图利用谈判进行讹诈，以便在会议上取得他们在战场上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分析得非常正确！”斯大林连连称是。

“我完全赞同周恩来同志的估计和判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外交家的判断！”莫洛托夫十分赞许周恩来的科学分析。

周恩来又继续说：“经过两年的军事斗争和一年的谈判斗争，朝中两国人民的力量更加强大了，美国侵略者则被更严重地削弱了。就连美国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美国资本家的喉舌《时代》周刊在3月10日公开承认：‘现在明显的是：美国不会赢得朝鲜战争了。’‘在8个月的停战谈判期中，美国军队越来越弱，而敌人却越来越强了。’发动侵朝战争的战争贩子麦克阿瑟在今年3月22日也承认：‘自开国以来，我国在全世界的声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落过。’根据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情况以及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呼声，美国侵略者还可以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一些小的和局部性的进攻，但是大仗打不起来了。朝鲜谈判还会有斗争特别是战俘问题仍要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最终还得和平解决，达成谈判停战协议。我们的方针仍然是：力争和，不怕拖，随时准备打。打对我

有利，和对我更有利。在谈判中该争的要据理力争，可让的或不能不让的，看准时机让。但在美国蛮横无理时不能让，虚张声势时不能让，不起作用时不能让，让步必须能够扭转局势，必须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的问题。”

周恩来抿了一口浓茶，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扫视了一下会场，看看苏方的表情，又说：“要应付美方的军事进攻和进行必要的反击，中朝军队都还有些困难，如武器装备、军需供给和掌握制空权等问题，仍需苏联方面提供大量的援助。此事徐向前参谋长曾经率团前来与苏方商谈过，并达成了协议，现在希望苏方尽快按协议执行，同时希望增加一些援助，特别是飞机。如果我们能掌握制空权，那美帝国主义就更没有办法了，失败得更惨。”

周恩来稍稍停顿一下，又说：“为使苏联同志直接了解朝鲜战场和谈判情况以及协调我们的行动部署和斗争方针，我建议苏联邀请金日成、彭德怀、朴宁永同志前来访问。”

“好，好，你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完全接受。请莫洛托夫同志立即去办，并希望他们尽快前来！”斯大林非常肯定地说。

莫洛托夫答应马上去办。

## 多番会谈气氛融洽

接着，周恩来说：“我们代表团前来苏联，要和苏联政府商谈的项目：（一）中国即将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我们没有经验，特来听取意见，并请求苏联帮助建设一些项目。我们已准备了一个初步方案，正在翻译成俄文，将送请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参阅。（二）延长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问题。考虑到日本只和美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缔结和

约，而拒绝和中苏缔结和约，考虑到朝鲜战争的现状，因此，我们提出希望苏军继续留在旅顺口。（三）中苏铁路修建问题，我们建议修筑从中国集宁到蒙古乌兰巴托铁路，因为从乌兰巴托至苏联境内乌兰乌德已有铁路。这条铁路可将中蒙苏连接起来，比走满洲里近得多。（四）中苏缔造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问题。苏联已准备贷款一亿卢布帮助中国发展种植橡胶，以解决苏联和东欧的需要。这就是这次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主要任务。”

周恩来讲完了，又问陈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陈云说：“总理讲得很全了，我是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其他成员都异口同声地赞同周恩来所讲的一切。

斯大林宣布休息5分钟。

双方代表团随即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分别畅谈起来，气氛极其友好、活跃、热烈、亲密无间。会议重新开始后，斯大林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非常感谢周恩来同志对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作了一个扼要而又精彩的介绍，讲得很好、很透彻、很深刻，对我对其他苏联同志及时地全面地了解那里的情况帮助极大。我，也包括在座的苏联同志和苏共中央，完全同意中国同志对朝鲜局势的估计和分析，完全同意中国同志关于朝鲜谈判的方针，也完全同意你们正在和即将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斗争的策略。

“我们认为，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笔，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它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方面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主张分三步走。我方被俘人员以116000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我百分之三十，我们

可以扣留敌人百分之十三左右作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遣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你们和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世界大战，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斯大林停顿一下，提高语调，强调说：“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和空袭吓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

斯大林说：“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关于军事援助，我们同意帮助装备中国 60 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 1：9 是不行的，应是 20：9，必须压倒敌人。”

“关于苏军继续留在旅顺口，客人不好要求多留，只能由主人挽留，这个换文发表，将使敌人很大震动。”

“关于修筑中蒙铁路问题，你们既赞同，我们没有意见，但须签订中蒙苏三方协定。”

“关于帮助中国发展种植橡胶，这是件好事，你们的志愿军在朝作战和发展橡胶种植生产，这两件事都是对苏联的援助。”

“关于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我们愿意尽力之所在资源勘探、企业设计、设备供应、提供技术资料、派遣专家和提供贷款方面给中国帮助。在军事工业方面，我建议中国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掌握技术，否则单有工厂，没有人才，绝对不行。最好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尤其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



技术人员等。”

斯大林笑着说：“你们运气好，革命获得成功，抗美援朝又取得胜利，所以苏联应该帮助你们。”

最后，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当天晚上，中苏双方政府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晤。

随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三年来中国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其他文件、附件分送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代表团。

9月3日，斯大林和周恩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举行第二次会谈。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米金。

这次重点会谈中国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斯大林首先发言。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但是，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速度为百分之二十，应下降为百分之十五。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这就是说，留有余地，超额完成，这是一种鼓舞，可增强信心，可增加干劲！苏联政府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建设。”斯大林喝了一口茶，话题一转说，“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最后肯定的意见，需要两个月时间加以计算之后，才能说可以给你们什么，不给什么。”

斯大林正面对着周恩来说：“恐怕你不能久等吧！”

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来时，预定我和陈云同志9月初就回去，李富春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可以留下。”

斯大林只作了一般的谈话和了解，而把整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

具体工作分配到他们的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由双方工作人员直接接洽，具体地、全面地研究和商谈。

周恩来也把中国政府代表团人员业务性质、工作关系相应地分成若干个组，让他们分头同苏联各有关部门直接接洽，开展工作。

因为苏联各部委的负责人要在百忙中指定和抽调出人员为中国的事花费精力来考虑、谋划、运筹、出主意，就表现出难色。那些部委工作人员一怕耽误自己本身的业务工作；二怕不了解中国情况而办错了事；三怕对双方都要负一种力不从心的责任，甚至因不了解情况，掌握不准问题，出了岔子，将来会受到批评。所以对口谈判，绝非易事。

周恩来在安排组织对口谈判工作中，呕心沥血，煞费苦心地对每一个组一项一项地分别进行了安排、指导和帮助。各组的工作人员共有一二百人之多，这些就够应付的了，再加上有代表团到欧洲、苏联访问，路过莫斯科也要向周恩来汇报请示，国内和朝鲜战场有些重大问题也发函或发报来请示。这样，周恩来从早到晚，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都是半夜一两点钟以后才休息，但他却觉得比在国内轻松些。周恩来的精力特别充沛，代表团的人都熬不过他，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同时，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直接与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于8月21日、8月27日、9月1日会谈了三次，讨论了有关问题。

## 彭德怀、金日成等应邀访苏

9月1日，彭德怀、金日成、朴宁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的别墅。

9月4日下午，斯大林约见了周恩来、彭德怀、金日成、朴宁永。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也应邀参加。苏联方面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

彭德怀、金日成分别介绍了朝鲜战局和谈判的情况。

接着，斯大林说：“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你们打得很好，把美军赶到了三八线。但是，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3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1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5个高射炮团，2000辆汽车。”

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对周恩来8月20日提出的要苏联增加对朝鲜战场的军事援助的答复。

然后，大家随便交谈，当谈到军队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不要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周恩来当即解释说，我们原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到1954年完全可以实行薪给制。

谈到朝鲜谈判关于战俘问题时，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同意美国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应该采取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以比他们少一点，也可以和他们扣一样大的比例。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邀请与会的全体人员到他的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先向周恩来敬酒，再向金日成敬酒，然后，他举着一大杯酒，走到彭德怀面前，要彭德怀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彭德怀马上站起来，同斯大林碰杯，并一饮而尽。斯大林的脸上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他非常喜欢彭德怀豪爽的性格风度，他满意地看着

彭德怀，端详了好一会儿。

宴会持续了约4个小时，然后，他请大家跳舞、吃点心。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金日成、朴宁永，都同经过精心挑选来的苏联年轻、漂亮又精通舞艺的姑娘翩翩起舞，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也是一个舞曲接一个舞曲地跳，有慢四、平四、快三和探戈、华尔兹，大家边跳边聊，沉浸在一片欢乐声中，既反映了中苏朝的友好关系，也反映了朝鲜战场胜利和平在望的喜悦情绪。唯有彭德怀不会跳舞，坐在旁边同人聊天。

直到深夜，欢宴才结束，大家告辞出门时，金日成推周恩来走在前面，彭德怀推金日成走在他的前面，这样彭德怀走在最后。斯大林把彭德怀请到他的身旁，离开大家站在大厅的一角，开始交谈起来。

斯大林请彭德怀转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是一支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军队，称赞彭德怀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指挥员、将帅，是闻名世界的战略家战术家，他个人非常敬佩。彭德怀则一再表示谦虚，称斯大林是亘古少见的大元帅，统率苏联军队打败最凶恶的希特勒法西斯，最后又出兵帮助中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称斯大林是老师，自己是学生。他们两人在大厅里边走边谈，有说有笑，非常友好，非常融洽，真是英雄识英雄，英雄赞英雄。

## 参观斯大林格勒

9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部分成员到斯大林格勒参观访问。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在这

里指挥红军打败了白匪军，扭转了整个苏联战局。为了表彰斯大林的功绩，于1925年改为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位于苏联伏尔加河的下游，为伏尔加格勒州的首府，建于1589年。18世纪为军事要塞，前面提到的察里津保卫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著名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在此进行。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德军的一次决定性的会战。德军于1942年7月17日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先后使用150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然后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在苏联最高统帅和前线司令官指挥下，艰苦奋斗，在顽强的防御中消灭了大量的敌人。

11月19日转入反攻，23日包围德军33万人，1943年2月2日将其全部消灭，迫使德军停止战略进攻，从根本上扭转了苏德战争的局势，使苏联的卫国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既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从此，苏军开始向德军步步进逼，变防守为进攻，而德军则一蹶不振，节节败退，走向死亡。斯大林格勒也因此而成为闻名世界的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的人民成为英雄的人民。

周恩来访问斯大林格勒，就是为了慰问这个英雄的城市和它英雄的人民，了解历史上罕见的、最残酷、最猛烈而具有关键性的战役的实际情况，调查研究战争带来的实际后果和战后重建情况，学习苏联人民的斗争经验和建设经验。

周恩来第一天参观了伏尔加河旧战场、面粉厂、万人壑（通向伏尔加河的一条沟渠）化工厂、拖拉机制造厂、工人新村、工人文化福利设施、法西斯匪军指挥大厦地下室。周恩来看到，虽然卫国战争已结束7年了，城内仍到处留有残酷战争的痕迹，未修复的残垣断壁，大片破碎的瓦砾和遍布各个角落的战壕沟渠，被破坏的楼

房。这些情景令周恩来及其一行个个触目惊心，使周恩来等联想到当年的战斗是何等的激烈和残酷，斯大林格勒的人民经受了德国法西斯史无前例的野蛮空袭和最猛烈的炮击，苏联军队和这个城市的人民与侵略者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为保卫社会主义的祖国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第二天，周恩来乘游艇游览了伏尔加河——顿河列宁运河，并在船上过了一夜。

伏尔加河，欧洲第一大河，苏联内河航运干道。伏尔加河源出于瓦尔代丘陵，曲折流经森林带、森林草原带和草原带，注入里海，长 3530 公里，流域面积 136 万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卡马河、奥卡河等。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流量为 8060 秒公方，全年入海水量 254 立方公里。它通过伏尔加河—波罗的海运河连接波罗的海，通过北德维纳河水系和北海—波罗的海运河通往北海，通过莫斯科运河通抵莫斯科，通过伏尔加河—顿河列宁运河沟通亚速海和黑海。沿河建有列宁水电站等水利工程。干、支流大部分河段通航，承担全苏河运总量的三分之二，航期 7 至 9 个月，主要河港有雅罗斯拉夫、高尔基、喀山、古比雪夫、斯大林格勒。

伏尔加河—顿河列宁运河，简称列宁运河。在苏联俄罗斯平原的南部，接通顿河同伏尔加河。西起卡拉奇南侧，东至斯大林格勒以南 25 公里的红军城附近，长 101 公里，有船闸 13 座。1948 年至 1952 年建成，使伏尔加河同顿河水系、亚速海、里海之间的航运得以直通。

周恩来把游艇变成学习的场所，他向陪同参观的当地州、市委负责人详细询问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具体经过，战后城市恢复工作的进展情况，特别是对工厂的重建、扩建和生产的情况了解得更仔细更全面，他的目的是从中汲取经验，为中国的建设服务。一路上，他除了用餐以外，从未休息片刻，一直精神抖擞兴致勃勃地谈

论问题。据当时担任翻译工作的师哲说：“我们两人轮流担任翻译，还有些支持不下的感觉。”

周恩来在游览列宁运河途中，曾两次下艇登岸。第一次是参加运河岸边一个小镇上的哥萨克青年举行的传统青年联欢会。青年们见到周恩来乘坐的游艇便聚到岸边欢迎他，他们把联欢会变成了欢迎会、狂欢节。他们载歌载舞，尽情地抒发自己心中美好的情感。周恩来在年轻时代就是一个活跃分子，跳舞、唱歌、演戏，所以他特别喜欢同青年人在一起，青年人那种活泼愉快的心态和举动，最能感染他，所以他就不管自己是客人、是大国的首脑身份，便情不自禁地投入到青年们的狂欢行列，同大家一起跳，一起唱，气氛热烈无比。周恩来第二次下艇上岸是参观一个码头和停泊港。在这个码头上，竖立一尊60尺高的斯大林铜像，像体的内部是空的，并安装有电梯，乘电梯可达铜像的顶部。导游介绍说，这尊铜像的靴子的大小和重量与胜利牌汽车相等。周恩来和随行的人瞻仰了铜像。

当游艇返回斯大林格勒停靠码头时，周恩来通过翻译对陪同人员说：“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陪同人员回答说：“我们一路上受到您、周恩来总理那灵敏的思维，和蔼的容颜，深思、感人的眼神和洋溢的热情鼓舞，再加上您对我们这里表现出的兴趣和关心，我们早已把一切困乏和倦意都驱赶到北冰洋里去了！”

彭德怀、金日成、朴宁永，他们同苏联国防部、军工部门谈完了话，办完了事，即将启程回国之际，斯大林于9月12日在他住的别墅里以家宴的形式欢送彭德怀、金日成、朴宁永一行，周恩来、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也应邀出席了宴会。

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轮番向客人们致酒，欢送和祝愿的话此起彼落，不知说了多

少，也不知说了多少次，热诚希望彭德怀、金日成在朝鲜战场打得更好，迫使美国早日达成停战协议，恢复朝鲜的和平局面。

周恩来、彭德怀、金日成、朴宁永等也频频举杯，感谢主人，感谢斯大林、感谢苏联政府在朝鲜战场上给予的援助。

主人和客人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认为在朝鲜战场上无论是打也好、谈也好，对中朝苏都是有利的，对美国是不利的，美国在朝鲜已经输定了。宴会桌上一片谈笑声，个个兴高采烈，无拘无束地吃着俄国大菜，喝着伏特加酒，宴会真正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充满了亲切融洽和欢乐。

这时候的中苏朝关系都是处在蜜月阶段。苏联、朝鲜依靠中国派出的志愿军和全国总动员，全力以赴地支援朝鲜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阻止和推迟了美国扩大侵略发动世界大战的阴谋，减轻了对苏联的压力，使苏联得以腾出手来恢复和发展经济，研制核武器，加强军备，增强应战能力，并帮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战争废墟中建设起来，从而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相对抗。朝鲜则从行将亡国的灾难中获得新生。

中国、朝鲜则依靠苏联的军事援助打败美国侵略者和在停战谈判中得到苏联在国际上的支持和声援。特别是中国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借重苏联的经验、人才、技术、资金和装备。

在意识形态上中苏朝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大矛盾，虽然有些不愉快，如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某些大国主义表现，毛泽东、周恩来有些不满，但斯大林那时帮助中国建设还是诚心的，并且确实出了不少力。斯大林把中国看成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的大国，处处突出中国的地位，如斯大林 70 岁生日，各国领导人去祝贺，把毛泽东放在首位；周恩来多次访问苏联，斯大林都亲自与其会谈；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位置十分



显著。……

宴会快结束时，坐在斯大林旁边的主宾周恩来告诉斯大林：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将讨论朝鲜问题，墨西哥拟提出解决俘虏问题三点建议。

斯大林问：哪三点？周恩来答：第一，双方俘虏已表示愿意返国者应予交换；第二，其他俘虏由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给予暂时避难的权利，这些俘虏应按照以后确定的办法予以遣返；第三，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前，有些俘虏要求遣送返国，有关政府也应该同样办理，并给予他们返国的便利。

“噢”，斯大林哼了一声，说，“我们还未接到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正式报告。”

“这个建议，很可能是美国策动的。这个建议的要害是将俘虏分散到各国去。我个人觉得这是个阴谋，初步意见，不宜接受。但是，想听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同志的意见。”周恩来非常锐利地看出这个建议的实质，却又谨慎地表示自己的态度。

斯大林犹豫一会儿说：“我请莫洛托夫同志和苏联外交部研究以后，再提出我们的看法和意见。现在看来，美国急于找一出路解决朝鲜停战问题。联合国已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要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请你带回去，我们应为新的联合准备条件，应设法促成亚洲国家区域联合，如果成功，苏联亦可参加。”

“我们现在对联合国不感兴趣。现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形势甚好，为亚洲的联合准备群众基础。这样可迫使亚洲国家的某些政府造成区域联合。”周恩来避开了苏联参加亚洲区域联合问题。

斯大林说：“不要急，区域联合是要政府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应以和平为中心，一切围绕着为争取和平做斗争，能争取日本、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参加很重要。”斯大林喝一口咖啡转了话题说，“我听彭德怀同志说，朝鲜战争很艰苦，志

愿军有时连水都喝不上、饭吃不饱，而且都是冷的，你们是否不愿东欧国家帮助？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周恩来笑着说道：“哪有不愿东欧国家帮助的道理，谁向我们提供援助都欢迎。”

宴会之后，斯大林赠给彭德怀一辆“吉姆”轿车，以表示对他在朝鲜打败美国侵略者的敬意和中苏友谊。

## 发表公报、公告和换文

9月15日晚，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灯火辉煌，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的谈判的中苏公报》，交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关于组织铁路联运的协定》。

这些公报、公告和换文对当时加强中苏联盟，发展两国的友谊和合作，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完全符合中苏两国人民和远东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经过一个多月谈判取得的巨大成果。为使读者便于了解公报、公告和换文的实际情况，抄录如下：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的谈判的中苏公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巴·尼·库米金一方，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率领并包括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

会副主任李富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张闻天、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一方之间，最近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讨论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间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谈判是在友好的互相谅解和诚恳之气氛中进行的。这次谈判证明了双方都决心努力使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同时用一切办法维护和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同意着手进行各种措施，以便苏联政府在1952年底以前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铁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归其所有。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交部部长安·扬·维辛斯基已就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问题互换照会。

上述换文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公告公布如下：

### 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业已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两国曾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归其所有。依上述协定，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之实现应不迟于1952年末。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业已着手进行实现该项协定的措施，并为此目的已协议成立中苏联合委员会。

中苏联合委员会应于1952年12月31日前将中国长春铁

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完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

### 去文

敬爱的部长同志：

自从日本拒绝缔结全面和约并与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其他若干国家缔结片面和约后，日本因此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订立和约，看来也不愿意订立和约，这样就造成了危害和平事业的条件，而便利日本侵略之重演。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障和平起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兹特向苏联政府提议，请同意将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中规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上项提议，如获苏联政府同意，本照会和您的复照即成为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本照会互换之日起生效。

部长同志，请接受本人最崇高的敬意。

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同志

1952 年 9 月 15 日

复文

敬爱的总理兼部长同志：

接获您本年9月15日照会：自从日本拒绝缔结全面和约并与美利坚合众国以及其他若干国家缔结片面和约后，日本因此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订立和约，看来也不愿意订立和约，这样就造成了危害和平事业的条件，而便利于日本侵略之重演。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保障和平起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兹特向苏联政府提议，请同意将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条中规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的期限予以延长，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和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和约获致缔结时为止等由。苏联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上项提议，兹特表示同意，并同意您的照会以及本复照成为上述1950年2月14日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本照会互换之日起生效。总理兼部长同志，请接受本人最崇高的敬意。

此照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  
部长 安·扬·维辛斯基同志

1952年9月15日

随后，斯大林设宴招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宴会上，彼此相互祝贺公告、换文、协定的签订，祝贺中苏关系的新发展。周恩来在检查代表团的工作时，做了进一步的安排，随后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领导各组继续谈判工作。9月22日，他同陈云、粟裕等一行17人离开莫斯科返国，莫洛托夫等到机场送行。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谈话。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今天离开莫斯科之前，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大元帅对于我们的热烈招待和亲切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

“自从我们到达莫斯科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之间，在斯大林同志亲自参加之下，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并发表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国政府的联合公告，交换了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照会。这样就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我们因之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

“在留住苏联期间，我们代表团同仁曾在莫斯科参观了各种工业建设，并同赴斯大林格勒英雄之城与列宁伏尔加河—顿河运河进行访问。在参观和访问中，我们亲眼看见伟大的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以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自觉的劳动热忱和高度的先进技术，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样辉煌的建设，不仅为苏联人民，同样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带来了对于共产主义光明前途的新的鼓舞。”

“我们深信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将要日益发展，而且要世代地发展下去。任何对于这样伟大友谊的挑拨和破坏，在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力量的打击之下，必将归于失败无疑。强大的中苏友好同盟是维护远东与世界和平的最有力的保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中国人民最亲爱的朋友和导师、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据当时担任周恩来的翻译师哲回忆说：“在周总理率代表团访苏期间，我紧紧跟随着他，寸步未离，这使我有机会进一步学习和

体会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及灵活巧妙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周总理执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既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又善于发挥最大的机动、灵活性，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总是准确地掌握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作出科学的判断，当机立断，作出自己的正确决定。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和各项紧张的活动中的，善于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与建议，灵活机动，从不一意孤行。他总是与大家充分协商，反复推敲，三思而行。从不自以为是，更不采取轻率、武断的态度或抱有侥幸的心理。他常讲8个字：如履薄冰，戒慎恐惧。这8个字表现出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 十一、上甘岭战役后谈判重开

朝鲜前线由于美军对我军发动军事攻势，板门店谈判冷冷清清，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一再重复夹着皮包走进谈判帐篷又立即走出去，玩弄仿佛仍在谈判的骗局，以欺骗世人。只有一些参谋人员和文字专家仍在咬文嚼字，起草和推敲停战协定草案。到了1952年8月5日，他们已就全部文字达成一致，共五条六十三款。《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草案。只等大会批准签字了，可是美国方面拒不执行，仍在战俘问题上无理纠缠，以待它在军事上的胜利。

9月10日，志愿军司令部电报中央军委，称：“我为争取主动，有力打击敌人，使新换的部队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拟在换防之前，以三十九军、十二军、六十八军为重点，各选了三至五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求得歼灭一部敌人，其他各军亦应各选一至两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有利于我杀伤敌人。反击战斗时间拟在本月20日—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换防。”

军委接电后，总参谋部徐向前总长和聂荣臻等立即进行研究，并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批准，于两天后回电：“9月10日电悉。同意你们10月底三个军的换防计划和防前的战术行动。”

9月14日，志愿军司令部向全军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



9月15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担任主攻的三十九军以4个连的兵力在100多门火炮支援下，突然向其正面敌人的两个连支撑点发起攻击，全歼美军两个连及一个排。随后又打退敌人一个排到一个营的兵力连续30多次的反扑。其他各军也陆续发起了反击，在正面180多公里的阵地上对敌人18个目标进行了19次反击，其中美军防守的7处，伪军防守的11处，共打退敌人一个排至一个团兵力的反扑160多次，歼灭敌人8300多人。

在这期间，敌人将预备队第四十五师和伪第一师前调，敌人有可能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为了在敌情未有更大变化之前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志愿军司令部决定立即进行第二阶段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儿展开，第一梯队的六十五、四十、三十九、三十八、十五、十二、六十八军共7个军参加战斗。

10月6日黄昏，7个军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宽180余公里正面上，在760门火炮的配合下，同时向敌人23处一个班到一个营的兵力的防守阵地发起攻击。除两个目标由于准备不足未能占领外，其余目标均于当夜或第二天攻占。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全线战术反击之初，“联合国军”摸不清我军的作战意图，克拉克在9月24日到前线视察时还认为“共军是试探性进攻”，“是想探悉他们要夺取地方的地形”。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其23个前沿据点同时发起攻击，使他们遭到沉重打击、全线告急之后，克拉克这才恍然大悟，认为联合国军已失先攻之利，作战主动权已落到共军手里。他也才意识到，志愿军的战术反击作战，其目的在于迫使他们接受中朝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

克拉克不甘心失败。他为了报复，更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被动局面，谋求在和谈中的有利地位，于10月8日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并在同一天批准了美第八集团军范佛里特

的“金化攻势”计划。这个计划攻势的目标是范弗里特亲自勘察选定的，即上甘岭地区的两个山头——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

## 上甘岭战役震惊中外

上甘岭乃朝鲜中部一个山林，位于金化以北五圣山的南麓。五圣山海拔1000多米，西瞰金化、铁原、平原地区，东扼金城通往通川至东海岸公路，是我中部战线战略要地，也是朝鲜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五圣山为志愿军第十五军防御的战略要点，597.9高地和537.7高地的北山是我五圣山主阵地前沿两个连的支撑点，地理位置重要，它直接威胁着美军的金化防线。敌人要夺取五圣山，必须首先夺取这两个高地。如果夺取了五圣山，就从中部突破了我军防线，在我方阵线中央打破了一个缺口，就可以进到平康平原，敌人的坦克也就可以发挥其优势了，从而进一步进攻我平康、金城以北地区。敌人看准了五圣山这两个点，对这次战役十分重视，由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直接指挥。

但是这两个高地，山高坡陡，地形极其复杂，易守难攻。美军于10月14日凌晨5时，以美第七师的二师7个营的兵力在300多门大炮、30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对我仅有3.7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发起了连续不断的猛烈冲击。同时，美第七师，伪第九师4个营向我十五军二十九师和四十四师阵地进行了钳制性进攻。志愿军防守在两个高地上的十五军一三五团九连和一连在仅有15门山野榴炮和12门迫击炮支援作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步兵火器、依托坑道和野战工事顽强战斗，先后击退敌人30多次冲击。至下午1时，地表阵地工事几乎全部被摧毁，人员伤亡较大，弹药消耗殆尽，被迫转入坑道作战。当晚，我十五军四十五师趁敌立足

未稳，组织4个连队进行反击，又恢复了地表阵地。

15—18日，美军先后投入了两个团又4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和大炮配合下向我两个高地连续猛攻，志愿军防守部队与美军反复争夺，地表阵地昼失夜复，战斗异常残酷激烈。

19日夜，志愿军在炮火支援下，分别以4个连和3个连的兵力向敌发起反击，经过激战，全歼守敌，恢复了全部阵地。但是，第二天敌人又以3个营的兵力向我反扑，我防守部队与敌激战终日，终因伤亡过大，弹药缺乏，除597.9西北山脊外，地表阵地全部被敌人所占领。

这时，志愿军司令部调第十二军参战，将炮七师一个营、炮二师一个连和高炮一个团加强十五军。美军司令部也调整和增派兵力，调伪九师于金化以南为预备队，并在占领我地表阵地上抢修工事，同时向我纵深发展，采用轰炸、熏烧、炸破、放毒、堵塞、断水等手段对我坚守坑道作战的部队进行封锁和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邓华代司令员认为这对我很有利，他指示十五军和十二军，目前敌人成营成团向我钢铁阵地冲锋，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是歼灭敌人于野外的良好时机，应抓住它，大量杀伤敌人。

志愿军除以冷枪和夜间偷袭，杀伤了成千敌人外，于10月30日夜，四十五师、二十九师10个连兵力在104门火炮多次轰击后，对占领597.9高地的地表敌人发起反击，经一天一夜的激战，于31日晚恢复了主阵地。第二天敌人以4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连续疯狂反扑，我军一连粉碎敌人10次反扑，坚守住阵地。11月11日，我军反击重点移至537.7高地北山，经过激烈的战斗，当晚我军全部恢复失地，全歼守敌。第二天，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扑，阵地又被其占领。第三天，我再次反击又夺回阵地，随后敌人又反扑。经过一个星期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巩固了537.7高地的北山阵地。

历时 43 天的上甘岭战役，敌人的金化攻势终于以失败告终。我军毙、伤、俘敌 25000 余人，击伤敌机 270 余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 61 门，坦克 14 辆。我军伤亡也不小，敌我对比为 2.21 : 1。

这次战役，双方在 3.7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兵器。敌人先后投入兵力 6 万余人，火炮 300 余门，坦克 170 余辆，出动飞机 3000 余架次。我方先后投入兵力 4 万余人，火炮 138 门，高炮 47 门。战役中敌人共发射炮弹 190 余万发，投掷炸弹 5000 余枚，最多时一天发射炮弹 30 余万发，投炸弹 500 余枚。两个高地的土石均被炸松 1—2 米，走在上面，松土没膝，像走入土灰里一样。地面阵地全被摧毁，许多岸石坑道被炸短 3—4 米。我军发射炮弹 40 余万发，亦属空前。为了争夺两个连阵地，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火力之猛烈、密集，战斗之紧张、残酷，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应该说，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坚守阵地的防御战。它又一次证明，中国军队不仅能打运动战，而且也能打阵地战，“打钢铁”“打后勤”的现代化阵地战。证明中国军队即使在没有制空权的条件下，以劣势的装备，也可以战胜现代化的又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对美国来说，使它再一次认识到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国军队不可侮。美联社记者报道说：“在三角山，虽然联军的大炮实际上已将山顶打得不成样子，但是，中国军队还能筑成一条铁的防线。”合众国际社用联合国军指挥官的话说：“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上甘岭和爸爸山（即五圣山）上的共军全部消灭。”上甘岭战斗，美军称之为“伤心岭”战役。这次战役后，美军再也没有发动什么像样的攻势了。

这就是上甘岭战役，闻名世界的战役。

会场上谈判也好，战场上交锋也好，美国对中朝施加的种种压力都一个一个地失败了，杜鲁门又想利用七届联合国大会施加压

力。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作了长篇的发言，推卸朝鲜问题的罪责，并提出英美等二十一国关于朝鲜问题的提案，企图利用联合国迫使朝中方面接受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且要挟、威胁更多的国家支持美国的提案，形成对朝中方面更大的压力。

### 苏联在联大提解决方案

经过中、朝、苏三方事先商量过的，出席联合国七届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于10月29日、11月10日和11月24日在政治委员会上作了三次长篇发言，并针对美、英的提案，提出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

建议朝鲜的交战双方在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的草案基础上，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上、海上及空中的军事行动，战俘全部遣返的问题则交给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决定。

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美国、联合王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

责成上述委员会立即采取措施，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上述委员会的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解决朝鲜的问题，此项措施，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在内。

这个提案后来又于11月24日提出补充案。

11月28日，周恩来以外长名义发表声明，赞成苏联代表团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建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苏联代表团11月10日的提案及11月24日的补充建议是立即结束朝鲜战争并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合理途径，因此，特授权本人对于苏联代表团的提案表示完全赞同。”然后揭露美国“为了保持国际紧张局势，以便从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攫取巨额利润，一开始就蛮不讲理，任意撕毁国际公约，肆无忌惮地破坏人道原则，经常不断地拒绝协商，最后竟至片面宣告无限期休会，企图依靠这一切来破坏停战谈判，延长和扩大战争。”进而驳斥美国在遣俘问题上的立场和刁难：“美国政府自1951年12月11日开始谈判战俘问题以迄于今所持的政策，即它们在板门店提出的‘自愿遣返’原则和‘不强迫遣返’原则，以及最近在联合国第七届大会上提出的‘不以武力遣返’原则，实际上都是换汤不换药地以强迫扣留战俘为其基本内容的。为了达到这个强迫扣留战俘的目的，美国侵略军多时以来就在朝中被俘人员当中使用了大批李承晚、蒋介石特务，以毒打、刺字、盖血印、集体枪杀和绞刑等来胁迫战俘，企图使他们违背自己意志而承认反对自己的祖国并‘拒绝遣返’。必须指出这种以武力胁迫战俘的行为是完全违背国际公法和人道原则的。”

接着，声明指出美国拒绝遣返战俘的目的：“美国政府对于战俘遣返问题的荒谬绝伦的主张和虐待战俘的卑劣残暴的行为，不仅根本违反了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五十一款关于双方全部战俘在停战后须尽速予以释放和遣返的规定和交战双方战俘得以早日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愿望，不仅彻底破坏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及一切关于战俘待遇的国际惯例的原则，而且还有意地把一个原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战俘遣返问题变成了阻挠朝鲜停战实现的唯一障

碍，使远东与世界和平受到严重的威胁。”声明最后表明中国的立场：“我们兹特表示完全赞同苏联代表团所提的先朝鲜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全盘建议，亦即是在朝鲜的交战双方按照双方已经同意的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完全停火，就是说双方停止一切陆、海、空军行动，战俘全部遣返问题则交给苏联提案中所规定的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缅甸、瑞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朝鲜组成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去解决；这个委员会并应本着由朝鲜人自己在这个委员会监督下统一朝鲜的精神，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在这个委员会中，一切问题要经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赞成决定的全体建议。中央人民政府相信，这个建议是能够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开辟道路的。”

朝鲜外相朴宁永也于10月28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建议。

按道理，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立即停火，而将僵持不下的战俘问题交给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及中立国家参加的委员会去解决，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是符合世界人民愿望的，但是，却被政治委员会拒绝了。这在当时冷战时期，不管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什么样的方案，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不能接受或者是极难接受的。

### 印度提案上了美国人的当

正当苏联等国不同意美、英二十一国提案，美国不同意维辛斯基提案，双方激烈争论之际，印度代表团团长梅农于11月17日发言，并提出解决朝鲜战俘的方案：提议建立一个遣返委员会来处理朝鲜战争中的俘虏问题。该会由4个中立国组成，并由该四国推一

公断人，遇到不能决定的问题，由公断人裁决。朝鲜停火后 90 天，尚未遣返的战俘由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30 天后，如仍有未回家和未作出处理决定的战俘，交联合国收养。

梅农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亲密战友，为印度独立做过许多斗争，印度独立后一直担任印度驻英国的高级专员即大使，是有名的外交家、政治家。

美国代表团团长艾奇逊觉得印度的这个提案可以利用，他于 11 月 24 日再次发言，说，如果印度提案能够做些重要修正，美国代表团将“衷心支持”。11 月 26 日，印度提案作了重要修正，27 日美国发言人表示，该案符合美国遣返原则，美国代表团决定支持这个提案。当时的联合国是在美国的操纵之下，所以 12 月 2 日政委会以 53 票对 5 票通过了这个方案。12 月 3 日，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该案。

这个提案修正案，共 17 条，要害是第三、四条；“一方面肯定战俘之释放与遣返应按照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国际公法中确立的原则与惯例以及停战协定草案中有关的规定执行”；另一方面却又“肯定不应对战俘使用武力以阻止或使他们返回家乡”。

这样，就前面那个“肯定”成为幌子，后面的“肯定”是实质。日内瓦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规定拘留国在停战生效后只有迅速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之责，而决无使用武力、使用特务来侮辱和扣留战俘之权。后面的“肯定”里一加进“或使”二字，前面的肯定便失去了意义。目光敏锐的周恩来，凭着他同美国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一眼便看出这完全是美国的阴谋，那些有着善良愿望和好心的朋友，上了美国的当，受了美国的骗。为了揭穿美国的骗局，帮助朋友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在 1952 年 12 月 14 日答复联合国大会主席莱士特·B. 皮尔逊的来信和转来的联合国大会根据印



度提案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决议案的电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非法决议案，无论它怎样自称是符合于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实际上，它却是1952年10月24日美国艾奇逊先生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提出的所谓‘二十一国提案’的改版”，明确指出这个决议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人民坚决表示反对”。接着又指出，这个非法决议案，是以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为“基础的”。“决不可能解决你来电中所说的停战谈判过程中唯一尚未解决的剩余问题，即遣俘原则与程序问题”。

事实上，关于这一剩余问题，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已经达成协议的停战协定草案第三条中，业已根据国际惯例和《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制定了具体而缜密的办法和步骤。“如果美国方面按照停战协定草案办事，而不故意制造出一个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来作为阻挠朝鲜停战的借口，那么，‘这个唯一尚未解决的剩余问题’早就可以圆满解决，全世界人民所共同关心的朝鲜战争早就可以结束了。”“而联合国大会竟对美国这种违法罪行加以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周恩来进一步用大量事实揭露美国的罪行：“你所交来的这个非法决议案，不仅是以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为根据的，而且是以假定朝中方面被俘人员中确有一些战俘‘拒绝回家’与其家人团聚过和平生活为前提的。这样的看法既完全不符合人道，更绝对不合乎事实。事实是，很长时期以来，美国方面就悍然不顾《日内瓦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及其他对战俘人道待遇的条款，在其所管理的战俘营当中，使用了大批美国的、李承晚的和蒋介石的特务担任战俘营中的负责职务，甚至使用了李承晚的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进行所谓‘劝导’‘甄别’‘再甄别’和‘征询’，胁迫他们表示‘拒绝遣返’和‘不愿回家’。凡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战俘都遭到这些特务的毒打，而在战俘们受重伤、失知

觉之后，特务们就利用这一时机在战俘身上刺上侮辱他们人格、违反他们意志的背叛祖国的字样，或按住战俘的手指，用他们身上的血，在所谓‘不愿回家’的甄别书上打指印，这些特务甚至用自己的手指蘸上被毒打战俘伤口上的血，来伪造指印。”

“美国方面丧尽天良地拿这些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烙印和血书作为根据，来叫嚣什么‘有些朝中战俘不愿遣返’，而你所交来的这个非法决议案就居然加以肯定，说什么‘《日内瓦公约》不能被解释为授权拘留国以武力来强迫个别战俘返回家乡’。其实，凡属战俘，就是在敌方武力控制之下不得自由的对方交战人员，一旦停战生效，双方全部战俘所应享受的释放与遣返的权利，就是要解除敌方的武力控制，使之归还对方，得以恢复自由和回家过和平生活。战俘享受这种权利，有何‘强迫遣返’或‘武力强迫回乡’之可言？”

周恩来又用最近的事实揭露美国的罪行：“就在联合国第七届大会期间，朝中战俘们还在因抗拒‘甄别’‘劝导’和反对表示‘不愿回家’的愿望，而继续受着屠杀。从今年10月14日到12月4日，仅仅根据美英通讯社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加以统计，这样死伤的朝中战俘已达321人之多，平均每天有六七个朝中战俘因此受害。而你们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这个非法决议案时，却俨然无事地装出一副仿佛正在悲天悯人的样子，你谈什么‘人道原则’和‘战俘意志’来替美国方面的残暴罪行辩护，并想出了种种方法，来实现美国方面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即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全世界公正人士对于联合国大会这样堕落的行为，不能不感到惊讶和愤慨。”

周恩来接着指出：“按照印度提案的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决议案“规定将十几万朝中战俘送到一个非军事区‘释放’出来，交给一个由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准许‘自愿

回家’者回家，其‘不愿回家’者交给遣返委员会，在120天后交给联合国处理。这个遣返委员会并要设立一个公断人，假如委员会对于这个公断人的任命不能达成协议，则此事应该提交联合国大会。公断人是在遣返委员会起决定作用的，其最后任命权归于联合国，而所谓‘不愿回家’的战俘的最后处理权也交给联合国，这真是荒唐达于极点的建议。难道联合国中提出并通过这个非法决议案的各国代表们竟然忘记了联合国正是朝鲜战争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吗？老实说，这些规定兜了许多圈子，玩了许多花样，实际上是完全采纳了美国方面1952年9月28日在板门店所提的三种建议而以更巧妙的形式写出来的，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更易于欺骗世界人民，使美国政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得以实现。所谓战俘‘不愿回家’的谣言，完全是不可置信的，已如上述。而且就将遣返全部战俘回家这个任务交给中立国所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去做，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如前所说，美国方面曾派有大批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在朝中战俘当中，利用战俘已被强迫刺上背叛祖国字样或盖上拒绝遣返血书指印后所产生的耻辱、顾虑等心理失常的状态，经常对他们进行胁迫行为，如果不把这些特务从朝中战俘中隔开或孤立特务分子，这在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的情况之下，是根本无法办到的，只有将战俘直接交给对方保护，然后才能办到。”

周恩来强调指出：“非法决议案是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它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它完全违反了人类的良知、人道的原则、国际的惯例、《日内瓦公约》的条文和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的规定，承认了美国方面用极端野蛮残暴的方法所制造出来的战俘‘拒绝遣返’的‘愿望’，并硬要扣留几万朝中战俘作为人质来迫使朝中方面对美国方面屈服。它之所以不公平，是因为它处心积虑地想把美国方面所坚持的毫无法理根据的‘自愿遣返原则’强加在朝中方面

头上，而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朝中方面关于遵守《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的建议和苏联代表团关于先在朝鲜立即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遣返全部战俘问题的提案。”

周恩来最后指出：“事实既是这样，所以我不能不郑重地通知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于这样一个非法决议案，认为是根本不可能‘作为一个协议的公正与合理的基础’。你的来电用了许多辞藻来企图说明你们通过这个穿上印度外衣的、以美国‘自愿遣返原则’为其中心内容的非法决议案，是热诚愿望朝鲜战争迅速结束的，可是，你所交来的这个非法决议案却完完全全证明它是在屈从美国政府决心用暴力来贯彻它们强迫扣留战俘以便中止和破坏朝鲜停战谈判，延长和扩大朝鲜战争的横暴意志。你们不是在努力设法结束朝鲜战争，而是在努力设法诱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若干国家共同批准美国的不停战、不谈判、也不和平解决的延长并扩大朝鲜战争的政策，同时则又企图把战争不能停止的责任，设法转嫁到朝中方面，可以断言，你们这样转嫁责任的企图是徒然的。”

周恩来的复电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外柔内刚，非常有力。这是他的一贯的外交风格和外交特色，因而博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赞誉，收到良好的效果。

美国国务院却就周恩来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电报发表声明，声称要扩大侵朝战争，以此来恐吓中国。

## 艾森豪威尔上台举棋不定

正当联合国就朝鲜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的时候，美国也在紧张地进行大选，选举第三十四任总统。

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五星上将，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一位有军事才华的人，曾得到过他的老上司麦克阿瑟和马歇尔的赏识，二战期间在北非、意大利立过战功，1944年6月在他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时，指挥4000艘舰艇和百万大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因而闻名世界，并受到美国人的尊敬。他来参加竞选总统，给人们带来了一些希望。周恩来非常重视这次美国总统的选举。

杜鲁门为了民主党的竞选，不想当年在朝鲜停战，以免被共和党利用，指责民主党的政策失败，对大选不利。艾森豪威尔则处境不同，他不承担这次朝鲜战争的责任，较有回旋余地。他在1952年10月25日的竞选演说中向人们公开许诺，他当选了总统，“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艾森豪威尔这项打动人心的“诺言”赢得了选民。因为当时美国人对打了两年零四个月的侵朝战争已厌恶，战场上不断损兵折将，士气低落，毫无胜利的希望，而且军费支出越来越大，物价也随之上涨，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加之，盟国的埋怨、泄气、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尤其是把美军7个陆军主力师长期陷在朝鲜战场，亚洲的一角，形成战略重点的矛盾，促使美国很多有战略眼光人士忧心忡忡，人们普遍要求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艾森豪威尔“将亲自去朝鲜，并结束这场战争”，正迎合了人们的心理，因而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了总统。

1952年11月29日拂晓前几小时，正是纽约最宁静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在早晨4时30分，从莫宁赛德大道六十号他的家中悄悄走出来，带着他选定的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司法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以及柏森斯乘一架普通的军用运输机，极其秘密地飞往朝鲜，实现他的竞选“诺言”。出发之前，艾森豪威尔邀请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太平洋海军司令约瑟·雷德福在琉璜岛加入他们的行列。12月2日下午，

艾森豪威尔的飞机在朝鲜金浦机场着陆，受到克拉克和范弗里特的欢迎。艾森豪威尔一行视察了美军一些空军师和陆军师，访问了英联邦师，检阅了 15 个国家组成的一个团队。

在艾森豪威尔抵达之前，克拉克将军的参谋部已经搞出了一项把战争进行下去的应急计划，其中包括把李承晚军队的规模从 16 师增大至 20 个师，64 万人，还考虑了使用原子弹和国民党军队问题。

李承晚则想利用艾森豪威尔的来访重振他自己日渐式微的民心，并在疲惫萎靡的朝鲜人当中重新燃起战争热情。李承晚打算让艾森豪威尔在朝鲜花一个星期时间，向国民发表讲话，主持庞大的军事讨论会，但是艾森豪威尔只打算在南朝鲜待 72 小时，而且主要是同美军领导人在一起。李承晚陪同艾森豪威尔参观南朝鲜首都师的一次战术演习，使他理解“在训练大韩民国士兵中所取得的好处”；还同李承晚进行会谈，开过多次秘密会议，形成了“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构想。然而李承晚对艾森豪威尔的来访并不满足，他提出要“全力以赴地全面进攻”“把战争扩大到跨越鸭绿江，攻击中国境内的”供应基地，但艾森豪威尔没有表示可否。

克拉克、范弗里特等美国朝鲜前线指挥官们，也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在一定时期内，谈判仍不成功，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艾森豪威尔带着难以决断的问题和心情结束了朝鲜之行。因为他在朝鲜前沿哨所通过望远镜观察了中、朝军队的阵地并听取了前线指挥官的详细报告，他私下说：“看来，他们已找到一个保护自己万无一失，同时却能以炮火不断袭扰我方阵地的办法。他们不怕烦劳，开进了直通山顶、大得足以容纳大炮装备的坑道。他们通过坑道推出大炮进行射击，打完就撤。显然，他们已经做了一项很费气力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他们有充分的人力可以使用。”艾森豪

威尔无可奈何地说：“鉴于敌人阵地的力量已得到加强，任何正面的攻击将碰到巨大的困难。”艾森豪威尔飞返美国关岛之后，他和他的内阁班底改乘巡洋舰“海伦娜”号到威克岛靠岸。在那里，同已选定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富勒斯、财政部部长乔治·汉弗莱、内政部部长道格拉斯·麦凯和卢休斯·克莱将军会合，讨论新政府面临的种种问题。经过几天的讨论，艾森豪威尔认为：“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中，没有一个比朝鲜战争更需要引起迫切注意的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反反复复地琢磨几种可能的措施：

拖下去。那是“不能容忍的”，美军正在“遭受着严重的伤亡，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微不足道的”。

不顾一切全力发动进攻，夺取军事上全面的胜利。“这是最不诱人的方案”。中国军队已在横跨朝鲜半岛挖掘了犬牙交错的地下坑道，并组织了纵深阵地，囤积了大批粮食、弹药，如果硬拼，除了惨重伤亡之外，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而更大的问题是必须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冒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必须削减答应增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和军火，甚至不得不动用原子弹。如果这样的话，他认为将会“使他们和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

争取“体面”条件下的停战。可是共产党人已经拒绝了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艾森豪威尔一直举棋不定，决断不了。正当他要返回美国大陆的时候，他得到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传来的消息。麦克阿瑟在美国制造商协会全国会议上说，他有一个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如果他被请求，他将把这一计划向艾森豪威尔陈述。艾森豪威尔立即发电给麦克阿瑟说：“举行非正式的会晤以便我和我的同僚们从你的见解和经验中获大效益。”

1952年12月17日，艾森豪威尔同麦克阿瑟在杜勒斯的私邸会晤了，麦克阿瑟把一份长达几千言的备忘录交给了艾森豪威尔。

这份文件的关键要点是建议举行艾森豪威尔与斯大林“双边会议”。美国向苏联提出要求德国和朝鲜统一，日本和奥地利中立，由美苏两大国作保。如果苏联不接受，则“我们就准备肃清北朝鲜的中方军队，这一意图可以通过如下办法来实现：用原子弹轰炸北朝鲜境内的敌人军事集结点和军事设施，在战地散播适量的制造原子弹的副产品放射性物质，封闭从鸭绿江通向南方的敌人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同时在北朝鲜两面海岸进行两栖登陆。同时中国的军事和工业设施也将受到轰炸”。

艾森豪威尔对他这位老上司的建议，未加可否地听着，唯恐说什么肯定或否定麦克阿瑟的话。他听完了以后，才简单地说：“将军，这是一种新东西，我将必须看看我们自己 and 盟国之间对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的理解如何；因为假如我们准备轰炸鸭绿江那一边的基地，假如我们准备扩大战争，我们就必须确保我们不会冒犯整个……自由世界或不会失去信任。”

1953年开始，即将上任的新总统同即将离任的总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如何设计一个方案，它既符合把美国和联合国带进战争的那些原则，又有开脱美国 and 联合国参战的责任。于是，他一方面宣布要加速训练和扩大李承晚的军队，计划增至大约655000人，包括20个陆军师和1个海军陆战队，这样可以撤出美国一部分部队；另一方面秘密交代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一个“攻势”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把国民党的一些师拉进战场”，对中国东北地区和本土进行轰炸，封锁中国，甚至在战术上使用原子弹等等。也即是他在竞选讲话中说过的：“联合国——而又以美国首当其冲——一直不断地被迫向这些前线输送人员，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是朝鲜人的差事。我们不想让亚洲人觉得，西方白人是它的敌人。如果那里一定要打仗，那就让亚洲人去打亚洲人好了，我们则支持自由这一边。”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的“亚洲人打亚洲人”计划。



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进入白宫，登上总统宝座，2月2日发表了经过较长时间精心准备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放蒋介石出笼。同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说：“现行紧急指令中关于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不被用作中国国民党向中国大陆作战的基地的那部分现在予以撤销。”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个国家的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这个冒险计划一露头，便立即遭到美国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英国丘吉尔、艾登马上表示，英国决不同意因使用蒋介石的武装而导致朝鲜战争的扩大。英国外交大臣于2月5日在下院发表演说时表示，封锁中国“是一种错误”。就在艾森豪威尔同十六国代表当面协商时，在场的多数代表就表示对中国进行封锁“将有种种困难”。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也激烈反对和抨击此项计划和政策。为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和盟友丘吉尔以及国内两党头面人物举行会议，磋商结束战争的可行途径。

### 和战胶着一动不如一静

毛泽东和周恩来综观全局，分析研究了艾森豪威尔接任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朝鲜停战谈判中断、联合国决议遭到我拒绝等情况，判断敌人现在什么花样都玩尽了，也都遭到失败，只有在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清川江、鸭绿江一线集中大量兵力举行冒险登陆，从后方打击我们，只要我们把他们的冒险计划打下去，他们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毛泽东早在1952年12月9日即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的电报中说：“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

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速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毛泽东在1952年12月4日邓华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上批了三段话：“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决不能允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允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1952年12月10日向中央军委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准备工作的报告上，毛泽东于12月11日指示：“周朱阅退彭、聂办。同意这个部署，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1952年12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志愿军党委。全文如下：

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军委各部首长：

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更大胜利的指示：

（一）根据各种情况（艾森豪威尔登台，谈判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7个师左右的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二）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

（三）为此目的，我军必须：

（甲）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巩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

（乙）在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

攻。在其他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

（丙）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

（丁）我正面各军过去作战成绩很大，在1953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

（戊）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

（己）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1953年4月这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

（庚）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同志为西海岸副司令员，西岸（海）指挥部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四）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同时，中央军委于12月28日给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省军区并告中南军区，要他们加强装备，防止敌人为了配合在朝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两三个县的阴谋计划，要福建军区以现有兵力粉碎敌人的进攻。以后还要上海防止敌人空袭等。

毛泽东、周恩来在军事上做了极其周密的充分的准备和部署，以保证万无一失地防范敌人的冒险计划，如果美军真的在我侧后沿海登陆进攻，必遭惨重的打击和可耻的失败。同时，另一方面，他们，特别是周恩来清醒地看到，艾森豪威尔在当选总统并到过朝鲜之后，他却又在承认朝鲜战争“要胜利很困难”的同时作出一些强硬的姿态。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周恩来认为美国已陷于顾了东方又顾不了西方和盟国不断反对的处境，加上世界人民要求朝鲜和平，所以艾森豪威尔总的政策还是要从朝鲜脱身，停战的趋势不可改变，协定不久仍可签订。周恩来摸透了美国的底，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周恩来要在前线指导谈判的乔冠华研究可否再给美国一个台阶下，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

乔冠华秉承周恩来的指示，仔细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4点意见并重要的建议：

（一）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要就此转变，尚非其时，特别是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看。

（二）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的行动，激怒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

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三) 美国搁起板门店转到联合国，本来想借此压我们，联大压不成，战场又无多少办法，本可自回板门店，但鉴于美国在联大尚未死心，对战场亦未完全绝望，因此虽有少数国家不反对再回板门店试试，美国今天是不会愿意的。

(四) 如果我们正式在板门店通知对方无条件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具体方式可能是：1. 置之不理；2. 以我既未接受其方案又未提出新方案而拒绝；3. 反建议以印度方案为基础复会；4. 坚持不得强迫遣返战俘的原则解决战俘问题。以2、3可能较大。如我以金、彭致函形式，对方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

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毛泽东、周恩来都同意乔冠华这个言简意赅的、看得深看得透的分析和看法。乔冠华的这个分析真正起到了为中央参谋献策的作用，不愧为老练杰出的外交家，当世才子。

毛泽东、周恩来做好了军事、外交的两手准备，站稳了脚跟以对付美国的政策之后，便利用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机会，对美国、对艾森豪威尔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逼其重新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

毛泽东1953年2月7日的讲话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在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

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周恩来在2月4日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有利、对美国不利后，非常坚定地说：“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必须继续加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壮大起来。我们要动员人民增产节约，努力工作，来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全世界人民都清楚地看到，中国已经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而进入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建设时期，中国人民是充满了和平建设的热情和维护持久和平的愿望。可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中国人民必须警惕和揭露侵略者的战争阴谋，必须随时准备着与敌视中国人民、阻碍中国建设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是并不惧怕战争。如果美国新政府还有意用和平方式结束朝鲜战争，那么它就应该无条件地恢复板门店谈判。朝中方面准备按照已经达成协议的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立即先行停战，然后再由‘和平解决朝鲜委员会’去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因为这样，既可迅速满足有关战争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对于立即停止现行战争的热望，又可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远东其他有关问题开辟道路。如果美国新政府仍然执行杜鲁门政府的政策，仍然无意于恢复板门店谈判而继续和扩大朝鲜战争，那么朝中人民在这方面也将继续斗争下去，并且是有了充分准备的。朝中人民深刻地了解，对于帝国主义的挑衅，只有进行坚决斗争，使帝国主义的每一个战争计划都受到粉碎性的打击，每一个侵略行动都遭彻底的失败，才能迫使敌人罢手，取得人民所热望的和平。”

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既是对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又是对他的劝诫，要他打破幻想用冒险政策取胜，还是老老实实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才是美国结束朝鲜战争的出路。

艾森豪威尔进退两难，既不敢冒险扩大战争，又不能以政治讹

诈迫使中国屈服。他除了一面加紧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一面寻求恢复谈判结束朝鲜战争之外，无法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停战是不可改变的趋势，协定不久仍可签订”，只是在寻找一个“体面”的转变的机会和办法而已。艾森豪威尔同杜勒斯终于捡到一把可能打开僵局的“钥匙”，这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952 年 12 月 13 日在日内瓦通过的一项决议，倡议病伤俘虏在朝鲜停战以前先行交换，虽然这个决议已经过去两个月了，但是仍不失为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决定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克拉克下达指令，让他给金日成、彭德怀写信试试看。克拉克奉命后立即写了给金日成、彭德怀的信函。

## 克拉克发讯号战俘问题作妥协

朝鲜人民军金日成最高司令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官：  
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 1952 年 12 月 13 日在瑞士日内瓦通过的一项决议当中，呼吁朝鲜冲突中的双方作为善意的表示，立即采取行动，实行《日内瓦公约》的人道主义规定，按照《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遣返病伤战俘。如在板门店谈判过程中一再向你们申述的，联合国军从一开始就严谨地遵守《日内瓦公约》的人道主义规定，具体而言，已准备好对在它收容下的病伤战俘实施《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联合国军现仍准备按照《日内瓦公约》第一〇九条的规定，立即遣返那些重病重伤被俘人员。我希望你们通知我，你们方面是否已准备好立即进行遣返在你们手中的联合国重病重伤的被俘人员。联合国军联络官将准备与你方联络官会晤，以为公正地查明情况，并为按照《日内瓦公约》第一〇九条的规定而相互交换此种重

病重伤者做必要的安排。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 克拉克

1953年2月22日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总司令办公室

军邮第五〇〇号信箱

机会终于来了，克拉克的来信，显然是一个重要讯号，说明他们又想回到板门店来。既然是一个等了许久的机会，为了争取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早日达成朝鲜停战，就应抓住这个机会。但美国是个头号帝国主义，不给它一点面子弯子很难转，为了中朝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要在战俘问题上做点必要的妥协，于是中朝苏进行紧急磋商。恰巧就在此时，斯大林因脑出血于3月5日逝世了，谈判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去了。

斯大林葬礼中周恩来是站在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中间的唯一的外国党政领导人，受到了崇高的礼遇和尊重，这说明周恩来本人和中国地位的重要。在葬礼期间，周恩来利用空闲的时间同苏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新领导人就国际局势和朝鲜问题以及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交换了意见。紧接着，周恩来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直接从莫斯科去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葬礼，3月21日才返回北京。

经过反复研究和磋商，中朝苏决定采取一个一致的决策和行动步骤，向美国发动一个新的和谈攻势。

3月28日，金、彭复信克拉克：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

1953年2月22日你的来信收到了。

关于优先遣返双方重病重伤战俘问题，双方谈判代表本已



根据人道原则达成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五十三条款的协议，只因朝鲜停战谈判中断，此项协议无法实现，致双方重病重伤战俘至今未能遣返。

现在你方既然表示准备对双方收容下的病伤战俘实施《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方为表示同一愿望起见，完全同意你方所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的病伤战俘的建议。这个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一〇九条的规定处理。同时，我们认为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问题的合理解决，适当使之引导到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使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将以实现。因此，我方建议，双方谈判代表应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我方联络官并准备与你方联络官进行会晤，以确定恢复谈判的日期。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3年3月28日

随即，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名义就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正式声明。

声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1953年2月22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

### 声明重申了停战协定草案的要点：

过去一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奠定了在朝鲜实现停战的基础。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首先，对于举世关心的朝鲜停火问题，双方已经同意，“双方司令官命令并保证其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此项敌对行为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生效。”（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十二款）其次，双方还会商定各项重要停战条件。在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便在敌对军队之间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以防止发生可能导致敌对行为复发的事件。”（草案第一款）在关于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处理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指派的5名高级军官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指派的5名高级军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包括对于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督导，并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事件（草案第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五十六各款）；双方并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和由联合

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在其下配备由上述各国派出的军官为组员组成中立国视察小组，分驻于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君山各口岸，以监督与视察双方对于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条款的实施（条款中准许轮换和替换者除外），并得到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以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草案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各款）。此外，双方还商定“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等问题”（草案第六十款）。

声明明确指出：

如上所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只有一个战俘问题阻碍着朝鲜停战的实现。而且就在战俘问题上，除战俘遣返问题外，双方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对于有关战俘的安排问题的一切条款亦均已达成协议。如非朝鲜停战谈判中断5个多月之久，则这个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了。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声明再次表明中朝两国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并提出新的建议：

关于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特别是该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才是合理的解决。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清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声明强调说明这个新建议提出的原因：

必须指出，我们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的原则，也非承认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战俘中有所谓拒绝遣返的人，只由于终止朝鲜流血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关系到远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一新的步骤，准备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提议在停战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停战的实现。

声明最后指出：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结束朝鲜战争所采取的这一新步骤，完全符合于有自己子弟在朝鲜作战的双方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完全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话，我方这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

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得到朝鲜、苏联的支持。金日成以首相名义于3月31日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新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4月1日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的新建议，并建议联合国中应有中朝两国政府的合法席位。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七届联大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热情支持周恩来的这一“崇高举动”。

周恩来的新建议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国际舆论纷纷表示欢迎，认为这一建议消除了停战的最后障碍，表现了中朝方面谋求和平的真实诚意。

美国艾森豪威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周恩来的新建议先是有些吃惊，继而将信将疑，最后承认其“价值”，并指示克拉克立即研究。

经过双方函电磋商，停战谈判联络会议于4月6日开始举行，僵局很快打开了。4月11日签订了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并从4月20日开始实施。第一批我方遣返给对方朝鲜籍病伤战俘50名，非朝鲜籍的50人。对方遣返给我方朝鲜人民军病伤被俘人员40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战俘100名。我方被俘人员经过在对方战俘营中长期痛苦的生活而回到祖国的怀抱，立即受到良好的诊疗和

亲切的慰问和关心，使他们深感祖国的温暖，对那些尚未被遣返的战俘有着很好的影响。

以后，陆续遣返，我方到4月26日将适于旅行的对方病伤战俘全部遣返完毕，其中遣返美国籍战俘149人，英国籍战俘32人，土耳其籍战俘15人，哥伦比亚籍战俘6人，澳大利亚籍战俘5人，加拿大籍战俘2人，菲律宾、南非联邦、荷兰和希腊籍战俘各1人，朝鲜籍战俘471人，共684人。我方实际遣返的数字比原来通知美方的概数增加14%，这充分表明中朝方面的诚意。美方于5月3日声称遣返完毕，共遣返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5564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1030人。

遣返病伤战俘的协定和实施，特别是周恩来声明提出的新建议，推动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行。4月18日，七届联合国大会根据巴西提案通过决议：“希望病伤战俘的交换迅速完成，并希望在板门店进一步谈判，导致在朝鲜早日实现停战，以符合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这样，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讨论，又从联合国回到了板门店。

4月26日，正是朝鲜的春季，气候温暖、百花盛开、草绿山青、风光明媚，令人赏心悦目。由于朝鲜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热战场所，也是国际局势中最关键的焦点，牵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成为舆论界注意的中心，世界各大通讯社、各大报纸都派有记者在朝鲜采访报道。一听说中断了36个月又18天的朝鲜停战谈判重新恢复了，这样的重大消息、头条新闻，记者们自然要抢着报道，如果能第一个报道出去，其新闻价值最高，也是记者的功劳，还可以提高其身价。所以，这天一大早就有上百名各国记者蜂拥在板门店谈判的帐篷外面。下午2时，双方代表重新走进帐篷。中方代表改由丁国钰接替边章五，柴成文接替解方。

在这次会议上，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提出全部遣返战俘问题

6点具体实施方案：

一、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双方应依照停战协定第三条第五十一款的有关规定，并根据双方所交换并校正的最后名单，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遣返，交给战俘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难。

二、在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的直接遣返完成之后的1个月的期限内，拘留一方应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负责送到一个经双方协商同意的中立国家去，并从其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由有关中立国当局指定地区加以接受和看管。该有关中立国当局应有执行其合法职务和责任以控制在其临时管辖下之战俘的权力。

三、此项战俘的所属国家应有自由与便利在战俘到达中立国之日起的6个月期限内，派人前往该中立国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的战俘解释，消除他们的顾虑。并通知战俘在任何有关他们回返家乡的事项，特别是他们有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完全的权利。

四、在战俘到达中立国之日起的6个月内，经其所属国家的解释之后，凡提出要求遣返的一切战俘，应由有关中立国当局负责协助他们迅速返回祖国，不得留难，此项战俘遣返的行政细节，应由有关中立国当局与战俘所属国家当局协商解决。

五、在本方案第三条和第四条所规定的6个月期满之后，如尚有在中立国看管之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交由停战协定第四条第六十款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六、战俘在中立国家的一切费用，包括其回国旅费在内，应由战俘所属国家负担之。

南日提出上述方案后，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发言重复了他在4月16日给南日信中所提出的三点具体意见。即：

一、中立国为诸如瑞士这样传统上被认为适合于这类事项的一个国家。

二、为求实际可行，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释交中立国家在朝鲜收容。

三、在诸如60天的合理时间内，中立国给予有关各方以机会，来确定在其收容下的人员对于他们的地位的态度。在此期限后，中立国将作出安排以和平处理仍在其收容下的人员。

在谈判中，对方力争得到更多的“体面”。他们反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并且拒绝我方提出的以亚洲国家作为中立国。

5月7日，我方为了推动谈判的进行，对6点方案作了修改，成为8条建议的新方案：

一、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双方应依照停战协定第三条第五十一款的有关规定，并根据双方所交换并校正的最后名单，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遣返，交给战俘所属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难。

二、为了协助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回返家乡，双方同意建立一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停战协定第二条第三十七款所规定的4个国家，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及双方同意的印度，共5个国家各派同等数目的代表组成。

三、双方全部战俘，除本方案第一条所规定的应予直接遣返者外，应在原拘留地点从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和收容下释放



出来，交由本方案第二条所规定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受和看管。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应有执行其合法职务和责任以控制在其临时管辖下之战俘的权力。为保证此项权力的有效实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成员国应各处配备同等数目的武装力量。

四、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接管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之后，应立即进行安排，使战俘所属国家有自由与便利在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受之日起的4个月期限内，派人前往此项战俘的原拘留地点同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的战俘解释，消除他们的顾虑，并通知战俘任何有关他们回返家乡的事项，特别是他们有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完全权利。

五、在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战俘之日起的4个月内，经其所属国家的解释之后，凡提出要求遣返回家的一切战俘，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负责协助他们迅速返回祖国，拘留方不得留难。此项战俘的遣返的行政细节，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双方协商解决。

六、在本方案第四条和第五条所规定的4个月期满之后，如尚有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之下的战俘，其处理办法应由停战协定第四条第六十款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

七、战俘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期内的一切费用，包括其回国旅费在内，应由战俘的所属国负担之。

八、本方案的条款及由此而产生的安排应使全部战俘知晓。

这一方案的提出，使双方的立场更加接近，受到国际上的普遍赞扬。印度总理尼赫鲁于5月15日发表声明，主张以中、朝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基础，并赞成召开大国最高级会议讨论和平问题。缅甸政府也发表声明，赞成以中朝建议作为朝鲜停战谈判的

基础。

美方代表只就我方建议提出若干问题进行询问，要求我方加以说明，未提出任何积极性的意见。

这时，美国同南朝鲜李承晚的矛盾不断加深。李承晚看到板门店双方联络组会议迅速发展，一旦恢复病伤战俘协定达成，恢复停战谈判势在必行，这样对南朝鲜不利，必须要美国允诺一些条件。4月9日，李承晚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抗议信”，坚决反对恢复谈判，说“如果达成一项容许中国人留在朝鲜的和平协议，大韩民国将认为它有理由要求除了那些愿意参加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以北的国家外，所有盟国都得离开这个国家”。他说：“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留下，那么它们得跟随着前沿阵地的战士支持他们，并用飞机、远程大炮和在朝鲜半岛周边的炮舰来掩护他们。”甚至威胁说，如果美国想要把它的部队撤离朝鲜，他可以这样做。

会谈越是要接近成功，李承晚反对越激烈，反美集会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在一次集会上他宣称：“无论在板门店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目标仍然不变——我们永远的目标就是从南方到鸭绿江统一朝鲜。你们必须继续战斗直至你们到达鸭绿江。”

这样，美国不得不花点时间解决它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因此，在谈判桌上又采取拖延政策，提出一些明知我方不能接受的主张和建议。如5月13日，美方代表提出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对中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和战俘所属国家的解释工作加以种种限制。以后又干脆提出休会，停战谈判又搁置下来了。

## 十二、停战协定终于签字

1953年夏季，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形势对我非常有利。反登陆作战做了充分的准备，我军后方防御体系日益巩固，既可攻又可守，在战略上更加主动，敌人则日趋被动。在兵力上我也占绝对优势，我军总兵力已达180万人，25个军，敌人120万人，24个师。我作战物资也很充足，兵强马壮，全军上下积极求战，士气十分高昂。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停战谈判是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谈”。志愿军代司令兼政委邓华主持召开兵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邓华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作了“关于举行夏季反击的几点意见”的报告，研究制定了战役指导方针和部署，确定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伪军为主。稳扎狠打，由小到大，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

为了配合板门店谈判，当美国提出就地释放朝鲜籍战俘的建议以拖延谈判，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将原计划于6月初发起的夏季反击提前到5月中旬，并对敌人要“大动手”“狠动手”，用铁拳头教训一下敌人，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

5月13日，我二十兵团所属的六十、六十七军和九兵团所属

的二十四、二十三军，先后在火炮支援下，向美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 8 个师的正面支撑点发起猛烈攻击。由于我军突然反击，攻势凌厉，敌人措手不及，战至 26 日，我军阵地已向敌方推进 2 平方公里，歼敌 4100 多人，取得了反击战的初步胜利。

美方眼看军事上对它不利，便在软硬兼施初步压服李承晚之后，不得不请求于 5 月 25 日上午 11 时复会。美方考虑在谈判桌上提出的“就地释放朝鲜籍战俘”，中朝方坚决反对，难以再谈下去，便准备在接受我方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方案，但鉴于美李关系，美方既怕事先通知李承晚遭到他的反对，如不通知他又怕他提出异议，所以华盛顿指示克拉克，要他在 5 月 25 日在板门店开会前一个小时偕同美国驻南朝鲜大使布里格斯去拜会李承晚。

克拉克照美国政府的指示，对李承晚提出 4 点保证，即：

一、预先声明，如果共方破坏停战协定，在韩国同共方作战的十六国将团结对敌，那时十六国所采取的报复将不仅限于韩国国土之内。

二、将韩国军队扩建到 20 个师，并援建相应的海军和空军。

三、美国政府保证最少提供 1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四、直到朝鲜真正实现和平，保持在朝鲜和沿海的战备态势。

作为上述 4 项保证的代价，美国要求南朝鲜当局停止“反对停战运动”，一旦停战协定签字必须遵守，李承晚的军队指挥权继续委托给联合国军司令部。

李承晚觉得 4 条保证捞到了实惠，但是这还不够，有可能得到更多。于是他故意板起面孔说：“我非常失望，你们的政府变化无

穷。你们无视韩国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要坚持的是把中共军队从我国赶出去”，“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和平，你们的压力对我毫无用处，我们希望生存，我们希望活下去，我们将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求任何人为我们打仗，我们可能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依赖外交来援助我们。十分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同艾森豪威尔合作。”克拉克没有理会李承晚的这番话，而李承晚当即通知参加板门店谈判的代表立即撤回去，不再参加谈判会议了。

美国立即换了一位泰国将军作为代表接替南朝鲜代表，会议照常开，方案照常提，并建议谈判转入秘密的行政性会议。李承晚恼火了，5月30日他再次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接受任何一项允许中国共产党人留在朝鲜的停战安排，必将意味着朝鲜甘愿接受死刑的判决。

艾森豪威尔为了安抚李承晚，又作出3条保证：

- 一、美国将不放弃他的努力，用一切和平的方式实现朝鲜的统一；
- 二、在缔结一项可以接受的停战条件时，我准备立即按照过去美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之间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两个英联邦成员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的原则，同它谈判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 三、美国政府在取得必要的国会拨款条件下，将继续向大韩民国提供经济援助，用以恢复其饱受摧残的国土。

艾森豪威尔同时邀请李承晚访美。

李承晚考虑了以后，拒绝了艾森豪威尔访美的邀请，他托词说，这个时候他不能去，因为反对停战示威在汉城已经搞起来了，朝鲜局势使他片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其实，他懂得，如果这个

时候访美，到了华盛顿，一切只好听从美国人的摆布了。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历史文件上痛苦地说：“美国或者联合国军的大量说理、劝导或是抗议，无一能够打动顽固不化的李承晚总统放弃他那一意孤行的和潜在的自杀性的方针。”

## 美对韩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美国决定对李承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让朝鲜的美军司令部准备一个“永远准备着”的计划，克拉克指示接替范佛里特的第八集团军司令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拟定了一个“从最坏处着眼的应急计划”，即李承晚可能把韩国军队撤离联合国军指挥之下，这样将使联合国军阵地全线崩溃，因此“计划”预想了三种紧急情况 and 采取的紧急措施：1. 韩国军队对联合国军队的指示不予置理。那么，美国和联合国部队将着手保卫大城市周围的重要地区；海军和空军将继续处于戒备；对韩国军队和政府的情报活动将增强。2. 韩国军队单独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将作出某种“保护性”撤退以确保基地之安全；韩国军队将被解除武装，代之以可靠的联合国部队；平民的动向将受到控制。3. 最极端的情况，韩国军队和平民同联合国部队“公开敌对”。克拉克在5月27日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概述永远准备着计划的这一部分的措施说：“李承晚将被邀至汉城或其他地方——任何能使他离开釜山（韩国临时首都）的地方。联合国军司令官将在合适的时候开进釜山地区并拘捕5至10名在李承晚的专横行动中担任过领导人的韩国高级官员……并通过韩国军队总参谋长实行军事管制法，直至取消之时为止。如果李承晚仍拒不接受联合国军的停战条件，他将被单独扣押在警卫森严之处。联合国军司令部将着手建立一个由首相张泽相

领导的政府；如果他拒绝，则将在韩国军队或直接在联合国军领导下建立一个军政府。”

“永远准备着”计划被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欣然接受，然后于5月29日呈交国务卿杜勒斯和国防部长威尔逊审批。杜勒斯、威尔逊命令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克拉克，在“极其紧急”的情况下，他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你的部队完整”。等于授权给克拉克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搞掉李承晚。

另一方面，杜勒斯、威尔逊等则准备对李承晚采取胡萝卜政策。即如果李承晚同意接受停战条件，则美国同韩国签订一项长期安全条约。

5月30日，艾森豪威尔决定把一项安全条约作为李承晚接受停战条件时正式的附属条件提出。但是他不希望把这一建议公开，以免被共产党抓住，在和谈中纠缠不清。

与此同时，板门店谈判进展迅速，朝中方面已暗示美国方面，大体上同意联合国军5月25日的建议，很明显只要澄清几个细节就可以达成协议了。

克拉克奉命将上述情况通知李承晚。这天，李承晚的妻子奥地利出生的弗朗西斯卡没有在座，过去她总是穿着一套飘拂如仙的朝鲜服装参加他们的谈话。这说明李承晚的情况不好。克拉克告诉李承晚说，“我国政府已经决心向前走，并在5月25日条约基础上签订协定：马上就要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现在只有几个问题留待解决了。”布里格斯大使将在今天带来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私人信件，概述美国将采取的支持南朝鲜的步骤，“除了不以继续战斗来保障朝鲜的统一之外”。

李承晚怒气冲冲激动地说：“美国采取这种绥靖策略是犯了一个大错误，韩国政府决不接受这些停战条件；它将打下去，即便这意味着自取灭亡也罢，而且我李承晚将领导战斗。现在可以自由自

在地采取认为是合适的步骤了。”

克拉克要他对最后一点作出详细阐述，但是由于过于激动，他只是闪烁其词。克拉克告诉他：“单独进攻是多么徒劳无益，因为……没有必要的后勤支持，这将导致自己和国家的毁灭。”李承晚反驳说：“我的国家即将要变成一个共产党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和我的人民现在死和以后死都一样。”

克拉克同李承晚的谈话不欢而散。

后来克拉克在向华盛顿报告这次谈话时强调说，虽然他尚不能肯定李承晚是否已下定决心要破坏和平，“但他确有能力和违反停战条件使联合国军大为难堪”。这位韩国总统“根本不讲道理，而且拿不出理由，他自己是唯一知道他将要走多远的人，但是毫无疑问他要以此来吓唬别人，直至最后”。“我目前看不到有任何解决办法，莫如静待事态发展。”这种“事态发展很快就要来了”。

## 志愿军反击战以打击李承晚为主

周恩来、毛泽东洞悉美国同李承晚之间的矛盾，以及李承晚阻挠停战谈判的顽固态度，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二阶段的反击，原以西线为重点的打击美军的计划，改为以打击李承晚为主，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击英军的方针，以分化敌人，打击李伪军的气焰，促进停战谈判。

5月27日，志愿军司令部命令前线部队第二十兵团、十九兵团和九兵团，集中力量打击北汉江两侧的李伪第八、第五两个师，并准备吸引和粉碎可能从纵深机动的两个师以上的反击。

6月4日晚10时整，繁星满天，弦月如弓，虽已进入夏季，却并不热，感到舒适宜人。这时我各种火炮突然齐声轰鸣，像放



鞭炮一样，响个不停。整整打了20分钟，接着我喀秋莎火箭炮二十一师又连着发了两个齐放，打完后，李伪军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地上腾起的烟尘是火红的，天上翻滚的云彩也是火红的。

9日夜间，我六十军突击部队已秘密进入敌阵地前翼侧隐蔽处潜伏。10日晚，六十军以3个团的兵力，在各种火炮支援下，采取多梯队的方式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发起冲击，不到一个小时，全歼守敌一个团，首创了阵地战以来一次战斗攻击歼敌一个团的范例，至6月15日，六十军把阵地向敌方推进42平方公里。

6月11日，六十七军将8个连兵力潜入敌阵地前的我秘密构筑的屯兵洞。12日晚，六十七军以3个团的兵力，在各种火炮、坦克的支援下，向敌人的“横范阵地”号称“京岁堡垒”的伪第八师二十一团主阵地突然发起冲击，迅速占领阵地，全歼了守敌，把阵地向前推进了12平方公里。十九兵团的一军、四十六军，九兵团的二十三、二十四军也向敌人发起了反击，分别将阵地向敌方推进了1.5平方公里和1平方公里，共歼敌41000余人。志愿军的第二阶段反击战，使克拉克和华盛顿的决策者十分震惊。逼于形势，美国终于同意以我5月7日8点建议为基础，在6月8日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文件。协议说：“双方同意将停战协定草案第五十一款关于处理直接遣返的战俘的规定作适当的修改，而将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处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共11条26款。要点是：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应于停战协议生效后60天内由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下释放出来，在朝鲜境内交给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代表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

战俘所属国家应有自由与便利，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战俘之日起派遣代表向一切附于该国之战俘进行90天的解释。90天之

后如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其处理应交由政治会议在 30 天之内解决。在此之后尚有未行使遣返权利的战俘，而政治会议又未为他们协议出处理办法者，应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 30 天之内宣布解除其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并协助他们前往他们申请要去的地方。

这个一年多来唯一阻碍停战达成协议的战俘遣返问题解决了，这就意味着朝鲜停战协定不久便要正式签订了，朝鲜的和平便要实现了，为之而奋斗的主张和目的便要达到了，它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啊！

周恩来在当天夜里从他的办公室里打电话给李克农，祝贺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并要他向谈判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转达他的慰问。那些为谈判日夜操劳的人们为此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感谢中央的关怀。同时每一个人都想到这场谈判斗争中最操劳、最辛苦的是它的决策者、指挥者周恩来，每一次谈判，每一场斗争，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日理万机，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他都要管，国际问题、外交工作他要管，他还要协助毛泽东指挥朝鲜战争。真不知有多少个不眠之夜，里里外外，在那里紧张工作，不知道累成什么样子。但是，大家感到有这样的总理、这样的外长真是国家的幸福，在这样的领导人领导下工作，即便如何辛苦，如何累，即便是在前线牺牲了也是心甘情愿的，绝无半点怨言。

6月8日以后，各方面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忙碌起来了。

6月11日，章汉夫副外长在外交部接待室里分别接见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瑞典大使、瑞士公使、波兰临时代办，说明朝中代表团已与联合国军代表团协议，由谈判双方分别邀请五个中立国，朝中方面愿意由我国政府正式邀请五中立国同意按照战俘遣返问题协议条款参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五中立国家分别于6

月11日、12日、13日答复我外交部，一致接受我政府邀请，参加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

在板门店谈判帐篷里，于6月16日双方参谋人员按照实际接触线重新划定了军事分界线，我方向南推进了140平方公里。在另外一个帐篷里，双方的文字专家正在逐条逐段逐字地重新审定停战协定的文本。

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战士们在赶修开城到板门店的公路和桥梁。

其他有关工作人员和各国记者也陆续赶到板门店来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也预定在6月19日离开北京前来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正在指挥进行第二阶段反击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部，于6月15日傍晚接到彭德怀从北京打来的电报说：“据我停战谈判代表团电话称：军事分界线已基本上达成协议，以今晚（6月15日）24时为准，在本晚24时前敌我双方攻占之阵地均为有效，在此以后（零时起）即作为16日计算，敌我攻占之阵地均属无效。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促进停战实现，应以明日（16日）起坚守阵地，不再主动出击，但要提高警惕，严阵以待，对敢于侵犯我阵地之任何敌军坚决给予歼灭之打击，切不可有任何疏忽。”中朝联合司令部于15日晚7时，向志愿军各兵团和朝鲜人民军各军团发出了《16日起停止主动向敌攻击》的命令。

### 大局已定李承晚搞小动作

“丁零零、丁零零”，总理办公室的军用电话铃声响了。周恩来拿起电话，说：“我是周恩来呀。”

“总理，我是彭德怀呀！”

“啊！彭老总，天快亮了，你还没休息？”

“你不也没有休息嘛！总理！我的身体比你好，你的事情太多太忙，得注意休息，可不能累垮了，你是我们国家的大管家。”

“你不是要回朝鲜去签订谈判协定吗？”

“是的，我明天晚上走，正是为这事才打扰你。我想在临走之前，见见你和主席，看还有什么交代的和注意的事？”

“那好，我报告主席，你就好好休息，等候我的通知。”

6月19日下午，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周恩来、彭德怀先到，正在那里亲切交谈，研究签字的事，毛泽东急急忙忙从他的卧室里走进来，抱歉地说：“让你们两位抗美援朝的大功臣在这里等我。”他一边朝着沙发走来一边说，“美帝国主义这只不可一世的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次我们就摸它一下，而且它也老老实实地服输了。这次美国可丢了大面子了！”

“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第一次遭到这样大的失败，损兵折将40多万人。”周恩来说。

“连李承晚的军队和其他十几个国家的军队总共被我毙、伤、俘达100多万。”彭德怀补充说：

“击落击伤敌机近2万架，击毁击伤坦克2600多辆、汽车4000多辆、各种炮1370多门，击沉击伤各舰艇257艘。我军缴获敌飞机11架，坦克370余辆，汽车9000多辆，装甲车160多辆，各种炮6300多门，各种枪11万多支近12万支，火焰喷射器170多具，炮弹、枪弹不计其数。各种通讯器材5700多件。”

“打得好，打得痛快，打出一个局面，打出一个停战协定。不仅保住了北朝鲜的疆土，越过了三八线，而且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保卫了世界和平。可以说是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了和平。”周恩来又说。

“这都是我们彭大将军的功劳。”毛泽东笑着对周恩来说，“这

说明我们选将选对了，三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不、不，这不能算是我的功劳，是主席、总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没有你们的胆识、雄才大略，敢于冒着很大的风险，独立自主地作出抗美援朝这样震惊世界、亘古未有的重大决定和英明的战略决策，我彭德怀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坚决执行你们的命令和指挥做了一些具体的事。而且还依靠全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一起并肩作战的朝鲜人民军、金日成首相的全力支持，才有今天的局面。”

“你说得还不完全，李克农、乔冠华和谈判代表团也有很大的功劳，他们同志愿军一样英勇善战，以极大的坚定和耐心，击破敌人在谈判桌上的种种阴谋，最终迫使敌人达成停战协议。这要归功于周恩来同志领导有方。”毛泽东说。

“不对，主席，这个功劳不能算在我的头上。重大的决策都是你决定和批准的，我同彭老总一样只不过做点具体工作。”周恩来谦虚地说。

“周恩来同志你一向谦逊，从不争功争权，值得全党学习，但是在国际问题上、外交上，你的经验多，手面大，见识广，知识渊博，我早就说过，我不如你，在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一个能赶上你的，当仁不让嘛。”毛泽东停顿一下说，“今天我们不谈这个，让后人去评说吧！总之，我们是把美国这只老虎尾巴给抓住了，狠狠地揍了它一顿，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吧。今天晚上老彭要回朝鲜去签订停战协定，周恩来你有什么指示和要注意的问题？”

“现在大局已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但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很狡猾，反复无常，要防止它耍新花招。李承晚很顽固，刻骨仇视和平，6月18日午夜，他私自放了关押在南朝鲜战俘营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0多人，企图以此破坏停战协定的签字。很显

然李承晚这一行动是美国纵容和默许的，这是一个讯号，值得注意。因此我考虑协定可以暂时不签，拖一下，要与美国、李承晚进行坚决斗争，特别要发动国际舆论谴责李承晚、美国破坏协议，违反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逼迫美国承认错误，承担这次事件的责任，直到美国和李承晚作出切实保证，不再违反和破坏协定，保证协定顺利执行，那时再正式签订协定。同时，也请德怀同志到朝鲜前线后，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征求邓华他们和金首相的意见，有无必要在军事上再教训一下李承晚，让他老实点。但是斗争要适可而止，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朝鲜的和平。至于被李承晚扣留的战俘恐怕是要不回来了，但是现在不能松口，要利用这件事在政治上打击美、李。”周恩来稍稍思考一下又说，“停战协定签订要好好宣传一下，宣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成就，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胜利，宣传朝鲜人民为保卫祖国进行的英勇斗争，宣传苏联、东欧民主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援，宣传和平战胜战争，宣传正义战胜邪恶。还要宣传停战协定的签字只是解决朝鲜问题第一步，要举行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政治解决朝鲜问题，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让朝鲜人自己决定朝鲜的命运。另外还要开一些庆祝会、欢迎会、报告会。你回来的时候准备在车站开欢迎会欢迎你凯旋，然后用什么名义什么方式举行报告会。这是激发人民爱国精神、鼓舞斗志的好机会好方法，把人们的热情引导到祖国的经济建设增强国力上来。”周恩来说，“我可能讲得远了一点，看主席有什么指示？”

“恩来同志讲得很好，讲得深，看得远，我都同意。我也赞成给李承晚一点颜色看看，但是否要这样做，请老彭到那里后，权衡一下利弊，报告我们再定。”毛泽东完全肯定周恩来的意见。

彭德怀起身说：“我完全同意恩来同志的意见，将坚决按照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办，请你们放心，像前年出征时一样，决不辱使

命。”彭德怀是个爽快人，说完了拔腿便走。

周恩来赶忙说，请你代主席和我问候金日成同志，祝贺朝鲜同志取得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赶紧补充说，还要问候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和谈判代表团的同志们，他们辛苦了。

再说李承晚这个顽固分子，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私自于6月18日夜以“就地释放”名义，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0多人离开战俘营，被押解到李承晚的训练中心，将这些被扣留的战俘编入南朝鲜的军队中去。李承晚的这一罪恶行动，立即在全世界引起愤怒和谴责。印度总理尼赫鲁于6月25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召开联合国特别紧急会议，讨论因李承晚释放战俘而引起的严重局势。英国首相丘吉尔因遭到议员们的严词质问，不得不致电李承晚提出抗议，说“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背叛行为”。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其他盟国政府也纷纷向华盛顿提出抗议和质询。艾森豪威尔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指示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作出交代，一方面于6月18日给李承晚发出一份急电，严厉地对李承晚说：“我怀着严重关注获悉，你已下令释放被联合国军司令部拘押在它管辖下的集中营的北朝鲜战俘，看守这些战俘的责任部分地被联合国军司令部付托给大韩民国武装部队，你的命令是由你们公开使用暴力而得以执行的，从而违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

“1950年7月15日，你正式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鉴于联合国为大韩民国而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你授权他和在朝鲜境内或附近海区行使联合国军司令部授权的那些司令们，‘有权在目前处于敌对状态期间指挥大韩民国海、陆、空三军’。克拉克将军和泰勒将军报告我，在最近几天内，你已给了他们无条件的保证，即你在没有和他们磋商之前，将不会采取与以上所谈相抵触的片面行动。”

“要是你坚持目前的行动方针，就无法使联合国军司令部继续同你一致行动，除非你准备立即毫不含糊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处理并结束目前的敌对行为，否则就将另行安排，因此，联合国军队总司令现已授权将根据你的决定而相应采取必要的步骤。”

“作为你个人的朋友，我希望你会找到一个立即纠正这一局面的方案。”“因为我感到不得不对我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国恪守信用。”

杜勒斯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怒斥李承晚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权威的侵犯”，随后他又发信给李承晚，措辞更为激烈，并通知他，美国派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前来同他商谈。

6月20日，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在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宣读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在6月19日致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的信件。全文如下：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

我们收到你方哈利逊将军1953年6月18日致我方南日大将的来信。

你方在来信中说，被拘留在你方第五、六、七、九号战俘营里的朝鲜人民军战俘25000人，是6月18日在南朝鲜政府最高级的事先秘密筹划和缜密配合之下，并得到南朝鲜警卫部队和外界的援助“越出”战俘营“逃”走的。可是，南朝鲜李承晚却已正式承认，这些战俘是他命令南朝鲜警卫营部队“释放”的。

仅仅在十天之前，双方才签订了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而在你方直接控制之下的南朝鲜政府和军队，却已悍然地公开破坏了这个协议，在所谓“释放”的命令之下，经过特务、警卫部队和外界的里应外合的行动，胁迫占全部不拟直接



遣返的战俘总数一半以上 25000 人离开战俘营。因此，我们对于这次事件的性质，不能不认为是极端严重的。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好久以来即在叫嚣着要“反对朝鲜停战”，“向北进攻，统一全国”，“解放所有‘拒绝’遣返的朝鲜战俘”。你方对于这一问题，不是不知道的。可是你方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来预防并阻止这次事件的发生。这就证明你方是有意纵容李承晚集团去实现其久已蓄意的破坏战俘协议，阻挠停战的预谋。我们认为，你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

我方早就一再提请你方注意：你方所一贯宣传的所谓“防止强迫遣返战俘”，完全是无中生有，根本不曾发生的。相反地，强迫扣留战俘的可能性却是时刻存在着和增加着的，因而而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现在发生的这次李承晚“释放”和胁迫战俘事件，证明我们所反对的强迫扣留已经进一步地成为不容置辩的事实。而你方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所表现的错误立场和纵容态度，不能不直接影响这次事件的爆发和即将签字的停战协定的实现。

鉴于这次事件所产生的异常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不质问你方：究竟联合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方面的实施有什么保障？如果包括在内，那么，你方就必须负责立即将此次所有“在逃”的，亦即“释放”和胁迫扣留并准备编入南朝鲜军队中去的 25952 名战俘，全部追回，并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我们等待着你的回答。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元帅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人民日报》于6月22日以《美方必须对强迫扣留战俘负责》为题发表社论。社论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美国事先就知道李承晚要私自“释放”战俘，破坏停战协定，毫无疑问美国是纵容、默许李承晚这样做的，因此美国负有严重的责任，必须承认错误，作出保证，以后不再破坏协议。

谈判桌上，我方紧紧抓住这个问题，谴责李承晚和美国，要美国承认错误、交回被“释放”走的战俘，并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再说，多谋善断的大将军彭德怀于6月20日由北京赴开城，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他了解情况之后，根据临行前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精神，途经平壤时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

毛主席：20日晨抵安东，南北朝鲜均降雨，故白日乘车至大使馆，与克农、邓华均通电话。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6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15000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明21日见金首相，22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

彭德怀 6月20日

中央接电后，毛泽东、周恩来商量后，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6月20日22时电悉，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再歼灭伪军两万人极为必要。

## 再次严惩李伪军

这时，李伪军在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4个师的阵地更加突出，态势对我极为有利，同时我军已查明了敌人第一道防线阵地的设施情况，我方已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和400多门大口径火炮，又有第一、二次反击作战的经验，军队士气很高，也有雄厚的物资基础，加之李承晚因为私自释放战俘，破坏和谈，很不得人心，因此，政治上对我极为有利，狠狠地打击一下李伪军，美国也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在彭德怀亲自主持下开会研究，决定立即在全线发起第三次攻击作战。随即指示各个兵团、各军原预选攻击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坚决歼灭之；如新选目标应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对美军及其他外国军队仍不做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犯之敌，均必须给予坚决打击。

7月13日晚，昏天黑天，异常闷热，我军1000多门火炮，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向敌人猛轰，喀秋莎火箭部队两个师，向敌人连打了三个齐放。接着我二十兵团的3个集团同时向敌4个师25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迅猛突击。仅一个小时以后，我军突破敌人阵地。二十兵团西集团突破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攻当面之敌，采取渗透迂回的战术向敌后纵深猛插。一个13人的侦察班，在副排长杨育才的带领下，化装成护送美军顾问的南朝鲜士兵，接连混过敌人三道严密警戒，出其不意地直抵敌首都师第一团，也即是有名的白虎团之部。正赶上敌人指挥所开会，他们便突然开火射击，当场毙伤敌伪团长以下45名，活捉19名，捣毁了伪团部和通讯联络，该团很快溃乱。接着，又乘黑夜堵截溃逃之敌，

歼灭了一个位于白虎团团部附近的炮兵营大部和乘车来援的伪首都师装甲团二营大部，击毙该团团长。

7月14日，大雨如注，雷电交加，我军乘在雷雨天敌航空兵活动不便，迅速扩大战果，四集团于下午攻占了梨宝洞、间榛岬一线，六十八军二〇四师在激战中生俘了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

二十兵团中央集团突破后，左翼一九九师在对轿岩山的攻击中，遭敌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右翼二〇〇师于当夜突破后，迅速向敌纵深发展，占领了龙渊里、东山里，割袭了伪第六师防御，使轿岩山和峰火山两敌侧后受到威胁，发生动摇。

二十四军突破后迅速歼灭了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之敌，黄昏前占领了432.8高地及杨谷以北地区，保证了二十兵团右翼的安全。

至14日晚，金城川之敌已全部被我肃清。我军行动对敌金化要地造成严重威胁，损失惨重，敌人描述说：“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赴后继攻击这个地区的大韩民国的防线，在共军的猛攻下，前哨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了。”

伪军遭到痛击后，美、李间的那种关系更加微妙了，李承晚埋怨美国见死不救，只顾自己，美国埋怨李承晚无能，美伪之间矛盾加深。为了挽救败局和调整美、李之间的关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泰勒于7月16日匆忙赶赴前线，稳定军心，部署反扑。当日敌先后以伪三、六、八师残部及伪五、七、九、十一师和美三师等部向我发起反扑，企图恢复失地。17日，敌纠集6个团的兵力，在100余架飞机和大量炮火支援下，向我东集团阵地猛攻，我军与敌激战终日，后考虑到我军阵地过于突出，又背水作战，除留一个营坚守461.9高地有利地形外，其余撤至金城川以北，中、西集团也做了适当收缩。从18日起，敌人反扑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中央集团，我军与敌军展开激烈争夺战，牢牢地守

住阵地，给敌以重大杀伤。东集团阵地，敌人企图夺回461.9高地，但未能得逞。一直战斗到7月27日，我军一共歼敌5万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造成了对中朝方面极为有利的态势。

我军的节节胜利，使敌人处境更加不利，因李承晚私自“释放”战俘，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谈判桌上又理屈词穷。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考虑，只好向朝中方面作出保证，把停战协议签了，拖下去很不利。所以就在金城战役的同时，美方一方面派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与李承晚进行谈判，再次实行安抚，如签订美韩安全条约，第一次付给两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扩编韩国军队为20个师；政治会议前美朝举行高级会谈。这样李承晚给艾森豪威尔一封亲笔信，书面向美国保证不再阻挠停战协定的实施。与此同时，让克拉克复金日成、彭德怀6月19日的信，保证停战条款的执行。信的全文如下：

朝鲜人民军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

联合国军当然同意，约25000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逃亡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并且不幸得很，对于双方热诚争取的早日停战也无助益。联合国军通过哈利逊将军1953年6月18日的函件，立即将关于损失了这些战俘的事实通知了你们，我们觉得你们应该尽早地得到这一消息。然而在你们6月19日的来信中，我注意到你们为了某些理由并未接受我们所正确向你们报告的现实情况，你们且对事实作了若干不正确的说法，为了真诚地努力于达成早日的停战，我将进一步澄清这些事实。

虽然我们自动地与准确地提出了这些事实，你们似乎仍然认为战俘的“逃亡”与他们在大韩民国政府命令下的“释放”

是矛盾之词。正如现在你们已清楚知道的，事实是这些战俘冲破监狱的围墙与障碍物而“逃跑”了，除掉那些已被捕者外，都已经消失在平民中间了。他们是被“释放”的，因为大韩民国政府未经联合国军知悉，并违背联合国军竭力策划并布置了此次逃跑，而大韩民国军的保安警卫并没有做什么真正的努力以阻止逃跑。

在回答你们来信中所问的问题时，我相信你们认识到我们双方寻求的停战是一个双方军事司令官间的军事停战。联合国军是一个军事司令部，和你们6月19日来信中所表示的意见相反，它并不对大韩民国行使权力，大韩民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其政府是该国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自决的产物。大韩民国军是由其政府置于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的，以便更有效地击退对大韩民国的武装侵略。我相信你们应当清楚地知道，由于大韩民国所做的承诺，联合国军的确统率大韩民国军。在这次事件中，该政府违背了其承诺，通过了认可的军事途径以外的途径对某些韩国部队发布了我所不知的命令，容许战俘逃跑。

你们又问，朝鲜停战是否包括李承晚总统所代表的大韩民国？另一密切相关的问题表示你们企图知道，对南朝鲜方面而言，停战协定的实施有何保证。在这里有必要重申：我们所寻求的停战是双方司令官之间的军事停战，并涉及双方司令官所能使用的部队。停战协定中某些规定需要大韩民国当局的合作，这一事实是被认识到的。兹向你们保证：联合国军与利害相关的各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取得大韩民国政府的合作。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御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我们之愿意这样做，对你们应该是明显的，因为我们已经同意了“职权范围”中要求联合国军采取某些行动以保证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与其人员的安全的那些部分。

令人惋惜的是，你们竟声称联合国军纵容了战俘之逃亡。除了与昭彰的事实相反以外，这种非难是趋于阻碍，而非促成停战协定的。联合国军正继续努力追回已逃亡的战俘。但如果这些战俘可以追回相当的数目，则会是不现实的，而且会引起误解的，因为他们已经消失在居民中，而这些居民是有意庇护与保护他们的。你们毫无疑问地认识到，对我们来说，要把这些战俘全部追回，和对你们来说，要把你方在敌对行为进行期间所“释放”的5万南朝鲜战俘追回来，是一样的不可能的。你们当然了解，敌对行为的终止将有助于这些逃亡的朝鲜战俘返回你方，如果他们不反对这种回返的话。按照停战协定草案第五十九款的规定，这些逃亡战俘，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在停战生效后前往你方。

停战签字后，那些期望被遣返的战俘的交换将包括你们在1952年4月所报道的12000名我方人员，加上自该日以来被俘的现在你们手中的其他人员，而与此相对照，则约有74000名你方人员，包括约69000名朝鲜人现在我们手中，而且准备交还你们。

这封信是联合国军的一种真诚努力，来使你们得以知晓事实。在建议双方代表团立即会晤，以交换关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每一组成部分能以准备工作的时间的材料，以使停战的生效日期得以确定，并且在接到那项材料时，由我们双方各自的代表团所达成的停战协定得以即行签字。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 克拉克  
1953年6月29日于联合国军总司令部

朝中代表团研究了克拉克的信以后，认为虽然克拉克来信中已经保证，在停战协定实施上取得李承晚的合作，并说“遇有必要之

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防范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但这不够肯定，美国人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一定要在会场上把6月19日金日成、彭德怀信中所提出的质问逐条落实在文字上，把它扣死，公之于全世界。经请示周恩来批准，于7月7日以金日成、彭德怀名义再次致函克拉克。全文如下：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

你在1953年6月29日复信中，承认了李承晚集团胁迫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离开战俘营并强迫扣留他们是一个严重而不幸事件，这是对的，但你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和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切照章的事实都证明联合国军是不能完全推卸对于这次事件的责任的。南朝鲜政府和军队对于这次事件的预谋，早有表示，你方是知道的，但你方并未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事件发生后，你方不仅对于在联合国军控制下的南朝鲜保安部队胁迫离营的破坏战俘协议的行为未给以任何有效制裁，而且在我方6月19日去信提请你方应充分注意之后，你们仍然听任南朝鲜保安部队继续胁迫战俘离营，使李承晚集团强迫扣留战俘的总数达到27000余名，其中并包括有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50余名。在你方首席代表哈利逊将军6月18日来信、你的6月29日复信中，均表示正在努力追回“在逃”的战俘，但你同时又说，要把这些战俘全部追回，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你方的宪兵却奉命不得干涉任何“逃跑”的战俘，听凭他们被强迫到李承晚的军事训练中心去报到。联合国军这一期间所采取的态度，至少在事实上是纵容了李承晚集团放肆地进行其破坏停战协议和阻挠停战实现的活动。

你方企图将我方于停战谈判前在战场上释放战俘的人道行



为与南朝鲜保安部队在战俘协议签订后胁迫战俘离营的破坏行为相比拟，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方对于这次“在逃”的战俘，在任何时候，都负有全部追回的责任。必须提出警告：李承晚集团现在还在叫嚣要继续“释放”亦即强迫扣留剩余的8500多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正在勾结蒋介石特务企图胁迫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离开战俘营，以图彻底破坏双方已经签订的战俘协议。我们认为，你方对此，必须负起绝对责任，保证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你来信保证，联合国军在必要处将尽其所能建立军事上的防御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的实施，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但你方对于南朝鲜政府和军队遵守双方代表团所达成的停战协定的保证，表示尚无确实把握。而且李承晚集团一直还在叫嚣“武力统一朝鲜”，单就这一点论，已足证明三年前的侵略究竟来自何方。现在，联合国军如果继续纵容李承晚集团，并容许其进行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性的种种预谋，则即使朝鲜停战签了字，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侵略仍然随时可以爆发。因此，我方认为，你方对于南朝鲜政府和军队在遵守停战协定及其一切有关协议上必须采取有效步骤，方能保证朝鲜停战不受破坏。

综上所述，虽然我方对于你方的答复不能完全满意，但鉴于你方表示了努力达成早日停战的愿望及所提供的保证，我方同意双方代表团定期会晤，商谈有关停战协定的实施问题以及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会晤日期将由双方首席代表经过联络官商定。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元帅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3年7月7日

代表团大会于7月10日复会了。美方首席代表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改变了过去习惯在会场上吹口哨，也改变了他那满不在乎的傲慢态度，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听取我方的质询，并把要回答的措辞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纸条上交给其他代表传阅同意后再照本宣读，表现出沉着老练的样子。这样的会议连续开了6次，直到7月16日才告结束。对我方的提问或作答复或重复或默然，虽然话不多说措辞很谨慎，答复也有分寸，但处在被告席上，像审判案子一样，这是谈判以来美国代表处在十分尴尬的地位，最终还是作出了肯定的保证，保证韩国军队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如果韩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并承认朝中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国军仍保持停战状态，也不向韩国提供武器弹药、物资装备供应在内。

7月19日，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将把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将军对实施停战问题所做的保证以声明的形式公之于世。声明说：

1953年6月下半月，你方的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在联合国军的控制之下，胁迫27000余名我方被俘人员离开战俘营，破坏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因而使停战协定的签订遭受拖延和阻挠，并使停战协定各项条款的实施失去保障。我们认为，对于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的这一破坏行动以及由此行动而可能引起的关于朝鲜停战的不利发展，联合国军是不能推卸它的纵容责任的。

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的破坏行动引起朝中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最大警惕。为了取得对于实施停战协定各项条款的明确保证，以便能够在朝鲜实现真正的停战，朝中方面认为有必要向联合国军方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要求澄清。现在，

为使世界人民得以共见你方的保证，我们根据记录将你方对于我方所提各项问题的答复综述如下：

一、关于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在内的的问题，哈利逊将军在1953年7月11日答复说：“联合国军在提出执行停战协定时，已表示愿意受停战协定草案各项条款的约束。”在7月16日哈利逊将军说：“我在7月12日说过‘你们被保证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我再次向你们保证，我们已从大韩民国政府获得必要的保证，即它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条款的实施。”

二、关于南朝鲜军队是否将在停战协定签字12小时内完成停火，并将在协定生效72小时内全线自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以成立非军事区，以实现在朝鲜真正的停火与停战的问题，哈利逊将军在7月12日和7月15日先后作了同样的回答：“大韩民国军将停火并后撤。”

三、关于联合国军方面如何保证南朝鲜军队能够遵守停战协定各有关条款的问题，哈利逊将军在7月11日回答说：“一旦停战协定的条款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破坏，停战协定中规定将事实向军事停战委员会提出……最后如果停战委员会为保证停战条款的遵守而作的努力结果无效，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因另一方不遵守停战的协定而受到威胁，则受害一方有正当和充分的理由可以取消停战协定的条款，并采取在该情况下为其所认为必要的军事行动。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支持。”

四、关于如果南朝鲜军在停战后破坏停战协定、采取侵略行动，而朝中方面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时，联合国军是否仍保持停战状态问题，哈利逊将军在7月13日说：

“回答是是的。”

五、关于如果南朝鲜军在停战后破坏停战协定、采取侵略行动，而我们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时，联合国军方面所谓不予以任何支持是否包括不给予南朝鲜以装备和供应上的支持的问题，哈利逊将军在7月13日说：“回答是是的。”

六、关于联合国军首席代表曾说在“敌对行为停止后的期间”，南朝鲜政府将与联合国军紧密合作实施停战协定草案各项规定的问题，朝中方面曾指出敌对行为停止后的期间的约束语显然与停战协定不合，因为停战协定的有效性并无时间限制，而联合国军方面这句约束语与李承晚所表示的他只不过在90天内不阻挠停战的话有暗合之嫌。后来哈利逊将军7月13日回答说：“停战没有时间限制。”7月16日哈利逊将军说：“你方曾要求保证大韩民国政府与军队将在整个停战有效期间，而不是到某一个期限为止的暂时期间遵守停战协定的所有规定……联合国军已明白而不含糊地向你们说过，它准备缔结并遵守该停战协定的全部规定……包括第六十二款。”

七、关于联合国军方面是否保证按照停战协定前往南朝鲜地区工作的中立国人员和朝鲜中方面人员的安全和他们工作上的便利的问题，哈利逊将军在7月12日回答说：“任何按照停战协定被准许进入大韩民国的人员受到保护。”7月13日哈利逊将军进一步答复：“回答是是的。按照停战协定所派遣到我方地区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及你方人员将被保护和给予他们工作上的便利。”

八、关于如何保障按照协定进入南朝鲜地区执行任务的中立国人员及朝中方面人员的安全，并使他们得到工作上的便利的问题，克拉克将军在1953年6月29日给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将军的复信中称：“遇有必要之处，联合国军将尽其所能建立

军事上的防御措施，以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哈利逊将军在7月10日也说：“联合国军将对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及联合红十字小组提供警察保护。”

九、关于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破坏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强迫扣留了27000余名我方被俘人员的问题，我方认为，联合国军方面负有将这些人全部追回的无可推诿的责任。克拉克将军在上述6月29日的回信中曾说：“联合国军正继续努力以追回已逃亡的战俘。”但哈利逊将军却对此事未作进一步的交代。

十、关于联合国军方面是否准备保证对其余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不再采取强迫扣留行动的问题，哈利逊将军在7月12日回答说：“剩下的战俘在被送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之前将不被释放。”7月15日哈利逊将军说：“拒绝被直接遣返的剩余的你方被俘人员将被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送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

但是，关于追回被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强迫扣留的27000名战俘问题，联合国军方面在实际上并没有做过任何努力，也没有向我方作出进一步的交代。而关于不直接遣返的剩余战俘问题，尽管联合国军方面曾多次肯定保证：这些人员将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送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但美国总统代表罗伯逊先生在其与南朝鲜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却公然主张“在一定的时期结束时，凡是希望避免回到共产党统治下的俘虏，都应在南朝鲜释放，而对于非共产党的中国俘虏，则让他们到他们所选择的目的地去。”显然这个联合公报在朝鲜停战协定中不起任何约束作用，但美国政府与南朝鲜政府这个主张显然是违背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第十一款，而企图在停战后为南朝鲜进一步破坏战俘协议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

员预作准备。鉴于上述情况，我方对于你方关于战俘问题的保证，认为不能满意，并保留我方要求你方保证完全实施战俘协议的权利。

鉴于联合国军方面关于朝鲜停战协定实施问题所做的保证，尽管我方对你方关于战俘问题部分的保证尚不满意，我方仍然准备与你方即行讨论停战协定签字前的各种准备工作。朝中方面声明，你方对于被强迫扣留的战俘在任何时候都负有全部追回并向我方提出交代的责任。

如果在停战后，你方尚不能将这批战俘追回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我方将保留将这个问题提交停战协定第六十款规定的政治会议讨论。关于不直接遣返的全部战俘，按照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由拘留一方在朝鲜境内指定地点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一事，鉴于南朝鲜政府曾经声明拒绝印度部队入境，我方认为必须在停战签字以前解决此问题，以便及时通知各有关中立国家和印度部队预为准备，而不应将这个问题留在停战以后交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解决。

必须指出：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直到最近尚在公开声称南朝鲜反对停战并有其行动的自由，而联合国军对之亦仍然采取纵容政策。朝中方面在此必须声明，联合国军关于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遵守停战协定条款的保证将只能按其表面价值而被接受。如果联合国军对南朝鲜政府及其军队的这种纵容政策继续下去，则不论在停战前后，朝鲜停战协定条款的实施均有继续遭受破坏的可能。这是全世界和各国政府、各国人民、特别是朝鲜交战双方有关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所必须严重注意的。我们认为，任何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联合国军方面必须依据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委员会的视察判断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公正要求来严格执行其自身已经提出的庄严保证。

朝中方面于此将有权根据停战协定以及联合国军所提供的保证采取反侵略的自卫行动来保障停战的实施。

一旦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中方面保证实施停战协定的全部条款。我们并相信，全世界最爱好和平的人民对于朝鲜停战必将予以坚决的支持，以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挫败好战分子的任何阴谋。

## 彭德怀代表中国签字

7月22日，双方代表再次校正、核定军事分界线。校正表明，我军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较之第一次协议的军事分界线共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原先我方主张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美方主张以实际控制线为军事分界线，这样可以占点便宜，结果适得其反。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板门店签订了。因为周恩来考虑到金日成、彭德怀的安全问题，万一李承晚再破坏，它的后果将比扣留战俘更为严重。所以与对方商定，由双方首席代表先签字，并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然后分别送双方的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彭德怀和克拉克签字。上午10时10分，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分别在九本停战协定上签字。

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他签字后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在我们这一生将不会结束。”也就是说他还不甘心失败，可是历史是

无情的。

7月27日，南日带着协定文本赶往平壤。当日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金日成元帅于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于7月27日下午在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官崔庸健次帅的陪同下到达开城，住在来凤庄，并先后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驻开城前线部队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以及朝中代表团为庆祝达成停战举行的盛大宴会，并于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新修建的会议室里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是这位戎马一生、名震世界的大将军历史性的最光荣的一页，他受到中朝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和钦佩。后来他被朝鲜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他在签字后发表重要谈话庆祝停战协定签字，朝鲜实现和平，感谢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在后来的《自述》一书中描绘他当时的心情说：“先倒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似有一些可惜。”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同时公布了内容包括五条六十三款的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和有关附件的原文。

朝鲜停战是中朝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是军事、外交上的重大胜利，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从此，中国如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跻身于世界大国之林。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字更加响遍世界。他们不愧为伟大的军事家、外交家。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和金日成扮演



了主角，是胜利者、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人类和平光荣的旗手、是真正的大英雄。虽然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艾奇逊、麦克阿瑟、克拉克也是主角，但是失败者，这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实。

彭德怀在事先与周恩来商定并审阅过的于1953年9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中，对朝鲜停战谈判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论述：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火拼、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谈判，而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很显然，帝国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谈判是不甘心不情愿地接受的，它无时无刻不在力图翻案。因此，朝鲜停战谈判不得不是一场异常尖锐的、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